符号学译丛 ·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本书系作者专门为中国学界编选，
有对过往符号学大师的缜密解读，
亦有对微妙符号学概念的晓畅阐发，
更有直面当今全球化的符号伦理学批判，
集中展现出作者对符号学前沿问题的跨学科探索。

符号疆界：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Semiotic Horizons. From Global Semiotics to Semioethics

〔意〕苏珊·佩特丽莉／著　周劲松／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符号学译丛

2014年—2015年出版目录：

皮尔斯著，赵星植译：《皮尔斯论符号》

托多罗夫著，方芳译：《奇幻文学导论》

克里斯蒂娃著，张颖译：《诗性语言的革命》

佩特丽莉著，周劲松译：《符号疆界：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库尔、麦格纳斯编，彭佳译：《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研究进路》

艾赫拉特著，文一茗译：《电影艺术与符号学》

埃诺、贝雅埃编，怀宇译：《视觉艺术符号学》

宇波彰著，李璐茜译：《影像化的现代——语言与影像的符号学》

韦尔南著，曲辰译：《符用学研究》

莫利涅著，刘吉平译：《符号文体学》

贝尔金著，魏全凤译：《送礼的社会符号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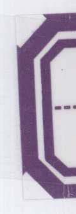
谢赫特著，余红兵译：《符号学与艺术理论：在自足论和语境论之间》

文内尔著，魏伟译：《坠落的体育明星、媒介和名流文化》

艾赫拉特著，宋文译：《丑闻的力量：大众传播中的符号学与实用主义》

2016年—2018年出版目录（略）





定价：52.00元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

符号学译丛 ◎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本书系作者专门为中国学界编选，
有对过往符号学大师的缜密解读，
亦有对微妙符号学概念的晓畅阐发，
更有直面当今全球化的符号伦理学批判，
集中展现出作者对符号学前沿问题的跨学科探索。

符号疆界：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Semiotic Horizons. From Global Semiotics to Semioethics

〔意〕苏珊·佩特丽莉／著 周劲松／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冰
责任校对:周小诗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符号疆界: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意)佩特丽莉(Petrilli,S.)著;周劲松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2
(当代符号学译丛)
ISBN 978-7-5614-7529-4

Ⅰ.①符…　Ⅱ.①佩…　②周…　Ⅲ.①符号学—研究　Ⅳ.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3473 号

Semiotic Horizons. From Global Semiotics to Semioethics
By Susan Petrilli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进字 21－2014－50 号

书名　**符号疆界: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FUHAO JIANGJIE: CONG ZONGTIFUHAOXUE DAO LUNLIFUHAOXUE

著　者　〔意〕苏珊·佩特丽莉
译　者　周劲松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529-4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20
字　数　32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第二部分

附 录

绪 论

经由苏珊·佩特丽莉而从符号活动到符号伦理学

(美)约翰·迪利

因为符号生命并不停止，当然，并不因其固化在对象之中而停止。……存在的符号……始终处在正在形成这种状态之中……停顿始终是暂时的。

——埃罗·塔拉斯蒂：《存在符号学》(Earo Tarasti, 2000: *Existential Semiotics*)

对符号的兴趣，作为对知识文化普遍兴趣的一种主题性或特殊性研究对象，是在20世纪最初出现的一种现象，在西欧是在“semiology”名下[该名称来自斐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年11月26日—1913年2月22日)]，在东欧则是在“semiotics”名下[名称来自尤里·洛特曼(Juri Lotman, 1922年2月28日—1993年10月28日)，洛特曼把自己的理论建构在索绪尔的基础之上，但与索绪尔不同，他知道更早些时候约翰·洛克(John Locke)所建议的这个名称]。因此，20世纪学界对符号的普遍兴趣，无论东欧还是西欧，最初都是源自索绪尔这位瑞士语言学家。比索绪尔稍微早一些，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年9月10日—1914年4月19日)也独立地进行这样一种研究，他将其称作“semiotic”[①]；并且他把符号活动——关于符号知识的研究就从其中提取而来——称作“semiosis”。

索绪尔最初集中关注的是语言这种人类物种专有的交流形式，并且将其符号视野限定在文化领域。1963年，托马斯·A.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 1920年11月9日—2001年12月21日)带着自己的观点加入了讨论，他的论点——更确切地说，表述——是所有动物，而不仅是人类动物，都使用符号并通过符号交流，由此，他拓展了对符号活动(即semiosis)的理

① 参见：http://www.cspeirce.com/menu/library/aboutcsp/deely/clearing.pdf.

解，将其推广到整个动物王国。

现在，一个符号要成其为符号，当然不应该只代表非自身的某事物［就像在索绪尔的能指/所指（*signi ficant/signi fiè*）模式中那样］，而且必须为某个第三者——符号的解释者——制造出“其他再现”（other representation）。对西比奥克而言，这个“第三者”（the third）是某一个——任何一个——动物；但是，皮尔斯引入了一个论点——这个“第三者”或者“解释者”不一定关系到“精神的”事件，由此他提出，有符号活动就必须要有这个第三项，且应该被称为“解释项”（Interpretant）而不是“解释者”（interpreter），这样便开辟了一条超越动物交互活动世界的符号理解之路。

西比奥克，作为《符号学刊》（*Semiotica*）主编［*semiotica* 这个词，实际上是希腊文 *σημωτικ* 的拉丁文音译，它第一次出现是在 1690 年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e Understanding*）的结尾章，约翰·洛克关于“一门有关符号的科学或学说”的最初主张正是在此提出］，于 1981 年编发了马丁·克拉蓬（Martin Krampen）的一篇文章。文章表明，符号活动在植物世界中并不比在动物世界中少，这使得西比奥克总结出“符号科学与生命科学共在”这一论点。这一论点成为今天被称为“生命符号学”（biosemiotics）这种更为广泛的符号研究的基础，即对来自人类世界的符号活动的研究［称为“人类符号活动”（anthroposemiosis）］；来自广泛的动物世界的［称为“动物符号活动”（zoösemiosis）］；以及来自植物世界的［称为“植物符号活动”（phytosemiosis）］。1989 年，在该年度的哈佛皮尔斯大会上，笔者融合现代文化知之不多的约翰·普安索（John Poinsot，1589 年 7 月 9 日—1644 年 6 月 17 日）的符号学和皮尔斯的解释项概念，进一步提出，符号活动［笔者称之为“物质符号活动”（physiosemiosis）］在生命来临之前和来临之际就已经在这个物质世界中进行了，是它首先推动世界从其最初的无生命状况发展到能够支撑起生命存在这种状况。

西比奥克第一个阐明了这一要点：符号学提供了唯一的、本身就该如此的跨学科或“学科间”（interdisciplinary）这一立足点；换言之，符号学把每种其他学科过去想当然地进行研究的那种东西主题化了，而那种东西就是符号活动。

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20 世纪的符号学发展“变得全球化起来”，在这一令人动容的现象中，核心的组织性人物，从 1963 年起，既不是皮尔斯，也不是索绪尔，而是托马斯·A. 西比奥克。

然而，截至 2001 年 12 月 1 日西比奥克过世，符号学最后一个大发展已经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即符号视野不仅融入理论知识领域，而且——正因为整

个人类知识从头到尾都与符号活动相关这个理由，洛克曾经指出，这正是符号学与众不同的特质——融入“实际知识”的领域，或者说，融入人类对人类行为的控制，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对人类行为的责任担当。这里所说的“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就符号学的目的而言，涉及该行为的全部内容：不仅包括社会交往，而且包括与整个物质环境和生活在人类周遭的生命之物之间的交往，人类存在正是以种种不同的方式不可分割地依赖其上的。

的确，这一发展超出了西比奥克最初的奠基性概念，然而这无可争议地对西比奥克所奠定的符号学理解的完善具有本质性作用，符号学要从凡是可以发现符号行为之处提取符号行为——事实证明它是无所不在的——便有义务如此。

因此，符号学在21世纪头十年中的主要发展，可以归结为一个词：“符号伦理学”（semioethics）。这个新术语首先表示人类这种动物显露出来的全球性责任感，苏珊·佩特丽莉（Susan Petrilli）和奥古斯都·庞齐奥（Augustos Ponzio）2003年的合著就以此命名。西比奥克生前没有看到这一发展，但这不会让他惊讶。他与苏珊·佩特丽莉的合作从1983年9月18日至30日由联合国发起、在葡萄牙阿尔克彼德西的辛特拉—埃斯托里尔酒店举办的符号学会议就开始了。从那时起直到去世，西比奥克和佩特丽莉一直有合作，他的著作大都由后者翻译成了意大利语，而佩特丽莉本人也通过撰写大量著述和出席各种会议，成为符号学发展的一位主要推动者。

这本为中国读者而出的书，以专著形式最为完整地呈现了佩特丽莉博士对符号伦理学发展的独创见解以及符号伦理学维度的符号学思想发展，即这一思想以符号活动研究为基础，尤其思考了人类对于人类的责任。事实表明，人类除了像其他动物一样依赖于符号活动而幸存甚至昌盛，还被证实能够意识到符号的存在，因而能够意识到未来如何通过现在而对过去事件的相关性进行重组，使得我们——人类，种类特异的符号动物——能够为塑造地球上的未来承担责任。这不仅是为了这种或那种文化或人类群体的“共同利益”，而且是服务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生物圈中的人类整体的“共同利益”；若非如此，等待地球人类的唯有灭绝。

苏珊·佩特丽莉已经成为对这一全球观表述最为清晰的发言人，这一全球观具有将表述转换到伦理方面这一蕴含。读者手中的这本书是一个里程碑，它完成了西比奥克的构想：起初，西比奥克对符号学的要求是，必须根据它的全部内容来对符号活动做出思考，因为对符号存在产生影响的活动贯穿——弥漫——我们作为组成部分的整个世界。

第一部分



“总体符号学”世界中的责任与生命[①]

本文中我将把总体符号学看作涉及所有和符号相关学科的一种元科学。总体符号学不能被化约为科学哲学这种地位，但无疑，作为一门科学，它和哲学存在着一种对话性的关联关系。作为“符号的动物”（semiotic animals），人类能够用总体的观点来看待符号活动，并因此而具有责任能力。从这一观点看，符号的动物也就是“符号伦理的动物”（semioethic animal）。既然符号活动和生命之间具有如同总体符号学在理论上所阐述的那种关系，那么要提出的问题就是：作为符号的动物，我们对于生命、对于总体性之中的世界，具有什么样的责任？

一、总体符号学、总体符号活动以及生命

作为一个符号表达的事实，整个世界都进入了托马斯·A. 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1920—2001）所谓“总体符号学”（参看 Sebeok 2001b）的领域中。[②] 在这种总体观中，符号学是“生命科学”和“符号科学”两相交汇的所在。这意味着符号与生命交汇。所以，总体符号学是人类充分意识到人类是符号世界中的一个符号这样一个所在。

西比奥克拓展了符号研究——“符号学”（semiotics），或更确切地说，“符号学”（*semiologie*）——的传统边界，提供了远比后者更为综合的一种研究方法。“符号学”［semiology，从索绪尔（Saussure）发展起来的那种符号

---

① 本文最初是为2003年6月8日至12日于芬兰伊曼特拉所召开的“国际符号与结构研究夏季研讨会”（International Summer Institute for Semiotic and Structural Studies，简称 ISISSS）所撰写，于6月9日的“西比奥克的世纪：向托马斯·A. 西比奥克的生涯和贡献致敬”（The Sebeok Century. A Hommage to the Life and Work of Thomas A. Sebeok 1920－2001）分论坛上进行了宣读，当时本文题名为《“总体符号学”世界中的人类责任》（Human responsibility in the universe of “global semiotics”），后来又在埃罗·塔拉斯蒂（Eero Tarasti）主编的《符号学》杂志特刊上（*Semiotica* 150－1/4，2004，151－167）发表。这里有所改写和扩充。——作者注

② “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这个表达，是西比奥克1994年6月18日作为国际符号学会名誉会长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一次讲座的标题；此文现收入 Sebeok，*Global Semiotics*，2001。

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以文字标准为基础和以部分代整体（*pars pro toto*）这种错误的制约。换言之，索绪尔式符号学错误地用人类符号（尤其是文字符号）来取代所有可能的符号——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基于这种神秘化，semiology宣称自己是关于符号的一般科学是不正确的。相反，关于符号的一般科学为自己选择了 semiotics 这个术语，并且和 semiology 及其局限方面保持了批判距离。西比奥克把符号研究中的 semiology 传统称为“小传统”（minor tradition），反过来提倡以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查尔斯·S. 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以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伦（Galen）及其关于符号与病征的古典研究为代表的“大传统”（major tradition）。[①] 所以，从它的地位明确及其广泛运用的意识来看，符号学是新近的；而从其——按照西比奥克的观点（1979）——至少可以回溯到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根底来看，符号学又同时是古老的。

西比奥克通过出版大量著作，倡导一种与生命进化研究耦合的广阔的符号学视野。经过西比奥克的努力［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查尔斯·S. 皮尔斯、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和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等人的启发］，今天对符号学领域和历史的认识已经必然地发生了改变。由于西比奥克的贡献，新千年开始之际的符号学已经拓宽了自己的疆界，而这无疑比20 世纪 60 年代前期所展望的广阔了许多。

西比奥克关于“符号生命”（life of signs）的研究方法之所以是“总体的”或者说“通盘的”，可能与他对“生命符号”（signs of life）的关注直接相关。在他看来，符号活动与生命相互耦合，符号活动起源于生命的第一次颤动。这使得他归纳出一条原则，他相信这是符号学中最为核心的原则：“符号活动是生命的标准属性。”

“总体符号学”（Sebeok 2001）为研究符号生命和生命符号提供了一个交汇点和观察点。与符号学中的“大传统”一致，西比奥克对符号生命的总体性研究方法预设了他对人类中心和语言中心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在对符号科学或（他称之为）“学说”（doctrine）的界限和边缘所进行的探索中，西比奥克开放了这个领域：一方面，他使之包括了“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这个术语是他 1963 年引入的），甚至是更为广泛的“生物符号学”

① 汉语学界中把 semiotics 和 semiology 都同样地翻译成“符号学”已成惯例，其实不妥，在本书的翻译中，为了表示区别，译文中凡“符号学”都对应 semiotics，都是指“大传统”意义上的，而如果特指 semiology（或法文 *semiologie*），则会附上原文注明。——译者注

(biosemiotics)；另一方面，他使之包括了“体内符号学”（endosemiotics）[有关诸如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等符号系统的符号学，参看由 Thure von Uexküll 撰写的“体内符号学”（Endosemiotics）这一词条，载 Posner，Robering，Sebeok 1997－2004，vol. 1：464－487]。按照西比奥克的认识，符号科学不仅是“根据社会生活对符号生活进行研究的科学”（Saussure 1916：26），即研究文化中的交流，而且是在生物符号学视角中对交流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因此，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被赋予了最为广阔的能力表现，这也成为其特色。

二、跨越符号活动界限

西比奥克的文章《符号活动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semiosis）（载 Posner，Robering，and Sebeok 1997－2004，I，亦收入 Sebeok 1991）是以“什么是符号活动?”这个问题开始的，而他给出的回答则从关于皮尔斯的一则引用开始。西比奥克发现，皮尔斯把符号活动或者“符号的行为”描述成一个不可化约的三元过程或者关系（符号、对象以及解释项）（*CP* 5.473），关注焦点在解释项如何产生。所以，这涉及对符号的目的论（即目的导向）的理解或者解释。

不仅存在作为其他某物符号的符号，还存在把某物当作其他某物符号的“某人”（somebody），即“准解释者”（Quasi-interpreter）（*CP* 4.551）。皮尔斯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描述的意蕴，他说：“它具有符号的性质，尤其是这一符号因为能够被解释为一个符号这一事实中的一个特征而变得有意义。当然，除非它被解释成符号，否则无物是符号。”（*CP* 2.308）他还说：“符号只是因它得到解释才成为符号的，也就是说，因为它决定着同一对象的另一个符号。”（*CP* 5.569）

从解释项的角度看，也就是从符号—解释活动或者从符号推导角度看，“符号活动”（semiosis）可以用“解释”（interpretation）来描述。皮尔斯做了具体说明：“符号要求至少两个‘准头脑’（Quasi-minds）；一个是‘准发话人’（Quasi-utter），一个是‘准解释者’（Quasi-interpreter）。”（*CP* 4.551）解释者，头脑或者准头脑，“也是一个符号”（Sebeok 1994b：14），确切地说是一个回应，即解释项。解释者是一个做出积极回应的“某人”。

在《符号活动的进化》这篇文章中，西比奥克接下来通过引用莫里斯来回答“什么是符号活动”这个问题。莫里斯在 1946 年把符号活动定义为“某物是某有机体的符号这一过程”。西比奥克认为，这个定义有效而必然地暗示着

符号过程中有生命实体在场。而这意味着，符号活动是与生命进化一道出现的。

譬如在詹姆斯一世版的《圣经》中（《启示录》I.3），关于上帝说过“要有光”（Let there be light）这种说法，人们必然认为这是错误再现：上帝可能说的是“要有光子”（Let there be photons），因为对以光信号形式存在的电磁辐射的感知（Hailman 1977：56－58），即光亮，须有有生命的解释者存在，而生命物的存在并不早于39亿年前。（参看 Posner，Robering，and Sebeok，1997－2004，I：436）

按照莫里斯的观点，符号活动中所暗含的有生命的实体是一个宏观有机体；相反，从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观点看，它则可能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一部分，或者一个基因。

在《符号活动的进化》这篇文章中，西比奥克考察了符号活动之前和世界开始之后的宇宙，提到了现代宇宙学的通行范式——“大爆炸理论”（the Big Bang theory）。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出现生命之前——最早痕迹可以追溯到所谓的“太古代”（Archaean Aeon），时间是从39亿年到25亿年前——当时存在的物质现象只是非生物核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稍后有了非有机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可以描述成“准符号活动”（quasi－semiosic）。不过，“准符号活动”这个概念必须和意大利肿瘤学家吉奥尔吉奥·普罗迪（Giorgio Prodi）所理解的“原型符号活动”（protosemiosis）分开（1977）。[1]［西比奥克以及乌米克尔－西比奥克（Umiker－Sebeok）1992年所编的《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就是题献给普罗迪的。书中，普罗迪被描述成“当代生物符号学中勇往直前的开路人”］实际上，就物质现象而言，“原型符号活动”是比喻性质的。按照西比奥克的观点，符号活动就其定义而言就是与生命相关的。他对非生物性相互作用和“原始交流”（primitive communication）进行了区分，后者指通过体内粒子进行信息传递，譬如在神经节中，在现代所理解的细胞那里，传递是通过蛋白质粒子进行控制的。

据我们所知，并不存在地球生物圈之外的生命，于是，在我们星系中，更不用说在外太空中，是否存在生命/符号活动便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西比奥克说，我们到目前为止只能认为“太空生物学符号学”

① 吉奥尔吉奥·普罗迪（1928—1987）：“一方面，是其本国肿瘤治疗方面领先的医学生物学家；另一方面，他对符号学和认识论、语言哲学和形式逻辑做出了极具原创性的贡献，此外他还是一位值得称道的文学界人士。普罗迪对该领域（免疫符号学，生物符号学重要分支）的早期贡献，‘具有奠基性的意义’”［西比奥克：“前言”（Foreword），见 Capozzi 1997：xiv］。

（exobiology semiotics）和“超地球符号学”（extraterrestrial semiotics）是姊妹学科，尚未有研究对象。

根据今天获得的信息，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在符号活动环上至少有一个链环必定是有生命的、地球的实体：这也许只是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甚至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人工延展。毕竟，符号活动是地球的生物符号活动。西比奥克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如前所述，是符号活动与生命相互耦合。符号活动被认为是区分有生命和无生命的标准性特征，要记住，符号过程并不总是存在于世界发展进程之中：符号进程和生命之物是与生命的发展一道起源的。

认同符号活动与生命，赋予了符号学一种截然不同于艾柯（Eco）所认为的作用。在艾柯的描述中（1975），符号活动与生命之间的结合所关系到的是“符号学的低门槛”。按照艾柯的观点，如其在1975年的著作中所表述的，符号学是一种文化科学。在西比奥克的解释和实践中，符号学则被当作一种生命科学、生物符号学，而且，生物符号学也不能被化约到仅仅作为符号学的“分支”这种地位。

三、符号活动世界的符号

西比奥克符号研究中所出现的“符号世界”包括多个方面：

——如生物科学所描绘的符号生命和生命符号：关于动物生命的符号和专门的人类生活的符号，关于成人生活的符号，关于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符号，关于交流能力分解和退化的正常或病态形式的符号。

——人类的文字的和非文字的符号。人类的非文字符号包括依赖自然语言的符号和不依赖自然语言、不被各种语言学家算在其内的符号。它们包括各类“寄生”语言的符号，譬如人工语言、“肢体语言”的符号，譬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的符号语言、聋哑人的语言、婴儿的符号，在其更依赖于文化的各种表现中以及其各种自然—生物表现之中的人类身体符号。

——人类受意志控制的意图符号，以及如同“聪明的汉斯”（Clever Hans）（参看 Sebeok 1979 及 1986）案例中人类与动物之间交流中所出现的非意图、无意识符号。从这一观点看，动物似乎能够做出某些表现（譬如算数），仅仅是因为它们对于其训练者的无意识和非自觉暗示做出了反应。这一组中还包括各种层次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生命中的符号，以及各种形式的撒谎（西比奥克对动物中的撒谎也进行了辨别和研究）、欺骗、自欺、信念等。

——最大程度的多声部性符号，以及与之相反的，以单声部为特征并因此而成为信号的各种符号。

——按照其不同指示性、像似性和象征性程度来看待的各种符号。

——“符号大师的符号”：(a) 通过它们我们能够对符号学的起源进行追溯的符号（譬如，在古代与占卜和医学有关的符号）；(b) 通过它们我们能够辨别直接或间接地［作为“蹑行符号学家”（criptosemioticians）］为符号学形成特色和做出发展的学者的符号；(c) 通过它们我们能够确立符号学相关某特定民族或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的符号，譬如西比奥克对美国符号学的研究。“符号大师的符号”还包括有关轶事、证言、个人回忆的叙事符号，它们揭示出这些大师不仅是学者，而且是人——他们的个性、行为、日常习惯等。即便是这些符号，“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too human）[1]，都没有逃出西比奥克的研究兴趣。

所有这一切，与索绪尔传统中所认为的符号科学相比，已经相去甚远！

四、总体符号学

对西比奥克而言，符号学不仅是对社会—文化生活范围中的符号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换言之，“研究关于社会生活意义的符号生活的科学”（索绪尔语）。在思考关于非意图交流的符号［表意活动符号学（semiology of signification）］之前，符号学进一步受到把注意力一味投向关于有意图交流的符号［交流符号学（semiology of communication）］这种限制。这反映了索绪尔以降的符号学主流。相反，西比奥克之后的符号学则不仅是人类符号学（anthroposemiotics），而且是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植物符号学（phytosemiotics）、真菌符号学（mycosemiotics）、微观符号学（microsemiotics）、机器符号学（machine semiotics）、环境符号学（environmental semiotics）和体内符号学（endosemiotics，在个体和种系层面对有机实体内部的控制系统所进行的研究）：所有这一切都被囊括在“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名下，或者，在现在和将来，越来越多地囊括在直截了当的“符号学”（semiotics）这一名称之下。

按照西比奥克的看法，生物学（因而就是生物符号学）处在有关人类动物的交流和表意活动操作研究的核心位置。以此着眼，生物学家雅克布·冯·尤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这位西比奥克对之进行过最充分研究的蹑行符号学家［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的老师］，是属于符号学史的。

---

① “人性的，太人性的”是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名言，他探讨人性的一部格言体著作就以此命名。——译者注

西比奥克的符号学联系起了其他知识领域和人类实践，而通常，因为专门化的需要，或者因为无益甚至有害的短视性的部门化，它们是彼此分隔的。这种态度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意味，常常蹩脚地以科学秩序这种动机作为掩饰。

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动物行为学和语言学、心理学和健康学，它们的内在分野——从基因学到医学符号学（病征学）、心理分析、老年学和免疫学——都如西比奥克所认为的，在符号学之中找到了交汇和相互交流的位置，找到了系统化和统一化的所在。然而，重要的是看到，系统化和统一化并不像新实证主义那样，按照"百科全书"这个静态术语来理解（无论是将知识和语言实践并列，还是把知识化约到一个单一科学领域及其相关语言，如同在新实证主义物理主义中那样）。如本文开头提到的，总体符号学是一种元科学，关注焦点是和符号相关的所有学术科目；同时，作为一门科学，它与哲学之间具有对话性关系，这并不意味着要让符号学沦落到科学哲学这种地位。

通过有利于明确新型跨学科关系和新的解释实践的不断地、创造性地变通，西比奥克发展起一种总体性的视角。他证实了一般被认为不存在符号关系的那些位置的符号关系，在那里，我们所有的仅仅是独立于交流和解释操作之外的事物中纯粹的"事实"和关系。此外，视角连续不断地变迁有利于发现新的认知领域和语言，而它们又能与之进行对话性互动。这是一个有关证实各种领域和语言中对话性被解释者—解释项符号的问题。随着对这门科学的界限和边缘的探索，西比奥克触及了符号学这门"关于符号的学说"的开放本性。

五、生命之后符号活动的命运

由于西比奥克而使得符号学达到了自觉，就像由于黑格尔而使哲学精神达到了自明（黑格尔自己是这么说的），这一说法我们并不认为太夸张（也许有一点）。而且，就黑格尔的情况而言，哲学自觉是和哲学化的终结相关联的，就西比奥克而言，符号学方面的符号活动自觉是和符号活动也会终结这种意识相关联的。在西比奥克这里（1991b），不可避免的问题是：符号活动，它的未来会如何？

符号活动延伸到整个地球生物系统，从位于下限的分子机制范畴到位于上限、被命名为"盖亚"（Gaia，希腊语中意为"大地之母"）的实体。"盖亚"这个术语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自然科学家引入的，目的是表示包括地球上各种不同生命形式交互行为在内的整个地球生态系统。正如西比奥克援引《格列佛游记》（*Guilliver's Travels*）中的奇幻世界所说的，符号活动覆盖了从分子基因学和病毒学的小人国世界，到格列佛的真人大小世界，最后再到盖亚这

个巨型生物—地理—化学生态系统的大人国世界。

这之上呢？我们能够说符号活动超出了盖亚吗？不仅按照空间，而且按照时间来理解“之上”（beyond）呢？在盖亚之上、之外，在这个巨型有机体的生命周期之外，符号活动可能吗？西比奥克对这个问题也有所思考［参看《符号活动与符号学：它们未来会怎样?》（Semiosis and Semiotics. What lies in their future?，载 Sebeok 1991b：97—99）］。

通过研究，西比奥克盘点了过去大约三十年间符号学领域发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总体性进展和扩张。从对“符号学是关于任何类型的信息交换和相关符号系统的研究”这个过于简单化的界定开始（对之他做出了抨击），他对作为对现实与虚幻之间进行思考的“沉思游戏”（play of musement）的符号学进行了理论梳理：符号学关注的核心是如出一辙的幻象，它们形形色色，数量无限；符号学的主要任务是在现实与虚幻之间进行思考——揭示现实之下的虚幻底子，寻求不管如何都可能从这种虚幻中泄露出的现实。这是一种试推法（abduction）性质的任务，于是，只要能够引导年轻人去关注他们所选出的医学人士的意见，就会变成后来者孜孜以求的特权（Sebeok 1986：77—78）。

我们相信，西比奥克所提出的这个有关符号活动命运的问题，也源自他意识到相对于符号活动的符号学责任。在超越西比奥克的意义上，我们现在相信，总体符号学演进到我们所提出的“符号伦理学”（semioethics）的时间已经来临（参看 Petrilli and Ponzio 2003a，以及 2005：第三部分）。

六、语言、言谈与模塑众多不同世界的能力

人类文字语言的起源问题，常常被科学界当作不值得探讨的问题而搁置一旁，由此而生出了众多幼稚而站不住脚的论断。吉奥尔吉奥·法诺（Giorgio Fano）1972 年出版的意大利文著作《语言的起源与性质》（*Origini e natura del linguaggio*）算是一个例外，该著作的英译本出版于 1992 年。不过，尽管所持的是这种普遍态度，西比奥克却没有忘记起源问题，也没有低估其重要性。他声称，人类文字语言是物种专有的。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他——常常是不乏讽刺意味地——对旨在教授被俘虏的原始人文字语言这类计划的热情支持者发出质疑。西比奥克指出这种计划是荒唐的，是受到动物能够说话这种虚假认识的诱导，甚至更为荒唐的是，以为动物拥有被理解为句法模塑手段的这种语言能力。西比奥克有关“语言”（language）和“言谈”（speech）的区别的论述（1986：第二章），不仅防止了有关动物交流方面的错误结论，而且针对语音中心主义、针对把科学调查建立在人类中心原则基础之上这种倾向，构

成了总体性的批判。

根据西比奥克的观点，语言是作为一种“适应”（adaptation）出现和演化发展的，远远早于从人类物种到智人这种进化中所出现的言谈。语言不仅是作为一种交流手段而出现：这一点上西比奥克的看法与乔姆斯基（Chomsky）一致，即便后者并未对语言和言谈做出这种区分。换言之，语言的专门功能不是传递信息，也不是给予信息。相反，西比奥克把语言描述成一种“模塑手段”（modeling device）。每一物种都被赋予了一种“产生”自己的世界的模式，语言正是属于人类的那种模式。不过，作为一种模塑手段，人类语言全然不同于其他生命形式的模塑手段。它的特殊性质在于语言学家称之为“句法”（syntax）的那种东西，即单个要素的排列和运作规则。但是，尽管对语言学家而言，这些由句法所排列的要素是单词或片语，西比奥克在论及语言中的句法之时，考虑的则是无声的句法。由于句法的作用，人类语言就好比乐高积木一样。[①] 作为一种模塑手段，语言能够以数量无限的方式对数量有限的零件进行重新组装。换言之，正是由于如此这般所理解的语言，相同的零件便可以拆分和组装，构成数量无限的不同模式。

言谈，和语言一样，是作为一种适应而出现的，但是它是为了交流的缘故，而且远比语言来得晚，确切地说，是和智人（homo sapiens）一道而来的。言谈组织语言并使语言外显，因此，语言也以成为交流手段告终，增强了人类已经拥有的非文字方面的能力；言谈从语言发展而来，对此，某些进化生物学家称之为衍生性的“联适应”（exaptation）（参看 Gould and Vrba 1982：4—15）。

正是由于语言，使得人类动物不仅像其他物种那样创造出世界，而且如莱布尼茨（Leibniz）所说，人类能够创造出数量无限的可能的世界。这把我们带回到“沉思游戏”，西比奥克秉承皮尔斯的思想，认为这种人类能力对于科学研究和所有形式的调查尤为重要，而且对于幻想和所有形式的艺术创造都是如此。

符号学——不仅被理解为一门科学，而且被理解为朝向符号伦理学的一种视野——是在人类符号活动领域中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它和“环境界”（*Umwelt*）以及物种专有的专属于人的模塑手段（或称语言）有关。如我们先前所看到的，这种物种专有的一级模塑手段赋予了人类（而非其他动物）创造

① “乐高”（Lego）是总部位于丹麦的一家玩具企业，以所生产的乐高积木闻名于世。——译者注

出无数不同世界的能力，无论这些世界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这里所蕴含的意义就是，人类并不是被束缚在这个如此这般的世界之中，并不是被束缚在种种形式的庸俗现实主义之中。符号学是有关人类物种的事实，但是它可否有效实现则是有关历史—社会的事实。我们的环境界，除了是生物符号活动赋予之外，更是一种历史—社会产物，以至于转变或替代性假设的任何可能，随着其逐步演化，与纯粹的生物材料愈加不同，都能够在历史—社会现实中找到其有效的基质和起点，其面对的条件，以及对其批判和规划所必需的材料。

七、符号的动物：主体、他性和责任

一种总体性的、去整体化的符号学研究方法，要求对他者敞开，要求倾听他者这种极端的能力（参看 Petrilli 1995）。所以，它预设了与他者之间对话性的相互关联这种能力。相应的，我们提出的符号学方法更多地强调了“去整体化”（detotalization）而不是“整体化”（totalization）这一倾向。他性使得总体性向着无限性（infinity）或“无限的符号活动”（infinite semiosis）敞开，引领我们超越认知或象征进入伦理层次，这暗示着与他者的无限关涉，因此而对他者具有责任。

与之相反，随着“生命权利”（bio－power）的扩张以及控制性地把身体植入生产工具，世界交流和作为孤立而自足实体的个体这一概念的扩张携手并进。身体作为一种孤立的生物实体而被体验，它属于个体，是个体归属范畴的组成部分。这导致了基于身体间性、相互依赖、展现和开放的文化实践和世界观几乎全然灭亡。我们可以对比今天全球交流系统中私密而静态的身体观念，以及由诸如巴赫金（Bakhtin）（1965）等进行过理论阐述的中世纪大众文化中的“怪诞现实主义”（grotesque realism）。

如以福柯（Foucault）为代表所揭示的［不过，我们也要记住罗西－兰迪（Rossi－Landi）在其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著作中所展现出的敏锐分析］，众多科学之间的分野和分离，对于“个体化身体的新经典”（巴赫金语）的意识形态—社会方面的必要性而言，是功能性的。这对于控制性地把身体植入今天的生产系统再生产循环而言是功能性的。

有关今天全球化交流语境中的主体的如此思考，根据并不一定是特定意识形态表现的总体计划，能够对符号学起到导向作用（参看 Petrilli 2002）。相反，我们这里指的是有关从责任能力这一角度关注人类行为的符号研究，换言之，指意识到人类作为“符号的动物”这种研究。按照适当的理解，“符号的动物”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者，不仅具有符号能力，而且具有符号的符号这种

能力，具有和整个星球上的符号活动都相关的调适、反映、意识这种能力。在这一意义上，总体符号学必须充分地建立在认知符号学基础之上，而且必须朝着数量和理论之上的第三种维度即伦理的维度敞开。既然这第三种维度和我们所努力的、所希望达成的目标相关，于是我们提出，将它的特征定为“符号伦理学”（semioethics）。

为了满足“符号活动的健康”这一承诺，也为了开发其理解整个符号活动世界这一能力，符号学必须不断锤炼其聆听和批评的功能，即倾听和批判的能力。同时，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相信，以下的三分法：（1）认知符号学，（2）总体符号学，（3）伦理符号学，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治疗理由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具有决定性的（参看 Petrilli 1998a）。

八、超越总体符号学：符号伦理学与他性的人文主义

符号伦理学可以被看作符号学中的一种取向，它致力于发展与他性问题不可分割的一种新形式的人文主义。这也来自符号伦理学对实用主义的承诺，来自它对超越众多科学中分离主义的承诺。它坚持认为各门人类科学，历史—社会科学和自然、逻辑—数学科学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符号伦理学证明，人文主义问题和“他性”（otherness 或 alterity）问题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我们所提出的这种新形式的人文主义，是他性的人文主义，也正是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在其所有著述中，尤其是在《他者的人文主义》（*Humanisme de l’ autre home*，1972）中所展望过的东西。到目前为止，对人权的主张主要是同一性逻辑导向的，他者的权利被搁置一旁。换种说法，“人权”这个表达是遵循传统是同一性人文主义取向的。所以，它倾向于指某人自身的权利、同一性的权利、自我的权利，而他者的权利则被遗忘了。换言之，“人权”这个概念大多数时候都撇开了他者的权利。相比之下，从关注整个星球上的生命——人类的和非人类的，从关注总体的符号活动的健康，从关注不仅局限于严格的文化方面而且是在更为广阔的生物符号活动中的交流发展这样的角度看，这种倾向必然很快受到他性人文主义的反抗——在他性人文主义中，他者是须首先得到承认的。通过如此论断，我们要论及的，不仅是自我之上的他者权利，而且是自我本身的他者、自我的他者。的确，自我的个性特征就是去除、遏制和分隔他性，体现出为了同一性而牺牲他性。但是如此认识的同一性是虚幻的，为了维系或复兴这样的同一性而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注定是失败的。

通过证实在共时性和历时性层面让人与人之间彼此关联的符号网络的拓展

和一致，符号学能够为他性人文主义做出贡献。交流网络在全世界范围的延伸，意味着全球交流系统是在整个星球的层面发展着。如此一来，这种现象便可以用共时性方式加以分析。此外，所有人类，无论个体存在还是集体存在，都蕴含在同一性之中，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决定，包括单个个体所做出的那些，从其最遥远到最新、最近的表现，过去和演变中的未来，在生物和历史—社会层面上，都蕴含在同一性之中，反之亦然。最终，历时性考察（颇让人讶异的是，其对多样性关注得太少）也同样是必要的。

符号网络关注人类所建构的符号界，这个范畴包括文化、文化符号、象征、艺术作品等在内。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西比奥克关于符号活动与生命耦合这一公式，那么，总体符号学教导我们，符号界远远超出人类文化范畴，是与庞大的生物界相互耦合的。符号（生物）界构成了人类的居所、我们发源的母体和注定扮演角色的舞台。

符号学具有展现涉及符号的人类的一切这一优点。的确，它所暗示的不止于此：从总体符号学的观点看，只要是有生命的东西就涉及符号。而且这还是认知符号学和总体符号学所能抵达的地步。不过，符号伦理学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意识，它证实了符号活动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且主要关注责任问题——由于我们是“符号的动物”而铭刻在我们身体中的那种激进的、不可逃避的责任。符号伦理学坚持人类的责任能力，因此坚持对整个星球上生命的责任，把符号的动物重新解释为“符号伦理的动物”（semioethic animal）。符号伦理学证实了符号网络的伦理维度，因此证实了（明确义务与价值观这种）最激进层面上责任的不可逃避性。我们的气质，但还不止于此，连宇宙本身，都在人类责任的范围之内。

此外，所有这一切都导向另外一个假设，根据这个假设，我们可以对关于人性的符号行为做出解释：如果所有人都涉及符号，那么，渐次地，所有符号都是人。不过，这种人文主义的承诺并不意味着重申人性的（独白式）同一性，也不是要提出另外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来。相反，这种承诺暗示着对去中心性和去整体性的激进操作，这并不亚于一次哥白尼革命。对此，维多利亚·维尔比（Victoria Welby）会说，“地球中心说”（geocentrism）须被取缔，之后是取缔“太阳中心说”（heliocentrism），直到我们接近一种真正的宇宙观（参看 Welby 1983 以及 Petrilli 1998b）。在这种宇宙观中，总体符号学与符号伦理学，或者与维尔比的“意义学”（significs），是彼此交叠的。这种宇宙观的达成或近于达成，是我们终极目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是总体符号学和伦理符号学［过去我们提出过的术语有“伦理符号学”（ethosemiotics）、“目

的符号学”（teleosemiotics）和“终极符号学”（telosemiotics）等］的交汇点。如前所述，在与人类责任问题并因此而与我们所描述的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中，陷入危急关头的是他性而非其他。不过，在目前语境中，他性不同于过去一般所承认的那种东西：他性并不简单地指我们邻居的他性，甚至不是指与我们相距遥远的某个人（即便在世界的、全球化交流的今天只是相对如此）。不止于此，他性还暗示着我们与就基因方面而言距离极为遥远的生命之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伦理符号学在今天的一个特殊任务，就是揭露相互之间有所区别就彼此冷漠以待这种主张的虚伪性。

特伦斯（Terrence）曾说“作为人，人之所属，我皆有之”（homo sum：un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对此做了改写，宣称（1963）“作为语言学家，语言之所属，我皆有之”（linguista sum：linguistic nihil a me alienum puto）。在符号学家立场上，这是对一切语言学之所属，实际上，是对被赋予符号价值的一切（不仅是针对人类符号活动，也不仅是针对动物符号活动，而是针对整个符号界）所做出的承诺。它不应该仅仅从认知意义上来理解，还应该从伦理意义上来理解。这一承诺所涉及的关怀，不仅是在“与……相关”这个意义上的，而且是在“对……关心”“关爱……”这个意义上的。实际上，从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对他者的关怀，对他者的关爱，暗示着一种不受归属、邻近或社群方面限制的责任能力：事实上，它并非是被排斥在“语言学家”或“符号学家”之外的一种能力。对雅克布森的说法做出发展，我们可以宣称，符号之“有之”，并不专门就职业语言学家或符号学家而言，而更重要的是对人类而言。省去特伦斯突兀的开头部分，我们可以这样接下去声称：作为人，我们不仅是“符号活动的动物”（semiosic animals）——就像所有其他动物一样，我们还是“符号的动物”（semiotic animals），而且在后一意义上，相比动物王国中的其他，人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任何符号活动的东西，包括生物界及其所发源的进化中的宇宙，都系“我皆有之”。

符号伦理学并没有一个具有意图目标和实践的规划提出，没有什么“十诫”，也没有什么严格贯彻的规定，所以，多少具有务虚性。从这一观点看，符号伦理学不同于格套、规范和意识形态。如果要说的话，符号伦理学能够对格套、规范和意识形态做出批判，因此能够对各种特色化的类型做出批判，譬如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在《意指与意味》（*Signification and Significance*，1964）中所涉及的那些［想想他关于“操作价值”（operative value）、“认定价值”（conceived value）和“对象价值”（object value）以及

“疏离”（detatchment）、“主导”（dominance）和“依赖”（dependence）这两个三分法吧]。

符号伦理学暗示着人类独具特色的批判能力。它的特殊工作是证实符号网络存在于看上去并不存在的地方，它昭示和评价无法逃避的关联、暗示和关涉，这些东西在这些地方看上去不在场，有的只是纯粹的分割、界限和距离。不在场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能为捍卫责任服务，所以个体的良知乐意表现自身“良心清白”。“目的符号学”或者“终极符号学”这种表达中的“目的/终极”（telos-）词素，并不表示某种外在的价值或者预先确立的目的、符号网络之外的终极目的、“至善”（*summum bonum*）。相反，它表示的是符号活动本身的目的，这被理解为超越整体性、超越整体性封闭的一种取向，被理解为去整体性的能力，超越既定实体、既定存在的能力，无限符号活动、朝着无限迈进、渴望他者的能力。

符号的动物和符号伦理的动物：为他性人文主义而奋斗[①]

一、元符号活动，他性，责任

本章中，我们将核心关注人类特有的符号活动形式，即我们将其辨识为元符号活动或符号学的那种人类能力。作为符号的动物，人类具有反思符号——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反思整个星球上的一切类型符号的能力。就人类能够对符号进行反思，从而能够搁置行动、慎重思考和做出决策这一程度而言，他们也处在对自身有所担当这一地位。元符号活动或符号学的能力，意味着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因此意味着负责任的能力，这种能力无疑是为人类所独有的。人类的权力在于这种独特的责任能力中。意识，认知的和伦理的，是与这种能力相关联的。正因为人类能够对符号——自身的和他者的——进行反思，因此，和这种能力相关的责任意味着不仅为自身的符号，而且为他者的符号有所担当。在当下语境中，“他者”（others）不仅被理解为另外一个人，也不仅是指某人自身的他者，即人类符号活动范畴中有别于自我或属于自我的那个他者，而且被理解为人类之外、地球上其他一切有生命者。这意味着这种物种专有的能力要为所有生命、为跨生物符号界的所有符号活动承担起责任来。“担当”和“承担”的能力对人类具有结构性意义，意味着人类能够对全球性的地球生命持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责任能力（其对生命的重要性绝不能被低估）预设了人类符号的或元符号的能力：超越“能力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① 本文最初题为《权力的责任和责任的权力：从“符号的动物”到“符号伦理的动物”》（“The responsibilit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semiotic animal’ to the ‘semioethic animal’”），宣读于2003年9月在维也纳由“社会符号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o－Semiotic Studies，简称ISSS）、“奥地利符号学会”（Austrian Association of Semiotics，简称ÖGS/AAS）和“维也纳应用艺术大学”（University of Applied Arts Vienna）联合举办的“符号权力，权力符号”（Macht der Zeichen，Zeichen Der Macht/ Signs of Power，Power of Signs）国际跨学科研讨会。后收入会议论文集《符号权力，权力符号》（*Macht der Zeichen*，*Zeichen Der Macht*/ *Signs of Power*，*Power of Signs*，103－119，Vienna：INST [www. inst. at]，2004）。这里有所改写和扩充。——作者注

of power）的“责任能力”（the power of responsibility）。这样的思考把我们从符号学领域带到了我们提出的所谓“伦理符号学”（ethosemiotics）或“符号伦理学”（semioethics）领域。（参看 Petrilli 1998b；Petrilli and Ponzio 2003）

二、“符号学”的两重意义

“符号学”这个术语既可以指人类符号活动的专门性，又可以指关于符号的一般科学。（参看 Petrilli 2001）

根据第一重意义，“符号学”是人类物种专有的元符号活动能力。在与符号活动耦合的生命世界中，人类符号活动被赋予了元符号活动的特点，即有可能对符号进行反思，有可能使符号不仅作为与对符号所做反应没有区别的解释对象，而且作为对符号的反思、搁置反应这种解释对象，同时，有可能做出审慎思考。

对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的开篇关于人有追求知识的天性这种观察进行发展，我们现在可以宣称，人有追求符号知识的天性。人类符号活动把自身呈现为符号学。作为人所特有的符号活动来理解的符号学能够冒险穿越整个世界，以寻求按照符号方式所思考的意义和意味。不过，符号学不应该把人类符号活动绝对化（如同在观念史中所发生过的那样），也不应该以过于简单化的方式，把它等同于一般性的符号活动。

相反，根据第二重意义，“符号学”作为关于符号的研究，在索绪尔（Saussure）那里被认为是一门学科或科学，在莫里斯（Morris）那里被认为是一种理论，在西比奥克（Sebeok）那里被认为是一种学说。符号学的研究和符号一般模式所构成的领域，可能延伸到整个世界，因为世界是为符号所充斥的［按照皮尔斯（Peirce）的看法］，被延伸到有机体世界，到生命世界（按照西比奥克的看法），并因此作为“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而出现。相比之下，“符号研究”则可能被限制在人类符号活动范围之内，文字的和非文字的，具有产生出一种有限的、人类中心的方法这种危险。

由于西比奥克（1920—2001）的贡献，20 世纪 60 年代起，一种新的趋势在符号学中兴起且至今仍在发展着，人们称之为“总体符号学”（Sebeok，2001）或者“生命符号学”（semiotics of life）（Ponzio and Petrilli 2001，2002）。西比奥克拓展了传统符号学的边界。传统符号学，或称 *semiologie*，与总体符号学相反，是严格地建立在文字规范基础之上的，并因此而由于“以部分代全体”（*pars pro toto*）这种错误而有所缺损。西比奥克把符号学研究

中的这种方法命名为“小传统”（minor tradition），并大力提倡他所谓的“大传统”（major tradition）——以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查尔斯·S.皮尔斯（1839—1914）以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伦（Galen）关于符号与病征的早期研究为代表。在西比奥克的认识中，符号科学不仅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索绪尔语），即关于文化中的交流的研究，而且是从生物符号学的角度对交流行为进行的研究。因此，和其他研究方法相比，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被赋予了能力表现最大程度拓展这一特色。

三、全球交流，生物符号学与符号伦理学

总体符号学朝着我们所谓“符号伦理学”的方向发展。作为一种独特的符号的动物，并由此而作为唯一能够对符号和交流进行反思的动物，人类对于生命具有一种单一性的责任（这是符号和交流造成的），这也意味着生命的质量。除了有限责任，即不在场的责任之外，所涉及的这种责任是无限责任，没有任何借口的责任，绝对的责任。我们对生命的责任，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交流—生产发展阶段是重大的，事实上也是无穷无尽的。当我们说到“生命”，所指的不仅是人类生命，而且是人类生命无法与之分割的、遍布整个星球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作为关于符号的研究，符号学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符号学被理解为“符征学”（semeiotics），属医疗科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在病征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今天，符号学这一古老职业——“关爱生命”，如其最初所实践的那样，必须根据我们所谓的“符号伦理”方式得到复兴和重新组织。这种特定取向，在面对历史—社会和生物界之间、文化和自然界之间、符号界和生物界之间的交流中日益增长的相互关涉之际，变得尤为紧迫。符号伦理学就是两种凸显所产生的结果：一个是生物符号学，另一个是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为与诸如基因工程、神经生物学和医药研究等领域中生物和医学发现有关的伦理问题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批判的视角。伦理问题连同生命伦理学一道，成了特定学科的研究对象。但是，在引入这门新学科之前，伦理问题就已经是共同形成其特征的两个总体性方面的组成部分了：一个总体性方面是“符号（生物）界”[semio（bio）sphere]，另一个是今天的“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的交流—生产体系”（global socio-economic communication-production system）。与其哲学取向一致，生命伦理学既是批判的，又是根本性的，它必须在面对与之相关的问题时，充分关注到这种双重的语境化。

符号（生物）界是总体符号学，或者所谓生命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因为其范围宽广，为了解决问题，总体符号学可以在数量（即跨越不同符号活动界的延伸）和质量方面为生命伦理学提供充分的语境。充足的语境化还意味着批判性的重新表述。总体符号学为研究根本性、批判性的生命伦理学提供了一种方法。

除了总体符号学所提供的语境，这种语境既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又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另外一种语境化对于充分理解与生命伦理学有关的各种问题也是必要的，那就是社会—经济方面的语境化。生物伦理问题必须放在今天的社会经济语境中来看待，今天的社会经济语境就是全球性的交流—生产。现象学的、本体论的和社会—经济的语境，从生命伦理学的角度看，是彼此密切相关的。而且，实际上，今天被理解为总体符号学的符号学，必须承担起终止总体系统中不和谐的东西的责任。因此，它必须终结由同一个系统所产生的对整个星球上生命所造成的任何威胁（见下文，参看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Part III，2.1，2.2）。

四、全球交流和总体符号学

目前处在发展阶段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其特点可以用世界性交流和全球化来表示。交流在整个星球延伸，现实性地满足了如其所是的世界，这使得“世界性交流”（world communication）这个表达特别恰当。此外，交流渗透了整个生产循环，不仅关系到人类生活，而且关系到总体的生命，这意味着今天已经是毋庸置疑的全球化时代了。

因此，对今天资本主义的充分分析需要一种广阔的、包容的，即真正全球性的视野。单独的各门专门科学无法提供这样一种视野，关于符号的一般科学或符号学，则在如此操作中拥有各种恰当的工具。这并不意味着如今所实践着的符号学已经为此任务做好了准备。要说有什么的话，相反的情况倒的确存在。不过，要充分地践行符号学，尤其是在面对交流理论或交流科学之时，不考虑今天全球范围的、全球性的交流状况，是根本行不通的。

此外，一种对世界交流的全球性性质（一种历史上全新的现象）缺乏把握的交流模式，将被证明是无法胜任符号分析的——至少可以说它是短视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在当下，一般符号学被重新界定，变成了全球符号学，需要展开其去整体性这种功能：全球符号学必须对所有声称总体性的东西做出批判，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总体性世界和全球交流。如果一般符号学或总体符号学不能实施这种去整体性功能，它的工作将被证明是无用的，或者更糟糕，纯粹

成了各种特殊符号学的大杂烩，各门统一化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断面语言，或者由于不同学科和专门化知识领域的无所不知而导致的哲学上的搪塞之辞。

交流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是一个表层现象，因此只能通过研究其根基来理解。采取这种方法，意味着摒弃意大利学者费卢奇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1921—1985）称之为“邮包交流”（postal package communication）的那种模式。所谓“邮包交流”模式，是按照源头发出和接收者所接受的预先构成信息来描述真正的交流过程的一种化约性的、过分简单化的说法，类似于从一个邮局到另一个邮局之间的邮包递送。1961 年，交流还不像今天这么普及，罗西－兰迪对邮包模式就已经有了猛烈批判。现实中，我们所说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意大利还没有达到像今天的交流—生产体系这样，让一切都走到近乎于社会重组的程度。按照邮包交流模式（它是以平等交换这个概念作为基础的）来解释人类交流，意味着论及一种化约性的、过于简单化的交流模式（尽管至今仍有影响力）。这种特定模式根据平等交换逻辑，使用的是诸如“信息传输”（information transmission）或“消息传输”（message transmission）等概念，因而无法对有关交流过程的构成要件——发出者、接收者、编码、消息、语境或者推动交流的需要——进行批判分析。实际上，根据这种方法，这些要件是预先建构的，即在交流过程之外得到界定的，交流还没有实际发生（参看 Ponzio 1997，1999）。这种描述看不到交流现象的一致性，相比一种把交流限定在孤立个体之间基于依据规约而接受的共同编码而进行的有意图的消息交换的模式，交流现象的一致性范围要广泛得多，内容要复杂得多。

充分理解全球交流，意味着充分理解今天交流所涉及的危险，其中包括交流终结的危险——交流可能呜呼哀哉。我们所说的危险并不仅仅是在电影和文学中得到理论阐述和体现的所谓“不可交流性”（incommunicability）这种琐细现象，即在今天根据与生产不可分割的交流——我们称之为“交流—生产”（communication－production）——发展起来的，出现在交流转换期间的一种主体—个体疾病。交流终结的危险所指的远比此更激进，相比社会再生产那些较早阶段，不如说使当今社会遭遇毁灭的极大可能是地球这个星球上生命的终结这种危险。就这一断言而论，显然，交流不是按照前面所描述的邮包模式来理解的，而在于其本身是一种与生命耦合的东西。正如西比奥克对生命符号学的研究方法所清晰证明的那样，符号活动与生命、交流与生命，二者是合一的。从这一观点看，交流的终结暗示着生命的终结（参看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Part One，V）。

对当今时代中交流的充分理解，要求我们关注交流作为世界范围现象的历史—社会方面的专门性，关注它与整个星球上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始终牢记符号活动与生命、交流与生命，二者是合一的）。为了达成这种理解，符号学必须采取这样一种视野：它像交流现象本身那样是“全球的”（planetary），所以在空间和时间方面也是“全球的”（global）。这种方法将赋予对当代性做出解释所必需的批判距离，对当代性的解释便不再拘囿于当代性自身的限界之内。

五、责任和符号伦理学

随着“生命权力”（biopower）［福柯（Foucault）］的扩张，以及可控地把身体植入生产工具，世界、全球交流以及作为孤立而自足实体的这种个体观念的散播和张扬一道前行。身体作为孤立的生物实体而被理解和经验，它是属于个体的，是个体所属范畴的组成部分。这导致基于身体的身体间性、相互依赖性、揭示和敞开的文化实践和世界观近乎全然灭绝。我们所剩下的，只有民俗分析家们所研究的木乃伊化了的残存之物、保留在人种博物馆里以及国别文学史中的考古遗迹，变成了业已普遍化了的“博物馆化”（museumification）这种状况。

让我们来思考大众文化代表们是如何看待身体的，譬如米哈伊·M.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1963，1965）就探讨过，种种不同形式的“怪诞现实主义”（grotesque realism）就不曾一般性地按照个体的或与地球其他生命、与世界其他部分相互孤立的方式，来看待身体和肉体生活。关于怪诞身体的符号（现今时代中只有微弱痕迹留存下来）包括了仪式面具在内，譬如大众节日期间所使用的面具、狂欢节面具。在与资产阶级崛起相关的个人主义发展起来之前，“怪诞现实主义”在中世纪的大众文化中把身体呈现为并未清晰界定的实体，它不故步自封，而是在与其他身体的共生关系中、在超越个体生命限制的变革与更新关系中发扬滋长。全球交流—生产并非削弱了身体认识的个体性、私密性和静态性，而是强化了它。

譬如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所揭示的（我们还要记住，罗西-兰迪的敏锐分析在其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中已经有着清晰阐述），各门科学之间的分野和割裂，对于“个体化了的身体这种新正统”（new cannon of the individualized body，巴赫金语）这种意识形态—社会必要性而言，是功能性的。这对可控地把身体植入今天的交流—生产体系这种再生产循环是功能性的。

一种总体性的、去整体性的符号学研究方法，是与要求高度地能为他者所用、愿意倾听他者、能够向着他者敞开的这种他性逻辑相互关联的，对这种关联的理解，不仅是数量方面的（源自总体符号学无所不包的特性），而且是质量方面的。所有符号学学者所做出的符号阐释，尤其是元符号活动层次上的，都离不开与他者的对话性关系。实际上，对话思想是全球化取向，同时注重向地方性和具体性两个方面（二者并不是简单地被划进来、被全球化）敞开的符号学方法的根本性条件。相应的，这种方法可以被描述为，它所凸显的是去整体化而不是整体化倾向。

正如首先由伊曼纽埃尔·列维纳斯（Emanuel Levinas，1906—1995）表明的，他性迫使整体性在与他所谓“无限性”（infinity）——用一个与查尔斯·S. 皮尔斯有关的表达，我们可以称之为“无限符号活动”（infinite semiosis）——相关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地自我重组。其与无限性之间的关系远不止是一个认知方面的话题：它超越既定秩序、象征秩序、我们的规约与习惯，是一种投身其中和责任担当的关系。与无限性的关系是与绝对他性的关系，这种关系与整体性最不可兼容。所以，与无限性的关系暗示着与他者的他性、异质性（*autrui*）的关系，与另一个人的他性的关系，这不是在像某人自身的另一个自我、另一个“他我”（*alter ego*）、另一个属于同一社群中的我这一意义上的，而更多的是在异质的他者这一意义上的，这个他者具有外来性、陌生性、多样性、差异性，对之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难以亲近，定然站在同一性、自我所提供的反面。

根据特定的意识形态规划，我们所澄清的方法并不是朝向符号学的。相反，如此描述中的符号学涉及我们如何理解与人类作为“符号的动物”的独特责任相关的行为。理解正确的话，“符号的动物”是具有关于符号的符号这种能力的负责任的行为者，对于整个星球上的符号活动有能力做出协调、反思和意识。在这一意义上，总体符号学必须充分建立在认知符号学中，但它又必须朝着超越数量方面和理论方面的第三维度敞开，即伦理方面。这第三维度涉及我们所致力于并渴望达成的目标，我们在过去的论文中用过“伦理符号学”（ethosemiotics）、“目的符号学”（teleosemiotics）、“终极符号学”（telosemiotics）等术语。今天我们还提出了“符号伦理学”（semioethics）这个术语（Petrilli and Ponzio 2003）。

如果符号学要兑现其“符号活动的健康”这个承诺，要发掘其理解整个符号活动世界的能力，它就必须不断锤炼其倾听和批判功能，即它的倾听和批判能力。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们相信，这样一种三分法——（1）认知符号学，

（2）总体符号学，以及（3）符号伦理学——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仅就理论目标而言是如此，对治疗目标而言亦是如此。

六、从理性动物到情理动物：同一性与异质性之间的主体性

“同一性”（identity）诸范畴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在世界性、全球性交流中起着核心作用，无论这种同一性问题关系到的是单一个体还是集体主体（西方世界、欧洲社会、国家、种族群体、社会阶级等）。

有关个体同一性和类似的社群或集体同一性的概念，需要用符号学的方法加以分析。任何情况下，无论问题是关于单一个体的同一性，还是关于集体主体的同一性，都会采用独白式或对话式的方式。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深远的、广泛渗透的。皮尔斯的反思对于重新界定主体做出了重大贡献（参看 Sebeok，Petrilli and Ponzio 2001）。主体可以被描述成一个符号活动过程。的确，由于其在解释—命题方面所承担的义务，被理解为一个符号的主体是由有可能数量无限的表意投射所构成的。如皮尔斯所说，“人和字汇以相互裨益的方式彼此教育、人在信息方面的每一增长都关系到对应的字汇信息方面的增长”（*CP* 5. 313）。人类，我，是由文字和非文字语言构成的一个极为复杂的符号：

> 人类意识的无论哪个要素，在字汇中都不存在与之没有对应的……人类所使用的那个字汇或者符号，就是人自身。因为，每个思想都是一个符号这一事实，和生命就是一连串思想这个事实联合起来，证明了人就是一个符号；所以，每个思想都是一个外在的符号，证明了人就是一个外在的符号。也就是说，人和外在的符号是同一的，如同 *homo* 和 *man* 这两个字汇是同一的。于是，语言就是我自身的总和，因为人就是思想。（*CP* 5. 314）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符号，主体是作为一个对话性的、关系性的实体而出现的，一个开放的主体是在与其他符号和其他主体的人内和人际关系中逐渐得到彰显的。所以，主体—符号的界限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划定的，而是在与其他符号的对话性相遇中出现的，而从不是界限分明。人在社会性中发展，也就是说，是在与他者经验的关系中发展，而从不是在孤立中发展。的确，自我，主体是遵从他性逻辑诸般法则的若干自我所构成的一个社会群体。如果我们字面地把“个体”（in-dividual）解释成“未被分割开来的、不可分割的”（non divided，non divisible），我们可能会像皮尔斯一样宣称：“一个人绝对不是一个个体”（*CP* 5. 314；参看 Petrilli and Ponzio：Part One，I. 2. 1）。皮尔斯这

样说道：

> 有两件事情对让人确信和牢记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是，一个人绝对不是一个个体。他的思想是他“对自己所说的”东西，即他对那个正在时间之流中成形的另一个自我所说的东西。一个人在推理的时候，他所努力要说服的是那个批判性的自我；同时，所有思想都是一个符号，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属于语言性质的。要记住的第二件事情是，人的社会圈子（无论对这个说法的理解是广义还是狭义），是一种松散的并简化了的人，在某些方面高过属于单个有机体的人。(*CP* 5.421)

皮尔斯对比了“个性”(personality)、“个人自我”(personal self)、“个体自我”(individual self) 这几个概念和“与其他自我共处状态中的自我”这个概念。前者暗示着一种自足的自我，或者，如他所说，一种“有限的自我”(finite self)。“有限的自我”“个人自我”是一种“虚幻现象”(illusory phenomenon)。不过，不同样式的自我中心主义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自我孤立这种幻象则以创造出这种孤立的条件而告终。维多利亚·维尔比（Victoria Welby，1837—1912）支持这一论点，尽管她的思路独立于皮尔斯，但她宣称的“正是我们的‘可分性’(di-viduality) 构成了我们的丰饶的禀赋”，表示出的是类似的立场。

自我的社会性和群体性，与自我的单一性或独特性，与就可能与之相关的解释过程而言的它所意指的他性并不冲突。自我是不可擦除的（参看 *CP* 1.357），它在已经说出的东西之外言说。自我的言说传递着语词规约意义之外的意涵。不过，同时，自我的不可擦除性和独特性并不意味着一种无法交流的状况。

皮尔斯对同一性的认识，如我们所讨论过的，让我们想起维尔比，反之亦然。因为在两个人的眼中，主体的同一性都是多重的、多侧面的、多声部的。它是在其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对话性相互关系之中得以界分和形成的。维尔比确立了“我”(the I) 与“自我”(the Self) 之间的区分[这体现在她题为“主体性”(Subjectivity) 的一份未刊手稿文档之中，该文档包括了她 1903 至 1910 年间所写的多篇文章，参看多伦多约克大学档案馆中的维尔比汇编，又参看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Part One，I. 2，Part Two，I. 2.1；有关档案馆中可查到资料的描述，参看 Petrilli 1998a]。她根据她称之为“我”（或者她为此而引进的一个新造术语“*Ident*”）与她称之为“自我”这二者之间复杂而明显的关系，分析了主体性问题（参看 1907—1910 年间的手稿)。根据维尔比

的分析，同一性是在“自我”与“我”的对话性关系中建构起来的。“我”（I或Ident）并不是“个体的”，而是“独特的”。“自我”也被她用一个新造术语*ephemeron*来表示，被描述成是非永生的，和身体一样是终有一死的。相比之下，“我”被描述成是超越身体和“自我”的非永生性，朝向永生的。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同一性并不是单一的或简并的；相反，它呈现出一种多余，相对它所超越的同一性本身而言的某种多余出来的东西。

主体不可避免的是肉身化的主体，因此是身体间性的存在，就是说，主体是与其他身体相互关联的一个身体。从这个起点开始，为了其整个的后续生活，主体是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上的身体间性状况的表达，换言之，主体并不是在与其他身体相互孤立的身体中被肉身化的。从生物进化角度，从物种的角度，以及从社会性和文化史的角度看，主体都是一个肉身化的实体。身体在意识发展过程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意识是肉身化的意识。身体为意识的充分发展，从而为人类作为符号动物的充分发展创造了条件。肉身化主体与其他身体相互联系地发展，并通过其他身体而拓展自我的边界，它们就是它所经验的世界的边界。字汇是身体的延伸。的确，如巴赫金所说，字汇是连接某人自己的身体与其他身体的一座桥梁。皮尔斯反复把“血肉”（flesh and blood）这个表达用于生理意义上的身体（参看*CP* 1.337，7.591），而后者只能通过抽象的方式才可能与符号意义上的身体区分开来。

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性关系（不同于自我的他者，属于自我的他者）作为创造性过程中最重要的延续条件之一而出现。这一创造性过程的一种驱动力量，是“仁爱”（*agape*）这一意义上的爱。实际上，根据皮尔斯的看法，情理与知识中之所以可能具有最先进的发展，多亏了情理的创造之力和仁爱的劝导转化之功。

如此看来，“情理”（reasonableness）被赋予了一种力量，它能够转变某人对陌生人、异类的惶恐，转变某人对被理解为与自身迥异的他者所带来的恐惧，将其变为对他者的同情，变得可爱。按照列维纳斯所阐发的主体性哲学这一方向对皮尔斯的话语做出发展，我们或许会补充说，在其同一性的硬壳之下，主体通过爱而重新发现了它为他者、为他者安全的担忧。这样一种担忧让主体惶惶不可终日，对他者牵肠挂肚。爱、情理、创造性都是植根于他性和对话思想的逻辑中的。如我们从到目前为止所引用的各位著作者那里所学到的，按照所描述的，他性和对话思想一道，不仅推动着人类符号活动的进化机制，而且不止于此，还推动着总体方式看待下的整个世界。

被理解为符号伦理学的符号学，必须关注“事物的理由”（reason of

things）并对之做出解释。不过，作为批判和对话性的整体化前提的去整体化能力暗示着把握事物“理由”（reason）的能力是无法与把握事物“情理”（reasonableness）的能力相互分割的。所探讨的问题可以阐述如下：对符号活动和总体上的生命的内在危险，既然在今天的社会再生产中是存在的，那么，人类必须尽早地从“理性动物”（rational animals）转变为“情理动物”（reasonable animals）。

在带着对主体性问题、对被当作行为、实践与习惯的集合的自我问题的关注，展开实用主义研究的过程中，皮尔斯把不同于“力量”（force）的“权力”（power）当作其根本特点之一。他把自我描述成朝向目的的一个中心，执著于多少经过整合的一系列“目标”的一个行为者。“目标”（purposes）或许与维尔比所用的“蕴涵”（purport）或“终极价值”（ultimate value）等术语相关，后者是她根据自己的意义三元观中第三个要素——“意味”（significance）所表述的意指价值来描述意义时所用到的。“权力”不是“蛮力”（brute force），而是“情理的创造力”，这，根据其仁爱这一取向，管辖着所有其他形式的权力（参看 *CP* 5.520）。我们可以说权力，换言之，情理的理想，是对他者施加于自身之上的吸引力做出回应的能力；权力和情理是和对他者做出回应的能力相关的，这种回应的情态是对话性的。

自我的羞耻、脆弱、弱势是一方面，自我愿意朝向他者而冒险中所暗含的危险性是另一个方面，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在柏拉图关于厄洛斯（Eros，爱神）的神话中已经得到了描绘［见《会饮篇》（*Symposium*）］。厄洛斯是半神性半魔性的，由彭尼娅（Penia，穷匮之神）和波罗斯（Poros，技艺之神）所生，具有即使被隐藏起来也能找到道路的能力。维尔比对“自我丰富”与“为了进化而冒险朝着他者敞开”二者之间的关联关系有过描述。以此关联作为基础，我们可能发展出对“满足”状况的一种批判，所以，针对现实，即如其所是的世界，针对一劳永逸地给出和决定了的本体论存在，发展出一种“超越”取向：“不论男女，我们都倾向于对如其所是的事物感到满足。但是，恰恰是因为我们都对世界感到不满，才来到这个世界。”“不满”是“母意义”（mother-sense）或“本初意义”（primal sense）这个概念的基本构成要素，标志着恢复人类知识能力的批判立场这种需要。在认知能力之外，这里所论及的，乃是关于他性的能力，是关于创造和革新的结构性能力，是关于切换和变动意义的能力。特别是由于试推法逻辑的操作运用，这种批判立场使得我们能够做出按照最为广泛意义上来理解的预判和“翻译”，即超越语际翻译的限制，作为对文字和非文字符号的解释和验证那种翻译。推理中的科学锋芒之所以可

能，是建立在“本初意义”（primal sense）基础之上的，维尔比如是观；是建立在仁爱的逻辑程序基础之上的，皮尔斯如是说。这意味着有勇气承认，对于符号、主体和意识的进化，情理而非理由因素，他性、身体间性、对话、爱、不锱铢必较、不满足和危机的因素，具有结构上的必要性。

七、母意义：主体性、意味与批判的前提条件

在写于20世纪初的一系列未刊手稿中（参看Petrilli 1998a），维尔比提出了“母意义”这个原创性概念［之后以“本初意义”（primal sense及其变体primary sense）取而代之］。母意义在意义、意思和意味的生成中，所以，也在世界观的建构和解释中，起着核心作用。维尔比进行了如下区分：一方面，是“感觉/意义”（sense）和由之而来的“母意义”，另一方面，是“智识”（intellect）和由之而来的“父理性”（father－reason）。通过这种区分，她想要表明意义产生过程的生成和解释中两种根本模态之间（超越了性别差异）的差异。这里，“意义”是宽泛理解的，包括了“意思”和“意味”在内。这些过程可能通过抽象的方式，假设性地，为了理论化的目的而被孤立起来，尽管在运用层面上，也就是说，在意义产生实际行为中，它们绝对是相互关联的。

在维尔比的描述中，“母意义”指的是意义和批判能力的产生源头。因为如此，它受到他性逻辑制约，对应于通过感觉、认识、直觉和认知飞跃而来的广义和创造意义上的知识能力。按照皮尔斯的观点，我们可以说，母意义［皮尔斯用的是“母智慧”（mother－wit）这个表达］是我们拥有观点之前，或者观点拥有我们之前，观点被直觉到的条件。按照皮尔斯的说法，这种智能方面的能力可以被描述成，一种“仁爱的或同情同义的理解和认可”（agapic or sympathetic comprehension and recognition），或者，按照巴赫金的说法，一种“积极回应的理解”（answering comprehension）。无论是叫“母意义”还是“母智慧”，它都是一种整体性中的人类所专有的能力：如维尔比所说，它是超越了性别的“种族的知识”“人类共有的传承”，即便在历史—社会层面上，女性可能作为其主要捍卫者而出现。

与之相反，维尔比描述了智识作为一种认知能力的关键，它会过分地受到同一性逻辑的制约。换言之，同一性在与他性的博弈中会占据统治地位。被理解为一种认知能力的智识产生出理性的知识，通过有关科学和逻辑中观察到和试验过的数据做出的断言、推论、概括等操作得到表达。它的局限是由允许数据独裁这种倾向所决定的，我们选择来加工的数据，反过来会对我们进行加工。智识掩盖下的知识支配一切，根本上说，被托付给了男性的决断，维尔比

说，但这只是因为社会—文化的缘故，肯定不是因为某种专门赋予男性的天生的理性推理才干。健康的智识来自母意义，而不应与之疏离：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意义与意味变得空洞，以独白性方式被敉平在同一性上。在拉丁语*scire*和*sapere*（“知”和“智”）这双重意义上，这正是智识必须尽其所能要达到的东西，是具有知识和超越性能力的母意义所已经“知道”的东西。

根据“母意义”，我们处在他性逻辑所主导的意指过程这一边，因此受符号的像似性维度主导；母意义，或者维尔比所谓的“种族意义”，涉及各种意义的创造和生成力量，它们来自把看上去彼此遥远却实质上相互紧密联系的诸般事物联系起来的这种能力；从论证角度看，“母意义”处于试推法类型的逻辑操作这一边，因为它们受到他性逻辑、创造性、对话思想、自由和欲望的制约。

皮尔斯明确地把欲望和意思联系起来，其中，意思是同时按照语义的和价值论的方面来理解的，作为意指价值，意义是和可欲性（desirability）相互关联的。对维尔比而言，她与玛丽·艾弗瑞斯特·布尔（Mary Everest Boole）[作家、著名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乔治·布尔（George Boole）的妻子]之间的通讯，就是为了探讨思想法则以及逻辑、爱、激情和权力之间的联系（参看Welby 1929：86–92）。

按照维尔比的看法，逻辑本身应该被理解为更为广阔的意义生成维度[元始层面、本初层面、母意义、种族意义、“母体”（matrix）]与情理二者辩证地，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话性地，相互交织的所在。所以，本初意义和理性生活之间相互增进的积极回应的理解这种关系，要达成去整体化的总体性中经验最大化的价值、意思和意图，那么，批判意识的充分发展便成为必然。维尔比的母意义—或本初意义——正如列维纳斯（1978）所说，让我们聚焦于意指活动之前和之后意味所具有的价值。母意义涉及我们意指实践的真实和理想两个方面：真实是就其关注实践的具体方面而言，理想是就其作为人类可能借其有所期盼的条件而言——人们想要在实际和可能的字汇以及一般性意指操作生产中得到延续和完善。

维尔比对逻辑的理论阐述也许和皮尔斯也有关系，皮尔斯按照“忍让”（self–surrender）对逻辑的大原则做了描述。不过，如皮尔斯做出的具体说明，从实用主义角度看，该原则并不意味着自我为了最终成功必须降尊纡贵，即便取得成功也不应该是任何行动的控制性目的（参看*CP* 5.402n2）。

在1909年1月21日的信中，维尔比表示同意皮尔斯的看法，即逻辑是“智识的伦理学”，并把他的观察和自己的母意义或本初意义联系起来：“当然，

我同意你对逻辑推导的定义，而且同意逻辑实际上是一种德性（在这个词最大和最高的意义上）的运用。这与本初意义的见证是完全一致的。”（载Hardwick 1977：91）

八、作为一种态度的符号学以及符号伦理学的批判工作

符号学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态度，它是在人类符号活动界限中兴起和发展的。这就是说，符号学独一无二地和人类“环境界”（the *Umwelt*）相关联（而非与其他动物物种的环境界相关联），因此和人类物种所专有的“模塑”（modelling）能力相关联，模塑具有产生多种多样的不同世界和世界观的能力。符号学是一个有关人类物种的事实，被认定为人类以历史和社会方式产生出的那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它实现的有效可能，它被赋予理解和意识的能力，是一个生物之上的历史—社会事实。我们的环境界是由物种所决定的，但它又是历史—社会产物。所以，变革的可能或者替代性假设，随着其渐渐地在符号活动中出现，有着其批判和历史—社会现实中的规划必需的有效立场、出发点、交接面、材料。

符号伦理学的批判工作表明，相互之间彼此冷漠的差异状况不过是一种幻象；相反，所有人类（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主体，有着自己的选择与行为）以及整个星球上所有其他生命形式，都蕴含在同一命运中。符号伦理学必须从对社会体系无偏见的分析和质询开始，它孕育在社会体系之中，现在又为社会体系所拥戴。换言之，它必须从我们今天就历史—社会而言所处的位置开始，从对当代性的大胆而精细的分析开始，所以要从对今天的交流—生产关系开始。

我们知道，全球化和交流—生产在世界范围的撒播在同一化的社会生产模式中达到很高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符号伦理学工作的一个优势。一种单一型的市场控制着整个星球，一种单一型的生产和消费系统导致的同一化，不仅表现在人类行为、习惯、样式（也包括服装样式）这个意义上，而且表现在想象生活方面。整个社会再生产体系今天主导并吞噬着整个星球，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按照他性所理解的差异处在被按照替代项所理解的差异取而代之的过程之中。

我们所说的优势，在于号召我们去面对的是一个统一了的分析对象而不是各种不同现象这个事实，这至少意味着不会浪费精力。不过，到目前为止，“优势”这个词很显然是带着讽刺色彩的，因为它暗示着，我们所必须面对的东西是被当作一个单一、紧凑总体的现实。这是独白思想的“优势”，因为如

此，它不可避免地会让批判能力事与愿违，也就是说，与多声部性和多元思想这种条件不同，批判分析所拥护的是创造性解释和批判性质疑。此外，批判工作还因为恰当的概念工具无法可及、尚有待创造出来，而变得十分困难。为了回应随全球性交流—生产新局面而呈现出的现今的社会再生产和革新，新的范畴必须被建构，各种设想——并非当下历史发展阶段中想当然的那些——必须被引入。

就目前所论及的而言，符号伦理学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提出了一种新形式的人文主义。实际上，符号伦理学在认知之外的伦理和实用主义方面负有使命。此外，它超越了联系自然和逻辑—数学科学与历史—社会或人文科学的各门学科之间的分割思想，从而恢复了早已嵌刻在人类知识不同领域中的相互关联关系。符号伦理学尤其证实了人文主义问题和异质性逻辑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符号伦理学与责任生命、符号、他者[①]

在此所做的评述中，我打算以一种更具共时性而非历时性的方式来考察符号学。它与其说是我想要探讨的，作为有关符号在生命和经验中所起根本性作用这样一种意识的整个的符号发展史，不如说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都生活过的我们所见证并且参与其中的符号学发展的当代现象。因为今天的符号学尽管背后理所当然地有着一段长长的历史，但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知识运动，却让人深感相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可谓“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因此，我要谈及的主要是20世纪的人物，其中一些至今仍健在。而我特别要谈及的，是人类符号活动中认识还不透彻的伦理一面，它刚刚走上前台，譬如（一个共时性的例子），它2003年才出现在埃罗·塔拉斯蒂（Eero Tarasti）的“存在符号学”研究中，以及我与奥古斯都·庞齐奥（Augusto Ponzio）的“符号伦理学”研究中，尽管在这之后其他学者也开始运用“符号伦理学”这个术语。

一、前提

语言是人类物种专属的动物模塑系统，它使得我们每个人，不同于非人类

---

① 本文结构如下：

一、前提

二、生命、符号与责任：进入“意义学”

三、与他者的关系，对话理论，以及作为人类理解条件的倾听

四、实用主义符号学，积极回应的解释项，以及对化约论的批判

五、符号活动及其未来，一种符号伦理视角

六、从符号活动到符号伦理学

七、符号伦理学，全球化之前和之上

*在这篇西比奥克学者奖获奖演说中，我尤其要感谢几位先进：1993年获奖的迪利（Deely），1996年获奖的霍夫梅尔（Hoffmeyer），2003年获奖的库尔（Kull），以及2005年获奖的梅瑞尔（Merrell）。第一位西比奥克学者大卫·萨万（David Savan，1916—1992）是去世之后获奖，按照美国符号协会（Semiotics Society of America，简称SSA）章程所体现的历史分层原则（“无人在死后写作”），我们无法看到他为此发表的演讲，不过，至少他有1989年出版的专著。——作者注（西比奥克学者奖，Sebeok Fellow Award，是以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的名字命名的美国符号协会最高奖，获奖者被称为西比奥克学者。——译者注）

的动物，具有如下能力：1）创造多个可能的世界；2）反思符号；3）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4）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逃避地与整个地球的生命符号网络有关；5）对地球符号活动的命运有所担当。考虑到今天技术发展所达到的高度，这意味着或者投身于改善整个星球上的生命条件，或者为毁灭它——即刻的毁灭或慢性的灭绝——而采取行动。上述能力中，前4项进入"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或"生命符号学"（Semiotics of Life）的总体架构，这在托马斯·A. 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1920—2001）的研究中有着新近的、成熟的表述，但源头却至少可以追溯到查尔斯·S. 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和查尔斯·W. 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并且，事实上，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是和后两位的实用主义紧密相关的，尤其是皮尔斯的"实效主义"（pragmaticism）。[①] 第5项是符号学中该趋势的分界点，我们无法再以包括我们的意识程度等在内的任何理由将之摒弃，而且事实上，在今天的全球交流条件下，我们要假装看不到、感觉不到也不想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且让我们从我与奥古斯都·庞奇奥共同命定为"伦理符号学"的这一符号

---

① 事实上，皮尔斯对"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实效主义"（pragmaticism）所做的区别更为重要，甚至比一般人所承认的更为重要。皮尔斯认为，唯名论者不承认关系能够不依赖人脑而取得，这对整个现代哲学都有影响——他把这种现代发展称为"唯名论浪潮"（a tidal wave of nominalism，1903：*CP* 1.19），这种评价得到了德里达（Derrida）的支持（1959：1），而美国实用主义——在詹姆斯（James）和杜威（Dewey）手上发展起来并被与之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接过来——也被包括在这一浪潮之内。既然符号所构成的存在确切而言是存在于三元性的类型关系中，并且常常在符号活动中使我们能够在不同程度上确切地了解"物自体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ings in themselves），那么，否认不依赖人脑的现实秩序之中的关系，会让（严格按照康德所规定的那种方式的）科学与皮尔斯所推崇的有关现实本身的知识两相阻断。皮尔斯本人并未使用"后现代"这个词，但是，在定义他本人"实效主义"的立场过程中，强调他对符号行为的理解与唯名论两相扞格，不同于与唯名论仍有所共通的他那个时代的实用主义，从我们的角度看，他事实上是划出了一条"沙滩上的界线"，一边是处于其中心发展之中的整个主流现代哲学，另一边是新兴的符号学观点。（足以与之相配的是，最初，皮尔斯在原先的形而上学俱乐部会议上杜撰出"实效主义"这个术语，而很久之后，2000年12月，这个俱乐部以其历经岁月演化之后的第三个身份在赫尔辛基大学针对这个问题召开研讨会，参见：http://www.helsinki.fi/science/commens/papers/redbook.pdf）即使在划出这条界线之后，在与其同代人的交流中，皮尔斯发现，作为公共话语中更为人所接受的术语，使用"实用主义"及其类似说法，有时仍然必要而且管用，因此，一如以实用主义语言谈论20世纪符号学说发展的莫里斯及其他关键人物一般，我们也将使用"实用主义"。不过，在符号学科——符号学视角——范畴之中，这仍然是一个根本性观点：关系在诸多存在模式中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它与环境无关；环境使得同样的这个关系变成有时依赖人脑，有时不依赖人脑的现实，以便做出解释，给或为第三方的"他者"传递所指客体的其他再现的载体这一意义上的符号（作为再现体的符号），如何能够同等轻松地传递真实或虚谬！所以，如果事关坚定认为关系所构成的现实并不仅仅是一种人类话语的特征而已，我们所谈及的应是"实效主义"，而非"实用主义"。

学转向的预见开始。[①] 且让我们从1971年开始，那一年，托马斯·西比奥克的论文《符号学及其同类》(Semiotic and Its Congeners) 与《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精编版共同问世，我后边的讨论就将以此为据。此外，且让我引用西比奥克在十三年后的1984年当选主席时所做的演讲，他声称此次演讲是自己“最具自传性的作品”[②]，其标题为《至关重要的符号》(Vital Signs)。凭借其“总体符号学”，西比奥克事实上在皮尔斯、莫里斯以及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 所画出的那道水平线上占据着一个位置。在1984年的主席当选演讲中，西比奥克提醒我们，正是皮尔斯这颗“指路明星”，在当代发展中，引领符号学 (semiotics) 取代20世纪欧美的符号学 (semiology) 并将后者同化为自身的组成部分。[③] 远胜任何其他个人，正是在西比奥克的影响下，“符号学”这个标签标志着后现代意识中的第一次繁荣，诸如实现符号在开创人类意识现实中的普遍作用等。我们看到，正是那种全球意识在现在——游戏的后半程——获得了一种伦理维度，也就是说，为我们身涉其中的整体负责的一种维度，因为我们已然身涉其中，这正是我今天给大家演讲的主题。在西比奥克发表其主席当选演讲之后十一年，我们看到，1995年，当迪利结束其书面文稿《科学的新开端》(A New Beginning for the Sciences) 时，曾有即兴发言 (这些话从未被纳入书面文稿)，他说，取代［自从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1809—1992) 以来］被用得甚为混乱的“进化”(evolution) 一词的，或许是“符号活动”(semiosis) 这个更为正确的术语。[④]

上述当代思想脉络，正是我想编织到为这次演讲所做的沉思之中的东西。

二、生命、符号与责任：进入“意义学”

以下是我对你们谈起的关键问题、核心内容：西比奥克注意到 (1984：

① Petrilli and Ponzio，2003.

② 参见我对西比奥克的访谈，《从皮尔斯(经由莫里斯和雅克布森)到西比奥克》［From Peirce (via Morris and Jakobson) to Sebeok］，载Sebeok 1991：95-106。

③ 有一整本书论及西比奥克对该问题的看法：迪利、威廉斯 (Williams) 与克鲁斯 (Kruse) 1986年合编的文集《符号学前沿》(*Frontiers in Semiotics*)；迪利1986年的论文标题——《作为符号学组成部分的符号学》(Semiology as a *Pars Semeiotica*) ——也反映出同样的思考。

④ 从一开始，达尔文主义的一个主要难题就在于依赖于偶然性的自然互动，认为是它提供了朝着更高级形式发展的整个过程的推动力。符号活动的因果性，因为不直接 (关系只能通过改变其基本要素来改变，无法直接改变) 并且有赖于“并非确然，然而可能的东西”，即未来会影响对过去相关性的当下重组，因而从开头就纠正了这一缺点。

21)，“生命改变世界以适合其需要，而其达成这一点的方式是通过符号行动”。不过，他同时感到“维勒（Wheeler）的说法强烈吸引着我，他认为，根本的自然常量，原子核的和世界的参量，以及其他，是受到生命进化的不断要求制约的”，难道他不是在表示（即使没有充分意识到），生命诞生之前的自然世界的发展，本身就是符号活动的产物？即便这种之前的发展，如皮尔斯所说（*W* 2.404），“如其所是，不能通过单单对符号进行研究就得到充分显露或揭示，（即便）对其的知识必定来自某个先前或旁支的来源”，难道不是这样吗？

简言之，即便我们接受西比奥克的说法，没有符号活动就没有生命，我们仍然会问，这个说法的反面，“没有生命就没有符号”，是否同样正确。西比奥克，这位以符号学（semiotics）取代符号学（semiology）并将后者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纳入“符号学说”（doctrine of signs）的总建构师[①]，是会这样认为的。针对其符号活动研究理路，相比更为堂皇的“科学”或“理论”，西比奥克更偏爱“符号学说”这个用语。这个用语他是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那里学来的。在后者眼中，一门“学说”是由大致构成一个知识场域的若干原则和观点组成的整体；因为这个用语，西比奥克在包括乔治·巴克利（George Berkeley，1685—1753）[②] 在内并可溯至皮尔斯的一种传统之中，拥有了自己的位置。而且我们看到，对于“符号学说”这个用语，洛克创造了“符号学”（semiotics）作为其同义词，而拉丁学者正是在洛克的意义上使

① 迪利评价说（2000a：xxv）：“符号学（semiology）和符号学（semiotics）这两个竞争性术语所具有的象征性财富发生颠倒，主导权发生颠倒，反映出西比奥克在符号学发展之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同西比奥克一样，今天，我们把 semiology 作为一种欧洲特色相对突出的现代后期现象，而把 semiotics 作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在针对此说的注释中，迪利把西比奥克与拿破仑类比，说：“西比奥克的将帅们，可以这么说的话，不完全地罗列，有加拿大的丹尼西（Danesi），爱沙尼亚的库尔，芬兰的塔拉斯蒂（Tarasti），意大利的佩特丽莉和庞齐奥，巴西的桑提拉－布拉加（Santaella－Braga），日本的山口（Yamaguchi），葡萄牙和法国的塔斯卡（Tasca），美国的劳齐（Rauch），罗马尼亚的马尔克斯（Marcus）、布伦佐（Brinzeu）和内特（Net），摩尔多瓦的哈尔诺（Harnau），乌拉圭的布洛克·德·贝阿（Block de Behar），匈牙利的欧罗斯（Orosz）、沃伊特（Voigt），保加利亚的波波娃（Popova），丹麦的约翰森（Johansen），德国的克拉彭（Krampen），希腊的拉格普洛斯（Lagopoulos），澳大利亚的卢氏洛夫（Ruthrof），等等。[在这个比喻中，我想，艾柯（Eco）像是贝纳道特（Bernadotte）；不过，任何比喻都不是完美的。]”（贝纳道特曾是拿破仑手下元帅，后来成为瑞典国王并率领瑞典加入反拿破仑联盟。——译者注）

② 对此，可参《现代学者对（洛克）主张的接受》[Reception of (Locke's) proposal among the moderns] 一文，载 Deely 2001，592－593。

用的。[①]

但是，我们必须明了，皮尔斯的视界比西比奥克还要宽广。秉承同一思想脉络，迪利（1989a）从约翰·普安索（John Poinsot，1589—1644）那里梳理出具有一种哲学本质的种种具体表现。他表示，符号活动的确对生命物维系自身而言十分重要，但更有理由认为，符号活动，不仅在其当前的、实际的存在中，对于生命物而言是重要的，如西比奥克所认识到的那样，而且对于自然世界中使得生命近乎可能并进而成为事实的元初条件，也是重要的。在这一点上，随着自然在这个星球上（如其在别处的星球一样）朝着那种独特的生命形式进化，符号活动历经了不同层级的"简并"（degeneracy）或"孕育"（pregeneracy），在把越来越复杂的生命系统引入现实这一名副其实的符号活动大爆发过程中，显露出自己完整而真实的样子；那种独特的生命形式，如马利坦（Maritain）所言，不仅能够使用符号，而且能够认识到符号的存在，此种生命即"符号的动物"（semiotic animal）。[②]

在1908年12月23日致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Victoria Welby，1837—1912）的信中，皮尔斯（当时他已年近七十）表述了自己关于符号学的宏大视角[③]：

> 所有这些东西，数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引力、热动力学、光学、化学、比较解剖学、天文学、心理学、语音学、经济学、科学史、惠斯特纸牌、男男女女、葡萄酒、度量衡学，都只是作为符号学研究才进入我所能及的范围。

所有存在之物，无论是人还是非人，都因为它们是符号，或者，更恰当地说，都因为它们实施了"符号功能"，才被皮尔斯所关注。的确，正如他在《实效主义几个问题》（Issues of Pragmaticism）这篇1905年的论文中所说（*CP* 5.448，n.1）：整个世界，整个存在之物以及我们之于其的观念所构成的世界，我们习惯上称之为真实（truth）和存在所构成的世界，不过是那个更广袤世界的组成部分而已，"这整个的世界处处充斥着符号，即便这世界并非纯粹由符号构成"。

---

① 参见Deely 2008：85，尤其是115 n 25："值得注意的是，'符号学说'这个命名，拉丁文写作*doctrina signorum*，在从奥古斯汀（Augustine）到普安索的拉丁时代（5—17世纪），在从洛克到皮尔斯的整个现代阶段（17—20世纪），以及在西比奥克之后、随着21世纪开始的符号行为研究者群体之中，都被通用于表示符号学（semiotics）。"

② 参见Deely，Petrilli，Ponzio 2005；Maritain 1986。

③ 载Hardwick 1977：85-86。

在各种著述中，皮尔斯罗列了他相信应该归入符号的无数例子，譬如其1909年在名为《论意义：基于对同一所进行的半个世纪观察》（Essays on Meaning：By a Half-Century's Student of the Same）的论文的前言中所言。在梳理有关符号学的总体描述过程中，他指的是诸如图像、图画、表格、指物的手指、疾病症状、眨眼、手帕上打的结、记忆、幻想、概念、表示、个别符、数字、字母、单词、短语、句子、章节、书本、资料收藏、信号、祈使命令、显微镜、立法委员、音乐符号、器乐演奏、节目表演、自然的呼号——换言之，能够创造出从其自身之外的某物释放出精神图像的任何东西。[①] 但在一般符号活动之外，在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人类符号活动层"（anthroposemiosic sphere）之中，按照皮尔斯的观点，作全球化考虑的世界是一个符号，"一个庞大的再现体，一个巨大的象征符号……一个主题"；作为主题，它"必然是一件艺术品，一首伟大的诗歌……一部交响曲……一幅绘画"（*CP* 5.119）。宣称世界充斥着符号（*CP* 5.448，n1），就意味着世界——包括生命之前和之后在内的整个世界——在构成上被赋予了一种潜力无限的意指和解释操作的生成机制。

但是，在这里的演讲中，我想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符号活动的发展以及人类——"符号的动物"——出现，产生出一种意识，它将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带来一种责任感：对于动物物种的未来所具有的责任，这种独特意识正是从这之中而来的，但责任感，原则上，则不仅涉及任一其他动物物种，而且涉及任一生命形式；因为责任感是植根在一种知识形式之中的，它［我称之为"元符号活动"（metasemiosis）[②]］仅凭自身就能够构想出作为全球的、系统交互的现象的生物界有何需求，并因此而采取措施使得文明与文化与此需求相符，如果与此需求背离，那么将会摧毁大地——生命滋长所依赖的生物符号活动的全球性整体。

正如我在别处表示过的[③]，我反对针对皮尔斯符号学做简化的解读，有关与他者的关系、对话以及对于他者的责任这个问题，在皮尔斯本人对在人类世界之中并因此在人类主体之中的符号活动所持的观念里，同样居于核心地位。事实上，皮尔斯符号理论中不应该被低估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为重新界定主体性所做出的贡献。主体性是作为对话性的、关系性的开放单位而出现的，这个过

① 参 MS 634：16-17，1909年9月；*CN* 2：149。

② 值得一提的是，迪利讨论过这个术语对于人类符号活动的适用性（参 Deely 2008 a："致谢"部分及14.2~14.5节）。

③ 参 Petrilli 1997，1999，2001。

程在开放的人的内部和人与人之间那种与自身和他者的对话性的相互关系中发展。正因其由符号构成，也就是说，由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符号构成，所以，主体性不可避免的是符号之间相互关联性的表达，它不仅与其他物体不可分割，而且因此而涉及其对于他者、对于宏大符号活动网络中其他“符号”不可逃避的责任这种前提条件。在这种状况下，对他者的冷漠和封闭是一种被迫而且做作的向内收缩。关于在皮尔斯研究过程中一直有所发展的思想和主体性的对话观，可以追溯到他早期的著述。正因主体性由符号构成——用我自己的话说，由符号材料构成——那么，它的边界就不能一劳永逸地被画出。事实上，边界只能在与其他主体的对话性遭遇中被画出。人类诞生在这样一个社群，其中，体验是和该社群中其他成员相互关联地经历的，而绝非是与该社群相互隔绝的（*CP* 5.403 note 2）：

> 我们知道，人若形单影只，则是不完整的，人本质上是社会的一个可能的成员。特别是，一个人的经验如果单独而论，什么都算不上。如果他看到他者所不能看到的东西，我们会称之为幻觉。必须加以思考的，不是“我的”经验，而是“我们的”经验，并且这个“我们”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就符号探索的伦理和社会涵义而言，除了皮尔斯和莫里斯[1]，另外一个杰出的符号研究者是维多利亚·维尔比。[2] 维尔比的意义学（significs）[通过荷兰诗人兼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范·伊登（Frederik van Eeden）对之所做的思考，引发了荷兰的意义学运动]，超越了纯粹的描述论，致力于在符号学的认识和认知边界之上来分析伦理学、审美以及实用主义哲学维度中的符号，而这正是符号学与价值论相互交合的地带。维尔比倡导意义学，缘于这一假设：符号和意义问题，不能脱离在人类兴趣和目的的所有可能领域中有关意义地位和价值的思考。她的工作使得符号学超越了人们所认为的“认知符号学”（cognitive semiotics）这一边界，也超越了符义学这种专门主张。意义学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而不是特别的、专门的领域中的意义问题，它邀请我们所有人——不只是专家，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每一个人——来提出这个问题：“这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是单单针对语言意义，而是要探知某物对我们所具有的价值。所以，意义学作为一种精神训练方法而出现，它在伦理和教育

---

① 尤其参见莫里斯所著《开放的自我》（*The Open Self*，1948a）、《人类价值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Human Value*，1956）以及《意指与意味》（*Signification and Significance*，1964）。

② 参见 Welby 1903，1911，2009；又参 Petrilli 1998a；Sebeok 2001：146－148。

方面意义重大，关系到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方面，并因此而关系到做出负责任的选择。

维尔比用以体现其符号和意义理论的，即意义学，还包括“意义哲学”(philosophy of significance) 和“翻译哲学”(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等其他表达，这充分显现出其方法的不同侧面。符号意义随着跨符号类型和层级的翻译过程的增加而增殖。事实上，维尔比所说的翻译是一种解释和理解方式，她将其如此而先驱性地运用到对符号和意义展开反思的若干领域。

在这种语境下，借用雅克布森的说法[参见 Roman Jakobson 1971 (1959)]，翻译不只是按照语际 (interlingual) 的翻译来理解（尽管它也是语际性的），而更重要的是作为符际的 (intersemiotic) 翻译和语内的 (intralingual) 翻译来理解。所有符号以及表达本身都是翻译，这是得到了皮尔斯符号观确认的一个观点。心灵活动，如维尔比所主张的那样——再一次地，她同皮尔斯看法一致——是自主性的翻译操作。维尔比的翻译理论对其意义学具有结构性作用，与她对语言修辞性的思考密切相关，即与她对暗喻、类比、同族关系在思维、知识、交流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思考密切相关。由于采用这样一种方式，意义学同时又作为一种方法出现，这种方法能够强化意识，增强并驾驭作为理解一般语词行为和非语词行为本义、蕴涵和意味条件的翻译操作。通过这种方式，维尔比的意义学，在严格的认知或认识维度之外，更与符号生命及其研究的伦理维度有所关涉。

因此，在我看来，从符号和符号伦理理论看，对于符号、意义以及责任之间关系的思考，是不能忽略维尔比所做的工作的。她引入了“意义学”这个新术语，来标识自己 1894—1896 年间关于符号、语言和交流之间关系研究的独有方式，使得我们有必要发问：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涵义？作为意义学家，维尔比核心关注符号与价值之间的关系，因为符号对向、朝向人类的交流和行为；她强调须探寻语词涵义、人类实践活动蕴涵——在终极分析中，即探寻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发展意识和责任批判，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负责任的批判行为这种追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意义学为一位女性所开创，这并不让人惊讶。她未曾跻身符号与语言科学的万神殿或先贤谱，也不让人奇怪，但她却有着重要影响。除了皮尔斯和前边提到的范·伊登，她还影响了无数其他重要学者，譬如柏特兰·罗素 (Bertrand Russell)、查尔斯·K. 奥登 (Charles K. Ogden)、乔治·F. 斯道特 (George F. Stout)、约翰·M. 波尔德温 (John M. Baldwin)、费迪南·S. 席勒 (Ferdinand S. Schiller)、费迪南·托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 等。“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什么意思”“有什么

涵义”，维尔比引导我们，面对一切语言中语词和非语词的一切表达，无论是普通语言还是特别语言，面对任何人类行为或社会实践活动，都应提出这些问题。

三、与他者的关系，对话理论，以及作为人类理解条件的倾听

在《理解的四个时期》（*Four Ages of Understanding*）这部2001年出版的划时代巨著中，迪利以提出“时间分界线”（the boundary of time）这个概念作为开始，他用这个概念来标识活在特定的“此处此刻”（here and now）的那些人的生卒年岁。因此，他的“时间分界线”概念是事实性的生活时间。“理解的四个时期”，按照该书所提出的，按时间细分如下：古典希腊思想时期、拉丁时期、现代思想时期以及后现代思想时期。“现在”在这种界定下，是专门为活着的人保留的；“过去”是不再活着的人的领域；“未来”属于并未活在现在，但是会在未来出现的人。“现在”，属于现在在世者这个领域，必然是激发特定历史解释那种视角的所在。人类理解中的发展，与符号一般理论吻合，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宣布它是以“总体符号学”作为特色的。[1]

后现代阶段被称为“符号之道”（the way of signs）。它的倡导者是（或者曾经是）诸如查尔斯·S. 皮尔斯（1838—1914）、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查尔斯·W. 莫里斯（1901—1979）以及托马斯·A. 西比奥克等开创者。这里，我仅谈论在《四个时期》所列“奠基之父、奠基之母”中所未曾提及的另外两位哲学家兼符号学家：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1837—1912）和米哈伊·M. 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1895—1975）。

此外，“现在”与符号在对人类理解的历史所做解释之中的联系，并不只依赖于生命与符号之间的一般性关系。特别就我们而言，作为身在21世纪中的符号行为解释者，“现在”意味着分割现代与后现代的那条界线，意味着知识文化的一个新的、真正全球性的时代的开始。“如果对于后现代意识的出现存在着一个核心观念的话”，迪利在《理解的四个时期》第ⅩⅩⅩ页上写道，“那么，它就是符号观念。”符号观念以及此观念在符号理论中的基础，共同构成了我们现在这一特别视角的关键语境，以对理解的历史做出新的理解。

符号理论与人类理解历史之间的关系，从作为全球交流时代的我们现在这个时期来看——在这个时期人类越来越清晰地作为“符号的动物”出现，是一种互利关系。

---

① 参见 Sebeok 2001。

符号观念在迪利所描述的四个时期，通过不同方式并在不同程度上，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造成它们之间的众多差别而做出了贡献。但是，在后现代时期，有关人类本质的定义本身，则是以物种专有的符号使用作为基础的：迪利认为（第736页），哲学思想的直接未来所要求的有关人类本质的定义，在于“人类这种动物，是作为除使用符号之外还知道有符号存在的唯一动物，因而被恰当地称为‘符号动物’（*animal semeioticum*）”。同时还补充说（同上页）：“正如笛卡尔关于人作为‘思想之物’（*res cogitans*）这一定义，[相对希腊学者和拉丁学者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animal rationale*）]，标志着从古典的、中世纪的思想向理性的、认识论的现代思想过渡，因此，人作为符号动物这一定义，对后人而言，将会标志着从现代思想到后现代思想的过渡。”迪利在《理解的四个时期》之后的著述中，进一步阐述了符号学在这方面的此类观点。他于2002年出版的著作《人类理解因何而特别》（*What Distinguishes Human Understanding*），如题所示，就是专门探讨人类理解问题的，其中包括关于“符号动物”的整个专章；而且，在其整个著述中，迪利都还在继续对这类话题进行探索，譬如他于2007年出版的著作《意图性与符号学》（*Intentionality and Semiotics*）。

在不同场合，我都坚持伦理学在人类理解起源上的首要地位。“现实的发现”（这是迪利专论“古典哲学”的《理解的四个时期》第一部分所用的标题）是以有能力倾听并欢迎他者作为前提的；“他者”（*autrui*）是法国哲学家埃玛纽埃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使用的术语。他者对于按照人这一物种特有的形式构建客观世界非常必要，但同时，他者对于所有那些想要去除其他性（otherness）的范畴则是难以驾驭的。对于被理解为同一、整体、存在的世界的完整性和封闭性，“他者”是一种构成上的阻碍。与“他性中的他者”（Other in its otherness）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过量的、多余的关系出现的；与作为“他的他者”之间的关系替代了客观化思想，就存在的现实而言，就如其所是的世界而言，就本体论而言，把自身呈现为被认为是主体

与客体之间这种二分关系之中释放出来的东西，呈现为超念之物(transcendence)。①

与作为他的他者之间的关系，他性关系不可化约地超出了知识领域、认知领域、概念、抽象思维的领域（正因为这种关系，它们才成为可能）。与他性中的他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发展人类理解、知识和主体性的伦理基础、条件和前提。

维尔比相信教育须从一生中非常早的阶段开始的重要性。她研究了教育问题和教学方法论问题，对如何教育孩子方面有着极大兴趣。在她看来，重要的是人类从孩提时代就学会批判性思考，这样一种思考直截了当的就是如何开发人类与生俱来的那种才能。因此，语言的批判和批判意识的发展，是她著述中的主要话题。她对传统教育体制持批判态度，认为其总体性的特点是具有教条主义倾向，抑制了创造、批判和表达方面的潜力②，正是在寻求一种救治的过程中，她对符号、价值观和行为做出理论梳理，将其变成了她意义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她还坚持符号化操作中的伦理维度。责任、自由、友善、倾听他者，是意义学逻辑的构成部件，如此种种都同莫里斯本人的方法类似而且是与符号伦理学及其所倡导的新式人文主义相互一致的，这种新式人文主义，“他性人文主义”（humanism of otherness），尤其是在列维纳斯那里，是有过预想的。③

在此语境中对“伦理”的理解，列维纳斯有如下解释④：

> 我们不把通过理解的综合或通过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而绑缚在一起的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称为伦理关系，我们所谓的伦理关系，是其中一方对于另一方有所负重、有所关怀、具有意义，它们通过一种知识所无法耗

① 当然，经过唯名论者和现代发展修正过的许多哲学术语，需要在符号学范畴之中再度修正，正如迪利于1982年在其关于“客观之物”（Objectives）的表述中所说：“从符号开始，即从按其理所当然的我们经验中的符号功能（符号活动）来看，符号学的任务就是创造一种新的规范——它自己的规范——并且以该规范对所有之前经验记录做出评价、批判和纠正。”最需要经过这种修正的，莫过于“客体”（object）这个术语了，“所指客体”（object signified）是个冗余性表达，因为“意指项”（significate）已经点明现代用法中“客体”这个术语主要掩盖什么。最近一次专门考虑到“客体”这个术语的符号学术语澄清尝试（Petrilli and Ponzio 2005），是引入“被解释项”（interpreted）和“被解释符号”（interpreted sign），就其作为解释项符号所做解释客体而言，是把符号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内了。参该书第二篇论文注释13所做讨论。

② 参Werlby 1983及其将要出版的著作，其中一部分收集了来自加拿大约克大学资料库的她的一些未发表论文。

③ 参Petrilli 1998，2007；Welby 2008及其将要出版的著作。

④ Levinas 1967，英译本，第116页。

尽、无法拆解的情结而绑缚在一起。

显然，"伦理"一词在这里的理解，是不同于其传统意蕴的。同雅克·德里达（Jaques Derrida）（1999）看法一致，我们可以宣称：列维纳斯的伦理是本体论之前和之上的，正如考虑到本体论在政治现实主义中所具有的内涵，它是在国家或政治之前和之上的。

与"他性中的他者"之间这种关系，是我为他人（one－for－the－other）的牵涉、展露、责任、非冷漠的邻近性。[①] 它的前提是能够去倾听——那种"有所回应的领悟"（answering comprehension）和"有所回应的理解"（responsive understanding）的倾听，能够去欢迎他者。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说："倾听会说话"[②]，这与米哈伊·M.巴赫金（1983）的看法一致：倾听所面对的是建构性对话中的符号。如果"有所回应的倾听"（responsive listening）以及与之相伴的他性逻辑受到压制和排斥，那么绝对的他性，想要听到的愿望，或者"应用意义上的倾听"（applied listening）就会占到上风。这就是说，解释项被拘囿在一个"封闭的话语世界"（closed universe of discourse）（Marcuse 1964），其中，问询和提前设定好的作用是固定了的，而且倾听和有所回应的理解是彼此分开的。"应用意义上的倾听"发生在一个由提前设定好的话语作用构成的网络之中：它恪守"信徒、弟子和病人的古老地位"[③]。与此相反，按照对话方式理解的倾听，有所回应的领悟，以及非冷漠的他者蕴含，则从来不把意义固定或僵化，而是与不断生成对话性的新的指符和解释项这一能力相关，与由话语中的作用所确立的无限责任相关，与回应性相关（Bakhtin 1990）。

言说不仅意味着言说别人的话语，如巴赫金所特地教导我们的那样，而且意味着在一种不可避免的关涉和蕴含关系之中对他者有所考虑、对他者有所交代、对他者有所担当，因此，言说总是意味着做出回应和担负责任——首先是对自己负责，让自己适当。"我"言说，并在这言说中对他者有所承担。[④]

人类的理解暗含了对话思想。就结构而言，对话这个字眼是对话性的字眼，它出现在与他者的关系之中，它是一种回应、回答、答复，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构成要素而言，理解是对话性的。对话是外部或内部的话语，在这话语

---

① Levinas 1961，1972，1974，1987.

② 参见 Barthes and Havas 1977：990。

③ Barthes and Havas 1977：990.

④ 关于他性关系的这一方面，参看列维纳斯对之所做解说以及对"非意图性良知"（conscience non intentionnelle）所做分析，见 Levinas 1991，英译本，第 122～133 页。

中，“他者”这个用词——不一定就是另外一个人——干扰到被认为某人自己用词的东西。既然与他者的关系对向“我”的构成，个体思维的构成，那么，他性甚至就位于主体之中，同一性之中，“我”之中——事实上，这本身就是对话性的，是同一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就构成要素和结构而言，“我”是对话性的，意思就是“我”证明了他性关系——无论这是非自身的他者（others *from* self）的他性，抑或自身的他者（others *of* self）的他性。对于诸如皮尔斯和巴赫金之类哲学家而言，对话就是思想模态本身［参 Petrilli，“Basi per una semiotica dell' io”（符号自我的基础），载 Sebeok，Petriili and Ponzio 2001；Ponzio 1984，1985a，b］。

巴赫金所辨识的语词和思想的“实质性的对话思想”（substantial dialogism），同“形式上的对话思想”（formal dialogism）相比[①]，处在这个哲学用词的起源位置。这个哲学用词来自于（derives from），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在于（consists in）人类特有的反思符号的能力，这被认为是“元符号活动”，是“符号动物”的独有特色。[②] 反思符号的能力意味着对他性的感知，因此是对责任性的伦理感知的所在和源泉。

回到实质性对话思想和形式性对话思想的分野上。“实质性的对话思想”，如巴赫金所澄清的，并非是由文本的对话形式所决定的（譬如柏拉图所撰文本中的苏格拉底的那些对话），而是由或许采取或许不采取对话形式的某文本中的对话思想程度所决定的。换言之，决定实质性对话思想的，是朝向他性开放的（或高或低的）程度。

在这一意义上，在其《人类理解的四个时期》中（第 45~52 页），迪利曾对柏拉图在《枚农篇》（*Menon*）中的对话大加引用，以便阐述苏格拉底的对话（更确切地说，是为了阐述柏拉图的主张：学问即来自在具体化之前所获取的存在层面的记忆），这事实上是实质性的对话思想低程度上的形式性的对话（也许处于所有柏拉图对话中的最低程度）。在《枚农篇》中，对话采取了一种追问到底的形式：在追问中，他者（那个小奴隶）受到引导，得出追问者（苏格拉底）预先定下的结论；从结果看，苏格拉底是已经知道答案并且相应地对对话进行了引导。

“在开始处开始”，我们在哲学的“源头”所发现的，并非是与哲学史保持着相互一致的什么一元论或多元论，而是对话思想——先于柏拉图在其（形式

---

① 参 Bakhtin 1963，1981。

② 即指人类具有辨识和分析存在的能力而并非只具有纯粹的符号性存在这样一种符号活动。

性）对话中所炮制那种对话思想的对话思想。通过“对话思想”，一如目前我们对这个词的使用，人类生存和理解中与他者的关键关系得到了理解。在与世界和他者之间的物种特有的模塑化关联——所谓文化或文明——这个意义上，人类的生活是对话性的。个人和人群的生活以对话方式包含在异质性之中，正如巴赫金式的“怪诞身体”（grotesque body）（Bakhtin 1965）包含在其他生物的身体之中，无论这生物是人类还是非人类。实际上，根据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对话和“身体间性”（intercorporeity）（根据一种不无误解的解释角度——参看 Poinzio 2003）是彼此紧密关联的，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所理解的对话以及拉伯雷（Rabelais）所描绘的“怪诞身体”。[①] 无具象身体的头脑之间不可能存在对话，对话思想也不可能脱离符号的生物符号活动概念——并非生物学主义的概念——得到理解。

四、实用主义符号学，积极回应的解释项，以及对化约论的批判

莫里斯把符用学定义为有关符号载体与解释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或者更简明的，关于“符号与其使用者的关系”的研究（Morris 1938）。与把符用学领域限定在语词符号内、很久之后才把非语言符号包括进来的那些方法不同，莫里斯的符用学观念预见到语词和非语词符号，并且核心关注符号的伦理与审美维度，事实上，这与他对符号与价值观之间关系的兴趣密切相关。与皮尔斯本人研究实用主义的意义维度所采取的方法相似，解释和异质性之间的关系在意指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使之为了人类符号活动中的责任而从积极回应的理解以及执着于可回应性这一方面，能够更好地理解解释项。

通过强调解释项（interpretant）而不是解释者（interpreter），符用学对解释项进行了突出，它并不是简单地起着辨识被解释对象的作用［用作“辨识解释项”（identification interpretant）］，而是做出积极反应，并且占据重要地位。这就是我所谓的“积极回应理解的解释项”。它和辨识解释项不同，是专门针对符号的，对符号的实际意义进行解释。符号解释，就“积极回应的理解”（answering comprehension）或“积极反应的理解”（responsive understanding）而言，是向着与意义关联的解释性轨道开放的。它朝着“符号特

① 参 Bakhtin 1963；Petrilli and Ponzio 2005；以及庞奇奥所撰前言“巴赫金及其文学圈中有关他者哲学的论述”（“La filosofia dell’ altra parola e la scrittura letteraria in Bachtin e nel suo circolo”），载 Bakhtin 2008。

色”（signness）迈进，也就是朝着信号性（signality）之上的符号性（semioticity）迈进。我们无需使用关系到以辨识解释对象为己任的解释项的“意义”（meaning）一词，也无需使用关系到以并不局限于辨识被解释符号为己任的解释项的“含义”（sense）一词，我们所要区别的是两个意义带（two zones of meaning）：信号性意义带和符号性意义带。与信号以及信号性有关的解释项是辨识解释项。相对而言，专门针对符号的解释项，对符号实际含义做出解释的解释项，就是积极反应的解释项或者“积极回应理解”的解释项。[①]这一解释项，或解释项的这一维度，是与符号，与如此这般的符号的符用学维度相互关联的。被解释对象和积极回应理解的解释项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该种被解释对象与解释项关系所处其中的世界的模塑、习惯、风俗。积极回应理解的解释项是根据对话结构进行推断这一推理脉络所得出的结论。符用学所处理的，就是符号载体或“再现体”（representamen），作为被解释对象，与具有其完全符号性质的解释项，即作为积极回应理解的解释项——之间的关系。

在《符号、语言与行为》（*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一书中，莫里斯利用生物学和物理学来处理诸如“有机体”“反应”“肌肉”“腺体”“感觉器官”“需要”“能量”等“难以分析的术语”，他将它们与其他诸如“行为”“条件”“原因”“影响”“状况”等来自日常用语的术语并作一处，用以（全面或部分地）分析为符号学所拟定的术语，即所谓“分析术语”。在致力于界定“符号”这个术语的过程中，莫里斯在其专著中提到的始作俑者是皮尔斯，后者的观点得到了他的采纳。莫里斯说，根据皮尔斯的看法，“我们只须明确它（符号）所创生的习惯”（1946，见 1971：75），“所以，”莫里斯说，“符号是按照它们在其解释者那里所引起的行为倾向来描述和区别的。”（同上）在其著作所附术语表中，莫里斯对“反应倾向”（disposition to respond）是这样定义的：“特定时间点上有机体的状况，以使得在某种附加条件下有某种反应发生”（同上，第 361 页）。他没有对“有机体”下定义；与他关于符号学的广阔视野一致，他是将这个术语应用于所有生命体的。然而，他对“反应”这个术语的定义却有如下表述：“任何肌肉或腺体的行为。因此，存在有并非反应的有机体所作回应。”（同上，第 365 页）反应倾向是“刺激”激发的，“刺激”被理解为“作用于生命有机体接受器官之上的任何物理能量”。此外，他明确分辨了“反应”（response）和“回应”（reaction）：“刺激在有机体那里引发回应，然而并不一定就是反应”，这句话之后他加了个括号：（反应是“肌肉或腺体做

---

① 参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2007b；Ponzio 2006。

出的回应”)(同上，第367页)。正如莫里斯在其1948年的论文《关于关于符号的符号》(Signs about Signs about Signs)中解释的那样，他的《符号、语言与行为》一书并不以呈现符号科学为目的，而是为这样一门科学拉开大幕，是寻觅精确术语这项重大工程，是要找到谈论符号的符号，而把发展该学科的任务留给了“众多领域中的众多探索者和后继者”(同上，第434页)——他的学生托马斯·A.西比奥克及其总体符号学，正是对其工作的继往开来。

莫里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开发一套适当的语言工具来谈论符号，属于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的符号(同上，第75页)，这使得他超越了严格的“人类符号学”(anthroposemiotic)视野的局限，而后者常常被错误地用来替代一般符号学。同时，与美国行为主义者［以巴罗斯·斯金纳(Burrhus Skinner)为首］不同，莫里斯不只是把观察非人类动物行为发展出来的术语用于人类行为，而且是集中关注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世界的总体统一之中的符号。他的观点显然是“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性质的，包括了今天所理解的“动物符号学”(zoösemiotics)和“人类符号学”(尽管这些术语并非来自于他，而是来自他的学生西比奥克)。然而，莫里斯有关符号和生命之间关系的看法，远比西比奥克狭隘，后者提出了符号活动与生命彼此叠合这一假说，如果我们从被赋予“肌肉和腺体”的有机体(定位在宏观有机体层面上的有机体)来思考莫里斯所探讨的生命有机体，就会把微观有机体从他的理论框架中排除掉。关于符号活动与生命之间的关系，莫里斯的观点似乎是这样的：一方面，有符号活动就有生命，的确，符号不能脱离生命而存在，所以，没有生命=没有符号。但是，另一方面，生命能够脱离符号活动而存在，即生命不一定意味着符号的活动，因为“生命”包括符号活动，同时又超越了符号活动。符号活动不能脱离生命而存在，所以没有生命意味着没有符号；但是符号活动不一定耗尽生命，所以生命能够脱离符号活动而存在——有生命的地方，不一定就有符号活动。由于莫里斯对“反应”和“回应”的区别，符号活动界也受到局限，被定义为涉及肌肉或腺体的一种特殊回应。

不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莫里斯在从生物符号学通往总体符号学(乃至其上)这一发展道路上的贡献。他把生物学与符号学联系起来，之后沿着符合皮尔斯实证主义和符号学与价值论关系的方向推进。

实际上，通过他在自己实证主义框架下针对符号与价值论关系的研究，莫里斯对于符号伦理学方向的符号学发展还做出了一个重要贡献。莫里斯的实证主义是在皮尔斯的“实证主义”或“实效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皮尔斯杜撰了“实效主义”(pragmaticism)这个词，以表明自己的方法不同于在他之

后以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作为肇始的种种解释]。[1] 皮尔斯的影响，在莫里斯诸如1937年的著作《逻辑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科学的经验主义》（*Logical Positivism, Pragmatism and Scientific Empiricism*）、1938年的论文《科学的经验主义》（Scientific Empiricism）和《皮尔斯、米德和实用主义》（Peirce, Mead and Pragmatism），以及1938年出版的对符号学具有开创性贡献的著作《符号理论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中，都可以明显看到。在《皮尔斯、米德和实用主义》一文中，莫里斯坚持认为在皮尔斯和乔治·H.米德之间，或者更恰当地说，在前者的原创性实用主义思想和后者时间上更近一些的重新解释之间，有着关联关系。他在1970年的著作《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American Philosophy*）中，对上述思考也有所阐发。

莫里斯的实用主义意义观使得他不仅关注符号，而且关注价值，这一点，在其早期出版的著作，如1942年的《生命之路》（*Paths of Life*）以及随后的1948年的《开放的自我》（*The Open Self*）中已经可以发现。这些著作展现了关于人类的种种偏好行为的研究，描述了不同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根本选择”。《人类价值诸种》（*Varieties of Human Value*）于1956年出版，收入了莫里斯对价值的实验性研究成果。他1964年的著作《意指与意味：符号与价值关系研究》（*Signif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of Signs and Values*），继续联系他有关符号的研究对价值展开研究，深化了符号学与价值论之间的关联关系。事实上，在莫里斯的描述中，英语单词“meaning”（意义）具有双重的认可含义，不仅指符号的语义维度（意指），而且指价值性方面（意味）：“符号化的某物以及被符号化者的价值或意味。”（Morris 1964：vii）通过《意指与意味》，莫里斯强调，自己的符号学研究方法是一项“跨学科事业”（第1页），他所关注的符号，是和人类和非人类动物有关的一切形式和表现中的符号，常规的、病理的符号，语言的、非语言的符号，个人的、社会的符号。

五、符号活动及其未来，一种符号伦理视角

如果像皮尔斯所说，“思想只有通过对更为发达的未来思想言说才成其为其所是”（1868：*CP* 5.316），同时，存在于符号之中的思想必须涉及符号活动，那么，即便符号活动像看上去那样，只是偶尔和间歇性地涉及自然事物的

[1] 参见本书第37页脚注①中有关实证主义/实效主义差别的讨论。

物质互动[1]，自然环境（就符号活动被涉及而言）于是只有通过对更为发达的未来事物状况言说才成其为其所是，而且，它最终，即便不是从一开头，是取决于社群的思想的，在此社群之中，由作为符号动物的探索者构成的社群有能力创建社群自身。

那么，在人类思想中，符号的行为如何典型地展现自身呢？一种主要方式是通过引领我们在日常事务中的行动。我去见一位朋友，或者去某人主持的一个会议。我并不知道那位朋友或那位主持人在预定的见面时间之前三个小时被杀了。我仍然去了，希望当面见到他们。他们作为符号化对象呈现在我面前，同时他们又是事物——或者我是这么认为的，即使“同时又是”这个说法不包括在内。我的思想，作为符号载体，把他们作为符号化对象呈现给我，此刻他们既是又不再是自然环境中能够“当面”碰到的事物。因此符号作为未来对现在的影响而起作用，过去的意义受到这种未来影响的塑造。

符号化的未来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发现是被经验过的未来。但是，被经验过的未来却定然被符号活动方面所预计的未来塑造，即使预计有所偏差。而且，并不存在符号活动之外的预计。在这里，我们一直谈论的是有意识的符号活动；但是要清楚，预计是具有符号行为的本质的，不仅在涉及有意识之时如此，而且，有意识的预计之所以可能，正是源自于符号行为的性质——即使当其也涉及意识之时，此行为也是不仅先于意识，而且处在意识周遭的。

那么，这样一种“符号行为”是怎样在非有机性自然中起作用的呢？并非始终不变，像在生命王国中那样。但是，为什么不是间歇性的，好比点烟的火柴，在燃烧到足以达成其目的之前就将其熄灭掉呢？皮尔斯说得好（参见1907：W 2.410）：“也许存在着中介，它们应该和符号划入一类，却在起初是相当无意识地开始行动。”因此，不合情理的第二性中的两个事件（自然事物中的因果互动）产生出一种新情况，这种新情况不是在此刻，而是在某种第三种情况发生的将来某时，催生出头一个生命物，或者至少是使得很不可能的生命比以前变得更为可能——这不就是符号活动在日后将变成的那种虚拟性吗？当第一个生命物体出现的那一刻，而且只有在那时，符号活动的火焰才会真实，才会适当点燃，随着生命演化而成为熊熊烈火，不同于之前生活的世界之中符号活动的摇曳火苗。

但是，那些导向那一刻的众多瞬间——其中，处在第二性层面的事物的物质性互动却催生出根本不可能早于这种确切互动的第三性可能［我们或许可以

---

① 这是迪利最早在“物质符号活动”（physiosemiosis）这一标题下提出的内容。

称之为一种“第三性的第一性”(a“firstness of thirdness”)]——又是如何?[1]这类转换,这类“跳脱”,必定已经发生过,因为若非如此,起初无力维系生命的无生命的世界,就会依然没有生命,依然无力维系生命。

然而我们知道,事实上存在一种在生命来临之前使得生命极为可能的自然世界发展,若非这种发展,生命至今不会成为可能。在“世界大爆炸”(“big bang”)那一刻,生命仍很遥远,但所有那一刻之后的事件,都“似乎”在它的影响之下发生,就像为其做着准备一般(不是每种发生都如此,但总体上是这样的)。最为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命需要行星系统,而行星系统需要众多星球;然而星球或行星在开初都没有表现为世界的形式。最为可能的未来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取决于此时此地的事物现有状况,然而,此时此地的那些事物,通过彼此相互作用,催生出改变未来可能性的若干现有状况,同时,改变了过去的关联关系;因为决定某特定的事物现有状况之中与过去之间那种关联的,始终是那些“未来可能”。

西比奥克的文章《符号活动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Semiosis)[2],以“什么是符号活动”这个问题作为开头。他从引自皮尔斯开始做出回答。西比奥克发现,皮尔斯把符号活动或“符号行为”描述成一种不可化约的三元进程,或者一种涉及三个构成要件的关系(符号或再现体,对象,解释项)(*CP* 5.473),焦点是解释项及其如何产生。从皮尔斯的观点看,某物成为代表某物的符号——它某些方面的对象,或它的观念,或它的立场——是因为它被另外一个处于(构成无限符号活动的)解释项开放链条上的符号,即解释项所解释。在我们的术语中,解释项本质上就是“做出积极回应的理解的解释项”。

---

① 在这里,我把皮尔斯关于人类符号活动层次的观察扩展到生理符号活动层次(1906:*CP* 5.488):“不要以为,有能力产生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项的符号的每次呈现,都实际性地产生出这样的解释项来。情况可能要么太早,要么太迟。如果太早,符号活动不会展开得深入……另一方面,情况可能是太迟。”(因而这里正是机遇的恰当位置:位于事情的中心地带,但并非就是靶心——参见 Deely 1969:105-111)。这里的扩展,仍然与皮尔斯的看法一脉相承(1904:*CP* 8.332),“我们可以在如此广泛的意义上理解符号,以至于它的解释项并非一个思想,而是一个行为或经验,或者,我们甚至可以扩大符号的意义,使得其解释项仅仅是一种感觉品质”。他还进一步阐明(1907:W 2.410):“或许我对总体上的符号看法太狭隘,说符号起初的效果肯定属于感觉性质的,因为”——如我们在上边提到的——“也许存在着中介,它们应该和符号划入一类,却在起初是相当无意识地开始行动”,无论是在关于生理符号学的问题中,还是在生命出现之前的自然中,情况的确而且定然是如此的。参见 Deely 2008b。

② 载 Sebeok 1991b:97-99,又见 Posner,Röbering,Sebeok 1997-2004,I。

所以，符号活动关系到对符号目的价值论（即以目的为导向）[1] 或实用主义性质的解释。

不仅存在作为另外一物之符号的一个符号，而且还有一个把某物当作另外一物之符号的“某人”（somebody）、“准解释项”（Quasi－interpretant）（*CP* 4.551）。皮尔斯对这种描述的蕴涵做出了进一步分析，他声称：“它具有符号性质，尤其是具有因为它会被解释成一个符号这个事实中的特性而变得有意义这样的符号性质。当然，没有什么是一个符号，除非它被解释成一个符号”（*CP* 2.308）。他还说：“符号唯有通过得到解释，即通过它对同一对象的另外一个符号做出明确，才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符号。”（*CP* 5.569）

从解释项以及由此而来的符号解释活动的观点看，从符号做出推定的过程，即符号活动，可以用解释来进行描述。皮尔斯规定说，所有的“符号要求至少有两个准思维：准言说者和准解释者”（*CP* 4.551）。解释者，思维或准思维，“也是一个符号”（Sebeok 1994：14），即一种回应，换言之，一个解释项：解释者是一个积极回应的“某人”。

在“符号活动的演化”中，为了继续回答“什么是符号活动”这个问题，西比奥克用到了来自莫里斯1946年的专著《符号，语言与行为》中关于符号活动的定义：“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之中，某物是某有机体的符号。”根据西比奥克的看法，这个定义有效而且不可避免地暗示着，有生命实体存在于符号过程之中。这意味着，符号活动的确与生命演化一道出现。西比奥克说[2]：

> 为此，譬如，人们必定认为，有关詹姆斯国王版《圣经》中（《启示录I.3》）引用上帝说过的“要有光”这一报告，肯定是错误再现；上帝可能说的是“要有光能”，因为有关以光信号这种形式存在的电池辐射，即发光，这种认识感觉，要求一个有生命的解释者，而物质活动在大约39亿年前尚未发生。

我们看到，在莫里斯的看法中，符号活动中所暗示的有生命实体是一个宏观有机体；与之相反，在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视角中，它可能是一个细胞，细胞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基因组。

在“符号活动的演化”中，西比奥克考察了符号活动之前的世界发展以及

① 可参迪利《后继错误之渊薮：从“目的论”到“目的价值论”》（A lair for later nonsense: from“teleology”to“teleonomy”）一文中，有关以“天文学”替代“占星术”类似，以“目的价值论”替代“目的论”的讨论，见 Deely 2001 pp. 65－66。

② 载 Posner Robering and Sebeok 1997－2004，I：436。

世界开始之后的发展问题，并且提到了现代世界学的统治性模式，即世界大爆炸理论。生命出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之前（最早痕迹追溯至所谓太古时代，约39 000到25 000亿年前），那时只存在涉及非生物原子和之后的非有机分子交互作用的自然现象。这些交互作用被描述成“准符号活动”性质。但是“准符号活动”（quasi-semiosis）必须与吉奥尔吉奥·普诺蒂（Giorgio Prodi）所理解的“元初符号活动”（protosemiosis）区分开来[①]，吉奥尔吉奥·普诺蒂是一位意大利医疗学家。[②] 实际上，就自然现象而言，“元初符号活动”这个概念是暗喻性质的。西比奥克区分了非生物交互作用和“原始交流”，后者指通过体内分子来传递信息，譬如在神经结中，现代细胞传递是通过蛋白分子来管控的。但是，在西比奥克的观念中，所界定的完全形态的符号活动是有关生命的。

既然我们的地球生物圈之外有关生命的例子尚且没有，即便有关陨石上有机材料痕迹或者火星上可能有水的案例很多（二者中没有哪个必然和生命有关，也肯定不是我们在地球上所知道的生命形式），关于我们星系中其他地方，更不用说外太空，是否存在着生命/符号活动这个问题，是非常具有开放性的。[③] 所以，西比奥克宣称，人们唯有把“外生物符号学”（exobiology semiotics）和“超地球符号学”（extraterrestrial semiotics）作为迄今缺乏主体的孪生科学。

用这种方式限制我们，我们仍然可以说，至少任何有生命的和地球的实体都定然是符号活动链条上的一环，甚至对于仅仅作为有机体的部分而已的东西，对于人类所制造的人工扩展的东西，也同样是如此。毕竟，地球的生物符

---

① 吉奥尔吉奥·普诺蒂（1928—1987）“一方面，是意大利医疗学领域中领先的医学生物学家，另一方面，他又在符号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和形式逻辑等领域发表极具原创性的论文，同时，他还是一位文学家。普诺蒂对该领域（免疫符号学，生物符号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的最初贡献，是‘意义重大的坚实基础’（le basi materiali della significazione）”，见 Sebeok，“Foreword”（前言），载 Capozzi ed.，1997：xiv；参看 Prodi 1977 以及 Prodi 1988。

②《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就是为了纪念普诺蒂而由西比奥克和乌米克-西比奥（Umiker-Sebeok）于 1992 年编辑出版的；普诺蒂被描述为“勇往直前的当代生物符号学开路人”。

③ 不过，开放程度也许不像它看上去那么高。迪利（1969）从物质作为“对形式的渴求”这一性质发论，认为由交互作用的物质性材料所构成的世界，摆脱了天堂作为控制地上兴衰的不变境域这种古典和中世纪虚构，一定会展现出一种演化性质，不可避免地会沿着行星系统这个方向发展。在这一系统中，生命，以及最终的“理性的”生命就会出现。因而他宣称，自己展现了“缺乏作为证据提出的实证例子的情形下，所能够被展现的东西”。当然，对于一个只会从“事实性方式”（ideoscopically）思考的实证主义者来说，这等于是全然没有证据！但是，迪利所说的，正如皮尔斯所坚持认为的，更多的，是我们必须以一种“共识性方式”（cenoscopically）去发展符号科学。

号活动是符号活动，而且我们知道，西比奥克本人的研究中一个核心概念就是，符号活动与生命是合一的[①]，的确，符号活动正是区分有生命之物与无生命之物的关键特征。按照这一看法，符号过程并不始终存在于世界发展过程之中，而是肯定与生命发展一道出现。与此看法不同，我们在更早些时候表示过，符号活动作为对未来施加的影响，即使在世界为生命所做的准备之中，也被涉及了。[②]

六、从符号活动到符号伦理学

针对西比奥克在《符号活动与符号学：未来会怎样?》（Semiosis and Semiotics：What Lies in Their Future? 见 Sebeok 1991b：97－99）中关于符号活动未来、符号活动命运所提出的问题，符号伦理学是给出答案的关键组成部分。符号伦理学试图就符号学对符号活动的责任给出证据，因此提出，现在，建立在皮尔斯所认为的一般符号科学基础之上的“总体符号学”应该确切地按照“符号伦理学”来做出进一步发展。

生物学和社会科学、生态学和语言学、心理学和健康科学，它们的内在分工——从基因学到医学符征学、心理分析、老年学，再到免疫学——都在总体符号学中发现了相遇和互换的位置以及系统化与一体化的空间。不过，重要的是注意到“系统化”与“一体化”并不是按照新实证主义方式、“百科全书”模式来理解的（是否是一个有关把知识与语言实践并置，或者把知识化约为一个简单的科学领域及其相关语言的问题，就像在新实证主义物理主张中那样）。总体符号学是一种涉及符号相关的所有学科的元科学。它不可能被化约成“关于（实验性）科学的哲学”这一地位，虽然作为一种共识性科学[③]，它当然是以一种对话方式与哲学有关的，而且事实上是哲学的固有部分。总体符号学把其他知识领域和人类实践联系在一起，而一般情况下，出于一种特别的合理化

① 不过，“合一”（converge）与“完全耦合”（full coincidence）并不是同一件事。有关西比奥克试图把生命过程和符号过程这两个概念相互等同的批判性讨论，可参看 Kull 2003 以及 Deely 1989，1990，1991（以及之后著作）。

② 莫里斯把符号活动限定在生命的一个部分，莫里斯的学生西比奥克把符号活动扩展到整个生命，西比奥克的学生迪利则把符号活动扩展到整个世界［这一点上，的确与西比奥克称之为“指路灯”（lodestar）的皮尔斯本人更加接近了］，从此之中，我们或许能够看出某种意味深长的东西。

③ 在致维尔比夫人的信中，他写道：“对符号的共识性研究（即不依赖于新的特别观察的那些研究）迄今仍然是一种没有被分化的科学”；并且，“迈向符号科学，或者关于符号的共识性科学，有用的首要步骤之一，肯定是对该门科学的精确定义，或者合乎逻辑的分析。”（Pierce 1908：*CP* 8.342，8.343）

需要，或者因为短视的部门化这种无用甚至有害的倾向，两者通常是被分隔开来的（这些伎俩摆脱不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暗示，很多时候使用自称具有科学性的种种动机拙劣地遮遮掩掩）。

相反，因为符号活动的总体研究方法而使得视野可能得到不断发展而且充满创新，主张认同新的跨学科关系和新的解释实践，正如莫里斯所拉开序幕的那样。符号关系在人们之前认为一无所有的地方得到确认，即人们之前认为只有纯粹的"事实"和事物间的关系，仿佛不依赖于交流和解释操作而存在。此外，这种视野的不断变动还主张发现新的认知领域以及以对话方式互动的语言——事实上，符号之间的对话性关系问题已然存在，而且要求得到承认。这不仅是一个新的架设桥梁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最终承认已然存在，对存在者具有构成性意义的相互关联性，对话性的身体间性，这正是约翰·迪利在明天午餐会的会议发言中要谈到的问题。正是在探索各门不同科学的界线和边缘这个问题上，西比奥克，如所料想的那样，赋予了"符号学科"这种符号学的开放性质。

同伊曼纽尔·康德（1724—1804）一样，但结果却大相径庭[①]，皮尔斯重点关注了意指条件，这使他获得了明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通基础这种可能性。由于皮尔斯的"范畴学"，统治西方哲学思想的两种对立的现实观最终能够碰上头。这里我所指的，一个是源自亚里士多德的事物观，认为事物因其自身而存在，不依赖于思想，而相对的另外一个，则把现实描述为是依赖于思想的。交汇点是把对象、事物和思想描述为共同的符号活动操作这样一种符号学的观点。

"符号学科"这个表达还揭示出符号学的批判立场，因为它不仅赋予自己观察和描述符号操作的任务，而且按照普安索和皮尔斯所指引的道路，对符号操作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做出追问，一如它对研究符号操作的各门学科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做出追问。而且，我们在上面已经注意到[②]，西比奥克所选择的"符号学科"这一表达，对人类历史诸个世纪中的符号学而言，最具普遍性的意义。

总体符号学的对象，生命符号学的对象，是"符号界"（semiosphere）。这个术语出自尤里·洛特曼（Jurij Lotman，1984，1990），但是后来却在叶斯

---

① 他抛开了康德有关事物本身不可知这一核心教诲中（被他斥之为）"胡言乱语"和"无意义的枝蔓"的部分（*CP* 5.525）。

② 参见本书第37页脚注①。

柏·霍夫梅尔（Jesper Hoffmeyer，1996）所引入的大加扩展了的意义上被使用。[①] 事实上，洛特曼把“符号界”所指的领域限定在人类文化之内。相比之下，从总体符号学的观点看，其中，符号活动是与生命两相合一的（正因如此，总体符号学也可以被命定为“生命符号学”），追随西比奥克的步伐，霍夫梅尔也表明，符号界等同于生物界，所以作为“符号生物界”出现。总体符号学的立场是证明符号网络的扩张和一以贯之，它实际上包括了由人类、人类文化、符号、象征和艺术品等所建构的（洛特曼的）狭义的符号界。但是，总体符号学还证明了这一事实：符号界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符号界——符号生物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人类作为生命之物而言，这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离开，也绝不会离开的符号网络。

所有这一切，是远离 20 世纪中期主流符号学的一个声音，是符号研究，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被化约为脱离生产过程历史—社会关系的有关信息交换问题之后产生的一个声音，是来自符号与价值论之间关系的一个声音。在若干场合，我都证明了这类倾向的差强人意，它们还暗示出一种被化约为单纯交换价值的人类主体性观念。我要重申，符号伦理学强调的是“符号学的统一功能”，并且辨析出该功能的三个方面：“描述—解释”方面、“方法论”方面，以及“伦理”方面。

七、符号伦理学，全球化之前和之上

符号伦理学的一个根本主张是，符号学不仅要描述和解释符号，而且必须寻找足够的方法来探索知识的获得，还要就人类行为和社会规划提出设想。作为有关符号的一般（共识性）科学，符号学必须征服狭隘的专门论，即众多科学之中一切形式的分隔思想。[②] 符号学的伦理方面是规划性的，应该为人类实践的批判方向提出设想，这一般涉及从生物到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并且关注重新建立作为分隔之物来思考和体验的东西之间的关联。[③]

批判能力、社会意识以及负责的行为，这些是符号研究中的核心主题，它们所要质询的，不只是有关科学的感觉，还有人类有关生命的感觉。符号伦理学发展了西比奥克的观点并且超越了他，证明了总体符号学的伦理蕴含以及它们对于教育，尤其是对于全面而批判性地理解当下情形中的交流，即全球化之

---

① 有关二者用法的讨论，参见 Deely 2001：629。

② 参见 Perron，Sbrocchi，Colilli，Danesi eds. 2000；Rossi-Landi 1968，1972，1992。

③ 参见 Caputo，Petrilli and Ponzio 2006；Deely 2005。

中的交流、全球性的交流所具有的重要性。符号伦理学汲取了西比奥克对人类中心和语言中心符号理论及实践的批判，明确了“符号学”（semiology）中把注意力限制在“社会生活中的符号”（*signes au sein de la vie sociale*）（Saussure 1916：26），特别是其中的意图性符号这一重要缺陷。此外，“符号学”（semiology）以语词模式作为基础，并因“以部分代整体”（*pars pro toto*）这种错误而缺乏效力——也就是说，它弄混了部分（人类符号，尤其是语词符号）和整体（所有可能的符号，人类的和非人类的）。[①] 针对“以部分代整体”这种谬误的批判以及诉诸所谓去整体性方法，被证明对于符号伦理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参 Petrill 1992；Petrilli and Ponzio 2001b）。

一般符号学不能被局限于仅仅研究文化中的交流，声称秉持如此观念的“符号学”（semiology）就是一般符号学，不过是一种迷思罢了。一般符号学为自己选择“符号学”（semiotics）这个名称之时，就同“符号学”（semiology）及其错误拉开了距离。[②] 西比奥克把“符号学”（semiology）传统称为“小传统”（minor tradition），并且针对于此，提出了他所谓的“大传统”（major tradition），后者的代表性人物有约翰·普安索（1589—1644）、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C. S. 皮尔斯（1839—1914），以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约 460—377）和盖伦（Galenus，129—约 199）有关符号与病征那些非常早期的著述。就其所代表的东西而言，整个世界进入了西比奥克所谓的“总体符号学”，这正是他 2001 年去世之前最后出版的那部著作的名称。[③]“总体符号学”这个表达标明了符号学中的一种新潮流，它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一直在发展变化，它超越了作为“符号学”（semiology）而被实践的符号学边界，构想了一种可以打破任何边界束缚的更为综合、强调符号研究的拓展和全面可拓展性的方法。有生命的人类是符号所构成的世界之中的一个符号。据此它得出结论，生物符号视角对于充分理解交流行为是十分必要的。在西比奥克之后，符号学的历史以及我们对于符号领域

① 参 Sebeok 1979，1985，1986；Deely 1986，1995；Deely，Williams and Kruse 1986。

② 在 2003 年“金莫顿奖”（Mouton d’ Or Award）获奖论文中，以及 2005 年基于此论文的著作《为什么是符号学?》（*Why Semiotics*?）中，迪利探索了有关于此的术语历史和发展。另可参看迪利 2006 年的文章：《论“符号学”作为符号学科的命名》（On “Semiotics” as Naming the Doctrine of Signs）。[“金莫顿奖”是以语言类著作出版为特色的莫顿出版公司（Mouton De Gruyter）所设立的年度最佳论文奖；国际符号学会会刊 *Semiotica* 就由该公司出版——译者注]

③ 值得注意的是，西比奥克的著作初版于 1979 年，这次是增加了新材料的修订再版，而迪利为初版所写前言标题就是“总体性事业”（A Global Enterprise），回顾起来，这个标题要早于西比奥克为其最后著作给出的标题“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

的认识都发生了极大改变。实际上，尤其是因为有了他，符号学在新千年的开始就已经拓宽了自己的疆界，远远超出了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所设想的符号研究视野。①

在被理解为与生命合一的总体交流语境中——在此之中，“存在”，在考布里（Cobley）2004年给出的简易等式中，就意味着“交流”，而如上所论及的对话，并不仅仅是彼此说着话的两个人一应一答，而是标明身体间性关涉的不变状况，以及身体和贯穿整个符号世界的符号之间的交互性蕴含。生物符号活动对话思想的核心条件，正是出现在人类符号活动界的更为专门的对话的必要条件。譬如，巴赫金（1963）对“形式性对话”与“实质性对话”做出了区分。从生物符号活动角度看，模塑、交流、对话是彼此作为前提的，它们共同形成了生命，包括人类，在整个地球上多样而特别的成长的基础和条件。在这样一种总体框架之中，交流不能简单地用从发出者到接受者这种信息传递来理解，即便这是其众多可能的展现之一。更为普遍的，交流与符号活动是合一的，因此是与生命及其之上的东西合一的，从而预设了这一前提：对话性的关联关系是一个处处皆如是的状况，构成地球上庞大的生命符号活动网络的符号之间是相互依赖的。

用对话思想对“解释项符号”和“被解释符号”之间的关系（包括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加以理论化（参见 Petrilli 1998：第一章），积极参与和回应积极的他性是符号伦理学中的核心课题。符号解释层与话语的意识形态层之间的关系，是符号伦理学中另外一个关注焦点，它强调了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那种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关于符号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研究，诸如费卢齐奥·罗西-兰迪（Ferrucio Rossi-Landi，1921—1985）和亚当·沙夫（Adam Schaff，1913—2006）等所做的工作，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这种关系是与符号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的——包括语言方面、经济方面、伦理方面和审美方面的价值。此外，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确立的“经验”和“能力”之间那种对话关系不同，符号伦理学——同时也远不同于康德之后的现代观念——是以一种一般符号学研究方法为前提的，它把经验描述成包括（皮尔斯的）试推法的推导操作在内的一系列解释行为。通过解释行为，主体使信息得以完成、组织和关联，否则它们就是破碎而不完整的。如此

① 参见 Anderson et al. 1984；Bernard，Deely，Voigt，and WIthalm，eds. 1993；Bouissac，Herzfeld，and Posner，eds. 1998；Brier ed. 2003；Deely 1978，1989c，2000；Deely，Williams，and Kruse，eds. 1986；Petrilli and Ponzio 2001b，2002a，b，2003a；Rey 1984；Tarasti，Littlefield，Inkinen，and Rossi，eds. 2000；Tasca，ed. 1995；Williams 1985.

一来，相比起初的输入，经验就是革命性的、品质上更为优越的。符号伦理学把它对经验和能力的看法，植根于一种符号、解释和推论所构成的对话理论。[1]

要充分理解今天的社会—经济世界，即“总体交流”的世界，需要既研究符号生命，也研究总体性的生命符号的一种理论方法，与“符号伦理学”相互关联的“总体符号学”所能够提供的方法。今天世界的特点是一场新型的计算机驱动的工业革命，全球性的自由市场，贯穿整个生产循环（生产、交换、消费）的无所不在的交流。交流为了资本利润而受到剥削。但是，在全球化阶段中赋予我们今日世界特色的，是其可能发生整个星球层面上的毁灭。整个地球上的生命遭受毁灭的这种危险，随着21世纪的到来而增大了。如果符号活动以及由此而来的生命要继续下去，就必须明辨危险，必须相互沟通，之后采取行动来降低或者根除危险。总体性责任的感觉在今天是必要的——正如使得我们身陷其中的社会体系是总体性的。而且，正如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或者“生命符号学”所教导我们的，总体性责任意味着需要理解交流与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星球视角为一种研究当代性的方法奠定了基础，它能够超越当代性本身的限制，使我们能够凝望未来，重释过去，从伦理符号学的观点看，这意味着无需任何借口地拥抱责任。

在一个由生产和市场交换逻辑主宰的世界中，每件东西都可能商品化，人性面临着对符号的非功能性和模棱两可的去感觉化：从构成身体的符号到看似无用的同他人之间的交际性交流符号。全球化阶段的资本主义正在强迫推行使自我和身体、自我和环境之间的交流变得愈发艰难和扭曲的一种生态状况（参Ponzio and Petrilli 2000；Sebeok，Petrilli，Ponzio 2001）。如果我们要提高生命质量，就必须恢复这些符号及其对于生命的意义。作为该项工程的一个部分，符号伦理学的一项任务，从叙事性角度看，就是重新联系起理性的世界观和神话、传说、语言以及其他致力于人类与其周遭世界关系的通俗传统。生命符号学的主要功能，伦理方面（符号伦理方面），对于人类行为具有丰富的启迪：我们尚不能阅读、未曾想要阅读、不再知道如何阅读的生命符号，必须恢复它们对于以一切形式展现出的人性和生命的健康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关联性。从总体符号视角看，人类符号活动只是符号活动的一个特殊界域，却与构成庞大符号网络的所有其他符号活动界域都息息相关。

生物符号学领域中的研究证明，符号网络如何同整个星球上茁壮成长的多

---

[1] 参 Ponzio 2006，2007b。

姿多彩的生命两相合一。符号研究必须说明所有地球生物系统，从较低层次的分子机制界域到较高的被取名“盖亚”的这个假设性实体（盖亚，Gaia，希腊语中意为“大地之母”——这个术语在20世纪70年代被科学家引入，表示包括地球上多种生命形式相互作用在内的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如西比奥克所说，以《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中的幻想世界为喻，从分子基因和病毒构成的小人国，到与格列佛身材相仿的人间世，再到大人国，即盖亚这个巨型的生物—基因—化学生态系统，符号活动无处不在。远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社会到来之前——即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全球市场所支撑的人工智能技术方面进步而带来的交流网络全球覆盖之前，全球性交流就已经——通过符号活动——成为一个生命事实。

从生物符号活动角度看，全球性交流在生命演化之初就给其打下了烙印，并且是如果我们作为人类动物要继续在全球生长就不能忽视的一种生命事实。全球性被嵌入了符号活动本质之中。人类交流是总体生物符号活动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所有生命形式都直接地与其他所有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即便所采取的形式是不直接的。符号活动，或者更确切地说，生物符号活动，这一视角证实了整个星球上生命所有方面都相互关涉和彼此关联这种状况。全球理论或者全球化，在符号学意义上，强调了身体与符号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关联、彼此相关这种状况，如此一来，对于他者的漠然，甚至压迫他者这种意志，只会让有这种态度者自取其辱。相比之下，按照社会—经济方式理解的全球化对于部门性的和自我的利益作用显著，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狭隘和短视的观察角度，显得似是而非。在这一语境下，全球性交流，即按照今天投入到再生产所有阶段之中——生产、流通、消费——这样一种全球性社会—经济体系所理解的交流，换言之，作为公司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来理解的全球性交流，既不是无可避免，又不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事实上，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正如它通过对整个星球所施加的往往具有毁灭性的影响所宣示的那样，它甚至威胁到要彻底摧毁生命。全球化的毁灭性特点，是和当下发展阶段中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体系相联系的，这一点如今变得愈加明显了。毁灭的最突出表现之一是战争，然而今天也表现在全球性环境污染、全球性制造让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难以为继的种种状况中。相反，符号学观点则证实，需要把人类担负责任的能力当作为了他者担负责任，而不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之中与身份自私利益相关的那种担负责任。

与毁灭生命和环境的方式不同，符号伦理学试图表明，为了一个基于按照异质性和对话思想——而非按照强词夺理和使一种差异凌驾于另外一种差

异——所理解的世界而努力是可能的。异质性逻辑涉及基于诸差异之间身体间性对话和共同参与的同舟共济能力，即便诸差异之间彼此有所冲突。今天更远胜从前，在这个全球交流生产的世界中，越来越明显，全球性责任不可能与同他者之间的全球性关涉关系分割开来，不可能同朝向他者的对话性回应关系分割开来。同时，根据这种逻辑，致力于人类的权利始终而且毫无保留地意味着致力于他者的权利。

“全球性交流—生产”这个表达，不仅仅指交流网络和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这个事实，而且指人类生命的所有方面都被融入到交流—生产体系之中。无论所指的是发展、福利和消费主义还是欠发达、贫穷和不具可持续性的生活条件，是健康还是疾病，是中规中矩还是离经叛道，是社会集约还是边缘化，是就业还是失业，是把人们转变成以外流为特征的劳动力还是要求大多数时候都不被给予的具有流动特征的接纳，或者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商品——毒品、人体器官、“非常规武器”——的买卖，都是真实的。融入也并非仅限于人类生活的交流—生产体系，而是与之相反，关系到整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它们在全球性交流—生产体系中的健康与否，现在正面临着危险。

从总体符号学和符号伦理学角度思考这些问题，必须注意到全球化所提供的语境。所以，我们的分析方法必定和产生出我们所分析的问题的语境一样，是全球性的。总体性方法不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定在交流—生产体系的局部，这是针对体系自身功能的内在角度所要求的。它也不应该把注意力限定在心理主体，即限定在被社会科学强行化约为模式的主体，按照统计数字来衡量的主体。全球性交流—生产要求一种方法论性质的、理论性质的视角，它同所观察的现象一样，是全球性的。全球性视角注重一种更好地理解交流—生产的全球性逻辑；因此，这样一种视角注重的是，一种有针对性地建构了它的社会生产体系的批判能力。

面向倾听、无条件地关怀他者、对话性的身体间性，对于总体符号学及其任务，对于理解整个符号活动的世界的能力，对于讨论不同形式的分离主义和以部分代整体的形形色色倾向——无论出于错误还是错误信念——所要求的能力，具有决定性意义。譬如，在社会和文化间的生活中坚持个体主义原则这种倾向，以及当下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的“过分专业化危机”现象，就属于这种情况。

符号学是和倾听他者的能力相关的，这也是恢复和重新建立它，如西比奥克所描述的，作为以疾病征兆为关注重点的医学“病征学”或“症状学”这一古老职业的前提。秉承、坚持并超越西比奥克，全球符号学的实用主义维度提

出了一种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它在实际的实践之中寻觅结果，对一种社会和环境嵌入的认识论、彼此关联特征、致力于伦理符号学倡导的方法以及恢复符号学作为“病征学”的先前职业，进行全面的理论梳理。

于是，如果从总体的和生物符号学的角度看，符号学关注的是他者，并且因此而关注整个星球上多姿多彩的生命，因为生命和符号彼此合一，同时，如果研究符号的动机最初是有生命之物的符号活动的健康、对生命的关怀，那么，全球化时代中的符号学一个无法等闲视之的任务，就是为全球性中的所有生命承担起责任来。

论交流　写给人文科学和人文主义[①]

一、预备概念：交流和存在

（一）交流的生物符号活动基础

有关交流的科学研究跨越种种极为不同的学科而发展。本文特别感兴趣的核心，是关注着从超级王国到微观有机体这个有机世界中的交流的那些探索，它们被总称为生物符号学研究。按照生物符号学的观点，生命与交流是相互意指的——或者，如保罗·科布里（Paul Cobley）所说（2004），"存在"即意味着"交流"。交流不仅被看作生命的条件，而且被看作辨识生命的标准之一：有生命的存在依赖交流而生长和繁衍（它作为一种交流的存在而继承基因符码，回应环境刺激，如此等等）。生命=符号活动，即符号在其中得以展现或可辨的过程；符号行为（无论是否符号活动）=生命（即使是符号活动生命）。根据这种方法，交流不是化约性地按照从一个有生命存在到另一个有生命存在

① 本文框架如下：
一、预备概念：交流和存在
（一）交流的生物符号活动基础
（二）交流
（三）什么是总体符号学？
（四）总体符号学与今天全球性交流的关系
（五）交流、语言、关系
（六）交流和人类的符号学或元符号活动能力
二、交流和责任
（一）"不同之在"和责任
（二）理性、同一性和现实性：对话理性批判
（三）他性人文主义与符号伦理学
（四）类别、个体和单一性
（五）从类别和个体到面对面关系（列维纳斯）
（六）人文主义、身体间性和类别抽象的去总体性
（七）差异的符号和符号的差异
（八）相对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符号逃离

的散发和外化来看待，无论这涉及细菌、原生物核、有细胞膜和细胞核的细胞，还是真核——从微观有机体到属于三大（或四大）超级王国的有机体。而是更激进的，交流就是有生命的存在本身，与之合一。在有机体世界之中，交流就是存在，存在就是交流。①

当有关交流和有生命的存在之间关系的讨论关乎人类，我们便超越生物符号活动或更狭隘的动物符号活动而进入到更为专门的人类符号活动领域，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所在。人类不只是有生命的存在，而且是历史—社会的存在（Petrilli 1998b；Petrilli ed. 2003a）。和人类符号活动一道，作为模塑手段的语言开始专门地发挥作用。话语或文字语言不过是被理解为模塑的语言的众多表现之一（参看 Sebeok 1991，1994，2001；Danesi and Sebeok 2001）。作为模塑的语言意味着人类不仅是与所有其他进行交流的有生命存在相似的符号活动的存在，而且是符号的存在，一种具有符号学，即元符号学这种能力的动物，该动物能够对符号和符号活动做出反思。所以，这一符号动物被赋予了意识，意识到自己能够创造、规划、担负责任和展开批判，能够发展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语言是人类所专有的特权，是其过去和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演化之所以可能的条件。相应的，符号动物的演变并不仅仅是生物方面的进化，而且是历史—社会方面的变化（Deely，Petrilli and Ponzio 2005）。

（二）交流

交流是一个过程、符号活动行为；符号行为对于生命具有结构性，因此在生命符号界中无处不在，当然，它也是人类生命全然有赖其上的一种现象。交流是从事以语言学、文学理论、神经机械学、心理分析、人类学、数学、天体物理学、生物医学、哲学、教育学、人工智能、机器人、语言哲学、符号学、生物符号学为代表的极为广阔学科和领域中的学者们一直以来的研究对象。所以，交流是众多不同科学——人类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客观事实科学——的研究对象，它们也按照不同理论角度对之做出了分析。我们借以表述我们对交流的研究的这一过程，以及直接的交流行为本身（研究对象和生命自身的展现），都是交流事实。不过，我们对于交流的理解却常常是不清楚也不全面的。

实际上，“交流”通常被理解为内在内容藉之得以外显、得以展示的一个

① 成百上千年的哲学，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标识存在与交流之间的转换，即使这个问题是在相当晚近时才成为焦点的。譬如，在约瑟夫·拉钦格（Joseph Ratzinger）的观察中（Ratzinger 1970：132），“从物质出发、万变不离其宗的思考已经结束了；关系被发现是一种同样有效的根本性现实模式”。在明确的符号学语境中的观点，尤其可参看 Sebeok 1991，2001；Danesi，Petrilli，Ponzio 2004；Petrilli and Ponzio 2007；Ponzio and Petrilli 2002。

过程。据此，交流被一个存在——发出者——发出，并在发出者，即“始端”（*a terminus a quo*）和另一个存在——接收者——“末端”（*a terminus ad quem*）之间发生。根据这种描述，交流可以化约性地被描述成一个作为发出者的存在和另外一个作为接收者的存在之间的过程。如此描述下，交流预设了进行交流活动的存在，换言之，此种存在首先是存在，其次要进行交流活动，此种存在一般被认定是其交流行为之前就有的而且是独立于其交流行为的。但是，这是对交流的一种狭义认识，尽管在日常看法层面上很普及；这种看法也是不同观点所共有的，而如果不是这一点上看法一致，这些观点之间的区别可谓不可以道里计（譬如，天性论和经验论，精神论和行为论）。

这种认识交流的方式和对存在、对本体论的特定认识有关。在这一框架中，正如总体性的交流被看作从作为发出者的存在出发的一个过程，总体的存在被想当然地看作交流的预设前提和基础。交流理论和本体论一般是紧密相连的：所有交流理论都有它们的本体论，无论明示与否；反过来，所有本体论都基于某种交流理论，即便这理论并没有清晰地表述出来。不论所持是什么交流理论、哲学和意识形态，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地是我们交流行为的组成部分，对于交流和存在之间关系的崭新认识在今天世界上都得到了充分展现。这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说法：“交流即存在。”这一断言可以被反过来：“存在即交流。”不过，“交流即存在”这一说法涉及了交流理论，而“存在即交流”则和一般的本体论有关。尽管这一说法不是本文的核心，我们还是表示，本体论和交流理论之间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①

我们可以把交流作为外化来分析，而无须去问它涉及的是过程还是存在：或者，我们可以对这些存在中无论哪个做出质询，一方面，去分析交流中被外化的内部存在；另一方面，去分析接收者的存在。换言之，两种存在都进入到了交流中，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把分析限定在它们交流中的行为上，或者可以为了理解它们的构成、它们得以存在的原因、它们的意义而对它们的存在进行考察。这就是奥古斯都·庞齐奥（Augustos Ponzio）和笔者②用“符号伦理学”（semioethics）这个新术语所表示的发展方向。

（三）什么是总体符号学？

“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或者“生命符号学”（semiotics of life）

---

① 有关上述各方面，参看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11.4，10.1；Petrilli 1999；Ratzinger 1970。同时，声明约翰·普安索（John Poinsot）对这种“不可避免的联系”在其 1632 年的著作《论符号》（*Tractatus*）的导言 2、问题 1 中就有明白表示，也并非多余之言。

② 参 Ponzio and Petrilli 2003。

是北美符号学家托马斯·A.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1920—2001）所提出的说法（Sebeok 1986，1991，2001）。总体符号学聚焦于“符号界”（semiosphere）。“符号界”这个术语来自俄国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Jurij Lotman，1922—1993）（Lotman 1975），不过，如霍夫梅尔（Hoffmeyer）在西比奥克思路的引领之下所指出的那样，这里对此的理解比他的更为广阔。[①] 洛特曼把“符号界”这个术语所指对象限定在人类文化上。相比之下，总体符号学，在符号活动与生命合一（导致“生命符号学”产生）这一定位中，把符号界等同于“生物界”（biosphere），以至于所指内容更宽泛地成了“符号生物界”（semiobiosphere）。总体符号学（西比奥克的观点）处在证实符号网络的拓展性和一致性的这一位置上，而符号网络包括了人类所建构的文化符号界（洛特曼的观点）——人类符号、象征和作品，等等。所以，总体符号学强调了符号界要远比洛特曼所认为的更为宽广这一事实，并且，它事实上，至少是与符号生物界合一的，而符号生物界是人类作为有生命的存在从来就没有离开、将来也绝对不会离开的符号网络。

此外，符号活动是在生命之后继续（西比奥克的观点），还是在生命之前并与生命一道进行（迪利的观点），都是很有竞争力的假设，它们所具有的相对优点还有待探索。这样两种有竞争力的观点是几乎同时但又独立地发展起来的，这从阅读西比奥克与迪利两人同时问世于1989年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两人的拥戴者于1990年9月纪念西比奥克65岁诞辰的布达佩斯会议上见面，使得两种观点得以交会。会议上，西比奥克全文宣读了他的《符号科学与生命科学》（The Sign Science and the Life Science），正式提出两者的共在，而迪利就是听众之一。之后不久，应西比奥克的邀请[②]，迪利为反对这种等同观而做出了书面的正式答复（Deely 1991）；但这场学术冲突的种子，回顾起来，在1989年就已经埋下了——当时，迪利在巴西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生理符号活动观点，并且对除开生命、生命之前和之外的符号活动行为的可能性展开探索[③]，而与此同时，西比奥克提出自己的符号活动与生命共在观——两者如此同步让人惊奇！2000年，温弗里德·诺斯（Winfried Nöth）在德国卡塞尔组织了一次大会，用意就在于讨论“符号前沿和核心”（the semiotic threshold front and center）问题（参看 Nöth and Kull Eds. 2001）。人们都知道，西比

① Hoffmeyer 1996：vii，对这个问题有明确讨论，在 Deely 2001：629，对此有总结性综述。可进一步参看 Hoffmeyer 2000，2008。

② 参见 Sebeok and Umiker-Sebeok 1992。

③ 据 Deely 1990：第六章。又参，更晚一些的，Deely 2008。

奥克和迪利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就我所知[①]，两人之间经常就此进行探讨，不幸的是，这场探讨因西比奥克的匆匆离世中断了。

然而，这场讨论随时间流逝，终会在符号学探索者圈子中水落石出。符号活动与生命合一，二者不可分割地和生命之物绑在了一起，任何情况下都会作为一条公理［克拉蓬（Krampen）］确立植物符号活动[②]，为西比奥克的动物符号活动和人类符号活动增加了植物世界，从而覆盖了整个地球生命王国，在此之后，我们可以称之为"生物符号学公理"（biosemiotic axiom）。从这一公理出发，总体符号学继续分析符号之间的相互联系。它的视线所及，从元初符号活动的能量信息过程一直到更为复杂的地球上生命演化中的符号活动过程：即从原生物核到真核群和构成超级王国的多细胞有机体。所有这些交互行为，一道形成庞大的生物界，创造出符号网络中不可避免的相互关联态势。这一符号网络，按照西比奥克的说法，从分子基因学和病毒学小人国世界，到人尺寸的格列佛世界，最终一直到大人国世界——被称为"盖亚"（Gaia）的庞大生物基因化学生态系统。[③] 初瞥之下，这个生态系统似乎包括无数单个的生命物种。但细看之下，情况立刻分明了：每个部分，包括作为人类的我们自身，都与所有其他部分是相互依存地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而言，盖亚是能够真正被看作总体系统的唯一生态系统（即便它也只能是相对总体的）。[④]

（四）总体符号学与今天全球性交流的关系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今天所实践的符号学就处在能够充分地对全球性交流做出分析这一位置上。说起来，事实恰恰相反。关键在于，如果在交流科学或理论旗帜下被用于符号分析的交流模式（无论它是什么样子）要有助于我们对存在者的理解，今天交流的全球性就必须被考虑在内。就社会—经济和文化史发展中的这一新阶段而言，任何考虑不充分的东西都会被证明无法满足目的、短视和违背时代特征。[⑤]

作为总体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必须实施一种"去总体化功能"（detotalizing function）[⑥] ——换言之，它必须对一切（被宣称为）总体性的东

---

① 参见 Deely 2003，载 Brier Ed. 2003。

② Krampen 1981；可进一步参看 Deely，Williams，and Kruse eds. 1986。

③ 在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 1726 年出版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中，虚构了主人公英国人格列佛在小人国、大人国等地的冒险游历；在希腊神话中，"盖亚"是大地之母。——译者注

④ 参见 Sebeok 1979，1986；Petrilli and Ponzio 2001；Posner et al. 1997-2004。

⑤ 参见 Petrilli 2003；Ponzio 1995c，1999。

⑥ 关于去总体化这个概念，参看 Petrilli 1990b。

西展开批判——而起点就是总体性的“总体符号学”。如果一般符号学不能发展出一种总体性的符号观，来实施这种去总体性的功能，它就只会是另外一种特别的符号学而已，不同的特别符号学的综合结果而已，各种统一化科学大杂烩的一种断面式语言而已，或者相对专门学科和知识领域的一种无所不知的哲学方面的搪塞而已。[①]

由于总体符号学断言符号活动与生命合一，这种研究符号活动的总体方法所提供的语境就远比斐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按照“符号学”（semiology）这一理念所认定的东西要来得广阔。实际上，后者被理解为研究社会生活界中符号生活的科学（Saussure 1916）。与之相反，西比奥克把人类符号学密切地和动物符号学与内部符号学联系在一起，他坚持认为，对人类动物中的交流和意指操作展开的研究，要称得上充分，就必须把生物方面考虑在内，这包括了这些操作的生物符号学基础。按照西比奥克的方法，符号学整合了一般处于分散状态的其他知识和实践领域，它们都致力于满足专门的需要，有时导致毫无用处的或者甚至是有害的狭隘化。这种倾向和意识形态意味不无关系，常常蹩脚地以为了科学这种名义来掩饰。[②]

交流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是一种表面现象。和面对所有表面现象一样，[③]如果我们想要充分理解这一现象，就有必要对其基础进行研究。这项任务要求建立一种交流模式，它并不像所谓“邮包模式”（postal package model）描述的那样[④]，以一种简化方式，在符码基础上按照从发出者到接收者这种表层传递来分析交流过程。要根据放大的信息或消息传输来解释人类交流活动，就要预先设定存在发出者和接收者、符码、信息和语境，存在有待交流的“东西”，以及被认为在交流过程本身之外已经先行建构并且可以分辨的“交流需要”。这一模式没有看到交流现象的真正复杂性，交流现象远不止是不同而独立的个体之间基于规约所保证的共同符码所进行的有意图的信息交换（Calabrese，Petrilli，Ponzio 1993；Petrilli and Ponzio 1998；Petrilli 1998，991，1995，1996）。

---

① 参见 Ponzio 2003。

② 参见 Petrilli 1998b，2005a。

③ 参见 Ponzio and Petrilli 2000。

④ 早在 1961 年，意大利符号学家费卢奇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1921—1985）就在其专著《意指、交流和公共话语》（*Significato，communicazaione e parlare comune*）中对这种模式进行了批判。此书撰写之时，交流尚未像今天这样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 20 世纪 50 年代，意大利还没有经历主导着今天生产体系的社会变革。

相反，从科学探索角度看，更具揭示力量的是那些总体地处理交流的学科和方法，因此它们能够重点关注交流及面相繁复的有机世界——从超级王国到微观有机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学科可以（而且已经）汇聚在“生物符号学”的名义之下。[①]

（五）交流、语言、关系

除了更为人们所熟悉的用法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语言”（language）——至少是在符号学中，在西比奥克之后——被用来表示人类物种专有的模塑手段。被理解为模塑手段的语言，切勿与作为语言交流的话语混淆。[②] 这种混淆一般可以称之为“语言谬误”（linguistic fallacy），或者更确切地，是指那些说“语言”却意指“文字语言”（或者口头或者书面的“言谈”）的“语言学家的谬误”（fallacy of the linguist）。同时，他们用“一般语言学”（general linguistics）来指研究表现相对各异的文字语言，历史—自然的以及狭义的或专门的语言。[③]

事实上，“语言”这一术语常常用于那些非文字性的语言（譬如“肢体语言”“聋哑人的符号语言”“图像语言”“绘画语言”“时装语言”和“商品语言”）。这一情形中，日常语言告诉我们，事物比专业语言学家来得可靠。[④]

所有专属人类符号行为的，都与被理解为模塑手段的语言有关，后者，就人类而言，的确涉及生物学上尚无定论的构成要素，但是也可谓是生物学上有定论的构成要素——分类上说，每种动物都如此［每种动物，包括人类动物在内，都依赖于“内部世界”(*Innenwelt*)］。因此，专属人类的符号活动，在动物内部环境这个根基意义上说，没有语言就不存在；动物内部环境特别地拥有一种生物学上尚无定论的构成要素。“专属人类”（properly human）指人类在其作为历史—社会存在的特殊性，之所以特殊，在于我们在生物学上被赋予了

① 参见 Sebeok and Umiker-Sebeok 1992；Hoffmeyer 1996；Hoffmeyer and Emmeche 1999；Kull Ed. 2001 以及 Kull 2003。

② 参见 Sebeok 1986，1991a，b。

③ 参见 Morris 1938，1946；Ponzio 2004，2007b。

④ 参见 Petrilli 1998，Petrilli ed. 2003b。但是，这种通行用法常常会导致另外一种混淆，另外一种“语言谬误”，如迪利（Deely 2001：5）所说：“对语言和交流做出清晰界分尤为重要；前者是物种专有的人类活动，后者是所有个体之中——有生命的和没有生命的、植物和动物、人类和非人类——一种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的确，一般情况下，语言和交流常常被弄混。但是二者大相径庭。90%的生物物种都没有听觉。譬如，蟋蟀有触觉，却对我们对之所称的‘鸣唱’毫无听觉意识。不过，因为我们和其他引起我们注意的动物使用声音来交流，我们就容易以为声音交流就一定是‘语言’，把诸如鸟的歌唱、狗的叫声当作某种语言。然而，交流（除非是在比喻意义上）不是语言，尽管语言能够用于交流。”

一种物种专属的模塑手段，根据西比奥克的说法，这种模塑手段不同于话语，正如“适应”（adaptation）不同于“联适应”（exaptation）。[①] 作为生物有机体，人类和其他有机体共同享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语言”的交流过程［尽管这类交流可能而且也许真的——因为比喻——不可避免地被称为“宏观有机体的交流性交换”（macro-organismic communicative exchange）中的语言］。[②] 但是这种交流性的交换包括了宏观有机体在内，人类就是宏观有机体构成的，或者人类就运载着宏观有机体。

人类符号活动，不论以哪种方式，的确全然由语言使用所构成，正如人类的符号活动从元符号活动运用这个角度来讲全然是符号学意义上的。语言范围，以及在它之中作为元符号活动的符号学范围，共同占据着总体的人类符号活动中相当小的一块地方。人类符号活动还包括种种内部符号活动操作（发生在人类有机体内部，使之发展和繁衍的操作），这属于动物符号活动或元初符号活动，或者，更广义的，属于生物符号活动。人类符号活动涉及贯穿整个符号生物界的交流活动。

所有动物都被赋予了一种物种特有的模塑手段。一级系统是在所有的有生命物种那里都存在的内部模塑手段。在这一内在的拟态性模塑能力基础之上，所有物种都以自身的特有方式塑造自身的客观世界。不过，与其他生命形式的一级模塑手段不同，动物模塑手段中专属人类的那种构成要素[③]被赋予了能够产生出无限多个世界的关系这种能力。这就对人类批判、创造和重塑的能力做出了解释。一定数量的元素被重新使用，形成新的结构，通过连续不断的解构和重建形成无限多个世界。语言作为一级模塑手段——确切地说，作为让人类动物与众不同的一级模塑手段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因此是有别于话语而且先于话语的，同时，它嵌刻在所有动物生命在类属方面的共有特征之中，“环境界”（*Umwelt*）借此内部世界而得以区别于单纯物理环境。相应的，这个一级模塑系统在类属方面存在于“不会说话的原人”（the mute hominid）身上，而且充当着进化中特定新阶段的起点，导致了在其现今发展阶段中的“智人”（homo sapiens）的出现。实际上，从进化的观点看，原人在向智人的发展中，

---

① 鉴于对这种模塑手段关系方面的考虑，奥古斯都·庞齐奥说，我们使用“书写”（writing）来表示如此理解下的语言：参看 Ponzio, Calefato, and Petrilli 1994; Ponzio and Petrilli 2008。迪利（Deely 2001：11）则强调，就适应要素而言，结果的联适应与姿体、发声或书写之间的区别无关。参看他对此问题所做的评述（Deely 2001：5-12）。

② 参见本书 72 页脚注④所讨论的“语言谬误”。

③ 西比奥克称之为“语言”，庞齐奥称之为“书写”，参看本页脚注①。

先于话语或文字符号之前被赋予语言，而且语言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他交流形式。[①] 文字语言作为一种交流方式登上舞台，其基础是语言一级模塑，以及关系性质的操作，后者作为适应，是它通过进一步的联适应的操作而得来的。[②] 因此，在人类进化史上，文字语言经历了它自身的内在化过程，经历了一种反向的联适应。结果，话语，作为思想材料，起到了强化一级模塑操作的作用，并且作为“二级模塑”手段，和后者一道协同发挥作用。二级模塑系统允许有各种标指类和延展类的模塑手段。“标指类模塑”（indicational modeling）可以在不同物种中见到，而“延展类模塑”（extensional modeling）则是人类独有的能力。它以被理解为嵌入人类物种一级模塑系统之内的语言为前提。二级模塑和特定语言有关，和话语秩序有关，话语秩序则渐次地又和特定社会关系系统有关。三级模塑以二级模塑为前提，处在文化中象征性结构和高度抽象的模塑操作的基础位置。因此，三级模塑系统（文化世界）是人类物种所特有的。[③]

（六）交流和人类的符号学或元符号活动能力

与其他动物类似，人类的存在—交流以物种专有的模塑手段基础上的世界观建构作为前提。不过，尽管在非人类动物那里，只要物种保持不变，除非其下属物种由于联适应而发生变异和演化，相互之间的对应性和同一性关系始终是建立在模塑和存在—交流之间的，而在人类的存在—交流中，专有的模塑手段，或语言，并不等同于存在—交流：语言相对交流存在而允许有解释、评价和回应。其他动物的模塑化约为能够直接对感官阐明的东西；人类动物的模塑包括这在内，但并不止步于不允许直接的感官阐明那些客观性方面（譬如如此这般的总统的存在，如此这般的法官的存在，等等）。[④]

因此，人类被赋予一种元符号活动或“符号学”的特别的能力。我们现在可以补充说，如此理解的元符号活动或符号学，以语言——一级模塑中我们人类物种专有的要素——作为前提。关系、解构和重塑，无数可能世界的产生，符号学的能力，由此而来的评价的能力，责任的担当，创新、创造和计划，这一切都是语言的特性。

---

① 迪利在 1966 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一核心要点。

② 参见 Deely 1980。

③ 参见 Deely 1982：第二部分，尤其是第 119 页上的图表 3；Sebeok and Danesi 2000；Petrilli 2005；Posner et al. 1997－2004：第 18 篇文章的第 5～6 节。

④ 参见普安索（Poinsot）1632 年的著作《符号论》（*Tractatus*）：绪论一，第二篇，尤其是 60/25～44 页；以及第三篇，尤其是 67/1～68/35 页。又参 Deely 2002。

由于被理解为模塑的语言，社会交流的存在，用法国哲学家埃曼纽埃尔·列维纳斯（Emmnanuel Levinas，1906—1995）的话说，有了一种"不同之在"(an otherwise than being)。[①] 就人类被赋予语言并且身为符号学的动物而言，人类行为不能局限于交流、存在、本体论。[②] 人类被赋予了一种他性的能力，可以把自己呈现为他者，并且提出种种可能性，这些是超出观念交流世界中的存在所预见的其他选择之外的别样东西。我们这里所指的，不是"不同于在"(being otherwise with respect to being)，而是"不同之在"（otherwise than being）这种状况，即"不同于存在—交流的在"（otherwise than being－communication)。实际上，成为"不同之在"这种能力对应着成为不同的所有可能，并且预设了朝向他性的这种能力。[③]

二、交流和责任

(一)"不同之在"和责任

只有他性符号中无功利的行为才可能逃出那种交流的存在。与之相反，同一性逻辑是与交流相关的，是可能可以更好地被描述成交流—生产的那种东西，对此我们下边将会论及。同一性是朝向特别功利的，特点是倾向于承担有限的责任。相反，他性逻辑取缔了有限责任（对同一性及其各种角色具有功能性的不在场所保障的那种责任)，取而代之的是角色之外、不同于角色的责任，没有逃避可能的责任，不可被代表的责任，即绝对的责任，特点是倾向于与他者完全地相互关涉，向着他者敞开。[④]

被理解为交流—生产的交流是一种内在化运动[⑤]，意味着回归和自我肯定。交流—生产涉及一种向内而不是向外的运动。他性是交流的外面、存在的不同。朝着他性方向的运动没有回头，也没有所得，作为一种符号运动，它是元符号活动性质的，并因此是专属于人的。由于被理解为一级模塑的语言，人

① 除了 Cobley 2004 之外，约翰·迪利也喜欢引用雅克·马里坦（Jaques Maritain）（1966：32）有关客观世界不可化约为物理环境这一说法："'非存在'（non－being）的道路，一旦某人，通过一种被颠倒的直觉，意识到它，意识到它在现实中的惊人作用，会与存在的道路一样艰难。"但这需要某种解释，就像普安索在《符号论》的第二版前言中所做的那样。

② 参见"现实主义与认识论"（Realism and Epistemology）词条，载 Cobley Ed. 2009。

③ 参见 Levinas 1974。Deely 2004 谈到过这一点，他说，"主体间性"，即属于"真实之在"（*ens reale*）一类的关系——对于理解符号活动的独特性"是不够的"，更不必说要理解由元符号活动而来的物种特有的责任性了。

④ 参见 Ponzio 1996，2007a。

⑤ 参见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114。

类行为不能局限于交流、存在和本体论。因为人类被单独赋予了（即物种专属的）语言和元符号活动或者符号学能力，人类行为不限于如同“真实之在”中交流世界的存在所预见到的其他替换方式、部分性责任。相反，人类行为被赋予了被理解为回应他者、对他者负责这一“不可撤销的义务”（irrevocable obligation）的责任能力，不仅要对作为我的自身做出回应和承担责任，而且要对作为他者的自我做出回应和承担责任，要对作为他者的他者——“绝对他者”（*altrui*）——做出回应和承担责任，这是列维纳斯的看法，也是俄国哲学家和符号学家米哈伊·M. 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1895—1975）的看法。[①] 交流的存在于语言之中找到了自身的不同这一事实，意味着语言是为他者的，是为他性的。所以，力求避免在交流中失去自身的存在这种状况[②]，有可能被力求避免在交流中失去不同之在、避免失去他者——自我的他者和不同于自我的他者——所取代。

对不同之在的能力是人类这种动物、独一无二的符号的动物的特点，是超越存在和交流或者交流—生产世界的能力。这种超越能力使得人类这种符号的动物能够不仅为社会再生产承担责任，而且为整个星球上的生命承担责任，而社会再生产与整个星球上的生命是不可分割的。[③] 对“不同之在”的能力意味着这种符号的动物不能诉诸任何托辞，不能接受用于捍卫有限责任的托辞。有限责任的托辞，只有在人类的解释、回应和行动限于交流世界中的存在时，只有在人类的选择能力被简约到世界上的其他替代方式时，方才可行；换言之，除非人类否认他们对他性的能力，认为被模塑的客观世界（环境界）与作为前提的物理环境没有区别，对所有来说都“共通”或“一样”。

（二）理性、同一性和现实性：对话理性批判

在论证推理（argumentative reasoning）中，即并未僵化成对同一性的捍卫和再生产，而是相反地向着他性敞开的这种推理中，这种观点导向对话中心性问题（以及生物符号活动世界中的对话思想问题，不过，后一方面不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巴赫金（1970—1971）证实了单边性、思想僵化、直线思维和单边的思路如何源起于刻板的对话。独语的、单线的、整体的思路，必然导向一种综合和

① 参见 Bakhtin 1990；Levinas 1972，1987a，1991；Ponzio 1995b，1998。

② 忠实于交流，就是对于他者的本质性的不忠实。

③ 参 Deely 2005，《符号活动中的责任是如何出现的?》（How does responsibility arise in semiosis?）。

一个结论，由此需要有“对话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ogic Reason）。[①] 从这一观点看，巴赫金成了参照重点，因为他的整个研究，包括他关于人类科学方法论的最新论文[②]，重心都放在了萨特（Satre）在1960年的著作《对话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中所面临的同一个问题上，即人类所达成的人类中的知识和理解是否不仅意味着专门的方法，而且意味着一种“新理性”（New Reason）。不过，按照萨特所相信的思想和对象之间的新型关系，这个问题是不可能得到充分理解的。实际上，萨特的辩证法始终是在单一逻辑辩证法限制之内的，因为他把他性关系化约成了一种同一性关系、一种相互客体化的关系：为自我与为他者之间的辩证法是总体化意识中的辩证法，其中，想要做的是对某人自己的客观化观点做出肯定。

对话理性批判是对于今天主导西方思想和实践的同一性逻辑的批判。按照同一性的观点，意义与部分的和有限的功利合一并产生出神秘化，无论这指的是个体、群体、民族、语言、文化系统的同一性，还是诸如欧盟、西方世界、美国、阿盟、非盟等宏观国际社会。

由于同建构在其上并形成如我们所体验的“现实”（reality）的种种“具体的抽象”（concrete abstractions），今天的世界是由同一性范畴主导着的。这些具体的抽象对于今天整个的社会再生产体制来说是“内在的”，而且，个体、社会、国家、民族、真相、知识、公平、正义、自由、有限责任、需要、平等交换等等，无不包括其中。然而，这不仅是一个体制所产生出的具体的抽象的问题。进一步讲，这个体制本身是根植于同一性范畴之中的，就结构和构成而言，同一性被认定在生产、市场交换和消费全球性过程中是普遍皆准的。这种构成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指向具体的抽象的逻辑，就是同一性逻辑。同时，具有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个体，具有自身功利的社会，忠实于现实的国家及其政治，诸如此类的范畴——所有这些范畴服从的，都是同一性逻辑。

话语秩序内在的论证所处位置是同一性逻辑的位置。理性包括战争理性，即便是按照极端理性这种形式，它也使得战争表现为合理、合适和合法。理性包括根除他者这种理性——从边缘化到隔离再到灭绝。理性是同一性的理性。它的逻辑是通过隔离、隔绝、排斥和根除他者，通过牺牲作为建设构成现实的具体的抽象、建设“如其所是”的世界的必要条件中的一部分的他者来得到肯定的。这些具体的抽象包括个体范畴，个体必须首先为了自己而牺牲自身的他

---

① Ponzio 1994，1998，2006a；又参见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第一部分，第三章，第1.6节。

② Bakhtin 1974，载 Emerson and Holquist Eds. 1986。

性，才能肯定自身的同一性。[①]

如此理解的理性和论证批判需要一种他者的视角。这一方法要求对他者的先行承认，或者更明确地说，需要承认这一事实：他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担当”[②]（an inevitable imposition）——这不是一种让步（个体、主体、同一所做出的自由选择），而是由异化、意义丧失，由“人与人之间如狼”（*homo homini lupus*）这种情况所强加的一种必需。“人与人之间如狼”的状况，事实上，正是诸如国家、政治、法律之类具体的抽象的结果，只有在人们的想象中才是先于它们的。[③]

（三）他性人文主义与符号伦理学

随列维纳斯一道，作为其所有著述所得出的结论[④]，以及巴赫金和维多利亚·维尔比（Victoria Welby，1837—1912）、查尔斯·S. 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1839—1914）、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1901—1975）等人所做出的贡献，一种新形式的人文主义得以稳步出现，我们可以称其为“他性人文主义”（humanism of otherness），与之相对的则是“同一性人文主义”（humanism of identity）。

基于同一性逻辑的人权主张——迄今为止占主导地位的主张形式——常常忘记了他者的权利。这一倾向需要通过异质性人文主义来迅速扭转，而这之中，他者的权利正是首先要得到承认的东西。我们这里指的，不仅是自我之外的他者，而且是自我自身的他者，自我的他者。的确，自我常常移除、遏制和隔绝自身的他性，使它成为同一性的牺牲品，然而，无论如何，（如此取得的）同一性是虚伪的同一性，注定会在某一点上分崩离析。

通过证实使得人类和每一他者都相互关联的符号网络[⑤]——用西比奥克的话说，“符号之网”（semiotic web）[⑥]——所具有的拓展性和一致性，符号学为他性人文主义带来启迪。从共时性观点看，这是正确的（的确，我们现在知道交流是世界性的，相互关联是全球性的）；从历时性观点看，这也是正确的。由此，人类物种的整个命运——从其最古远到其最近的表现，从其过往到其还在演化中的未来，同时在生物和历史—社会两个层面——都蕴含在和个体

① 参见 Ponzio 2008a；Petrilli 2008。

② 参见 Ponzio 1995a，b，1996。

③ 暗指的是霍布斯（Hobbes）的谬误！

④ 不过，尤其可参看 Levinas 1972。

⑤ 参见 Petrilli 1998b。

⑥ 可参 Sebeok 1975。



所做出的决定有关的一切事件和行为之中。

从这一观点看，符号学是倾听的（Petrilli 2007）。符号学诉诸倾听，这并不是指有关符号的一般理论，而是指医学符号学，或病征学。医学意义上的符号学是倾听的，倾听正是医学符号学或病征学所从事的工作。符号学必须倾听今天全球化世界的征象，辨别今天不断滋生的不安和疾病的众多表现——在社会关系方面、国际关系方面、单个个体的生活方面、环境方面——在整个星球上的总体的生命方面。在一个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的全球化的世界中，符号学必须诊断病象，开出处方，指出可能的治疗方法，以便总体性地改善全球化的未来和符号活动的健康状况。这一计划是符号学方向①中一个组成部分，它被称为“符号伦理学”（semioethics）。②

事实上，符号伦理学并没有一种像“十诫”那样的东西要提出③，它有着特定的目的和做法，它是需要或多或少真诚地、或多或少高调地去发扬的一种原则。从这一观点看，符号伦理学不同于固定模式，也不同于规范和意识形态。对不同价值类型的固定模式、规范和意识形态，譬如像莫里斯在其种种著述中所描述过的那样④，符号伦理学提出了的一种批判。符号伦理学预设了人类进行批判的能力。它的特殊志业是证实符号网络在看上去不存在的地方是存在的，所以逃出关联和蕴含是不可能的，而看上去，情况仿佛正好相反，似乎只有纯粹的分隔、界限和距离以及用来捍卫被理解为有限责任的责任那些相关托词［因此，意识以“清白的良心”（a clean conscience）这种形式而存在］。

符号伦理学的批判工作表明，彼此无关的区别何以是幻想性的，整个星球的命运何以最终蕴含在我们每一个人所做出的选择之中，反之亦然。

符号伦理学提供了一种综合视野，正如符号的动物一样是总体性的。今天比以往更甚，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符号伦理能力，不要辜负符号伦理能力，不要辜负对话、他性、倾听、包容、批判和责任的能力。但是，更为紧迫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充分理解符号活动的符号伦理方面对于生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星球上的生命，人类和非人类，想要继续生存下去的话。

（四）类别、个体和单一性

符号伦理学的任务之一，是对类别进行批判，即通过把生命不同表现指为

① 参见 Petrilli 2004；Caputo，Petrilli，and Ponzio 2006。

② Ponzio and Petrilli 2003 这部著作就以此作为书名。

③《圣经》中，“十诫”（decalogue）是上帝借首领摩西与以色列人所订立的规定，被信徒们奉为生活准则。——译者注

④ 参见 Morris 1948，1956，1964。

类别这种方式，对通过类别来操作的实体化过程进行批判。“类别”（genre）这个术语在这里是按照诸如拉丁文中的“*genus*”“*generis*”，意大利文中的“*genere*”的宽泛意义来理解的，在英语中有一系列表示种类、类型、风格、组合、组群、作用、阶级、范畴的不同术语——基于同一性逻辑的某种组合：文学或音乐中的“文类”（genre），生物学中的“属类”（genus），语法中的“性属”（gender），等等。

广义上的“类别”这个术语是一种抽象，决定着另外一种抽象：“个体”（individual）。类别和个体的“具体的抽象”构成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抽象。[①] 建立在同一性逻辑基础之上的政治和逻辑，就把单一性看成个体，看成是属于类别的，看成是平等的。一种单一性和另一种之间的异质性关系是前政治的和前逻辑的。政治和逻辑因为我对于每个他者的完全责任而出现，以至于我有义务恪守这种责任并没有分别地和每个他者相关。这意味着我不仅必须和单一性相关，而且必须根据类别而和单一性相关。我有义务和特定组合中的个体相关，该个体如此这般是可以和每个他者相互交换的，相对于同一组合中的其他个体是没有分别的。翻译过程是连续不断的，从单一性到个体和类别，从个体和类别，从异质性的东西到同一性的东西，从符号中的差异到标明类别的差异的符号。个体的身份和群体的身份在类别中得以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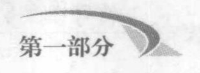
另外一个例子是民族概念，我们可以把关注焦点放在差异性和同一性的符号上，从符号学的角度对之做出思考。民族概念是社会同一性通过它而得以肯定的“具体的抽象”之一。这种具体的抽象同时既是幻想性的又是物质性的。对于所有社会—政治建构来说都是如此，包括所谓“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内，因为它们都是由符号构成的，由符号学的物质构成的。[②] 即便被称为“世界”的系统也是建构、投射、地理和意识形态的投射，换言之，是社会规划的产物——而民族身份正是该规划的组成部分。作为根植于同一性之中的范畴，民族又是以差异性为特征的范畴。[③] 这种二元性可以从“民族”这个术语本身得到证实，它具有双重意义，是模棱两可的。实际上，民族这个术语被赋予了：(1) 本质上是政治的意义，这表现在启蒙时代和法国大革命时代中，根据这一意义，民族是表现为“人民当家作主”（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的国家；(2) 种族—语言的意义，它在浪漫主义时代逐渐成熟，据此而有了基

---

① 参见 Petrilli 2008；Ponzio 2007a。

② 关于符号物质性概念，参看 Petrilli 1986，1998b。参看收入本书的“实体和符号的物质方面”一文（第 9 篇文章）。

③ 参见 Petrilli 2005a。



于种族和语言的不同于另外一个的民族。

这两种意义证实，认识民族身份/同一性起源有着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情况中，身份/同一性起源是政治、法律和经济的。所以，民族身份因为它所是，即一种社会—历史建构，而得到承认。第二种情况中，身份/同一性的起源被认为是自然的。第二种认识幻象还涉及社会—历史因素，譬如语言和文化传统，但是，它们都与诸如血缘和领土等"自然"因素相关。这种情况中，类似于前一种情况，社会—历史因素被认为是自然的（"自然语言"这个通常表达是有问题的），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认为是自然地决定民族差异的因素（Ponzio 2003）。

"身份/同一性"和"类别"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在今天的交流社会中起着核心的作用，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个体主体的身份/同一性，还是集体主体的身份/同一性——社会阶级、民族群体、民族、欧盟、"西方世界"等等。个体属于类别——性别类别、社会阶级、职业角色、种族、民族群体或者国家组织，直到某种国际社会，等等。单一性中的关系被翻译成了个体中的关系，个体中的关系也就是类别中的关系。我们提出了一种翻译的符号伦理学，以之作为类别之间的和跨类别的交流的原则，目的是要通过遵循反向的翻译轨迹，来扭转这个过程[①]：翻译成关于单一性中的关系的符号，也就是列维纳斯（1961）所谓的"面对面"（face-to-face）关系。

人类个体可以被描述成一个符号活动过程。的确，由于其致力于解释—提议，个体包括数量可能无限多的意指轨迹。作为发展中的符号（"形成过程中的符号物质方面"），个体是一个对话和关系的实体，是出现在与其他个体之中和之间的相互关系里的开放的个体。所以，个体的边界和符号不能一劳永逸地盖棺论定，而只能通过与其他个体，即与其他类别的对话交往方可明晰（Sebeok，Petrilli，Ponzio 2001；Petrilli 1999a）。

自我是对话性地相互关联的无数自我所构成的集合体，遵循的是异质性逻辑。主体的身份是复杂的、多重的和多声部的，它在其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的对话关系中得到界分和塑形。如果按照皮尔斯的看法[②]，皮尔斯反对有限自我或自足自我这种"虚幻现象"，我们把"个体"（individual）字面地（in－dividual）解释成"非分开、非可分"（non divided，non divisible），我们就可能主张"一个人并不绝对地是一个个体"。自我的社会和群体性质，就可能对

① 参见 Petrilli 2005c。

② Peirce *CP* 5.421。又参 Colapietro 1989。

其做出解释的任何意指过程来说，并不与其单一性、独特性或者他性彼此对立。自我是不可擦除的，说的要比已经说出的多[①]，自我的言说传递着文字之外的意味。另一方面，自我的不可擦除性和独特性并不意味着不可交流性。

在名为“主体性”（*Subjectivity*）的文件夹中的一系列未发表手稿里[②]，维多利亚·维尔比按照她称之为“我”（用I，或者新词 *Ident* 表示）和“自我”（用 self，或者另一个新词 *ephemeron* 表示）之间的关系，对主体的构成问题做出了分析。[③] 在维尔比的描述中，自我是终有一死的，像身体一样短暂易逝。相比之下，我倾向于超越身体和自我终有一死的那种不朽。如此表述之下，主体并不是单面的、周密的，而是表现出一种多余，就身份自身而言，这是多出来的某种东西，被建构在自我与我之间的对话性关系之中的某种东西。“我”（I或者 Ident）并不是“个别的”，而是“独一无二的”。维尔比说：“正是因为我们的‘可二分性’（di-viduality），才构成我们的丰盈天赋。”[④]

主体是肉身化的主体、身体间的存在，是与其他身体相互关联的身体，在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表现出身体间性这种情形。主体在一个不与其他身体分隔的身体中被肉身化，对于我们认识主体性十分关键。从生物进化、物种的观点看，以及就社会性和文化历史而言，主体都是肉身化的实体。对人而言，如同对任何动物而言，意识都是肉身化的意识，因为这个缘故，身体在意识发展过程之中起着根本性作用，而且，对于充分的发展，对于人类作为“符号动物”的发展，身体的确充当着一种前提条件。[⑤] 自我以与其他身体相互关联的方式发展，在相互关联中拓展自己的边界，这边界就是它所经验的世界的边界。世界是身体的延伸。用巴赫金的话说，世界形成了连接某人自己的身体和他人身体的桥梁。

自我和他者（不同于自我的他者和自我的他者）之间的对话关系作为创造过程中连续性的最重要条件之一而出现。这个创造性过程中的驱动力量是爱，即“仁爱”（agape）的力量。在皮尔斯的思想体系结构中，理性和知识中最先进的发展是基于情理的创造力和友爱的转换性劝服的，所以，是基于他性逻辑

---

① 参见 Peirce *CP* 1. 357。

② 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档案馆，维尔比文汇。命名为“主体性”的文件夹中包括了 1903—1910 年间所撰写的各种文稿；对此特定问题，尤其可参看 1907—1910 年间的手卷。

③ 这些未发表手稿现在和维尔比发表和未发表的其他材料，由笔者混合编辑在一起，将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稿已经于 2005 年送出，并经过出版社内外评审审定通过，参看 Welby ed. By Petrilli 2008。关于对“维尔比文汇”（Welby Collection）的描述，参看 Schmitz 1990 和 Petrilli 1998a。

④ 参见 Petrilli 1998a；以及 Welby ed. By Petrilli 2008。

⑤ 参见 Deely 2005a；Deely，Petrilli，Ponzio 2005；Petrilli 1998b；Ponzio and Petrilli 2003。



的（Petrilli 1997）。

对类别和属于类别的个体的批判观点，不能把注意力限制在“事物理性”（reason of things）范围。事物的理性，由此而来的对正确的哲学肯定［用列维纳斯的说法，“有理”（*avoir raison*）］，不可能与“情理”（reasonableness）的能力分开——后者是建立在他性逻辑基础之上的。这意思是说，事物的理性不可能与作为构成批判和对话的总体性的那种去整体性的能力分开。所讨论的这个话题可以用下面的方式来表示：今天全球交流社会被同一性逻辑和排斥他者所控制，其中的生命面临着其内在的危险。因此，人类从一开始，就必须从理性动物变成情理动物[①]，必须意识到作为符号动物，而不仅是“在思想的东西”，将直接担负起来的全部责任。

情理被赋予了把害怕陌生人（异类，对他者的恐惧被理解为对不同于自我的他者的恐惧）转变为同情他者这种能力。按照列维纳斯的主体性哲学启迪来阅读皮尔斯：在同一性的硬壳下，主体重新发现了自身对他者的担心而不是担心他者；对他者福祉的担心，使得自我始终不安，一心想着他者。情理、创造性、友爱都是基于他性逻辑和对话思想这一基础之上的，它们一道携手，必定全面地推动人类符号活动的进化。

（五）从类别和个体到面对面关系（列维纳斯）

列维纳斯说[②]：

> 宗教时代或者核时代——现代世界的特征，无论是口号还是诅咒，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趋势。尽管有我们每日所见的暴力和疯狂，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哲学时代。人类在其活动中得以维系，是通过“有理”［being right（*avoir raison*）］，通过与真正推动事物发展的可计算的力量保持一致，通过朝着历史方向迈进的这样一种肯定性。这满足了他们的良心。在科学所取得的进步之外——科学揭示出事物之内各种力量可预见的表演——人类自由本身（包括对这种表演做出思考的那些思想在内）是受理性秩序控制的。这种秩序隐藏在存在的深处，通过当代历史的无序，通过个体的痛苦和欲望、个体的激情和胜利，渐渐地揭开面纱，崭露头角。人们宣称，一个全球性的工业社会会克制住所有折磨人性的矛盾。但是，它同样也压抑着人隐蔽的内心。理性如同一个诡异的太阳升了起来，使众生的不透明变得透明。人失去了自己的影子！如此一来，无物能吸收或反射

① 参见 Petrilli 1998b。

② 参见 Levians 1960：253。

这光芒，这光芒甚至把存在的内在性都剥夺了！

严格意义上的人，列维纳斯术语中的“形而上学者”（the metaphysical），人的“超越”（transcendence），（不仅在整体性之上，而且在其根基处）是被绝对他性、无限责任、非冷漠的差异中对话性的身体间性关系、就身份和相关角色的功能性而言的非功能性所决定的。列维纳斯谈到了“渴望他性”（desire for otherness）（参看 Levinas 1960：33－35），严格意义上的人是易受伤害和向他者敞开的条件。

最能证明严格意义上的人的地方，是就与绝对和非功能性的他者之间的关系而言，时间在其中被磨平的那些所在：衰老、疾病和死亡的时间，友谊和爱情的时间，抚养孩子的时间，审美话语——文学、虚构艺术、音乐、电影——的时间，创新和科研的时间，休闲娱乐的时间，短暂易逝的时间。对于封闭的同一性而言，这些是冗余时间，是不可能召集起来听任世界差遣的对话性去整体性和差异滋生的时间。

“世界”（World）被理解为其最粗俗形式的现实主义，这是主流西方世界意识形态、同一性、存在、话语秩序、有良知的功能性主体、政治体制和大众媒体的潜在修辞的特点（当然，尽管不是本文的直接分析对象，“非西方世界”在其各种各样的文化表现中，同样也深受我这里所批判的同一性逻辑的影响）。所有这些位置都和今天全球的、总体性的世界相互呼应，在此之中，透明成为箴言，甚至存在的内在性也被剥夺了；这个世界，如列维纳斯所说（1948），“没有了影子”（without a shadow）。全球市场和全球交流网络一道，对被看作自足而孤立的个体实体行使着权力和控制。今天全球化中的趋势，是要同化和抹平差异，附着在全球市场和全球交流所决定的主流价值观上。尽管如此，抵抗符号面对独白式同化过程而兴起，与此同时，特殊的符号活动，语言和文化，仍在继续发展壮大。

从构成方面看，世界，如我们所描述的，是基于同一性的；它提前安排或计划了他者、他性为同一性的名义而做出牺牲。从这一观点看，类似于休息（余暇，起恢复工作、恢复暴力和“白日的疯狂”作用的夜晚）[①]，和平不过是一种间歇——片刻缓和、力量重新整合、缓刑、战后休整、为战争做准备。

要问的问题，与列维纳斯在其整个研究历程中所归纳出来的那些相同。除了在这个世界中存在，为了这个世界而存在，还有别的意义吗？“严格意义上

① 参 Blanchot 1969，1973。

的人”能够取代客体的时空、同一性的时空吗？存在着不能化约成同一性范畴的，不同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不同于交换、对等、功能性、利益和生产效率的关系吗？能不能有一种完全属于他者而同时又是物质性的和世俗的、人的身体能够对其敞开的人际关系？能不能有不同于对象世界中的意义的一种意义？［“关于意义的札记”（Notes on Meaning），载 Levinas 1998：152－171］如预计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朝着提出一种新人文主义的方向发展，它不同于同一性人文主义，我们称之为“异质性人文主义”（humanism of alterity）。[1]

基于他性逻辑的人文主义旨在给予一种并不转向主体的“运动”以特权，这一运动被称为“工作”（*œuvre*），它是冒险地对他者敞开、混杂同一性、打破独白、逃出主体—客体关系。[2]《主体之外》（*Hors－sujet*）是列维纳斯一部 1987 年著作的标题；“主体之外”还有一层意思是远离主体，对主题化、再现不做回应。所有这一切都以他性逻辑作为基础，这一切也成了一种使人文主义变得可能的条件，在这种人文主义中，良知和人权（自我的权利、身份的权利）按照他者的权利而受到质询。

当着他者的面孔，我受到质询。通过其袒露、坦白和脆弱，这张面孔说，他性绝对不可能被消除。他者的他性与有关诉诸杀戮和战争的号召针锋相对，为他者的不可化约性提供证明和证据。“另外一个”“他者”“这个他者”（this other），列维纳斯说，把我置于受格地位，召唤它、质问它、催促它回到绝对责任，去到我的动机范围之外。绝对责任是对于他者的责任，被理解为对他者做出回应、对他者承担起责任。[3]

与他者的关系是非对称的、非平等的：他者相对于我的权力和自由而言是不成比例的。道德意识对自我的自由提出质询。不过，就质询约束着从自发到自觉——从作为消极享乐和自我快乐的自发性的自由到作为权利并谈论这种权利的自由——这种转换而言，则质询既构成自我，又构成自由。[4]

自我的权利和自由，是面对在对他者的无限责任这种压力下对他者做出回应这种需要而设定的。自我的来源，没有“统治者”（arché）的来源（在“无政府”［*anarchical*］这个意义上），来自面对他者时不安的良心——所以是有愧，来自证明自己的在场对于他者是合理的这种需要。“自我”来自没有借口、

---

① 参见 Levinas 1972。

② 参见 Levinas 1935－36：373－392。

③ 参见列维纳斯：“替代”（Substitution），载 Levinas 1974，英文译本：第 99～130 页。

④ 参见列维纳斯：“第二节：B. 享乐和再现”，载 Levinas 1961，英文译本：第 122～14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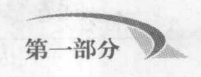
不会逃离他者的责任。[1] 在为问心无愧所做出的持续努力中，主格的自我，被理解为主体，被理解为意图性意识，被理解为话语的自我，来自质询自我并置自我于受格地位。同样来自这种质询的，是自我的自由、自我的权利——所谓“人权”，对它进行详细探讨，以便捍卫被他者面孔为说明他者权利所召唤的自我，捍卫作为“我”、作为自我的它本身。

一张素净面孔的对立，一双无辜眼睛的对立，被剥夺了保护，背离作为责任被建构的自我，这并不是由力量，也不是由敌意所造成的对立。不如说，这是一种热爱和平的对立，其中，和平并不简单地被理解为搁置暴力，为了更有力地击出而收紧暴力拳头。相反，永久化的暴力是消除热爱和平的对立，玩弄伎俩战胜这种对立的暴力，是无视这面孔、回避凝视的暴力。“不”写在他者面孔上——首先是“汝应戒杀”（Thou shalt not kill）——因为事实直截了当地摆在面前。不过，既然他者被赋予对自我的感觉，被解除了与我的关系，如此这般的他者可能在自我及其规划的在场中缺席，不与之继续前行。当他者面孔上“没有刻字”（*no inscribed*）被改造成敌对力量或顺从之时，暴力便被永久地保留下来。暴力存在于欺凌他者中，极点是谋杀和战争。尽管反对体现在“汝应戒杀”这条戒律中的暴力，推诿还是被永久地保存下来，甚至在规则中尚未明确表示出来之前，比理性思考，比作为“我”的存在，比主体、知识和客观化的意识更早地，就刻在了面孔上（参看列维纳斯：“维系”[Entretiens]，载 Poirié 1987：104）。人文主义是对他者的责任，意味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通过在将其提升到该程度的上帝之选中承担起对他人的责任而达成人的条件（Levinas 1990）。

人与人之间的责任这项工作，是个体在其单一性中的工作，这个人要绝对地承担责任：就像人质那样承担责任，他要为他从未做过、从来就不是他的过去、从来对他就不在场的事情担起责任（参看列维纳斯：“维系”，载 Poirié 1987：118）。

对他者的责任是朝向一种双重意义的：他者得到提升，他者被扛在我自己的肩上，所以说，是处在一种非对称的关系之中的。我必须为之负责的人也是我必须对之做出回应的人，列维纳斯说。我必须对我为之负责的人做出回应。对我所负责的这个人的面孔的责任：为一张注视我的面孔负责，为它的自由

[1] 参见列维纳斯：《人文主义与高高在上者》（Humanism and An-archy），载 Levinas 1972，英文译本：第 127~139 页。



负责。①

和平的状态和对他者面孔的责任，在一种个体把自身交与单一性、差异、非相互转换性、非无关痛痒的关系中，要先于政治和逻辑，列维纳斯说。

我们注意到，政治和逻辑把个体看作是属于类别的，所以是平等的。相反，异质性关系是前政治的和前逻辑的。政治和逻辑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对于单一性中的他者的责任，还因为我被迫无关痛痒地，即在类别基础上，与他者相关。所以，政治和社会组织，伴随其逻辑、法律、区别、分类，在对他者的责任中找到其正当性。然而，历史还表明，这种正当性，对他者的责任（政治的意义、逻辑的秩序由此而来）可能丢失。今天，尽管所谓全球性交流如火如荼，这一点却分外明显。

与发展当下阶段中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个悖论，是社会关系作为相互分隔、彼此冷漠的个体之间的关系出现。与他者的关系成了为达成个人私利所必须承受的东西。此外，一心只关注自己的身份，只关注与他者的不同无关的自身的不同，增加了在及物性方面被理解为害怕他者这种对他者的恐惧。按照这种逻辑，社会群体是身份利益的消极结果，相互之间无关痛痒。的确，如此理解的话，既然它的利益要求连贯和统一，社会群体只会将自己呈现为紧凑的同一性。

以自我为中心的群体，构成我们各自身份的无数自我所组成的群体，呈现出同一类型的社会性。这里指的是建立在差异和同一中相互之间无关痛痒这种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性。这种情况的由来，同时也被证实了，是同一个体主体中公私行为彼此割裂；角色、能力、使命、语言中的割裂和彼此互不干涉；同一个体、同一主体中种种责任彼此割裂；割裂被看成服从主体所属社会体制的“通常”或“标准”方式。

对他者的恐惧，就害怕他者这一意义上说，来自身份的建构。在今天社会中，对他者的恐惧，被理解为害怕他者（主体所经历的对客体的恐惧），到了井喷程度。不过，与霍布斯在如“人与人之间如狼”这种表达中所归纳出的原则相反，及物性中的恐惧并不是身份建构中的出发点，而更多的是到达点。②

“对他者的恐惧”（fear *of* the other）意味着主体所经历的被理解为客体的“他者所具有的”（of the other）恐惧。他者构成了主体的恐惧对象，主体所经历的恐惧，“主体属格”（subject genitive）之中的恐惧。逻辑对“主体属

① 参见列维纳斯：《自由与命令》（Freedom and Command），载 Levinas 1987b：第 15～24 页。

② 参见列维纳斯：《维系》，载 Poirié 1987：第 117～120 页。

格”和“客体属格”（object genitive）之间做出了分别：前者是恐惧的他者主体，恐惧的是他者；后者在客体所经历的恐惧这个意义上是“他者所具有的”恐惧。主体和客体。不过，我们必须抛弃逻辑中这种传统的二分法[①]，才能把握住第三层意义，根据这层意义，“对他者的恐惧”可能被消除歧义，成为“为他者而担心”（fear *for* the other）。根据第三层意义，对他者的恐惧意味着经历他者的恐惧，他者所经历过的恐惧，所以，为他者而担心。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去区分主体和客体，也不参考社会身份。换言之，差异中的关系不再暗示社会认同、同一和差异中的互不干涉。相反，差异中的关系是基于差异中的非无关痛痒、绝对他性、对同一性的超越。根据这种逻辑，对列维纳斯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他者所具有的”这个表达可以被标志位“伦理属格”（ethical genitive）（参看 Ponzio 1995b，1996）。这第三属格应该被逻辑作为第三层意义考虑在内，在此之中，我们有可能消除“对他者的恐惧”这个表达的歧义，即将其理解为“为他者而担心”。

（六）人文主义、身体间性和类别抽象的去总体性

前面所引文段出自列维纳斯名为“犹太教及其礼物”（Judaism and their Present）的文章，接下来，他写道[②]：

> 关键是诚，而不是真（真假意义上的），是做，而不是知。艺术、爱、行动比理论更重要。干才比智慧和沉着更有价值。

随着“生命权力”（biopower）以及身体对生产工具的可控植入日益普及，全球交流坚持认为个体是分离而自足的实体（参看 Foucault 1977，1988；Foucault et al. 1996）。身体作为一个孤立的生物实体而被经验，它属于个体，是个体拥有范围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导致了基于实体间性、相互依赖和身体袒露和敞开等等的那些文化实践和世界观几乎完全灭绝。给我们剩下的，是民俗分析家所研究的干尸化了的残渣，是保留在人种博物馆和国别文学史中的考古遗迹——表现为普遍的“博物馆化”（museumification）状况。

想想巴赫金讨论过的大众文化对身体的种种不同认识，想想不同形式的“怪诞现实主义”（grotesque realism），它们并不以孤立的、与世俗生活其他部分——实际上，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相互割裂的方式看待身体和身体生

---

① 如迪利极富成效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理解符号活动，要求现代和康德意义上与主观性相对的客观性作为一种虚假的二分法被揭示出来。

② Levinas 1960：英文译本，第 254 页。

活。[1] 怪诞身体的符号（当下时代中仅有微弱痕迹尚存）包括中世纪流行节日中和这个星球上所有前资本主义文化制度中的仪式面具。[2] 在与资产阶级兴起相关的个人主义发展之前，“怪诞现实主义”在中世纪文化中把身体表现为不确定之物——它不局限于自身；相反，是在与其他身体的符号活动关系中、在超越个体生活限制的转换和更新中发扬滋长。今天，全球性交流（全球性的交流—生产）强化了对身体个体方面、隐私和静态的认识，成了对于“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self）具有功能性意义的认识。

诸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和费卢奇奥·罗西-兰迪[3]之类学者已经表明，科学中的分离和分裂对巴赫金称之为“个体化身体的新典范”（new cannon of the individualized body）的社会—意识形态必要方面具有功能性意义。个体化的身体，渐次地，对于身体对今天交流—生产体制的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可控植入，具有功能性意义。

总体性的、去整体性的符号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必须建立在他性逻辑基础之上，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能够为他者所用，愿意倾听他者，对着他者敞开，不仅在量的方面是如此（总体符号学的无所不包性质），在质的方面也是如此。符号研究者所做出的所有符号活动解释，都必须考虑到与他者的对话性关系。对于朝着全球化方向的同时，又注重向着并非自我孤立或封闭的本地化、具体化敞开的方法而言，对话思想是根本性条件。相应的，这样一种方法凸显出有别于整体化的去整体化趋势。

他性迫使整体性在与“无限”（infinity）相关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地自我重组，对此列维纳斯做了专门说明[4]；皮尔斯的说法是“无限符号活动”（infinite semiosis）。与无限的关系远不止是一个认知话题：在既定方面、象征方面、规约和习惯之外，与无限的关系暗示着一种参与和责任。与无限的关系是与“绝对他性”（absolute otherness）的关系，这对于整体性，对于同一，是最难驾驭的。与无限的关系暗示着与其他众人的他性、与另一个人的他性的关系，并不理解成像某人自身一样的另外一个自我，另外一个“自我的另一面”（alter ego），另外一个属于“同一社群”（same community）的我，而是理解成异质的他者，外来的、陌生的、不同的、有区别的他者，不管如何努力，如何去保障由我的身份、我所提供的反面，我们都不应该对之冷漠相对。

---

① 参见 Bakhtin 1963，1965。
② 譬如，在亚美尼亚人中的那些，参看 Claude Lévi-Strauss 1975。
③ 参见 Rossi-Landi 1968，1970，1972，1975，1978。
④ 参见 Levinas 1961，1995。

我所提倡的研究符号生活的总体和去整体方法，并不是要根据某种特定意识形态计划来定位符号学。不如说，焦点是人类行为和人类作为“符号动物”所被赋予的独特责任。如前所述，“符号动物”这个表达指的是一个负责任的行动者，具有“符号的符号”（signs of signs）的能力，能够中止行动和慎重判断，能够超越“既定”和“既成”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反思和批判。

总体符号学必须充分建立在认知符号学基础上，但它还必须向着数量和理论之外的第三个方面敞开自我，即伦理方面——或者，更恰当地，我们称之为“符号伦理”（semioethical）方面。符号伦理学与我们有关新形式的人文主义这种提法相联系。实际上，回顾列维纳斯，包括本文提到的其他作者，符号伦理学召唤我们在实用层面、行动层面、超越纯粹理论层面诚恳地付诸行动；符号伦理学召唤我们超越个体的分离和利益去参与和投入，去关心和爱护他者。[①] 艺术、干才，比智慧和沉着更为重要，列维纳斯说；在理性之外，皮尔斯说，我们必须朝着情理方向发展。符号伦理学旨在超越各门科学及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分离主义，旨在把自然科学与逻辑—数学方面和人文科学关联起来。

我所提倡的这种新形式的人文主义只可能是异质性的人文主义，这一点列维纳斯在其毕生著述中已经阐明，最有代表性的是他 1972 年的著作《他者的人文主义》（*Humanism de l' autre homme*）。[②] 今天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的焦点是同一性基础上的人权主张，在人权概念中剔除了他者的权利。如果我们要捍卫遍布全球的生命，这种取向必须紧急地由异质性人文主义来做出扭转，在异质性人文主义中，他者的权利是首先要得到捍卫的东西，这个“他者”不仅是自我之外的他者，而且是自我本身的他者，自我的他者。实际上，自我本质上倾向于去除和隔离他者，大多数是因为同一性的缘故。然而，以这样的方式达成的同一性是虚假的，因而为了维系或复兴这样的同一性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过是既白费工夫，又犯了方向错误。

符号学具有展现人类涉及符号的任何方面这个优点。的确，不仅如此：任何东西，只要活着便会涉及符号——或许无论它是什么，都涉及符号！这是认知和总体符号学目前所达到的认识水平。现在，符号学把这种意识沿着伦理学方向进一步推进，超越了伦理学，如列维纳斯所说[③]，达到——如我们所

① 又参列维纳斯：《哲学，正义和爱》（Philosophy, Justice and Love），载 Levinas 1998：103－121。

② 又参列维纳斯：《人的权利和他者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Rights of the Other），载 Levinas：1987a：116－125。

③ 参见 Levinas 1995，1997，1998。

说——对于整体、对于"盖亚"本身的符号活动的责任意识。

从符号伦理学的观点看，责任问题在最为激进的层面上（界定行动和价值观的层面上）是不可逃避的。我们的信仰，甚至宇宙本身，都属于人类责任范畴。这里所暗含的意思是，为了充分解释人类符号行为，我们必须考虑这一假设：如果所有人类都涉及符号，那么，所有符号渐次地是和人类相关的。[①]

不过，这种人文主义承诺并不意味着重新认定独白式的同一性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反，所暗示的是激进的去中心化操作，这并不亚于第三次哥白尼革命。如维尔比所说[②]，"地球中心说"（geocentrism）必定被取代，之后的"太阳中心说"（heliocentrism）同样也被取代，直到我们接近于一种真正的宇宙观为止。形成这种视野是我们终极目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总体符号学和"符号伦理学"二者的交汇点。因此，对于人类责任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目前为止所描述过的人文主义这个问题，他性是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为关键的。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补充说，根据总体符号学，他性是以不同于之前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的：不仅是自我的他者，或者不同于自我的他者，我们的邻居（无论远近，事实上始终是近的），而且指基因方面距离很远的有生命的存在这样的他者。

（七）差异的符号和符号的差异

"符号构成差异""差异构成符号"——关于"符号"和"差异"之间的关系有这样两种说法。不过，和最初的印象相反，这种关系既不是对称的，也不是互补的。第一种说法中，"差异"这个词只指状况，在第二种说法中，它也指过程。所以，"符号构成差异"和"差异构成符号"两种说法并不是对称的，也并不相互暗指，因为，如上所述，第一种情况中的"差异"指状况而第二种情况中指过程。这种情况也可以由这一事实来证实：第一种情况中，"差异"可以用"同一"取代，第二种情况中则不可以。

"符号构成差异"可以当作"符号构成同一"的同义表达。实际上，根据状况所理解的差异意味着把差异解释成"同一"。相反，"差异构成符号"不能被解释成"同一构成符号"。不仅皮尔斯驳斥了这种说法，而且斐迪南·德·索绪尔也表示反对。这种说法也不见容于任何称得上符号学的符号学概念。

在皮尔斯的描述中，符号"以此代彼"（*stat pro alio*）[③]，是根据解释来

---

① 参见 Petrilli 1990a。

② 参见 Welby 1903；又参 Petrilli 1998a。

③ 有关对这个推断性"经典公式"中确切用字的讨论，参看本书第六篇文章：《20世纪符号研究中意义的意义》，尤其是本书139页脚注①。

理解的。这种方法证实了符号由差异构成这一事实，因此“差异”可以至少用两种不同方式来解释。第一种，不同于其他符号这种意义上的“差异”：譬如，在语义层面，一个单词和它的同义词在特定语言状况下有所不同。[想想索绪尔取自英语中的著名例子——*mutton*（羊肉）和 *sheep*（羊）之间的差异；或者就法语中的同义词的举例 *redouter*（担忧）、*craindre*（顾虑）和 *avoir peur*（害怕）之间的差异。在音系层面，想想诸如 *d* 和 *t*，*b* 和 *p* 之间各种对立性区别特征中那种双分关系。] 但第二种，是延宕意义上的“差异”：符号在其延宕至其他某物这一意义上也是差异构成的。[1] 符号“指向”（refer to）或“延宕至”（defer to）充当其解释项的另外一个符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符号不只是有关之前所建立关系的静态事实，而是一个延宕过程，的确，一个从一个解释项到另一个解释项的无限延宕过程。[2]

雅克·德里达（Jaques Derrida）通过把“*e*”置换为“*a*”，用法语单词 *différance* 来表示这个延宕过程，在此之前，皮尔斯就已经通过他的“无限符号活动”（unlimited semiosis）这一理念传递出了差异的动态涵义，即符号中的延宕。符号和解释项中的延宕是按照问题和回答这种对话方式来理解的：解释项回应符号，是对符号的回答——对将其自身呈现为问题的符号做出的回答。这从对话关系的角度给解释画出了清晰的界线，这种关系既是开放的，同时又依附于或受制于其术语不可化约的他性。

符号拒绝同一性，对于被理解为状态的差异是难以驾驭的，却在延宕、无止境的延宕中发展滋长。不过，根据第一种说法，被理解为“符号构成同一”的“符号构成差异”，最为讽刺的是，符号按照状况、同一性而构成差异。

所以，重要的是重复指出，与此相反，符号对被理解为变化、延宕、对话性敞开、他性的差异立下誓言。构成符号的这种差异是它的他性，因此是它的单一性、独特性。如此理解的差异让符号向着无限符号活动敞开，并把它与信号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与信号的单声部性、独白思想和静态性质区别开来。

构成差异的符号，在定位在同一性之上这个意义上说，是被化约成信号地位的符号，把自己的延宕能力最小化了的符号。所以，我们可以谈及符号的化约使用，根据这种用法，它们用于“构成”和标识被理解为同一性的差异[在现代后期的“语言哲学”中所提出的“僵化指示项”（rigid designators）这种

---

① 参见普安索 1632 年的著作《论符号》第一卷，问题 1，116/14～117/17。

② 参见 Petrilli 2005a。

虚构中，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宗旨必定是对运用符号来构成差异、标识差异、内在于符号世界的那些认识进行批判。我们指的是人类符号世界、文化、人类符号活动范围。如果我们指的是符号世界、整个符号—生物界（西比奥克语），要问符号在哪里构成差异，将它理解为把同一性固定下来，那么，答案是这只发生在人类文化中、人类符号活动中。只有在人类符号活动这个范围内，符号才被用于按照个体的、社会的和国家的身份/同一性去构成差异。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被称为“元符号活动”（metasemiosis）这种人类专有的能力，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使人类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动物，一种符号的动物，就是这样，但是这样使用符号是一种限制，因为它可能把符号降低到信号的地位。使用符号去构成差异，在人类符号活动范围内去明确身份/同一性，就符号活动的总体性质而言，可能意味着对符号的滥用、乱用。实际上，使用符号去构成差异会阻断延宕，把符号与静态的差异关联起来，这种差异被理解为固定的身份/同一性，而不是被理解为他性逻辑导向的开放过程——对话性的运动、参与、倾听、投入、身体间性。

被理解为同一的差异指“漠不相关的差异”（indifferent difference），和“封闭的话语世界”（closed universe of discourse）[马尔库塞（Marcuse）语]所要求的功能和角色相关的那类差异，它预见到了替换项，但却排除了按照他性所理解的差异。被理解为他性的差异是“并非漠不相关的差异”（unindifferent difference）[①]，是被理解为对话性的投入和参与其他差异的那种差异。按照他性来理解的差异，在“别样存在”（being otherwise）——这是替换项的特点——这个意义上并不是差异，而更多的是在“存在之外”（otherwise than being）这个意义上的差异：作为他性的差异是被理解为存在身份——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之外的延宕这种差异。

（八）相对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符号逃离

符号可以通过至少两种不同方式被文化使用：相对其他文化建立差异和建立同一，即界定文化身份以便使之与其他文化并置对照；或者，在对话性的相互关系中（在无限延宕中），一个符号作为被解释符号或解释项符号“指向”或“延宕至”另一个符号的这种关系中，作为对符号——无论是它们自身的还是其他的——的一种回应方式。这种情况下，文化为其符号赋予“质询的语调”（interrogative intonation）和“回应的理解”（responsive comprehension）

---

① 尤其参见 Levinas 1961，1974。

的能力。[①] 符号对其他解释项提出问题，其他解释项渐次地成为符号，又渐次地成为对话中的问题。这种方法提供的只是从相对主义和教条主义中逃出的可能性，相对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能承认他者，"绝对他者"（*autrui*）被欺压、否定和排斥。

今天的符号世界的特点是全球交流，它倾向于同化、容许、抹平和取缔差异。这种处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同一和差异的一种沮丧感。最后，这种处理甚至变得更加顽固，一心要坚持自身、欺压其他同一和其他差异，一心因为会被否决而愈发坚持自己的同一——差异。在这一语境中，差异之间的彼此漠不关心很快转化为对与之不同、异质、陌生东西的敌意和摩擦。

既然符号现在进入全球交流的流动，在（与全球交流相关的）世界市场上流通，那么，我们可以从什么符号中追踪差异呢？取缔差异该由谁来进行？吊诡的是，差异只能在过去被追踪：差异的符号是从过去接收而来的符号，取缔或可能取缔它们的则是现在。可能做出结合和区别的东西，也是可能做出分辨的东西，是"共同过往"（common past）：宗教、语言、领土分布、起源、谱系、根基、血脉、肤色等方面的差异。同一性试图在可能构成差异的东西中肯定自己，无论是以历史的还是以某种"自然"特点的名义：有关文化过往、传统、习俗、建筑、纪念物、语言和方言、宗教、民族等的证据。最有意义的是，教堂、博物馆、遗迹、城市的历史性组成部分，唯有这些是城市空间中认同的特征性要素，若非如此，在今天的全球交流中，相对其他城市空间而言便沦为无名和无个性。今天，同一性符号被固定在"无所差异"（indifference）和"干尸化了的差异"（mummified difference）之间。[②]

以用这种方式被固定下来的同一性作为基础，有可能保持一种距离——在不同的摈弃程度上（从仇恨到所谓忍受）——这种距离却由于国土、城市空间、郊区、毗邻关系、工作场所和日常生活等因素而变得可以渗透。与同一性的联系是宗教、种族、语言差异、文化过往等给出的。但是，基于共同过往的同一性就自我防卫能力而言变得更强，即使有差异和边界存在，在差异和边界之上，它在空间方面的拓展越宽广，它和世界范围的交流促成流通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不同就越强烈。在与国家、州或者诸如欧盟、美国、阿联酋、非盟等国家和州的联合体达成认同之后，如此描述的同一性就会得到强化。在共同过往这一基础上，如此理解的同一性可能把移民排斥在自己边界之外，于是，社群

① 参见 Bakhtin 1986，1990。

② 参见 Ponzio and Petrilli 2000；Petrilli 1998b，2008。



以外的人员——异质的、非法的移民，因为发展本身在移民祖国所引发的灾难，被迫要求发达国家提供居所。[①]

尽管如此，封闭社会、社会同一性的符号[②]，“琐细的经验”（small experience）的符号，可能受到在对话性延宕这一动态过程中发展滋生出的“重大的经验”（great experience）[③] 的符号抵制。由此，在“与他者相互关联”这种关系中[④]，在置身其中和对他者不可撤销的责任这种关系中，在并非漠不相关的差异关系中，符号是开放社会的组成部分，并且和社会共同参与。

把我们每个人和每个他者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每个人的他性[⑤]，它不可能被化约成任何形式的同一性，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每个人的单一性，是不可能被化约成与任何一类社会相关的差异的，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特性。这种不从属、相互之间的陌生性是在并非漠不相关的关系中把我们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只要同一性和同一性兴趣可以与单个个体的差异、对极端到欺压和排斥他们的所有形式的同一性差异漠不相关，那么，以同一性为基础，具有其同一性兴趣的差异便无法终结彼此陌生、互为他性的这种本质状况（Kristeva 1998；Solimini 2000；Solimini et al. 1995）。

全球交流理想化地使得差异的符号被抛弃掉；它使得那些为制造差异而对符号做非正常使用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与时代脱节和虚幻。今天的社会再生产系统是符号被用于制造差异的最后形式。但同时，这一系统又使得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符号变得不可能，也就是，为了制造差异和固定差异而使使用符号变得不再可能。

① 参见 Petrilli and Ponzio 2006/7。

② 参见 Morris 1948。

③ 参见 Bakhtin 1963；Holquist and Liapunov 1990。

④ 参见 Levinas 1974。

⑤ 不过，迪利以极为抽象的方式提出，这是普安索在他的《符号论》绪言二，第一篇中描述成“超验的相对性”（transcendental relativity）的那种东西，即有限个体彼此之间不可化约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

符号学和谓词判断现象学[①②]

本文中，我将对有关作为“结构现象学”（constitutive phenomenology）和语言哲学的符号学的若干问题做出思考。焦点是逻辑和知识理论，以它们的形成为切入点，分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其一，作为认识的符号活动问题，从“基质”（ground）方面尚不明确的诱导开始；其二，人类文字和非文字符号作为动态对象的解释项的产生，从它强迫我们接受其作为基质开始，原因则在于作为物种专有的人类模塑手段的“语言”；其三，本体论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在处理有关符号学和逻辑的关联关系以及作为超验逻辑的符号学等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到的问题；其四，意识与存在之间关系的伦理基础。

一、作为结构现象学的符号学

作为有关符号的一般性理论，符号学涉及基础、原则、可能条件的问题，而且必然是哲学方向的问题。从此着眼，似乎很难区分符号学和语言哲学，但是如约翰·迪利（John Deely）最近所说[③]，离开符号学的语言哲学是缺乏适当基础的。

在本文中，相应的，我的思考将必然涉及有关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从其形成来考虑逻辑和知识理论问题。埃德蒙·胡塞尔

---

① 本文框架如下：
一、作为结构现象学的符号学
二、作为超验逻辑的符号学：基质问题
三、谓词判断的生成
四、作为谓词判断的符号活动

② 本文曾以同一标题发表于《巴里符号学研究，欧洲符号学刊》（*Semiotic Studies in Bari*, *European Journal for Semiotic Studies*, Vol. 11.4 [1999], 563-593），但是我利用西比奥克学者专刊这个机会，根据此后十年间符号学领域中21世纪的发展，更新了这篇文章，也让更多的读者对此有所了解。——作者注

③ 见Deely 2006，《字面方面、暗喻方面和符号学的代价：论语言哲学和符号学》（The Literal, the metaphorical, and the price of semiotics: an essay o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he doctrine of signs），这篇论文的立论基础是托多诺夫出版于1977年的著作。

(Edmund Husserl) 会说[①]，我们的思考和"起源问题"(*Ursprungsproblem*)有关。此外，逻辑和知识论（或称"生成论"[gnoseology]）不可避免地和本体论有关，这意味着关于普遍性的某物、普遍性存在这种学说。这是因为没有谓词判断，那么断言，或者判断，就不可能；谓词判断包括了对某物的存在做出断言。另一方面，一旦符号学自身把符号定义为由解释项进行解释的某事物，"它必定思考此事物"，此事物，作为存在，便进入到所谓本体论这一哲学思考领域。[②]

不过，起源问题也和本体论有关。它也不能被化约为存在如何而来以及如何通过文字语言和一般性符号揭示自身这个问题，因为这会简单地表示对本体论采取一种非批判性立场。我们必须离开存在这个视界；的确，存在正是从这个"出口"、从这个并非虚无的"外部"被形成的。虚无已经身在存在、"本质"(*essance* 或 *essament*)（列维纳斯语）的产生机制内部了，也就是，已经身在形成存在和在存在中维系的产生机制，在存在的再生产辩证法的产生机制内部了。我们这里提及的是那个复杂而明确的超越本体论视野、关系到伊曼纽尔·列维纳斯（Levinas 1974c）所谓"不同之在"(otherwise than being) 的问题，和"别样之在"(being otherwise) 不同，它只是提出了一个替换的存在，是本体论领域中的一个替换项，而"不同之在"并不包括在存在之中，它并不是对存在的替换项，而是它的他性。按照列维纳斯的说法，我们可以把这个相对本体论的他者方面称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s)，并且表示：本体论预设了形而上学。存在之外并非存在的其他方面，它就是这个方面——换言之，它是存在可能性的条件和基础。我们可以为存在之外赋予超验存在这个特点，尽管这可能偏离思维轨道，因为这样的特点赋予可能使存在之外变成精神特权和认知条件。即便他性是存在条件，也不是唯此而已，在其作为存在条件这一功能方面并未穷尽；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并非为此而生"。不同之在的他性首先是定位在伦理维度中而不是认知维度中的。它存在、繁荣，使人兴趣大发，让人不能释怀、承担责任，但目的却并不是对存在做决定。我们后边还将对此讨论。现在完全可以这么说，本体论起源的问题和谓词判断问题，还有逻辑问题，必定对形而上学提出质疑。

---

① 参见 Husserl 1948：1。

② Eco 1997：6。但是，当然，真正明确符号学的后现代性质，不同于中世纪所有符号学意识早期发展的，确切地说，是皮尔斯对解释者和解释项这两者的区分—— 前者涉及意识（至少是对动物来说），后者则"不一定是精神上的"。艾柯似乎直到 1977 年都还未达成这种走出康德和现代性的转换。参看迪利 1997 年所做批判，载 Capozzi Ed. 1997，此文修订稿见 Deely 2001：第十七章。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总结说，符号学、语言哲学、生成论（知识论）、逻辑、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对所有这些方面进行了最明确阐述的作者之一是查尔斯·S.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而且，的确，本文中的主要参照点也正是皮尔斯。更近一些，通过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细致探讨，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他宣称，形而上学不能从本体论中被除去。我们的思考还会受到埃德蒙·胡塞尔及其现象学的引导，尤其是他 1948 年的著作《经验与判断》（*Erfahrung und Urteil*）。许多其他作者对我们的探讨也有贡献，尽管本文中，我主要把注意力放在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Victoria Lady Welby）和《意义、交流与共同话语》（*Significato, communicazione e parlare commune*）的作者费卢奇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身上，后者这部1961年出版的著作明确地处理了有关意义和交流的基础或可能条件这个问题。

符号学家必须对胡塞尔所谓这个已经给予、已经做出、已经理解、已经决定的世界何以可能做出反思。要批判这个世界的当前样态，要提出别种方案，反思是必需的。我们可能会说，符号学所进行的，是胡塞尔所谓“结构现象学”的总任务，这包括澄清导致“可能世界的建构”的整个复杂操作。[1] 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这个说法之后的阐述：“当我们说‘可能的’，我们的意思是，这个问题关系到总体的世界的本质形式，而非我们真正的、实际存在的世界”（同上）。这意味着不仅是根据事实性、现实和历史，而且根据潜质和可能，对人类世界的模塑结构和过程进行考察。这种考察之所以别具一格，另一层意思在于它所处理的是建构世界的一种物种特有的模态。实际上，和其他动物不同，人类动物的特点在于它能够建构出无数的可能的世界。如果，像托马斯·A.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那样[2]，我们把人类动物身上模塑世界的这种物种特有的东西称为“语言”，那么，我们会立即看到，人类物种，不同于地球上所有其他动物，能够建构真实或想象、具体或幻想、客观的无数个世界，而不仅仅是单一的一个世界而已。

所以，符号学可能自身是包括了如胡塞尔所理解的先验逻辑在内的，因为关于符号活动的现象学能够解释形成众多可能的世界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这也确证了胡塞尔对心理学局限的批判：到目前为止，心理学所处理的都是一个已经被明确的主体，该主体处在一个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已经被确定的世界之

① 参 Husserl 1948：50。

② 参 Sebeok 1991。要全面了解西比奥克关于该论点的著述，可参看本书 243 页脚注③。

中。而符号学与之不同，作为先验逻辑，它试图重构已经给出的世界和心理学上的主体因之而成为其所是的那些可能的操作。

作为博采众长的语言哲学，符号学无法回避如昂贝托·艾柯（Umberto Eco）所提出的这类问题（1997：4）："使得我们产生出符号的那种东西是什么"或者"什么使我们说话"。和艾柯的情况相似，这个问题可能让我们想到皮尔斯的"动态客体"（dynamic object）这个概念，并由此而让我们做出回答，正是这个动态客体"促使我们产生出符号活动"（同上：第5页）：

> 我们产生出符号，是因为存在着要求被说出来的某种东西。用一个难以称得上哲学但很管用的说法来表示，"施动客体"就是这种东西，它给我们踢上一脚，说"说吧"——或者"说说我！"，或者"考虑考虑我"。

这个回答，如艾柯所观察到的，预设了一种知识论；但是，在我们能够表明导致我们产生出作为动态客体、本体、原初之物的符号的这种东西之前，在某种尚未明确的东西激发出我们的关注并且置身认识行为之前，这种东西已经是符号性质的了［对此，普安索（Poinsot）已经做了充分表述］。[①] 因此，艾柯使用了皮尔斯的基质概念——它并不被理解为"某物出现的背景"，而是作为"从仍然暧昧不明的背景中出现的某物"[②]；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意大利语中的"base"这个词，就像博恩梵蒂尼（Bonfantini）的1980年版皮尔斯文选中那样，那么，艾柯说："与其说它是动态客体的基础，不如说它是我们想要拥有的关于它的那种知识的根基、起点"，一种感觉。所以（出处同上，第81页），它是"非形而上学的（具体化了的）认知过程"的"基础"或"根基"，通过不同方式，这"基质"可能是物质，某种模糊呈现出自身并成为谓词的"主体项"（subjectum）的东西。与之相反，它本身就是一个可能的谓词，更像是"it is red"，而不是"*this* is red"。

我们将从四个不同方面来探讨这些话题：

（1）作为认知的符号活动的起源问题，从就基质而言尚未明确的吁请开始。

按照这种观点，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中对"它是红色"到"这是红色"这种转换进行了深入分析。"S是p"这一谓词判断的起源在这里的表示

---

① 参见Poinsot 1632：卷一，问题4，"对象以何种方式分为'刺激对象'（stimulus objects）和'结果对象'（terminate objects）"，这是他的著作《论符号》（*Tractatus*）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

② 关于"基质"这一概念的暧昧性，以及皮尔斯对这个概念的特殊使用，参看"感觉/意味"（senses［a］&［b］）中"基质"词条，见Deely 2001：900—903；903。

是，从主体全然被动的状况开始，主体受到尚不明确的某物“影响”，该物使得我转向它。不过，胡塞尔并未把这个我作为现象学重构的起点。如所预计，这不是心理学上的我，而是意图作为建构心理学上的我及与之对应的“既定世界”的种种可能条件的综合物的我。换言之，起点是意图性意识——这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前提。

然而，就胡塞尔对实体及其周围世界关系的现象学分析所取得的成就而言，还可以进一步地做出“反推”（regression）。我们所指的是主体—谓词结构尚未明确的这个阶段，这个结构只是按照纯粹和简单的享乐——“愉悦”（jouissance）——而被给予实体：这是列维纳斯在 1961 年的著作《总体性与无限性》（*Totalité et infini*）中所阐发的核心论点。对于把自己按照愉悦给予认识、把自己以非人称形式给予的东西而言，这里是没有主体和谓词的。譬如在我们说“it's raining”或者“it's hot”的时候：这既不是“this is red”，也不是“it is red”，而是（如果有的话）“it is reddish”。这种反推并不涉及从逻辑到认识论，从谓词到有关处于不同而零散领地中的这些存在的感觉的这种转变；相反，这是从逻辑—认识论、从谓词—感觉到它们都从中找到其起源这一层次的转变。

而这或许使得这种说法变得合理：即便是在皮尔斯的思想体系中，也不存在这样一种转变——即从逻辑到认识论、从谓词到感觉这种转变——情况突变，这个转折点可以追溯到 1885 年左右。[①] 实际上，在皮尔斯那里，这不仅是一个转折点或者转换，更是一个对“直接对象”（immediate object）的起源进行深入考察的问题，它最初是以“物自体”（thing in itself）或者“动态客体”（dynamic object）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另一方面，这不仅涉及逻辑和认识论，而且还涉及本体论，因为来自向着先前的、溢出的层面的这种迁移，使存在问题本身在意味问题伴随之下变得问题重重，并且所有这一切都进入了形而上学领域。

此外，根据列维纳斯的“非人称发生”（impersonal happenings）这个概念［他用 *il y a*（存有）来表示］，我们并不具有被理解为再现或概念过程初始阶段的感觉。[②] 相反，感觉在这里是不可分割地和享乐联系在一起的。[③] 所以，它是价值论意义中所内含的，即便并不公然揭示出来。它不是道德上的而

---

① 参见 Fumagalli 1995：3，引自 Eco 1997：80。

② 如迪利（2007，2008）所表示的，这标志着把符号学可能和现代现实分开来的关键分野之一。参看 Poinsot 1632，尤其是第一卷问题 6 和第二卷问题 2。

③ 如迪利所说，是与作为结果的“性力投注”（cathexis）不可分割的，Deely 2008：32n4。

是审美上的，原因很简单：在这里，我们都身处愉悦维度中，身处纯粹而简单的自我享乐维度中。

（2）人类文字的和非文字的符号作为动态对象的解释项的产生，始于它作为物种专有的模塑手段而强迫我们接受它作为基质，对于此种物种专有的模塑手段，之前，和西比奥克一道，我们称之为“语言”。

即便看上去符号类型对于人类和非人类动物都一样，人类符号仍然是特别的，因为它们与建构无数可能世界这种能力相关。利用同样的、数量方面多少有限的要素，不仅产生出不同的意义，而且产生出不同的意义场：你可以用两块石头来“书写”，根据它们的排列方式，不仅可以产生出同一语域中的不同意义（譬如就狩猎而言：右边的猎物，左边的猎物，身形大小，等），而且可以产生出不同的意味，即属于不同语域的意义（关于狩猎、战争、爱情等的符号）。

（3）本体论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处理符号学与逻辑问题、处理包括了先验逻辑在内的符号学的时候，必定受到质疑。

如前所述，存在以及因之而来的本体论，就自身而言都不是自足的和完善的：现实具有一个不可与之分割的影子；同一性自身之中包含着他性，而他性无论如何都不会纳入彀中；总体性向着“无限”敞开。“无限”（infinite）中之“无”（in−），应该既被读作否定，又被读作具有位置价值的命题：在笛卡尔的观念中，少包含着多、超量和无限。

（4）意识与存在之间关系的伦理基础。

如艾柯所说，作为语言哲学的认知符号学所必须处理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有关“终点”（*terminus ad quem*）的问题，在谈论或产生总体性的符号时就是指它，而且还是一个有关“起点”（*terminus a quo*）的问题，是它使得某人发出言说，或者一般性地，产生符号。根本而言，正是这个问题促使我们产生出符号活动和形成主体，形成我。如果我们单靠指向客体来回答这个问题，即指向动态客体，像艾柯一样宣称，是对象“要求被言说”，那么，不仅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是片面的，而且可能得出的答案或推断性答案，也难以对展示需要言说的整个语境做出说明。换言之，这个答案无法说明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总是要受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调和这一事实，这里，他者不是被理解为事物，而是另外一个人，“他人”（*autrui*）。我们实际上或许会这样说：是我们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使得我们发出言说，要求主体必须发出言说。由于艾柯把分析限定在动态客体上，所以，他使用那些来自人际关系的暗喻也就并不为怪了：“要求”这个动词，“考虑考虑我”“说说我”这类说法，以及那个他开玩笑地

说他想将其翻译为德文以表示“在意大利它得到了严肃的哲学对待”的表达[①]——“给我们踢上一脚的那种东西”（something－that－gives－us－a－kick）。[②]

米哈伊·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说得好[③]，当我们说话之时，不仅我们使用到他者的言辞，而且我们还在不可避免的关涉和蕴含关系中记录着他者，如此一来，说始终是答，始终是为之负责，对之回应，而这首先是为自身负责，证明自身合理。我说话是为了对他者做出回应。如列维纳斯所说（1991：141－151），我被拒绝的第一种情况，不是主格性质的，而是受格性质的。他者对我提出问题。关于某物、关于存在的这个问题，是无法与关于我的这个问题本身分割开来的，这个我首先要为自身负责，为自身在世界中所占据的位置负责，为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关联负责。这意味着“第一哲学”，如巴赫金[④]和列维纳斯各自所坚持认定的，就是“伦理学”。如列维纳斯所说，主要问题并不是为什么有存在而不是虚无，而是为什么我在此地、此居所、此情形中存在，而他者却被排斥在外？人类符号活动的起源并不是意图性意识，而是，如列维纳斯所说，“非意图性意识”（unintentional 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是从伦理学而不是从认知意义上来理解的，更确切地说，是“坏的意识”在面对他者单单通过其在场而提出的问题时，极力要证明自身合理、要让自身安心、要让自己过得舒舒服服，由此而做出自我折中，变成“好的意识”。

二、作为超验逻辑的符号学：基质问题

基质，如皮尔斯所说，又如我们自此开始所要考察的那样，如果按照符号类型学来分析，是“第一性”（firstness），它属于“像似性”（iconicity）范畴。第二个阶段是属于“第二性”（secondness）和“指示性”（indexicality）的。艾柯，像阿尔芒多·福马加里（Almando Fumagalli）一样，碰到了这样一个难题：在任何推论活动发生之前，基质是否是一个有关直觉的直接性的问题，或者说，是否至少在其后的阶段中发生过某种推论过程。如果前一假设为真，那么就只有“关于某物在我面前这种纯粹的感觉”，一种“不具有任何知性内容”的直觉，“青年皮尔斯与笛卡尔之间的矛盾”会显露出某些弱点来：

---

① 参见 Eco 1997：389。
② 参见 Eco 1997：5。
③ 参见 Bakhtin 1929，1963；又参见 Bakhtin－Voloshinov 1929。
④ 尤其参看 Bakhtin 1919，1922。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回到解释过程之外所给出的证据这种笛卡尔式的观念。[①] 这种矛盾通过胡塞尔可以得到避免，因为后者对认识过程的现象学分析揭示出，回到“直接的证据”（immediate evidence），或者，如他所说，“朴素的经验”（plain experience）[与“中介化了的经验”（mediated experience）或者“基础化了的经验”（founded experience）相反]，是可能的，这种看法并没有超出康德的“先验逻辑”（transcendental logic）这一角度[②]，因为朴素或直接的证据是与认识的“规律”（laws）或者“本质性结构”（essential structures）相关的操作，尽管仍然还处在“反谓词”（anti-predicative）层次。

通过重新建构谓词判断的起源并由此而研究逻辑的构成过程，胡塞尔对主体性的操作进行了思考，他区分了“主体性”（subjectivity）和“心理主体性”（pyschological subjectivity），后者是之前所构建的世界的一个已经存在的组成部分。他所关注的，导致形成谓词判断的这些操作，是“先验主体性”（transcendental subjectivity）操作。后者显然是一个康德式概念，而且，按照胡塞尔的观点，证据无论如何直接，都始终是和先验主体性有关的，他谈到了和“极为基础的经验”相关的“极为朴素的”经验或者“直接的证据”。和皮尔斯如出一辙[③]，胡塞尔相信，并不存在诸如绝对不受其他观念决定的观念这种东西；在各种情况下，他都用到了笛卡尔的“证据”（evidence）这个概念，尽管他为之赋予了一种相对的意味。下面引自《经验与判断》中的一段话尤其具有这种征象：在此，胡塞尔提到笛卡尔，目的是证实对先验操作的一种重构处理[④]：

> 这里的所谓先验，不应被理解为别的什么东西，而应被理解为由笛卡尔所开创的那个原初的动机，即对一切知识形态的最终根源作进一步追问

① Eco 1997：81。不过，还存在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艾柯和福马加里或者认为“解释过程之外所给出的证据这种观念”涉及矛盾，或者认为这种观念实际上是“笛卡尔式的”，他们如此认为到底正确与否。参看 Poinsot 1632：Book I and II。

② 但是，当其不必要地要对皮尔斯恰当地称之为关于符号活动的“无意义的多余废话”（*CP* 5.35）做出定位时，也没有对这种视角所预设的东西做出考察，对此，伊默谢（Emmeche 1994：126）准确地将其描述为“自然中通往各处”的那条路径，即“符号之道”（the Way of Signs）。

③ 请思考他 1868 年的所有文章：《关于声称人所具有的某些能力的问题》（Questions Concerning Certain Faculties Claimed for Man），以及《四种无能为力的几种结果》（Some Consequences of Four Incapacities）。

④ 参见 Husserl 1948：48－49。

的动机，对认识者向自身及其认识活动作自我反省的动机。[①]

同皮尔斯和胡塞尔一道，我们置身经验论—天赋论这种对立关系之外［相反，当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向笛卡尔回归，对皮尔斯和胡塞尔视若从未存在，这一要点被他的语言理论天真地重新提出］，因为二者（再一次地不同于乔姆斯基）是从康德那里继承发展而来的。所以，胡塞尔利用来自笛卡尔的启发，来与康德式先验主义打交道，并且补充说明，对象与主体之间在认识最低层面上所发生的遭遇，绝非与天真的经验论甚至实证论意义上的“白板”（*tabula rasa*）之间的那种遭遇[②]：

> 至于前谓词判断作为自我主动性的一个低级阶段（作为接受性阶段），即知觉观察、摆明等阶段，是如何与更高的阶段即谓词判断的自发性阶段区别开来的，我们马上就要来详细地加以研究。
>
> 在较低或较高阶段的自我主动性这种最广义上的判断活动不可与那种被动的信念，即休谟（Hume）和追随他的实证主义假定为意识白板上的材料的信念相混淆。[③]

艾柯（1997）从皮尔斯（年轻时）针对笛卡尔式的直觉和关于内省与直觉的概念所做批判开始，因而是从知识方面（即便在最低认识层次上），通过假设推理得到的这一论点入手的。他探讨了基质的形成，以之作为认知过程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尚未涉及推导推理。如果推导过程随基质出现而被涉及，那么，基质本身和直接对象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区别。直接对象是在对象在其中被思考的那个方面中被再现的对象。[④] 它是“类型”（type），而触发连串解释反应的动态对象则是“符征”（token）。就直接对象是在类型基础上被解释而言，它不再是一种单一的、尚不明确的感觉，就好比基质一样。相反，直接对象属于一类，并且因此已经是普遍中的个别。所以，根据艾柯的看法，[⑤]“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在所有的意义上），皮尔斯并未以一种成功的方式解释出，我们是如何从印象过渡到概念的”。通过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独角兽

---

① 此处译文引自（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7页。——译者注

② 参见 Husserl 1948：63。

③ 此处译文引自（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9～80页。——译者注

④ 参见 Peirce：*CP* 8.343，5.286。

⑤ 参见 Eco 1997：47。

这个例子（或谓寓言或喻示），以及关于康德和鸭嘴兽这个例子，艾柯表示出，就直接对象的构成而言，我们是如何通过指涉（类似鸭嘴兽这类的情况，相比于最初被误认为独角兽的朝天犀这类情况，要困难得多）已经知道的东西而前进到明确未知（它从不把自己呈现为全然未知），个中缘由在于某种相似性，位于某种“百科全书”之中。

相似性这个概念给区分基质和直接对象带来了某种困难。实际上，对皮尔斯而言，相似性的特点是某物把自我呈现为第一性、在场、“如其所是”和纯粹品质；同时，由于相似性，直接对象把自我呈现为解释项或某种被解释者的类型、符征。所以艾柯这样推理[①]：

> 基质甚至连像似符都不是，如果像似符是相似性的话。因为它不可能与虚无具有相似性关系，除非是与它自身。在这里，皮尔斯是在两个概念之间摇摆：一方面，如我们所见，基质是一个观念，一种骨架性图示，然而，如果它是这样的话，它就已经是一个直接对象、第三性的完整实现了；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相似，看上去什么都不像。它只告诉我，我所感受到的那种感觉是以某种方式来自动态对象的。

在把握不到位的时候，艾柯甚至持一种反皮尔斯的立场，接着，他宣称，针对“比较是在‘类同’（similitude）关系中给出的”这一论点，我们这里必须让相似性这个概念不受比较的束缚。一旦这种“解放”达成，就能够保留下相似性这个概念——不同于比较和类同——将其用于基质、像似符、第一性（或者看上去是如此）。艾柯出人意料地得出结论[②]：像似符既不能根据类同来解释，也不能“通过说它是相似性”来解释，因此“像似符是奠定所有可能的相似性判断基础的现象，但是不能以这些判断作为基础”。此外，一旦比较—类同和（出人意料的）相似性这两个概念都被从像似符中剔除，艾柯就继续对像似符和精神“意象”做出区别。在皮尔斯（以及普安索）那里，像似符概念是与相似性和比较都相关的，是与类同和精神意象都相关的；如果艾柯教条式地坚持把像似符与所有这些孤立开来，原因就在于，他所指的是呈现在基质面相中的“本初像似”主张（primary iconism）[③]：

> 我不想说，精神意象不应该得到允许（明显的，就考虑到像似符这个

---

① 参见 Eco 1997：84。

② 同上。

③ 同上。

概念而言），或者在某些方面皮尔斯（不明显的）是按照精神意象来考虑像似符的。我想说的是，为了思考本初像似论这个概念，这种在基质面相中确立起来的东西，即使是精神意象这种观念都必须被抛开。

艾柯的优点是表示出了本初像似论问题的重要性。尽管如此，他并不清楚我们怎么通过将其与相似性和意象（精神意象，他补充说）分开这种方式谈论像似符，然而，相似性和类同这两者之间的区分看上去是让人信服的。

在一条注释中[①]，艾柯汇总了自己的看法，把本初像似论与精神意象分开，以适应皮尔斯对心理主义的批判。结果，他相信，“不诉诸事件或精神再现地”解释本初像似论过程，并不违背皮尔斯的宗旨（同上：第394页，注释28）。我们不会在此根据皮尔斯的观点展开对“精神”概念的探讨，这本身已经是除去了心理学内涵的。皮尔斯使用“心灵”（mind）这个术语所表示的是被解释者—解释项关系，并不是指心理学上所理解的主体。在皮尔斯的观念中，心灵并未预设一个我，或者被解释者—解释项关系之外给出的、独立于其之外的一个主体。伴随本初像似性，我们处在被解释者—解释项关系的一个非常低的、结构性的层次上。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把本初像似符与相似性、与（精神）意象、与（并无心理学上意图的）心灵分开。

在《经验与判断》中，胡塞尔分析了“消极的前信息”（passive predata），它们最初是通过从已知的所有合格成分中抽取出来的，与影响我们的东西相熟（消极的前信息通过这些合格成分存在于感觉层面，而且已经以某种方式得到了了解和解释）。[②] 在他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相似性在这一层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如果通过抽象方式，我们摆脱了对产生出感觉的已知对象的参照（第二性、指示性），摆脱了通过习惯和规约而带来的熟悉，其中，影响我们的东西，作为已经给出之物（第三性、规约性、象征性）和某方面已经了解之物，甚至即使它是未知之物（朝天犀或者艾柯的鸭嘴兽），我们最终会陷入全然混沌，用胡塞尔的话说，陷入纯粹的信息混乱。[③] 当颜色并不被看作某物、某表面的颜色，被看作对象表面的光点，诸如此类，而仅仅是被看作品质——换言之，当我们身处皮尔斯所谓的第一性这一层面，在此某物仅仅指涉自身，只在其自身之中有意义——此物仍然通过同质性过程而显示为一个单

① 参见 Eco 1997：394n28。

② 这里，迪利建议说，胡塞尔或许受益于符号学关于外部感觉和内部感觉这一区别（前者是选择性的而非解释性的，后者好比智识，始终是解释性的）。尤可参见 Deely 2001：345－350，以及 Deely 2007 中多处。

③ 参见 Husserl 1948。

位，其中，它与彼物，即与其他信息的异质性，相互对比：譬如白色底子上的红色。相似性在本初像似性层面上，确切地说，就是这种与异质性相对而凸显的同质性："同质性或者相似性"，胡塞尔说，可能通过完全同质性、无差异的平均而在不同程度上达成。与相似性相比，总是多少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相似性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是"联想统一体"（associate union）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模式所产生的结果。胡塞尔按照使得信息、品质能够出现的"本初综合"（primary synthesis）来谈论"直接联想"（immediate association），明确表示"直接联想"是一种通过相似性而来的联想。我们可以说，相似性是使得本初像似论的综合统一成为可能的那种东西。

关于本初联想显然没有任何心理方面的东西。胡塞尔的反心理主义和皮尔斯在这里有所交汇。我们甚至可以说先验的本初联想是符号构成之所以可能的一种条件。在这一语境中，"先验"显然属于精神一类，尽管"心灵"在这里指"元初符号活动"（protosemiosis）［不过现在包括"生理符号活动"（physiosemiosis）在内］情形中的任意被解释者—解释项关系，并不一定指人类心灵。[①]

让"相似性"重回像似符上之后，"意象"这个概念也应该被恢复——考虑到话语语境，"本初像似论"的话语语境，如果我们要补充一个特别说明，那么，这显然是指精神意象。从这一观点看，列维纳斯 1948 年的文章《现实及其阴影》（*La réalité et son ombre*）中，一个名为"相似性与意象"（Resemblance et image）的段落意义尤其重要。[②] 列维纳斯也处理到与对象的最初关系，它如此这般地尚未得到认识或明确。他将之与"象征，或者符号，或者语词"作比，问道："意象因何而不同于象征，或者符号，或者语词？"[③] 他的回答（同上）如下："因为它与其对象相关的方式：因为相似性"；并且，他补充说，这预设了心灵止步"在意象本身之上"，最终是"意象的某种不透明性"。"符号是纯粹透明的，本身无法理解什么。"接下去，列维纳斯写道[④]：

> 它会回到与起源相似、作为独立现实的意象吗？不会，但的确产生了相似，这并不是意象与起源之间的比较所产生的结果（艾柯从本初像似符中排除掉类同与比较，也排除了相似性！），而是产生出意象的新活动。现

① 参见 Prodi 1997。

② 现重印后收入 Levinas 1994。

③ Levinas 1948，重印本参见 Levinas 1994：132。

④ 同上，第 133 页。

实并不仅仅是它所是的那样，它在真实中揭示自身，以及它的双面，它的阴影，它的意象。

这样一种关联像似符来研究相似性和意象的方法，其中，不同于真实和专门的符号，并不涉及三性和概念解释，导致了对本体论的本初性展开批判性质疑。实际上，这种方法揭示了相对于其所是的“其他方面”（otherwise），而这并不渐次的就是“别样存在”（being otherwise），而更多的是处在存在、同一、明确、差异等之外和之前。意象是存在的他性，它的双面，它的阴影。现实并未在其所是中耗尽。① 除了是其自身之外，它还有它本身的不可遏制的他性，它看上去像别种东西，像非其所是的某种东西。现在我们来到了讨论中有关“形而上学”的这个部分——这里的形而上学是列维纳斯所理解的形而上学，也是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1948年的著作《意义与无意义》（*Sens et Non－sens*）中所理解的形而上学。在“现实及其阴影”中，列维纳斯讨论了和存在有关的“多余”（excess），对此，他在1935年用的是“逃逸”（evasion），之后，在1974年他用的是“不同之在”（otherwise than being），讨论如下②：

> 存在并不仅仅是它自身，它会发生逃逸。一个人是其所是那个样子；但她不会遗忘，不会消化，不会与她所是的那些东西和她借以如此的那种方式完全重合，她的姿势，她的各个部分，她的关注，她的思考，她的皮肤，都在她物质的同一性下逃逸，无能为力，就像包容这些的那只口袋穿了孔。这也正是一个人的面孔所表露的那个样子，是她身旁那个与她的存在碰巧重合的她的漫画像，她的肖像。肖像始终是漫画像。熟悉之事、日常之事，完美地被改造成为习惯——然而，保留在她存在背后的那些品质以及肤色、形状、地位，则成为从此对象中退却的灵魂的“衣服”（nippes），成了“死去的自然”（nature morte）。而正是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这个人，这个对象。在这个人身上，在这个对象身上，有一种双重性，她存在中的双重性。她既是其所是，又对自身是陌生的，同时，这二者之间又是存在某种联系的。我们说，对象就是她本身及其表象。而对象与她的表象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似关系。

我们可以说，表象就是没有在直接客体这一身份中被耗尽的动态客体，但

---

① 参见 Cobley 2009 中“唯识论与认识论”（Realism and Epistemology）一条。

② Levinas 1948，参见1994年重印本：第133页。

是，作为基质，即作为本初像似符，它会作为其不可化约的他性而一次又一次地［immer wieder（反反复复地），胡塞尔会这么说］将自身强加于解释项。"如此给予的本原物"，列维纳斯说，"就像存在中一再被推迟的某种东西"。考虑到直接客体在场，这里具有被赋予表现特色的某种"对象不在场的良知"。按照列维纳斯的观点，这代表了"对客体存在的一种改变，其本质形式似乎成了它退却过程中抛弃的衣服"[①]。

但是，且让我们回到本初像似主张这个论题。如胡塞尔所说，我们只能通过抽象方式抵达这个元初层次，而抽象的获得，或者是通过对时代的现象学化约，通过为已经给予的世界和相关解释习惯加上括号，抑或通过艺术的眼光。表象是其对于自身的陌生性、其双重性的他性。艺术确切地指涉该表象，因为它描绘出了存在的这另外一面。它并不代表显示，而是描绘其双重面相。换言之，列维纳斯所谓的"表象"是艺术眼光的图像，表象是被解释对象的他性，艺术的超本地性通过显露这对象的"双重面相"揭示出这一点，因此它不仅是遵从概念的知识对象，而且是图像。正如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在观察塞尚（Cézanne）时所表示过的[②]，绘画就朝向熟悉对象和规约的习惯态度而言是寻找其他的东西。塞尚说，必须具有一种观点，而这观点即意味着一种逻辑的视野。这种逻辑视野是抽象过程的结果，它允许回退到一种与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被描述成本初像似关系。如梅洛－庞蒂在"塞尚的疑惑"中所观察到的那样[③]：

> 我们生活在人类制造的东西之中，在器械、房子、街道、城市之中，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从使用角度来看待这些人类行为，因而无法将其看穿。我们习惯地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必不可少且不可动摇地存在。塞尚的绘画对这些习惯做出了质疑……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人物那么陌生，就像透过另外一个物种的存在所看到的一般……这是一个不为我们所熟悉的世界……
>
> 他的绘画并不排斥科学，也不排斥传统。……他必须做的，是忘记所有的科学，是透过这些科学去捕捉有如正在浮现的有机体的地貌结构……对于这样一幅画而言，只可能有一种情感——陌生感，只可能有一种抒情——存在的不断重生。

---

① 参见 Ibid，134。

② "Le doute de Cezanne"（塞尚的疑惑），见 Merleau－Ponty 1948。

③ 参见 Merleau－Ponty 1948：28－30。

就塞尚的绘画而言，这是一个关于回归知觉关系的问题，在这种关系中，几乎完全是皮尔斯称为第一性范畴那种东西在起主导作用。如梅洛－庞蒂所说[①]，“给人秩序正在生成的印象，某种东西正在显现，正在你的眼皮底下聚集”。而这种聚集是在基于相似性的联想过程基础之上发生的。

列维纳斯所谓的表象也是基于相似性基础之上的，而且，类似皮尔斯的像似符，它并不依赖于它看上去那个样子。用皮尔斯的术语来对列维纳斯进行阐释，我们可以说，与透明的象征符和指示符不同，表象是具有一定不透明性的一个符号。“像似符”，皮尔斯说，“是具有使之有意义那种性质的符号，即使它的对象并不存在，譬如铅笔画出的代表几何线条的痕迹”。(*CP* 2.304)

正因如此，以像似符作为基础的“试推法”(abduction) 能够与已经给定的世界、已经建构完毕的世界、规约以及固化了的习惯保持距离，并作为“构成解释性假说的过程”而在推论层面继续发展。接下去，皮尔斯又补充说，试推法 (*CP* 5.172)：

> 是引出新观点的唯一合乎逻辑的操作，因为归纳法只决定价值，演绎法只演化出纯粹假说的必然结果。
>
> 演绎法证明某物必然是什么，归纳法表面某物事实上在起作用，试推法只表明某物可能是什么。[②]

我们可以在讨论推导操作及其类型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分析。现在，我们将分析细胞核，推导网络的细胞是如何形成的；换言之，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话语形成问题，是作为推论文本细胞的谓词判断问题。

三、谓词判断的生成

为了从我们称之为本初相似主张或元符号活动这个层面来处理谓词判断的形成，我们将遵循按照皮尔斯符号学来思考的胡塞尔所做的那些分析。事实上，正如可能已经非常明了的那样，皮尔斯的符号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之间绝非大相径庭，可能也是符号学取向的，尽管路数不同于皮尔斯［胡塞尔写过一篇题为《符号学》(Semiotik) 的文章，并且在《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 一书中广泛涉及符号及其类型］。

胡塞尔考察了他认为是知觉活动最低层面的东西，这关系到影响、消极的

---

① Merleau-Ponty 1948：25.

② 参见迪利关于经验的“符号螺旋”(semiotic spiral) 的讨论，Deely 2008a：第 15.5 节，尤其是脚注 4。

前信息以及它们的联想结构，并且，他把处在这种最低程度知觉活动的感受性归属给了“我”。这个“我”，如我们前面所说，并不是心理意义上的主体，而是先验的自我。现在，我们必须澄清这个说法的内涵，解释我们何以一旦从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指涉中、从社会习惯中、从客观性认定中抽象出来就能够谈论起这个“我”，涉及他者的何种明确或不明确的证实手段、诉求或者见证人。“我”是一个相对概念，它预设了“你”；相反，在胡塞尔的分析中[①]，与“你”的关系则被置入了括号。

我们称呼“我”的这种抽象，关系到被胡塞尔描述为“属域”（the sphere of belonging）的东西[②]，以及列维纳斯被描述为“内在维度”（dimension of interiority）的东西。如果我们从“为自身的在”或者“为他者的在”（换言之，从意识的在）抽离出来，那么，这个“我”便失去了它对自身的意义（就“我”并不单独存在而是与“你”合并存在这一意义上而言），然而它还是作为一个纯粹从属性的身体、“躯体”（*Leib*）、一个有生命的身体而继续存在。“我”的这种多元性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肉体生命，这使得我们每个人相对于他者都不可化约地成为了他者。就意识而言的个体之间的区别，是以我们每个人的肉身生活中的区别作为基础的。在这一意义上，每个自我在意识到自身之前都是为自身的存在：“为自身”，如列维纳斯所指出的[③]：

> 不得不为自己，最初，为了存在，并不是作为再现，而是为了自己本身。她是为自己的，如同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说法中一般，为自己就是“为了填饱肚皮而无视一切”，敢为了一片面包而杀人。

这个为自身而存在的我，作为从属的实体我，或者胡塞尔所谓“原我”（*Ur-ego*），是与世界直接相关的我，它仅仅在其次的层面、在意识中部分地展露自身。它是社会建构的，只不过，在胡塞尔的说法中[④]，它对于人类环境一无所知，对于现实，甚至对“他者”的真正可能性一无所知；因此，它对于自己的身体可以为他者所了解一无所知，它对于其他主体可能对同一个世界做出思考这个事实一无所知。

如此的考量之下，“独我”（*solus ipse*）是其关于他性的意识业已被去除掉的那个先验的我。这是把世界的人际边界置入括号这种做法所产生的结果。

---

① 参见 Husserl 1948。

② 参见 Husserl 1929，意大利语译本第 150 页。

③ 参见 Levinas 1961：122-123。

④ 参见 Husserl 1950，意大利语译本第 476 页。

"独我"并不是理想的主体或者某种神秘的东西，而是具体主体的一种真实维度，就其作为同一性那种东西而言，它是主体的他性，并不依赖为自身的存在、为自身意识和他者意识的存在这一维度。为自身而存在的我，如列维纳斯所讨论到的，并不是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为自己，它已经是意识了。相反，我们可以把它与萨特在《存在与虚无》（*L' Être et le Néant*）中以"自我"（*Ego*）来表示的那种东西进行比较。[①] 经验构成的"自我"，经验的统合者，从经验是某人自身的经验而言，并不属于意识范畴。对于我的意识并没有耗尽它，意识也没有使之存在："自我"总是把自己表现为某种在那里的东西，在意识之前，同时它又把自己表现为若干有待渐渐揭示的深沉之物的加工者。[②]

我本身并不是为自己的，只是要求意识赋予其个人的存在；然而，这正是意识和个人化过程的基础所在。意识范畴之外的存在是身体直接生命层面上的存在。身体，尤其如梅洛-庞蒂所表明的那样，在为我或为他者的存在之前，在那些最为基础的知觉层面上是为自己而活的。

因此，一旦我们从我和世界这个主体间领域中抽离出来，作为我，剩下的并不是看待、描述、评价、占有和改造现实的一种特定方法，这些都是要求主体间关系才能办到的操作。在前范畴化的直接经验这个层面上，列维纳斯说[③]，"对我而言，存在既不意指什么，也不反对什么，不代表什么，不使用什么，不期待什么，它只是在嬉戏"。和外部的直接关系是享受它，是汲取它来快乐生活。在这一层面，我，某人自身的身体，与所汲取的东西之间没有距离。我是其所汲取的东西。个体性是通过某人自身身体对事物的经验而达成的："人的个性，我的精神"，列维纳斯说，"以及原子和个体的多样性，就是幸福的多样性，是欢愉的多样性。"[④] 欢愉在范畴层面上是身份的前提和限定；就同一性而言，它是异质性——就世界之在而言是不同之在。构成每个我的独特性或单一性，使之不会完全与另一个我相互重合的那种东西，是它的肉身生活。尽管如此，使得每种存在独特的肉身生活本身，同时也是就意识、决定、惯例、契约而言在先前水平上把我与他者联系起来的那种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根据对他者的意识来思考这种抽象层面，"我"之前就不再有什么物质世界。由这个或那个构成的东西，明确又具体，众所周知地有特

---

① 参见 Sartre 1943：150。
② 同上：第 151 页。
③ 参见 Levinas 1961：124。
④ 参见 Levinas 1961：88。

定物理特征、特定价值，以特定方式被使用——好比我习惯性地面对和他者所共有的世界、客观的世界（an *Umwelt*）之时所发生的情况。在欢愉的抽象层面，自我发现自己不离不弃地打着交道的东西（就其由其而生这个意义上）完全是匿名的；无法引领它回到某种东西，也无法在某种东西中使它得到明辨，它是一种纯粹的品质，不是任何基质所决定的东西。这个皮尔斯会称之为第一性的认知域与有意识的解释过程无关，而是由纯粹欢愉、享受所构成的场域，直接经验的场域。"我"直接经验的东西的存在，无需涉及用作被知觉品质主体的对象。同列维纳斯一道（1961：114），我们可以说，它以一种完全非个人的方式存在，好比"*il peut*"（下雨）或者"*il fait chaud*"（天热）这种事实一般。这里，我们经验的世界是各种非人的发生的集合，是无法归结到引起它们的某种东西上的知觉综合，由此而预设了第二性范畴。这是"*il y a*"（存有），列维纳斯说（1961：108），这个其中任何东西都不稳定和明确的存有领域，因为其不明确性和不稳定性，可以比作《克拉底鲁篇》（*Cratylus*）中连一次也无法踏进的那条河。[①] 在"我"与世界彼此尚不分明，事物并非按其个体性而被经验这个层面上来直接感知世界，意味着不可居于某种东西之前，而须"置身看台，身处其间……"[②]。

在此应该提出两点，以尽可能地避免误解。

首先，为了分析的目的以及作为抽象的结果，搁置有关异质性和社会方面以及有关已经建构好的主体——这预设了异质性和社会方面——仅仅意味着搁置关于社会方面和关于异质性的意识。因为，事实上，社会方面和异质性是一直都存在的。在皮尔斯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中就发生了类似的被误解的危险。解释过程的"匿名化"（anonymization）和"非人称化"（depersonalisation）并不意味着否定主体间性；如果说皮尔斯看上去对主体间性同样"敏感"，这倒并不是因为这一事实——来自《解释的限制》（*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作者的下述说法让人瞠目！[③] ——"皮尔斯，如我们所知，会根据你怎么摆弄他而说出任何东西来。"在各位作者——皮尔斯、胡塞尔、列维纳斯、梅洛－庞蒂——的理论场域中，我们所考虑的，内在或属域或身体本身这一维度，是他性关系的状况并不意味着身体就此关系而言是自主地存在着的。与我的意识

---

① 古希腊哲人克拉底鲁歪曲了他的老师赫拉克利特一切皆变的思想，否认事物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把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改造成"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译者注

② Levinas 1961：108。关于列维纳斯在这个方面论述的分析，参看 Ponzio 1995，1996。

③ 参见 Eco 1997：394。

分开来考虑的身体的生活，已经是社会性的构成。我，列维纳斯说①，由于是次世代的，所以并非始于欢愉之中，而是始于和从中所诞生的他者的关系之中，始于和与之共存及生活在这个我之前那些东西的关系之中。从对他者的指涉中抽象出某人自身身体所经验的生活这一维度，这种可能性仅仅意味着这一维度不需要得到他者的承认或者为了存在而与他者进行交流，因为反过来，这一维度是这种承认以及作为我和作为他者这种自我建构的预设前提。

其次，我们可以从归属或内在或“原我”等这一维度进行抽象，唯一的方法是通过从这一层面开始——在这一层面上，自我意识已经存在，他者已经存在，世界作为不仅是我的而且是我们的世界、作为客观世界已经得到明确。如胡塞尔在《笛卡尔的沉思与巴黎演讲》（*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äge*）中所观察到的②，如果被认为是纯粹感性的我以及他者的原有场域被实质上认定为是彼此独立的，那么，它们的交流就会成为难解之谜：两个原有场域相互分别，这个难解之谜就会出现，而事实上，这种分别预设这种陌生性经验已经发挥自己的作用。

如果我们现在要通过符号学性质的研究转回到谓词判断的生成这个问题，首先要说的事情是，符号视角让我们摆脱了语言学的限制，摆脱了后维特根斯坦式“语言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所具有的局限。从这一观点看，符号学作为一种元语言学而出现，因为逻辑在语言法则之中，即与这种或那种文字系统相关的法则之中，是找不到的。作为先验逻辑，符号学必定是一种元语言学。如果，如胡塞尔所宣称的③，语言不仅有其物质的、心理的④，以及历史—文化的根基，而且有其先验的根基（参看 Husserl 1900－1901：162），那么，符号学在寻求谓词判断的来源这一过程中，就必须赋予这些先验根基以核心关注。

这种“先验”（a-priori）并不是由某种天生的普遍语法所给予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就持这种观点。⑤相反，对胡塞尔而言，尤其是在《经验与判断》中，这种先验是超验的，与建构前范畴层次上知觉—肉身领域中所涉及的基本模态有关。

乔姆斯基寻求生成句子表层结构的深层结构，预设了一种天生的普遍语

① 参见 Levinas 1961：151。
② 参见 Husserl 1929：173。
③ 参见 Husserl 1900－1901：162。
④ 在传统的自然主义心理学意义上。
⑤ 参见 Chomsky 1969－1970。

法，而胡塞尔则是在判断形式的认识和构成中来寻找它们。[①] 如果说我们因为乔姆斯基而能分辨“桌子上的书是红色的”这一表层结构以及“书是红色的”+“书在桌子上”这一深层结构，那么，与乔姆斯基的不同在于，胡塞尔并不具有这种来自天生精神机制的区分，他的区分来自从最低层次的知觉或符号活动开始的那些主体和客体之间互动中的原有模态。胡塞尔表明“S p is q”这种命题（the red book is on the table）来自对“S that is p is q”（the book that is red is on the table）这个命题的“模态化”（modification）[乔姆斯基称之为“转换”（transformation）]，后者则来自对于“S is p”和“S is q”这种简单判断的模态化。

这些命题在被解释项—解释项的基础之上是彼此关联的，由于主体对“p”这一说明所具有的兴趣有不同，它们每个都表现了解释中的模态化。从最后一种命题到第一种命题，这种兴趣在符号活动—解释这个过程中逐渐降低。在“S is p”“S is q”、“S is p and q”几种命题中，“S”的主题性兴趣同等地分布在关于“S”的所有说明中：“在循序而进的观察中，一切按照顺序出现的规定性对于主题性的视线来说都同样‘重要’”[②]。另一方面，当知觉兴趣就“S”的不同说明而言并不一致的时候，我们于是得到上面所表现的其他命题。胡塞尔说[③]：

> 兴趣可以立即直奔q的规定性，而只把附带的兴趣放在p身上。在接受性中这就是说：一方面在p身上只投以匆匆一瞥，它只是附带地得到把握；另一方面主要的重心则放在q身上，它被优先纳入视线。……于是在谓词领域内，与此相应，就不会存在有一个“S是p和q”形式的简单循序而进的规定活动，相反，主动地实现出来的综合“S是q”将具有主句的特征，而主动地实现出来的综合“S是p”则将具有从句的特征。[④]

在“S that is p is q”这种表达中，“……这个自我并没有以一种简单的视线指向认同的综合，而是以一种自身分裂成主要视线和附带视线的双重视线指向认同的综合的”[⑤]。在“S p is q”这种表达中，“它失去了自己作为独立句子、作为一个自身封闭的谓词宾词化步骤因而作为一种满足知觉兴趣的统一体

① 关于从此着眼而对乔姆斯基和胡塞尔所进行的比较，参看 Ponzio 1974，第三章。

② 参见 Husserl 1948：271。

③ 同上。

④ 本节中对胡塞尔的德文原文引用，翻译中主要参照（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版，特此致谢并不再注出。——译者注

⑤ 参见 Husserl 1948：271。

的特征，并且作为这个整体，它成了某种只是从属于主词的东西”[1]。在此，我们处在非常高的符号活动水平上：把深层和表层结构分配给无限量的句子领域这种能力，即控制乔姆斯基所谓“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这种能力，通过认知训练并在主题兴趣的层级形成基础上在此得到了发展。在之后的分析中，我们将对“S”和“p”这种综合本身如何在“S is p”这种判断中源起做出思考。

我们必须以之作为开始的抽象，涉及暗指指示符和象征符的知觉符号活动过程，即这些知觉把对象作为刺激我们的东西，作为与知觉的因果和/或延续关系中影响我们的东西，或者涉及以习惯和规约为基础，现在已经自动且被动运转的既定惯常世界。按照胡塞尔的说法[2]，抽象意味着认定只有一个所谓的“解脱场所”（field of reliefs），它无法归结到某个客体上，而且它不属于客观世界这个也为他人而存在的世界。[3] 这个解脱场所本身意义重大，并且，从这一角度看，就符号而论，它的特点是像似性。我们显然谈论的是对某人的解脱，换言之，对解释者的解脱，然而这解释者却并不像作为主体、作为意识的我那样，而是按照上面描述过的模态作为一个知觉的身体，呈现出自身。

在我对解脱场所实施意义生产之前，解脱场所并不就是纯粹一团混乱，信息乱哄哄的，因为它自有其意义，显现出自己以相似为基础得到了像似性的建构。如我们所看到的，相似在同质性和异质性意义上运作，产生出元初的综合，譬如，对白色底色上的红色这种知觉。感觉信息可以通过相似在直接联想的基础上被知觉，因为，如胡塞尔所说[4]，这种发生“都是不同类型联想综合的产物”。没有通过相似的直接联想，就没有“解脱”，没有“突出”。这里所指的是所有像似的、听觉的、视觉的、触觉的、本体感受的符号。论及信息从背景中凸显，胡塞尔说[5]：

> 这个感性材料将凭自己的强度而从众多刺激物中凸显出来。例如，在感性领域内，一种声音，一种噪声，一种颜色，都或多或少是扰人的，它们存在于知觉场景中，并且从其中凸显出来，它们在还未被把握时就对自我施加了一种较强或较弱的刺激。同样的，一种浮现出来的思想也可能是扰人的，或者说，一种愿望、一种渴求也能够从背景中对我们作讨厌的侵

① 参见 Husserl 1948：274。
② 参见 Husserl 1948：75。
③ 参见 Husserl 1948：75。
④ 参见 Husserl 1948：80。
⑤ 同上。

扰。这种强迫接受是以或多或少带有刺激性的凸显为条件的，在感性领域内则是以对比、以带有明显距离的质的不连续性等为条件的。当然，在非感性的被给予性领域内，还谈不上这样一些质的不连续性，但在这里毕竟也有某种类似的情况：在激动着我们的各种模糊的思想冲动之中，好比有一种思想在一切别的思想前面凸显出来，它由于仿佛在对自我施加压力而对自我具有了某种情感上的影响。

这种凸显的东西可能被不正确地称为"客体"，正如我们不正确地谈到"我"。即使胡塞尔对此引文进行了注释说明，我们仍然无法恰当地在这个"元初被动性"层面上谈论客体。所以，在外面使用"客体"和"我"这种字眼的时候，必须把这个说明考虑在内。刺激越强，我转向客体的倾向就越强。我的这种转变可以被描述成听命于受客体所吸引，或者更恰当的，受刺激所吸引这种存在倾向。从这里开始了如何积极把握知觉场中凸显的客体这样一种积极的知觉。

从我的注意力转向开始，从它被客体所"唤醒"开始，开始了注意力和兴趣过程，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因为听命于使客体可以从不同方向抵达这种倾向，我对客体的前理解一直不断地推进。胡塞尔把对这种倾向的解说描述成"我的多重行动"。[①] 我总是试图获取新的景致（从元初景象开始），以使得客体从各个方面自我展现。胡塞尔把我所致力产生的这些新的景致称为"印象"(images)。"印象"在这里表示的是我们说"对某物做图示"这句话所表示的意思，不一定就是要看到它。我们可以谈及改变触觉的、听觉的、嗅觉的、本体感受的印象。我们可以说，我打算建构像似符，这些像似符在不断地、单方面地致力于产生出关于客体的像似符。在此，客体、动态客体，根据自身情形，将自身表现在随着我的动觉（眨眼、摇头、变换体姿、转身等）而来的一个接一个的景致中，一心要让客体从所有可能的方面展示出自身。这里，我们得到一种关于我的积极性和被动性、接收性和创造性关系[②]：

印象的出现处于"我的权力范围中"；我也能让这个印象系列中止，例如我能够闭上眼睛。但处于我的权力之外的是，当我让动觉停止时，就会有另一个印象出现；在这个印象面前我只是单纯接受性的：如果我把如此这般的动觉面对客体发动起来，就会有如此这般的一些印象出现。这对

① 参见 Husserl 1948：87。

② 参见 Husserl 1948：89－90。

于静止和运动、变化和不变是同样有效的。

我与对象之间关系的符用特色比较有趣。我的"注意力转向"的特点可以说是"我行动",以理解客体对目的的行动——换言之,动觉——特点也是"我行动"。胡塞尔对这两者进行了区别①:(1)行动并非"我的行动"(doing of the I),而是注意力转向之前的行动,核心在于注意力是分散的,尚未得到聚集;(2)"我行动"(I do)不包括自觉行为:我在把注意力转向客体时不自觉地眨眼等等。

通过把注意力转向变成了主题的对象,我让"转向"倾向自由发挥,此时谓词判断开始形成。为了能够谈论确切意义上的主题,兴趣必须有自己的相对持久性,对客体的理解必须有其自身的发展。当我们注意力转向某物,却不过是浮光掠影地转向,就像转向一个噪声,而我们的兴趣却集中在别处,然后我们直接地重新转向兴趣对象,我们就无法在确切意义上谈论主题。所以,我们必须区别具有时间持久性并构成主题的我的转向行为,以及与之不同,短暂性的、浮光掠影式的行为。考虑到这一点,胡塞尔谈到了"我的兴趣行为"②。对于要发展到形成"S is p"这种谓词判断地步的某物的存在而言,必须区别与周围存在、环境界有关的"我的兴趣行为",以及转向作为其主题的某物的存在那些行为。

我做出展露这种倾向并不是没有目的的盲目倾向,而是根据期待而来的一种推进方式。对客体的兴趣与这些期待是不可分割的。从一个知觉阶段到另一个知觉阶段,从一个印象到另一个印象,期待可以得到满足或者受到欺骗。客体的景致由于离开知觉场域而可能被阻断,原因或许是它撤出知觉场域中,或者它被撤出知觉场域,又或许是因为另外一个客体插入,吸引了我的注意。另一方面,期待受到欺骗,也可能是客体的后续印象否定了我对其所形成的整体印象这一意义上的。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出一种"非如此而似彼"(not like this but otherwise)的格局:整体印象之前划分中的各个不同阶段被取消,由一个新的印象所取代。这就是胡塞尔在"否定的元初现象"(original phenomenon of negation)或"其他现象"(otherwise phenomenon)中所描述的东西。相应的,胡塞尔宣称③:

否定并不是谓词判断才有的事情,而是在其原始形态中就已经出现在

① 参见 Husserl 1948:91。
② 参见 Husserl 1948:92。
③ 参见 Husserl 1948:97。

接受性经验的前谓词领域里了。

我的种种期待在其知觉的推进中并不总是受到纯粹的欺骗。期待意图即使在怀疑方式中也可能陷入危机，因为所期待的东西并不是完全地被新的知觉所取消。通过这种方式，关于两个交叠的知觉的模态被创造出来，其中，一个并不削弱另外一个，而是两个都有效，但是方式并不和谐。正如在否定中那样，这里，在倾向性的知觉兴趣发展路径中也存在着阻碍，对此，否定在“非如此而似彼”形式中加以解决和克服，而怀疑则维系了更长或更短的时间。当两种知觉之一[①]更有可能被相信、更可信，那么，产生的就是可能状况，便不再有怀疑。

谓词判断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通路，在于这一事实：当我的兴趣从S移向p，这种迁移并不抛弃S，相反的，却由于对S的进一步理解而变得可能。凭借这一通路，我们离开了主导接收性这个领域，而进入我有一席之地的领域。我继续对S感兴趣，同时，正因为这一点，它由于它是S的说明而转向被主题化了的p。在从S导向其说明部分p、q等的单一行为中，S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得到了进一步的理解[②]：

> 这个过程是一种展开着的观察，一种被分解了的观察的统一。由于这整个过程，S便保持了主题的特征。

这意味着，一方面是S，另一方面是p和q等，被分布在两个不同的维度上：S接受“基底物”（substratum）的意义，p和q被解释成这个基底物的片语、特性、说明，或者解释成对S的展现的说明。随着作为前者的“说明”的“某物”的“基底物”，我们发现我们自身，胡塞尔说[③]，“处在所谓逻辑范畴的第一个的源头”。

这里，我们得到的是“解释性耦合”（explicative coincidence），它必须与“辨识性耦合”（identificative coincidence）区分开来。后者在于相信被知觉的客体总是同一个客体S，它始终是同一个基底物。解释性耦合，则在于相信所有p、q之类说明是使得S由之而得到解释的说明，是S自身的特殊之处。这两种知觉综合，解释性耦合和辨识性耦合，是“S is p”这种判断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

---

① 胡塞尔所举的例子是（1948：99—100）：我在窗口中看到的是一个真人还是一个人形服装模特？

② 参见 Husserl 1948：126。

③ 参见 Husserl 1948：126。

构成谓词判断的符号活动现象学中，两个特别有趣的要点应该在此得到考虑。

首先，在构成客体的我通过其说明做出的解释操作中，我们必须考虑我放置了某种“仿佛”（as-if）的东西在其中的那些操作。我们指的是虚构的“仿佛”定向。① 由于谓词判断是以西比奥克称呼语言的模塑能力作为基础——并且，就人类来说（而不是其他动物物种），语言能够生产出无数可能的世界——它逃脱了真实世界的限制，平等地在各个虚构世界中悠游漫荡。尽管如此，“仿佛”关系不只是与建构想象客体和世界的可能性有关。谓词判断并不能避免利用比喻手段，以至于难以（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分辨字面的和比喻。② 如维尔比1903年所说，即便“字面”（literal）这个用词，也是一个比喻，它使得我们能够像书写一样谈论文字表达。“仿佛”关系使得某种东西能够在某种其他东西的基础上得以明确，而这个某种其他东西在“仿佛”形式中可以恰到好处地用作它的解释项。因此，“仿佛”是谓词活动（predication）的构成要件。

其次，有兴趣地转向客体，在我这一方，如前文已经说明，是一个行动，类似于随即而来的认知过程。谓词活动是一个行动，而且，从这一观点来看，它与实践行为平行。胡塞尔对认知行为和实践行为做了如下区别③：

> 我们在这个词那里首先想到的是一种外在的举动，一种把外在对象（物）作为自身被给予的对象从其他自身被给予的对象中制造出来的活动。在认识行动中虽然这些新的对象性也被预先建构起来了，但这种产生却与从物中产生物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并且——在此尤其重要的是——这种范畴对象性的产生在认识行动中并不是这一行动的最终目的。所有这些认识活动——尽管它只能随着认识的进步经过漫长的历程而在那些已被产生的对象、那些逻辑构成物的范围内，只能在清晰性的明证性中进行活动——最终都是与判断基底相关的；它的目的并不是产生对象，而是产生对一个自身被给予的对象的知识，因而是把这个对象作为一个可以持续不断地认同的东西而据为己有。

实践行动与认知行动之间这种平行，对于不把谓词判断与和知觉、和某人

---

① 参见 Husserl 1948：195-199。

② 可以比较迪利关于“字面的东西、比喻的东西以及符号学的代价”（The literal，the metaphorical，and the price of semiotics）所得出的结论，参见 Deely 2006。

③ 参见 Husserl 1948：235。

自己的身体、和周围环境相关的各种操作相互分割开来，是尤其重要的，因为谓词判断正是从此而开始形成的。从这一观点看，认知倾向能够被描述成（这也是一种“仿佛”式的说明）仿佛欲求倾向一般，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关系超出单纯的“类似”（analogy），胡塞尔说，实际上可以用“异体同形”（homology）来描述。和认知倾向相似[①]：

欲求性的努力导致一种以“命令”来启动的实在化行动，而在这种行动的前进中它才日益实现出来，由最初单纯的目的而变成达到目的。通向目的的道路可能是简单的，它就存在于某个简单的行动中，或者，它也可能是复合的，可能会经过一些中间目的，这些中间目的倾向于一个特别的意志行为，并且与统治性“意图”相反，它们具有服务性意图的特征。伴随着在这个行动过程中目的的日益满足和对这个目的的逼近，就引出了日益增长的满意感，而且有必要区分出对满意的趋向的满足和对意志遵循了目的的满足。

我们关于从身体的经验和它的动觉开始的谓词判断生成的思考，用作乔姆斯基生成语法所规定的有关对语段的结构描述的基础，也可行得通。换言之，乔姆斯基所认定的东西（辨明给定句子中的名词语段、动词语段和形容词语段），可以通过在非范畴性的符号活动过程层面上分析知觉而得到解释，如同发生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的那样——而且这种解释要优于根据乔姆斯基的天生性的生成语法所提出的解释。[②]

如胡塞尔所表示的，主语、述语等的句法构成，如果不回到另一种构成——各种形式的核心——就不可能得到解释。核心的形成：[③]

却为句法的定型、为用那些功能形式例如主词形式等等把核心构成物打扮成句法材料提供了前提。作为主词的定型以某种带有名词形式的材料作为前提。

主语预设了名词性这一核心形式，后者同样渐次地预设了知觉过程中基底物的形成。述语预设了形容词性这一核心形式，后者同样渐次地预设了对某物的知觉过程中的辨识，以之作为说明。名词性形式表示了为自身而存在，作为基底物而存在，名词性并不是已经给出的，而是从名词化过程，从创造基底物

---

① 参见 Husserl 1948：236。

② 参见 Ponzio 1974：100－106；参看 Ponzio 1994a：87－128。

③ 参见 Husserl 1948：248。

过程中引申而来的。形容词性形式是存在于某物中的形式，它标示出说明对象具有非名词化这一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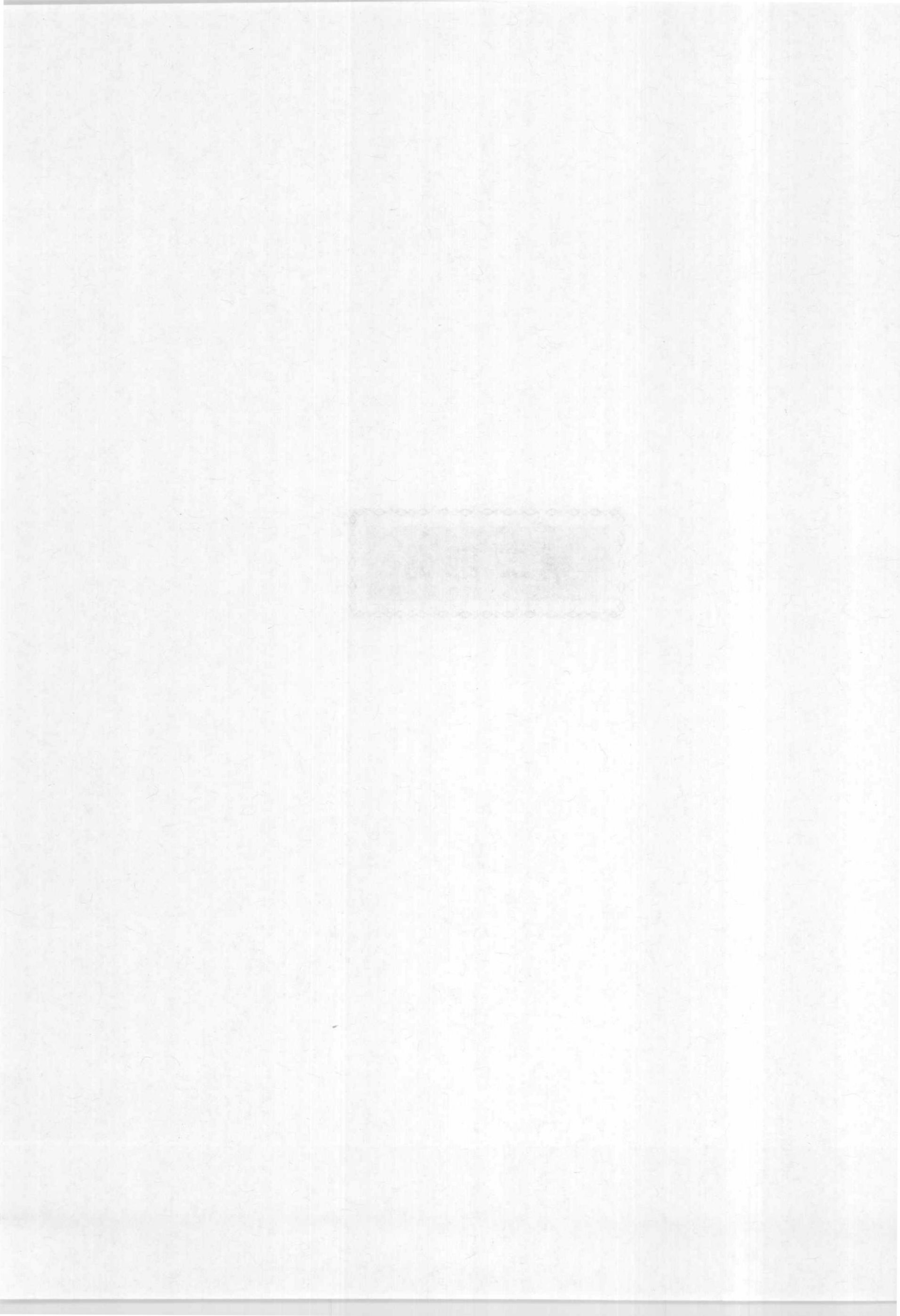
四、作为谓词判断的符号活动[①]

且让我们回到作为兴趣起点的基质这个概念，转向动态客体的符号活动就起源于此。根据上面所述，我们现在或许能够宣布，对尚未明确的基底物的知觉和解释，实际上是历经该基底物与对之做出的一个或几个说明之间的解释性耦合，从基质开始的。一旦它从基底物过渡到说明，并最终过渡到各种进一步的说明，兴趣就在此转向基底物，基底物则在此过程中，作为理解其说明所产生的结果，得到丰富。于是，我们抵达这样一个阶段：基底物明确地被当作说明的基底物，最终，客体—基底物采取了谓词主语的形式。所发生的是，“起点”（*terminus a quo*）[②] 从基质变成主题—主词；谓词活动从基质朝着说明发展，述语成了共同相关的“终点”（*terminus ad quem*）。动态客体是这样的客体：它从作为基质开始，在其不同说明之中——也就是说（为了语言交流的目的），在关于它的不同谓词判断之中——展现自身。

① 也就是说，指的并非其完全意义上的符号活动，而是作为物种特有的、专门性地体现在人类符号活动领域内主要知性表现之一中那种符号活动。

② 这个表达是艾柯引入的（Eco 1997：4），但它也是胡塞尔用以描述我们此刻正在思考的这个过程的表达。

第二部分



20世纪符号研究中意义的意义

当奥登（Ogden）和理查兹（Richards）在1923年出版他们名为《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的这本书的时候，人们可能疑惑，两位作者是否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书将为整个20世纪的符号讨论打下印记，而该话语会带我们进入超越现代性、通往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全球性的后现代阶段。①

一、意义与符号活动

意义问题和“意义的意义”问题与符号活动概念是紧密相关的。符号活动是某物于其中实施符号作用的进程，或者关系，或者情况。符号与符号活动不可分割。事实上，某物要成为一个符号，为了解释前者的意义，另外一物的在场（真实的或者可能的）是必需的。这个第二事物就是一个解释项，它一般（但并不始终）是一个符号，因此在由解释项所构成的开放链条上是与另外一个解释项相互关联的。对此，在今天，用与查尔斯·S.皮尔斯有关的术语来说，尽管他本人实际上从未用过，似乎我们所面对的就是所谓“无限制”

---

① 本文结构如下：
一、意义与符号活动
二、意义与解释项
三、意义与价值
四、意义与符号运用方面
五、意义与指涉对象
六、意义与感觉
七、意义与积极回应的理解
八、符号中的意义与信号中的意义
九、初始意义与附加意义
十、意义与单义
十一、意义与含混

(unlimited) 或"无穷尽"(infinite) 的符号活动。[1]

我们说过,符号与符号活动不可分割,换言之,符号与它以三元方式而相关的关系、过程和情形不可分割。当然,对于符号有着各种不同认识。符号是过程中的一个要素,这个过程或者按照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思路被认为是二元的(能指/所指),或者按照皮尔斯的思路被认为是三元的(再现体/对象/解释项)。符号活动的三元性在拉丁时代的孔布拉派(Conimbricenses,1606/07)中就若隐若现,皮尔斯对他们的著作非常熟悉,而这个学派所熟悉的是约翰·普安索(John Poinsot)这位大学教师,他1632年的著作《论符号》(*Treatise on Signs*)完成了对三元关系的最早主题性展现,他认为三元关系"构成"——皮尔斯也如此表述(1904:*CP* 8.332)——"符号存在模式"。

在我们的术语中,构成符号的基本术语包括对象这一方的"被解释项"(the interpreted)(包括符号和对象之间关系在内)以及"解释项" (the interpretant),它们之间是解释项使被解释项(所指对象)成为可能(作为被解释项)这种关系。一个符号要存在,就必须有一个被解释的符号和一个解释项符号,换言之,使对象用作解释项的被解释项。因此,在皮尔斯的观点中,如同在他之前的晚期拉丁学者所具有的最早的符号意识中那样,允许某物用作符号的最简关系是三元性的。这种不可化约的关系包括:(1)客观的某物(不

① 查尔斯·桑德士·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年生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34年卒于马萨诸塞州米尔佛德),美国科学家、科学史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以及享有国际声望的哲学家,常被称为"现代符号学之父"。他提出了关于符号的一种普遍性理论,将其等同于逻辑和推理理论,尤其是"试推法"(abduction),之后又将其等同于实用主义,或者他更偏爱的叫法:"实效主义"(pragmaticism)。皮尔斯1859年从哈佛毕业,1863年在新成立的哈佛大学劳伦斯科学学院得到科学硕士学位。他在"美国海岸与测地测量"(the U.S. Coast and Geodetic Survey)这个机构担任研究科学家31年,于1891年退休。除了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79—1884)、波士顿的洛威尔研究院(1866)以及哈佛大学(1865、1869—1870、1903、1907)等处短期开设逻辑和科学哲学讲座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只身在学术界之外从事研究。在其有生之年,他的著述难以出版。他发表和没有发表的著述,被选编成《论文集》(*Collected Papers*),第一卷出版于1931年,最后的第八卷出版于1958年。《偶然、爱与逻辑》(*Chance, Love and Logic*)这本论文集由M.R.柯恩(Cohen)编辑,出版于之前的1923年。现在,他的著述按照时间顺序,被编成一个评注版,总名为"查尔斯·S.皮尔斯著述集:纪年编"(*Writings of Charles S. Peirce: A Chronological Edition*)(Indianapolis: Peirce Edition Project),计划多达30卷。第一卷出版于1982年,第六卷出版于2000年,第七卷即将出版。在此期间,譬如在2009年,《论文集》仍然是目前最大规模的皮尔斯文稿汇编。从1994年起,通过约翰·迪利的整理,可以获得它的电子版(Chalottesville, VA: Intelex Corp.)。值得一提的是《皮尔斯核心读本》(*Essential Peirc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2,1998),这是总编辑纳桑·豪塞(Nathan Houser)整理之下出版的一个两卷本,其中,在第二卷中收入的大部分文章都是《论文集》中所没有的。

一定是有形之物），它是先行存在的、自主的，就解释活动而论是“物质性的”[皮尔斯的术语中的“对象”（the Object）]；（2）被解释项，在“有意义”的程度上，即在它被另外一物所代表的程度上，是同一个对象[皮尔斯术语中的“符号”（the Sign），对之他在技术上定义为“再现体”（representamen），因为它在三元关系中起着再现“非自身的另一个”（another than itself）即对象的作用]；（3）对象因之而获得意义的“解释项”。那么，化约到其最简方面，符号呈现了这三个面相。由此，我们所提出的“被解释项—解释项”这个表达，指一种（最简的、抽象的）三元关系，既然被解释项暗示着解释的对象，那么现实中它就该被读作“对象—被解释项—解释项”。

被解释项成了符号构成成分（或者再现体），因为它接受了解释活动，但是解释项渐次地“也”或者“能”成为具有创生一个新符号这种潜质的符号构成成分，所以，直接就有两个符号；同时，既然解释项能够创生一个新符号，于是直接就有三个符号。以此类推，如前所述，如同“无穷尽的符号活动”（infinite semiosis）这个概念，或者无休止地从一个解释项到另一个解释项的延宕链这个概念所描述的那样。

从解释对象，即被解释项着手分析符号，意味着从第二层次入手。[①] 换言之，从对象—被解释项开始，就意味着从延宕链或符号活动链上的某个点开始，这不能被当作符号活动的起点。要解释符号进程的操作活动，被解释的符号不能通过哪怕是理论层面上的抽象化而享有特权。举个例子：皮肤上的斑点就其可能被解释成肝病征兆而言是一个符号；但这已经是解释进程中的第二层次了。在第一层次，回顾起来，皮肤失调是有机体自身所启动的一个解释活动，和扰乱它的变异以及它对之做出的回应有关。皮肤失调自身已经涉及一种解释项回应了（参 Petrilli 1998a：I，1，2001d，2005a：V，12）。

说一个符号首先是一个解释项，意味着该符号首先是一个回应（response）。我们也可能说该符号是一种反应（reaction）：但这是以“反应”被理解成“解释活动”为前提的，也就是像查尔斯·莫里斯所确立的行为主义那样[②]，是与（仅仅在粗糙的第二性中看待物质的）机械式（二元式）方法截然不同的。相比“刺激—反应”（stimulation－reaction），我更喜欢“诱导—

① 这可以从约翰·迪利的公式中看出：“符号就是每个对象所预设的东西”（2004：4）。

② 查尔斯·莫里斯（1901 年生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1979 年卒于佛罗里达州的盖恩斯韦尔）对工程学、生物学、心理学和哲学展开了研究。1922 年取得科学学位之后，1925 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于 1931—1958 年间在此任教。莫里斯继续了查尔斯·S. 皮尔斯某些方面的研究工作，但与皮尔斯不同，他的大部分著述都发表在他的有生之年。

回应”（solicitation－response）这种说法，以便避免产生与它们各自让人想到的种种方式相关的那些表面性联想。甚至刺激，或者更准确地说，诱导，所产生的“直接”回应，也不是那么直接的，因为它要由解释活动来“中介”[①]：除非我们所处理的是“反射行为”（reflex actions），对回应的梳理意味着明确这种诱导，在语境中对其定位，并且把它与既定行为参数相互关联。所以，作为解释项的符号首先是一个回应，因为它，某物（再现体）被认为是一个符号，并且成为它的被解释项，此外，原则上还能够创生出由进一步的符号所构成的终端开放的链条。

二、意义与解释项

作为原创术语的“解释项”，是皮尔斯符号学框架中引入的概念。根据皮尔斯的看法，如我们所看到的，符号活动是一个三元过程，它的构成要素包括符号（或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符号，或再现体，是第一项，它在一种真正的三元关系中与第二项——称之为它的对象——相关，因而能够决定第三项——称之为它的解释项——采取相同于它本身与它的对象相关的同一种三元关系与同一个对象相关”（*CP* 2.274）。所以，符号代表某物，它的对象；对象“并非在所有方面，而是根据某种观念”（*CP* 2.228）“中介性地决定”（*CP* 8.343）符号。不过，符号只有在它决定“中介性地被对象所决定的”解释项这一条件下，才能办到这一点（*CP* 8.343）。“符号在解释项符号和它的对象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是因为第一个在某个方面或者观念、条件之下被它的对象决定，而且“通过把解释项带入与对象的关系之中，对应于他本身与对象的关系这种方式”决定解释项（*CP* 8.332）。

符号的解释项是另外一个符号，是前一个符号在解释者那里所创造的符号。这是“一个对等的符号，或者也许是一个更为发达的符号”（*CP* 2.228）。所以解释项符号不能等同于被解释的符号，它不可能是重复的，原因就在于它是“经过中介的”，解释性的，而且因其如此始终是新的。就前一个符号而言，解释项是一个回应，并且因其如此而开启了一个新的符号进程，一个进一步的符号活动。在这一意义上，它是一个“更为发达的”符号。作为一个符号，解释项决定了另外一个渐次地作为解释项的符号，所以，解释项向着新的符号活

① 参阅普安索 1632 年著作《论符号》（*Treatise on Signs*）的第二篇序：“论关系”（On Relation）。关系不能直接得到调整，只有通过相关各个方面（对象或事物）的变化而间接地（中介地）得到调整。

动敞开，它发展符号进程，它是一个新的符号发生。实际上，每次都存在着一个符号发生，包括"第一符号"在内，存在着一个"第三项"，某种被中介的东西、一个回应、一个解释方面的新东西、一个解释项。由此得出，一个符号在构成方面涉及解释项（Petrilli 1998a：I. 1）。一个解释项（第三项）渐次地是一个符号（第一项），该符号（第一项）渐次地是一个被符号化对象（第二项）的一个解释项（已经是第三项了），这一事实把符号置入一个开放的解释项网络：这就是皮尔斯关于无限符号活动或关于无穷系列的解释项这一原则（参看 *CP* 1.339）。

所以，符号的意义是回应，是要求另外一个回应的解释项，是另外一个解释项等等。这意味着符号和符号活动的对话本质。符号的意义在回应它的另外一个符号之中，而另外一个符号，如果有另外一个符号回应和解释它的话，渐次地又是一个符号，如此类推，以至无穷（Ponzio 2006a）。

在我的术语中，符号活动三元关系中的"第一符号"是呈现非自身的另一个的再现体，是接受意义的对象，渐次地是被解释项［意指项（the Significate）］[①]，赋予意义的是解释项。最后这个可能有两种类型：使符号得到承认的解释项是"辨识解释项"（an interpretant of identification），或称"起辨识作用的解释项"（an identifying interpretant）；相反，符号的特定解释项（对符号的含义或实际意义做出解释）是我们所谓的"做出积极回应的理解的解释项"（the interpretant of answering comprehension），或者更简单地称之为"积极回应解释项"（an answering interpretant）。第二类解释项不只把自身限定在辨识被解释项这个范围，更表达出它的符用性的意义，为它注入了一种关涉和参与关系；它"回应"被解释项，并针对后者持有某种立场（Petrilli and Ponzio 2005：9—10）。

对解释项的这种观念，是与皮尔斯的符号学一致的，是与他的实效主义不可分割的（Petrilli 2004c）。在 1904 年一封致维多利亚·维尔比（Victoria

① （根据 Deely 2004）要点是："所指客体"（object signified）中的限定语"所指"实际上是冗余的，而"意指项"公开道出了"对象"这个标准术语所遮蔽的东西，即只有通过符号活动，才能特别凸显"对象"［包括"作为对象的事物"（things as objects）］与"作为事物的事物"（things as things）之间的分别。

Welby，1837—1912）① 的信中（有关皮尔斯和维尔比之间的通信，可参看

① 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在符号学研究中名头不太响亮，但她对符号和意义理论的贡献卓著。就她对我们理解符号所做贡献的重要性而言，她或许该被看作符号学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参见 Petrilli 1998a，Petrilli and Ponzio 2005，Welby and Petrilli 2008），因此值得我在此做出传记性的注释，以方便更多的著名符号学家。

维尔比属于英国上层贵族。1837 年 4 月 27 日出生，在三个孩子中排行第三，父亲是首任沃恩克里夫勋爵三个儿子中排行第二的查尔斯·詹姆斯·斯图亚特—沃特利（Charles James Stuart—Wortley，1802—1844），母亲是艾美玲·夏洛特·伊丽莎白（Emmeline Charlotte Elizabeth，1806—1855）。艾美玲·斯图亚特—沃特利夫人是一位作家、诗人、旅行家，是第五任茹特兰公爵约翰·亨利·曼内斯与第五任卡尔里瑟伯爵弗雷德里克·霍华德（Frederick Howard）的女儿伊丽莎白·霍华德婚后的第二个女儿。1837 年 6 月 17 日，维多利亚·维尔比在圣詹姆斯教堂由萨里斯伯里主教主持受洗，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公主和肯特女伯爵（女王之母）为教母，约翰·埃尔文先生为教父，她获得教名维多利亚·亚历山德拉·玛利亚·路易莎·斯图亚特—沃特利。此名是根据第一位教母名字得来。这一事件，随着五年之后维多利亚公主变成首任亚历山德拉·维多利亚女王并把签名改成简化的维多利亚女王，意义越发重要。维多利亚·维尔比 1861 年被任命为女王的荣誉侍女，在宫廷中呆了大约两年时间（1861—1863），之后于 1863 年 7 月 4 日在贝尔伏瓦与威廉·艾尔·维尔比爵士（1829—1898）结婚，后者是军官、下院议员、名誉部长，1875 年接替亡父成为第四任从男爵并且得到附加的家族姓氏格里高利。这样，维多利亚·维尔比的姓氏就变成了维尔比—格里高利。19 世纪 80 年代之前，她发表的作品所署为全名"夫人维多利亚·维尔比—格里高利"（Hon. Lady Victoria Welby—Gregory）；从 1890 年至 1893 年，署名为"夫人维尔比"（Honourable Lady Welby）；1893 年之后，署名为"维多利亚·维尔比"（Victoria Welby），尽管在签署官方和商务文件时她还是使用全名。1887 年，她的儿子查尔斯·格里恩·艾尔·维尔比（1865—1938），下院议员、战争部次长助理，与玛利亚·路易莎·海伦娜·赫尔维（1920 年去世）结婚，她的名字于是变成"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Victoria Lady Welby），因为作为荣誉称号的"夫人"被她的儿媳所继承，冠在了后者的教名之前。结婚之后，她的儿子获得在丹顿庄园居住的权利，于是她搬到杜尼维斯。她的另外两个孩子分别是儿子维克多·阿尔伯特·威廉（1864—1876），女儿艾美玲·玛丽·伊丽莎白（小名"妮娜"，1867—1955）。妮娜后来成了画家、雕塑家和作家，为她母亲著有一本传记，编辑出版了两卷她母亲的信函集。婚后头几年中，维多利亚·维尔比付出努力，在 1872 年成立了皇家针织艺术学校。

维尔比对宫廷生活根本不感兴趣，婚后就离开宫廷，去了丈夫的丹顿庄园。在这里，在丈夫的全力支持下，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她有关晚近的现代符号、意义、解释的理论贡献卓著，1896 年引介了"意义学"（significs）这个独创术语，用于描述有关符号、含义（在所有其意指蕴含方面）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独具个人特色的研究方法。她为报纸、杂志和科学刊物大量写稿（著名的有《观察家》《揭示者》《双周评论》《开放庭院》《自然》《思维》《一元论者》《希伯特期刊》《哲学期刊》《心理学与科学方法》等等），还自费印刷种种论文、寓言、格言汇编，以及有关不同主题（科学、数学、人类学、哲学、教育、社会话题等等）的众多小册子。她还出版有六部著作。除了孩提时代写就并出版的一部旅行日记之外（1852），她有一部有关神学和宗教问题思考的著作［《纽带与线索》（*Links and Clues*），1881］，其中有她的信函摘录，有一部祈祷书（1892），有一部寓言、批评反思和格言汇编［《感觉的微粒》（*Grains of Sense*），1897］，之后有两部和意义学相关的专著：《何谓意义？意义学发展研究》（*What is Meaning?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s*）（1983/1903）和《意义学与语言：我们表达和解释资源的清晰形式》（*Significs and Language. The Articulate Form of Our Expressive and Interpretative Resources*）（1985/1911）。其他有关维尔比的有价值信息包括：她女儿所写的一本传记，［《漫游者：艾美玲·斯图亚特—沃特利和她的女儿维多利亚旅行轶事录，1849—1955》（*Wanderers: Episodes From the Travel of Lady Emmeline Stuart—Wortley and Her Daughter Victoria, 1849—1955*）］（Cust 1928），两卷本的维尔比与各种各样的通信人在 1879—1891 以及 1898—1911 年间的信函集，分别名为《丰饶生活的回声》（*Echoes of Larger Life*）（Cust 1929）和《侧面》（*Other Dimensions*）（Cust 1931）。她与查尔斯·S. 皮尔斯之间的通信，以《符号学与意义学》（*Semiotic and Significs*）为名出版成书（Hardwick 1977）。

从 1863 年到她去世的 1912 年，维尔比一直是科学界和文学界众多领袖级人物的朋友和灵感之源。她同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超过 450 位各种人士有着固定的通讯联系——她在她那个时代文化圈中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她把通讯当作与他人保持对话交往的理论化场所。维尔比在 1870 年开始与政治家、教会代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信件往来，在 1880 年之后发展起一个迅速扩展的通讯网络。她把这个网络当作自己观点的公告板，当作传播这些观点的手段。通过她身为维多利亚女王宫廷成员这一崇高社会地位，她在政界和贵族圈中交游广阔。她对宗教和神学问题的兴趣使她与当时教会领袖有着书信往来。后来，她欢迎杰出科学家、哲学家、教育家，组成了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沙龙。维尔比工作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广受称道，但是这项工作却并没有如她所愿地得到公众认可。问题一部分在于，为了保证是工作本身而不是她的社会地位得到关注，她常常匿名发表作品，或者用假名、缩写或者直接使用"维多利亚·维尔比"这个名字。她所重视的唯一荣誉，是"被做事情的人当作一个严肃做事的人"（Hardwick 1977：13）。尽管她不属于哪个机构，却是"亚里斯多德和人类学学会"（the Aristotelian and Anthropological Societies）的成员，"社会学学会"（the Sociological Societies，1903—1904）的最早发起者之一。

随着维尔比研究工作的进展，她逐步推动意义学研究，把自己的多重兴趣纳入意义学视角。1897 年，在发表了她的两篇关键性论文《意义和暗喻》（Meaning and Metaphor，1893）和《含义，意义与解释》（Sense，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1896）之后，《思维》（*Mind*）这份期刊设立了颁发给最佳意义学论文的"维尔比奖"（the Welby Prize）。1898 年，该奖被授予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托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所撰论文《哲学术语学》（Philosophical Terminology）（1899—1900）。以《哲学与心理学词典（三卷本）》（*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in Three Volumes*）（Baldwin 1901—1905）中"翻译"、"意义学"、"官能的"等条目的发表作为代表，表明意义学的重要方面得到了正式认可。不过，她所期待的对意义学的正式认可，则在 1911 年方才到来，经过三十年的努力，终于在《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d*）中有了"意义学"这一条目。荷兰的意义学运动，分成两个发展阶段（1917—1926 和 1937—1956），是经由荷兰精神病学家、诗人、社会改革家弗雷德里克·范·伊登（Frederik van Eeden，1860—1932）介绍，以维尔比的意义学作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维尔比的科学著述现在在两大档案机构可以获得：（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档案馆的"维尔比文汇"（the Welby Collection），伦敦大学图书馆的"维尔比夫人图书馆"（the Lady Welby Library）。后者包括来自她个人图书馆的约 1000 册书籍，以及装有宣传册、再版书、剪报、宗教论文、布道词以及不同作者发表的讲稿等等在内的 25 口箱子。没有编号的 4 口箱子中，装有大部分维尔比发表作品的复制件。她科学和文学创作的主要部分可以在约克档案馆找到，共 42 只箱子。1～21 号箱子装有维尔比未发表的信函，覆盖时间从 1861 年至 1912 年。22～42 号箱子是专题文件（由维尔比本人命名）。它们包括针对生物学、教育学、伦理学、优生学、塑像术、语言与含义、逻辑与含义、物质与运动、数字理论、哲学与含义、意义学（9 个文档）、时间等形形色色专题的注释、摘录和评述，其他作家的发言、讲话、布道词，维尔比本人未曾发表的论文和一本诗集，图表与图片，翻译、校样、出版物、剪报等。维尔比 1912 年 3 月 29 日在丹顿庄园去世，享年 75 岁，葬在格兰森（Petrilli 1998b，Petrilli and Ponzio 2005：Chap. 2）。

Hardwick 1977)，皮尔斯写到，如果我们从一种非常广阔的意义上来看符号，那么，它的解释项就并不一定是一个符号，因为它可能是一个行动或者一种经验，甚至只是一种感觉（参 *CP* 8.332）。实际上，解释项作为一个符号化的回应，使某物有所意味，并因之而渐次地成为一个符号，它就必定是一个符号发生，一个符号活动行为，即使在行动、经验或感觉情况下，它也仍然如此。事实就是：我们在处理的是积极回应的解释项，因此便是在处理符号。

三、意义与价值

查尔斯·莫里斯区分了“意指”（signification）和“意味”（significance），辨识出“意义”（meaning）的两个不同方面：“语义的”（semantic）方面和“价值论的”（axiological）方面（参 Morris 1964）。与之类似，维多利亚·维尔比引入了“意味”，来表示她的意义三元体的第三个方面，其他两个分别是“感觉”和“意义”（参 Welby 1896，1985）。

这个三元体在她的“意义学”中起着核心作用（她在发表于 1896 年的《含义，意义和解释》这篇重要论文中正式引入“意义学”这个原创术语，用以表示自己独具特色的符号和意义研究方法）。维尔比尝试过其他可能的术语，譬如“感知学”（sensifics）、“符因学”（signics）等等，其实在 1894 年左右，才创造出“意义学”这个术语来[①]，觉得它比已经现成的“符号学”（semiotics）、“符涵学”（semasiology）、“符义学”（semantics）等更胜一筹。1911 年牛津词典中的条目“意义学”发表于《历史原则新英语词典》（*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现已可通过网上获取），并且得到了维尔比的首肯，是这样的[②]：

> 意义学（Significs）。1896 年由维尔比夫人引入。基于认识术语和概念确切意味及其对于思想和生活影响所提出的科学和教育方法。
>
> 有 signific（形容词）、significally（副词）、significian（名词）等用法。
>
> 1896 年，维尔比夫人在《思维》（1 月号，第 32 页）中写道：利用儿童蕴藏的无穷的兴趣和好奇心，把“意义学”或“感知学”变成有趣的研

---

① 同一年，即 1894 年，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在一本没有发表的笔记中引入了“符号学”（sémiologie）这个术语。参见 Godel 1957：275（又参 Auroux and Delesalle 1990：106）。

② 该词典的第一版以 12 卷本的形式于 1888—1928 年间问世；关于意义学的条目出现在 1911 年出版的第 9 卷。参见维尔比与安德烈·拉朗德（André Lalande）以及查尔斯·K. 奥登（Charles K. Ogden）的通讯（见加拿大约克大学档案馆的“维尔比文汇”，现收入 Welby ed. Petrilli 2009）。

究应该不是难事。1903 年（同上，第 161 页）她写道：因此，意义学会给我们带来有关意味的哲学，即把我们对于意义的整个认识提升到一个更高且更有效的水准。

同一年，即 1911 年，维尔比的第二部专著《意义学与语言：我们表达和解释资源的言说形式》问世（第一部专著《何谓意义？意义学发展研究》出版于 1903 年）。我们从中发现了下边这个定义，维尔比说，这是一个关于意义学的"权宜性"（provisional）定义［Welby 1985a（1911）：vii－ix］："是对所有形式和关系中的意味性质进行的研究，因而是对它在每个可能的人类兴趣和目的领域中所起作用的研究。"但是，她话锋一转，声称"这种研究甚至在教育中都被完全忽视，这一事实使得难以在目前梳理出让人全然满意的定义。事实上，解释性功能是任何被忽略或者至少处理得相当随意的直接性感受之中唯一的一个。可是，它却自动凸显在前，恰恰是非人类的相互交往的条件，同人类把握他的世界如出一辙。"接下去，维尔比说明，自己的著作目的是要表明"意义学的实践特色，不仅烙印在语言上，而且烙印在人类行动、发明和创造中每一种可能的表达形式上"。

维尔比和詹姆斯 · M. 波尔德温（James M. Baldwin）以及乔治 · F. 司各特（George F. Scout）共同撰稿，为 1902 年出版的波尔德温主编《哲学与心理学词典（三卷本）》梳理出了一个词典定义，并且在 1911 年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二十五卷）撰写了一条百科全书条目（可参 Hardwick 1977：167－175）。与"符义学""符涵学""符号学"不同，"意义学"没有技术方面的联想。[①] 这使得这个术语适宜于标明——根据维尔比的意图——意义和价值在其包括语用的、社会的、伦理的、审美的、经济的、语言学的等等所有方面的联系。1902 年波尔德温的词典条目是这样的：

> 意义学（Significs）：德语 Bedeutungslehre；法语 théorie des significations；意大利语 teorie delle significazioni。1）意义学暗含着与 a）感觉或者符号活动，b）意义或者意图以及 c）意味或者理想价值三者之间的谨慎区别。可以看到，相对而言，a 主要是语词性的（或者感觉性的），b 是意愿性的，c 是道德性的（譬如，我们说某一事件"其意味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在这种情形中，换成"感觉"或者"意义"来表达这类

---

① 譬如，在约翰 · 迪利对西比奥克（1971）称之为"符号学及其同道"（semiotics' and its congeners）的穷究性词源考察中［《为什么是符号学？》（*Why Semiotics*?）］（Deely 2005），"意义学及其同道"就没有被纳入。

事件而不发生任何重要失误是不可能的。意义学处理的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符号与它们各自之间的关系。

2）一种构想的思想训练方法，旨在集中研究被含混地认为构成每种研究形式首要和终极价值的智性活动，即目前被不加区分地称为其意义或感觉、蕴含或意味的那种东西。

同时，意义学提供了一种方式，使我们关注语言相对于其他人类交流模式的落后性，关注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中逻辑、实践以及审美价值的兴趣创造来激发思考的紧迫性。并且，它提供了一个便利的一般性用语，有可能为国际性的认同发挥作用，并且通过赋予语言某种社会和学术方面的“限制”这种威慑，对随心所欲地浪费或者滥用现有语言资源做出自然检核（参见编者前言，第 viii 页）。

意义学以着眼实际的方式，考察隐蔽的含混表达或者模棱两可的断语，而这些方向是形式逻辑这一学科难以提供直接明了帮助的。要说明的是，这门学科根本不是要取消、替代已经得到认可的各门学科，甚至连分散后者的注意力也谈不上，它是要让后者更具效力，因为它让后者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更加明显地和平常经验和兴趣相关。而且，它让传统的更大方面的道德价值以及语言的未来得到了凸显，并且，在为拓展清楚表达界限提供支撑的同时，创造一种语言良知，这必然会对思想产生作用，从而逐步、自然地带来定义方面的自觉认同。

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意义学作为一种科学，会集中、协调、解释、关联，并致力于展露各种形式中的意义，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清晰明了地划分种种符号化特征的运用。

文献参考：A. 斯基维克（Sidgwick），《信念的区分和批判》（Distinction and Criticism of Beliefs）；卡尔·佩尔森（Karl Pearson），《科学的语法》（Grammar of Science）；马赫菲（Mahaffy），《现代通天塔》（Modern Babel），载《十九世纪》（*Nineteenth Cent.*）1896 年 11 月号；格施·尤肯（Gesch Eucken），《哲学术语学》（*d. philos.* Termiologie, 1879），载《一元论者》（*Monist*）1896 年 7 月号；布里尔（Bréal），《论符义学》（Essai de Sématique）；叶斯柏森（Jespersen），《语言进展》（Progress in Language）；F. 托尼斯（Tönnies），“维尔比奖”获奖论文（Welby Prize Essay），载《思维》（*Mind*）1899 年 1 月号和 4 月号；培根（Bacon）、霍布斯（Hobbes）以及后来的惠特利（Whateley）、G. 康涅沃尔·刘易斯（Cornewall Lewis）和 J. S. 米尔（Mill）都对这个

普泛性主题有过探讨。(本词条由维多利亚·维尔比、乔治·F.司各特和詹姆斯·M.波尔德温共同撰写)

“意义学”这个术语关注“它表示什么”这种日常表述,聚焦超越语义意义之外的符号终极价值和意味。很明显,从其所有著述来看,在意义学以及意义理论中,维尔比是要为批判性思考提出一种方法,一种“意义学方法”,这种方法在探索符用学和价值论(符号、价值与行为之间)关系方面能够超越纯粹描述思想和严格的逻辑实证边界,是一种针对使有意义行为变得可能的条件展开研究所用的方法(参看 Petrilli 1988, 1998a, 2007i)。

意义学的核心,是维尔比把意义分析为三个层次:“感觉”(sense)——“对环境的有机回应”;“意义”(meaning)——一个词所“试图传达”的特定感觉;“意味”(significance)——“某事件或经验的深远结果、暗示、最终结果或后果”(参 Hardwick 1977: 169)。根据皮尔斯的看法,感觉、意义和意味三元体和他本人的三元体有着密切关联;实际上,皮尔斯确立了与他本人分析的对应关系(Hardwick 1977: 109—111),他把解释项分别分析为“直接解释项”(Immediate Interpretant)、“动态解释项”(Dynamic Interpretant)以及“最终解释项”(Final Interpretant)。

在维尔比之后,莫里斯也把符号与价值观联系起来,因而把符号学与价值论联系了起来。用他自己的话说(Morris 1964: vii):“……如果我们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能是在就‘生活’这个词的符号活动提出问题,或者就生活的价值或者意味提出问题——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他还说,诸如“意义”这类词的使用(带着其所暗示的极性)如此普遍,这一事实表明在他所谓的不同于意味的意指之间,存在着某种根本性的关联。

但是,回到维尔比及其意义理论,意义学从符号和价值观的相互联系出发,就语用和伦理而言,把人类行为的效果和后果概念化了(这绝不是粗俗化了的,或者按照行为主义或机械论那种化约性理解的)。并且,事实上,意义学正是维尔比对正在发展进入 20 世纪的当时理论和实用主义论争做出的回应(从《纽带与线索》这本书出版的 1881 年左右开始,直到她去世的 1912 年,这种回应一直在发展之中)。在这一框架中,维尔比集中关注与意义、语言、知识、术语学、交流、普泛的意指行为、人际关系以及主体性等有关的种种问题。正如她在 1903 年出版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何谓意义?》中,开宗明义地写道的[Welby 1983 (1903): 6]:

人提出问题,答案就等着他。但首先,他必须学会说话,真正“表

达”自己和世界。为此，他必须学会符号化和信号化。他必须去发现、观察、分析、评估，首先是通过触觉、听觉、视觉所感受那一切的感觉，并且意识到其兴趣；之后是行为的意义—意图—行动的动机，每种后果的原因。如此，最后他将会发现意味，终极特征，核心价值，关键暗示—它们是关于什么的？关于一切经验，一切知识，一切事实，以及一切思考。

稍后，在同一著作中，维尔比把她的思考和东方哲学联系起来，和吠陀哲学的“明表”（Express）、“标指”（Indicated）和“暗表”（Suggested）联系起来，对此她表述如下：

> 必须记住，意义学所意味的，并不只是某人“感受”到感觉、意义和意味之间的细腻差异。这个三元体可以在许多形式中发现，可能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种是来自东方的：“（可能属于某词的）意义被认为有三重，即明表、标指和暗表。明表的意义是通过（该词的）指称传达给理解的；标指（的意义）是通过（该词的）暗表而得以传达的。这就是一个单词所具有的三种力量。”

维尔比用以阐析“意义三个主要层面”或者“表达类别”的其他三元体，还包括如下：

> 和感觉彼此相关的，“倾向”（intention）、“意指”（signification）和“对环境的有机回应”（organic response to an environment）；
>
> 和意义彼此相关的，“意图”（intention）和“意图传达的特定感觉”（the specific sense it is intended to convey）；
>
> 以及和意味彼此相关的，“理想值”（ideal worth）、“本质兴趣”（essential interest）和“理想价值”（ideal value）。

与被理解为三元体中第一个术语的“感觉”相关，指的是“语词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感觉的”），同时也是“本性的”；与被理解为三元体中第二个术语的“意义”相关，指的是“意愿的”；与“意味”相关，指的是“道德的”。也就是说，我们感到不舒服，或者我们看到某种意义上某物为真，我们是想要（即意图）做出某事，而且我们谈的是其意味怎么都不会被高估的某事件。维尔比写道（同上，第46~47页）：

> 人类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夭折，除非我们能够掌握我们大致称为“意义”那种东西的秘密。我们一直以来寻觅的是目的；还是让我们去寻觅意图吧；我们一直以来寻觅的是行动或操作的最终结尾、目标、目的；

还是让我们去寻觅它的感觉，它的意义，以及，最重要的，它的意味吧。

意义学超越纯粹描述思想，在符号学严格的实证论和认知界限之外的伦理、运用甚至审美维度中研究符号和意义，这是符号学与价值论交接的地带。越过专门符义学主张，维尔比所提出的意义学源自这一设想：符号、意义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兴趣和行为的每个可能的方面都具有核心的重要性［关于所有这些方面，参看 Welby 1983（1903），1985a（1911）；笔者为 Welby 2007 所撰的“绪论”（Introduzione），Welby ed. Petrilli 2009；斯密茨（Schmitz）为 Welby 1985a（1911）所撰的“绪论”（Introduction）］。

同时，意义学又是作为接续维尔比关于交流的社会和心理方面专门研究的一个可能的基础和分界点而出现的，这些方面在 20 世纪上半期的荷兰意义学运动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参见 Heijerman and Schmitz 1991）。

四、意义与符号运用方面

莫里斯对皮尔斯最感兴趣的地方，是后者强调行为对于意义的重要性。皮尔斯坚持认为，要决定符号的意义，我们就必须辨明它所产生的行为习惯，莫里斯本人在自己的符号理论中所用力的正是这个方面。根据莫里斯的说法，皮尔斯具有反对笛卡尔心灵主义传统的优点。联系自己的工作，皮尔斯相当多地谈到心灵主义，这种谈及最后被“行为习惯”这个概念所取代。按照莫里斯的看法，这使得符号学朝着一个对符号操作描述更充分的方向发展。

莫里斯对意义的语用观做出发展，使得他的关注焦点不仅落在符号上而且落在价值观上。《生活之路》（*Paths of Life*）1942 年问世，《开放的自我》（*The Open Self*）1948 年问世。两部著作关注人类的偏好行为，描述了不同文化中所运作的“根本选择”。《人类价值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Human Value*）出版于 1956 年，汇集了莫里斯尝试对价值观研究的种种结论。他 1964 年出版的著作，《意指和意味：符号与价值观关系研究》（*Signif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of Signs and Values*），继续了他把价值研究与符号研究相互关联的研究方式，强化了符号学与价值论之间的关联关系。英语中“意义”这个词具有双重含义，不仅指符号的语义方面（符号活动），而且指评价方面（意味）（Morris 1964：vii）：“某物所表示的东西，以及所表示东西的价值或意味。”此外，该著作明确了莫里斯对于符号学所用方法是一种以一切形式和表现中的符号为核心的“跨学科工程”——关系到人类和非人类动物、常规和病理符号、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个人和社会符号。

在《符号理论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中，莫里斯

把符号学分成三个分支：符形学（syntactics）、意义学（semantics）和符用学（pragmatics），分别对应于符号活动的三个维度：符号形构、符号涵义和符号运用。从根本意义上说，这种三分结构是两种主要影响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行为主义的逻辑实证思想，另一方面是米德（Mead）和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参看 Morris 1970）。这可以说明，早在 1938 年，莫里斯就已经意识到，不能把符用学与符号学彼此分开，因而不能把符号活动的运用方面与形构方面及涵义方面彼此分开，是何其重要（关于这几个方面，参看 Petrilli 1991a，2000，2001e，2004a 以及笔者为 Morris 1938，1948，1988，2000 等诸个意大利文译本所撰之绪论）。

符号学三个分支之间的区别是莫里斯的符号理论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方面。然而，尽管他的描述在其他符号学框架之中得到成功运用，他工作的这个方面却通常都被误解了。主要的误解涉及这一事实，意义通常只和符号活动的符号含义方面关联，可是相反，它是呈现在三者之中的。莫里斯宣称符形学处理的是符号之间的关系，这与它关涉意义并不排斥，它也是符号之间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之类似，尽管符用学的关注焦点，如莫里斯所说，是在符号与解释者之间的关系上，它也要与符号并因此而与意义打交道。证明符号活动所有三个方面都有着意义痕迹，并因此而强调意义问题与符号学所有三个分支都有关联，为此而做出显著贡献的学者，是意大利语言哲学家和符号学家费卢齐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1921—1985）（参见罗西－兰迪于 1953 年和 1975 年出版的两部有关莫里斯的专著；又参 Rossi－Landi 1961，1972，1975a，1993a）。

五、意义与指涉对象

莫里斯为符号理论做出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和指涉对象这个问题有关。在符号学近年来的某个阶段，指涉符号学是和非指涉符号学彼此对立的。这场

辩论的起点是查尔斯·K. 奥登（Charles K. Ogden）[1] 和艾沃尔·A. 理查兹（Ivor A. Richards）在《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1923）中所描述的语义三角，它把三个顶点标记为"符号"（symbol）、"思想或指涉"（thought or reference）以及"指涉对象"（referent），这一描述非常知名却又常常引起争论。意义被描述成存在于"符号"和"思想或指涉"的关系之中（这一立场受到包括索绪尔有关所指与能指关系这种符号双分观念在内的影响），以这一事实为基础，所辩论的问题于是成了"指涉对象"是否应该从这个语义三角中去除。非指涉对象符义学的支持者包括斯蒂芬·乌尔曼（Stephen Ullman）和昂贝托·艾柯（Umberto Eco），前者 1962 年出版了著作《符义学：意义科学引论》（*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后者 1975 年出版了著作《一般符号学原理》（*Trattato di semiotica generale*）（英译本出版于 1976 年）。之后，艾柯（1984）认识到了指涉对象对于符号活动而言所具有的关联性，于是利用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所阐发的"回指"（*renvoi*）概念，把它不露

---

① 查尔斯·K. 奥登（1889—1957）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博学学者，尤其以他与艾沃尔·A. 瑞恰慈共同写就的《意义的意义》一书最为人们所知。作为剑桥大学学生，奥登是探讨与哲学、艺术、科学和宗教有关问题的"异教会"（the Heretic Society）的创立者之一。他担任过《剑桥杂志》（*Cambridge Magazine*）编辑，之后又担任《心灵》（*Psyche*）这份一般心理学和语言心理学期刊的编辑（1923—1952）。他所做的工作众多，其中包括创建"直系同源研究所"（the Orthological Institute），发明由 850 个单词构成、供没有英语知识的人使用的国际语言——"基础英语"（Basic English）。

他的研究颇受他与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参见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Part One，II）以及瑞恰慈之间关系的影响。奥登和维尔比之间未发表的通讯（1910—1911 两年间），从研究维尔比的意义学和《意义的意义》中所提出的意义观念这两者之间联系的角度来讲，是很值得关注的（参 Gordon 1990；Petrilli 1995a，1998b：173：218；Caputo *et alii* 1998）。作为年轻的大学学生，奥登强烈拥护意义学，1911 年他为"异教会"写过一篇关于《意义学的发展》（The Progress of Significs）的论文（参见 Ogden 1994b）。

在《意义的意义》中，奥登和瑞恰慈提出了一个符号三元图示，其中，解释活动和意义是通过来自符号、解释项和对象——或者，按照作者用的术语，符号、指涉和指涉对象——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来描述的。在这本书中，查尔斯·S. 皮尔斯对于符号学的重要性得到了承认，在附录中加入了关于他的专门部分。由此，皮尔斯的思想同其他重要角色一起，首次被介绍到英国并在学界推广。维尔比也被提到，但她所做研究的意义却被低估了。

声色地矫正过来（参看 Jakobson 1963，1990）。[①]

相反，如果我们对莫里斯所确立的“指示项”（designatum）和“意义项”（denotatum）的区别进行考察，指涉对象问题以及围绕它的那些误解就能轻易解决。这一区别最初是莫里斯于 1938 年在他的著作《符号理论基础》中提出来的，在他 1946 年的著作《符号、语言与行为》以及之后的著作中，伴随用字上的变动，又被提了出来。不过，他的立场，如在 1938 年著作中所表明的，仍然是最让人信服的（参见 Petrilli 1999a；Petrilli and Ponzio 1998）。

在《符号理论基础》中，他说：“在被指涉的东西作为被指涉的而实际存

---

① 1993 年的西比奥克奖启动仪式上的演讲中，约翰·迪利专门谈论到雅克布森的“回指”概念，在 2001 年就任美国符号协会主席的演讲中又一次提到过（参 Deely 2004：30－31；下面所引来自 2003 年版第 183～185 页）：“‘为什么你不接受雅克布森为定义符号所给出的著名表达呢，*aliquid stat pro aliquo*，以此代彼？’

‘我很高兴你熟悉雅克布森的那篇论文，它是一篇经典，是上个世纪符号学发展中的里程碑之一。’我说，对我同事的博闻欣喜不已。‘我用了十九年时间，才发现这个表达中的一个重大瑕疵，因为该表达中那个彼（*aliquo*）包含着沿笛卡尔思路而来的误解，对象在主观或者心理意义上被化约成了理念。1993 年我对美国符号协会就此发表过演说，表示，或者试图表示，这个经典表达应该被修正为 *aliquid stat pro alio*（以一物代另一物），这样，如普安索在早期阐述过的（1632，*Tractatus de Signis*，Book I，Question 1，116/14－117/17），如我在各种场合详细思考过的（尤其参见 Deely 1986），符号，与对象不同，它从来就不代表自身，始终代表非其自身的其他东西，对此我们不会存有任何疑虑。’

‘但是，既然你提到雅克布森的表达，’我接着说，‘且让我提醒你，他想用该表达来表示的，是符号所特有的或构成上的关系，雅克布森恰当地称之为回指（*renvoi*）的那种关系。’

‘我忘记了回指这个说法了，’我的同事承认，‘但是我不明白它在这里有何用处。’

‘好吧，’我说，‘我回应不及时，也许是我天生是个慢性子吧。从我十九年前于此事实之后最初提出对雅克布森原则的修正，八年过去了，才想起第二个修正很有必要。’

‘第二个修正？’我的同事问。

‘是的。如果你想得起，回指对于雅各布森而言，并不只是符号和所指的关系，如你所说，那种二元关系。回指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之中，所谓符号对某人或某物展现其意味。所以该原则实际上不只需要做出如此修正，以避免符号作为再现他者而同作为自我再现的客体发生混淆这种典型的现代现象学模式，如我在 1993 年西比奥克基金启动仪式上的发言中所表述的那样，它需要得到修正的又一个目的，是要把拉丁人表示对效果有间接指涉的与格（dative）包括在内，一个符号行为正是在这种效果之中取得其特别结果，即皮尔斯所说的特有的意指结果（proper significate outcome）。’

‘你让我脑袋里冒出了两个问题，’我的同事有些激动地说，‘你说符号对某人或某物展现。对（to）和为（for）怎么会相等？某人（somebody）和某物（something）又怎么会相等？但是在你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的同事要求，‘请告诉我你最后是怎么理解这条经典原则的。’

‘所谓一物相对于另一物代表着非自身的又一物（*Aliquid alicuique stance pro alio*），’我建议说，‘尽管非人称动词形式 *stat* 和分词 *stans* 一样有用。只有通过像这样的最后修正，才可能把它最后说清楚，对此，西比奥克的说法（我现在才明白）有不够成熟之嫌，他说，通过回指这个术语，雅各布森“巧妙地捕捉到并定位了符号这条经典原则的每一个符号”；因为如果一种关系不是三元的关系，它就不是符号关系。真正经典的公式应该是：*Aliquid alicuique stance pro alio*，一物相对于另一物代表着非自身的又一物。’”

在之处，指涉对象就是意义项（Morris 1971［1938］：20）。”譬如，如果“独角兽”（Unicorn）这个符号指的是被认为存在于神话世界中的那个对象，那么这个符号就有意义项，因为它的对象在那个世界中是存在的；相反，如果“独角兽”这个符号的指涉对象是存在于动物世界中的，那么它就没有意义项，因为它的对象并不在那个世界中存在。这种情况下，该符号有“指示项”（Morris 1938），或称“表征项”（significatum，参见 Morris 1964），却没有“意义项”。“因此，很清楚，尽管每个符号都有指示项，但并非每个符号都有意义项”（同上引）。

有关指涉对象的误解，实际上是能够在莫里斯对指示项和意义项的区分基础上得到避免的。在奥登与理查兹所提出的三角模式中（1923），指涉对象始终是可以预见的，而且构成三个顶端的一端。与此不同，在其他符义理论之中（譬如 Ullman 1962 和 Eco 1975，1984），基于符号指涉的东西并不总是作为该符号所指涉的而存在这一事实，指涉对象是被全然去除了的。不过，这是没有能够考虑到意义项的缘故。相反，符号总是有着指涉对象，或者用莫里斯的术语来说，总是有着指示项，如果该指涉对象如它被该符号指涉那样而存在，它就还有意义项：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oll）的著作《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the Wonderland*）中的“柴郡猫”（Cheshire cat）既是指示项，又是意义项；“上帝”（God）对于信教者而言，既是指示项，又是意义项；而“上帝不存在”这个说法中，“上帝”是有指涉对象的（否则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但只以指示项形式存在，而不以意义项形式存在（参看 Petrilli 1999a；Ponzio

1990a，1994b)。[①]

---

① 迪利提出了他认为处理符号学中对象不存在这个问题的一种更简明的方式（参见 Deely 2008a，2008b)。他首先区别了对象和事物，前者必定涉及与某个知道者的关系，后者无论其是否被承认都是存在的。那么就有了只涉及三个要素的一种关系：1. 它的基础或根本，支撑它的那个主体性方面；2. 关系本身，作为主观立场之外和之上的某种东西；以及 3. 关系的终端。对于这种情形，迪利提出两个要点。

首先，根本作为根本，终端作为终端，即便它们作为真实事物特征而有形存在（譬如，两个三角形的东西的形状，基于它们的"相似"），都既非根本又非终端，而只是存在的那些事物的主体性的各个方面，是在世界中区分那些事物的那种东西的一个部分。因为如果两个三角形东西的其中一个被毁坏，它们两个就不再相似，剩下那个东西的形状因此是既非根本又非终端，因为相似性关系已经不再。

其次，显然，和知道者相关的对象是既非根本又非关系本身的，而始终是该关系的终端。所以，当心理状态产生出与对象的关系，根据已知位于该关系终端，即便是在位于终端的是对象而不是和作为终端无关的事物这种特定情况下，对象都有着其原则上公开性的（或者超主观性的）存在。

在这两个要点之上，迪利又加上了第三个要点（详细内容参见 Deely 2007)：心理情形和物理情形的不同，在于前者必然地而后者只是偶然地产生出关系。譬如，如果我在路上，要去见某人，而我不知道，约定的见面时间之前一个小时，对方死了，那个人，曾经既是事物又是对象，继续对象性地存在，即便现在不再作为事物而存在；因为意识关系继续作为关系而存在，并且，和每种其他真实存在的形式不同，使符号活动成为可能的关系单一性正是在这种漠然状况中存在的，与仅仅发生在作为事物的事物之间那种物理性因果关系不同，与符号方面所谓的它们的"客观状况"无关。

在迪利的描述中，这三个要点共同支撑起普安索的解释，为何——既然符号是在关系之中确切存在的——符号会超越"内"与"外"、"自然"与"文化"、"依附思维"与"不依附思维"这些差别：因为尽管关系作为关系始终关联着在此中被发现是另外一物的主体，无论这种关联（所以是其对象性的终端）是依附思维还是不依附思维，并不取决于作为关系的关系本身，而是取决于关系存在的环境条件：同一种关系在一种环境条件下是依附思维的，在另一种环境条件下则是不依附思维的，同一个意指项也会如此。在前一种情形中，关系在同时也是事物的对象那里终结，后一种情形中，关系在只是对象的对象那里终结，但在两种情形中，它都是同一个所知的意指项。按照莫里斯的术语来说，前例涉及的既有指示项又有意义项，后例只涉及指示项（Petrilli 2000e)。迪利相信，他的模式的优点在于，它不仅更为简约，而且可以避免困扰后现代讨论的那种"预期理由"（*petitio principii*），即便莫里斯对此孜孜以求。普安索的分析，从一开始就是符号学的，使得迪利可以得出结论："意指项"（significate）开诚布公地说出了"对象"（object）说得含混不清、遮遮掩掩的那种东西，即意指项不加分别地包容了指示项和意义项。正如我们在即将开始的正文下一段的讨论中所看到的，迪利这种议论是和莫里斯对意指项的介绍相契合的，也是和庞齐奥（Ponzio）在 1981 年所做分析相契合的，但和他认为"实有"（which is real）的详细阐述是预期理由并不契合。

来自普安索的这个解决办法，迪利早年指出［1975，"关于非实存"（References to Non－Existent)］，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史上可谓"独树一帜"（*sui generis*）。尤其是，回顾分析哲学家和现象学家在二十世纪初期所采取的立场，包括受到奥登和瑞恰慈 1923 年著作中符号三角表影响的那些人所采取的立场在内，迪利相信，这不仅是唯一完全站在符号学立脚点上来书写的一场讨论（而不是将其置入之前存在的现代性哲学模式），而且是唯一避免就意指对象，就特定符号的意指项而动用"真实性"这种预期理由的一场讨论。譬如，莫里斯说，"当对象存在之时"我们称之为意义项，当它不存在之时更愿意称之为指示项；但是，不仅符号必须是而且总是（参如 Ponzio1981，1990a，1997；Ponzio，Calefato，and Petrilli 1999）有着意指项，而且莫里斯在后期的著述中不做声地把"意义项"与"指示项"等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同一个意指项——同一个——为什么而且何以能在一种情形中是意义项，而在之前或之后却仅仅只是指示项。这当然地深入到自康德之后的整个"认识论"问题的核心，而且已经发出呼吁，符号学需要从自己的框架而不是从现代性哲学框架展开工作，无论时间多么晚。普安索关于被发现是并不存在的对象这种符号分析，在哲学文献中是独树一帜的，一位分析哲学家（Haldane 1996）看到了这一点，却试图（全然地，迪利对我说）对普安索分析的展开不予理会，它不是某些关系的"单边特性"（one-sidedness），而是关系的"独一性"（singularity），是在亚里士多德"实存"（*ens reale*）诸范畴的框架之内和之外找到的唯一存在。

这里我只能对迪利的议论做出注释；为了理解符号活动是越过动物环境界之上的符号行为，如皮尔斯也认为的那样（参 Deely 1989，1990 等），要说的还有很多；但是，在这里对这种探讨展开追寻，会让我们远远偏离我本文的论题，我的讨论主要在于符号学今日发展的 20 世纪背景。

《符号、语言与行为》中保留了这种区分，并且，如所预料的那样，引入了一个术语变体——用“意指项”替代了“指示项”。用莫里斯的话说，即“条件就是如此这般，因而无论满足它们的是什么，都是意义项，它将被称为符号的意指项”[Morris 1971（1946）：94]。符号或者符号载体，如莫里斯所说，可能被说成是表示一个意指项。“表示”（to signify）、“具有意指”（to have signification）和“具有意指项”（to have a significatum），可以被看作同义表达。在他有关使得某物可以作为符号发挥作用的条件描述中，意指项，类似于它所接近的指示项，是和意义项彼此区别的。所有符号都有一个意指项，因此意指，但并非所有符号都有意义。意指项表示的是符号能够具有意义项并因此而有意义的条件。所以，如果条件是符号有意义，那么这个符号就被赋予了意指项和意义项。蜂鸣器（符号）吸引了巴甫洛夫（Pavlov）的狗（解释者）的注意力，蜂鸣器的意指项就是可以得到吃的东西；狗找到的食物，使它能够受符号激发，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解释项）的食物就是意义项。不过，让狗失望的是，后者在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

在《符号理论基础》第二章中，莫里斯使用了指示项而不是意指项。每个符号就其作为符号而言都有指示项，但并非每个符号都有意义项，因为并非每个符号都指涉真正存在的某物：被指涉的东西（指示项，或者随之而来的，意指项）如被指涉那样真实存在的地方，指涉对象就是意义项。换言之，指示项或者意指项就是符号或者符号载体指涉的东西，它们是一系列品质，构成解释者对之做出反应的一类或者一种对象或事件，与被指涉者根据符号赋予它的存在价值、意义项存在的可能条件而实际存在与否这一事实，并无关系。在《意指和意味》中，莫里斯用“意指”替代了“意指项”这个术语，而“意义项”这个术语则被彻底抛弃了。

六、意义与感觉

在“感觉、意义和解释”（Sense，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1896）这篇文章中，维尔比已经排除了有可能替代“意义学”这个术语的其他用词。这些用词包括生造的“感知学”（sensifics）及其对应的动词“感知”（sensify）：通过这些用词，与感觉世界的联系太直接了，就关于意义的一般理论而言有过于简单化的危险。然而，与“语词”（verbal）这个表示语言形式、声音、书写的用词相比，“感觉”（sense）和“官能的”（sensal）这两个用词除了使人想起后者与有机界的关联之外，也会激发这个词的意指价值。

维尔比用到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是“解释”。这个术语作为她的意义三元体

的第三个层次列在了她的论文标题中。不过，“意指”这个术语很快就取代了“解释”，原因在于，所探讨的活动指的是一种涉及意指过程所有三个层面和维度的活动，而不是“解释”这个术语可能让人以为的仅仅是第三层。

在其第一重意义中，“感觉”这个术语对应的是前理性生活的层次，意指的元初层次，是解释者——解释项对于构成其环境的符号所做出的没有任何分别的有机的—准天性的（organic—quasi—instinctive）回应。如此理解下，“感觉”这个概念根本上说是有机主义的，它不仅仅与动物，而且与所有跻身生物界的有生命实体都有关涉的（如同 Sebeok 2001c & d 中所总结的那样）。如上所述，“感觉”是动物能够适应世界的前提条件，因为世界是一个直接经验的世界，一个“经过体察”（perceived）的世界［环境界（an Umwelt）］。可是，鉴于感觉关乎总体上的生命世界而不仅仅是动物界，于是，这种理解下的“感觉”能力（与被理解为意指价值的相对），与“意义”不同，远远谈不上是人类所特有的［Welby 1983（1903）：28；参看 Petrilli 1999b 以及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80—137］：“整个动物‘王国’（即便植物不同样如此）共同分享着感觉世界：尽管在演化过程之中，意义感觉——最高类型的感觉——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分界点：它开启了人类特色的时代。”

所有意指行为，所有经验，从有机的到认知的和价值论的，都以“感觉”层面（就最广义的涵义而言）的解释能力作为预设前提。实际上，既然“感觉”蕴含着符号使用、环境，以及在更高的动物生命形式中的精神状态、指涉等，还指意指操作的符用方面，它即便仅仅是处在前意识层面上。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感觉”这个术语在其所有意指蕴含中（包括意义感觉和意味），构成了经验的价值。在这一宽泛意义上，“在这个词所有的‘意义’上的感觉”（sense in all‘senses’of the word）[①] 被用于指意指操作、符号活动的价值，它们面向地球这一星球上的生命界这一总体方向。所以，就其指涉经验价值而论，感觉也和世界的智性、伦理和审美维度相关联（Welby 1983［1903］：48）：

> 在其所有的意义上，感觉都可以被称为智性、伦理和审美世界的纽带或接点。因为，在所有的意义上，正是在感觉之中并且通过感觉，它们才成为可能。

① sense 这个单词有“感觉”和“意义”等多重含义。这里，维尔比夫人一语双关，巧妙点出“感觉”和“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紧随其后的下文中，“在什么意义上”亦有此番心思。译者在译文中这两处均附加了英文原文，希望在促成明晰表述之外，或稍有提示之功。——译者注

根据这一观点，“在什么意义上”（In what sense）这个问题引出的是，“感觉”这个术语具有一种既宽泛又专门的意义，关系到单一性中的符号对于个体解释者/解释项的适切性。

对人类具有价值的一切，都被赋予宽泛的、总体的感觉中的意义，即不仅是按照意图性来理解的意义，而且是作为超过和超越意图方面的感觉，意指方向“被预见到的东西”，作为产生出“某种更多的东西”（something more）——相对已知道、已给予、已说出的东西而言的一种意指富余——这种能力的意义。这样一种能力是和意指操作的伦理维度相互关联的，因此属于意指行为，它有能力向着他者、批判、包容和责任敞开，对此我们用新造术语“符号伦理学”（semioethics）来表示，这是在与诸如皮尔斯等开创者的对话中对维尔比思路的发展，它还在理念方面与巴赫金（Bakhtin）和列维纳斯（Levinas）展开对话（参看 Ponzio and Petrilli 2003；英文本可参看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 以及 Petrilli 1990[①]），更不必说，与充满原创力的拉丁学者对符号意识的发展在伦理学领域展开对话（Deely 2004a，2005a，2008c）。

七、意义与积极回应的理解

对符号的解释不能被限制在对它的辨识上。解释要求“积极的理解”，即“有所反应的理解”。符号的意义，在表示着价值（意味）这种理解下，存在于某种更多的东西之中，相对让它得到承认的要素而言，这是一种富余出来的东西：意义是那些语义观念方面形成的，它们不可分割地与符号活动的场合语境相互联系，而后者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对符号的理解是“积极的理解”，因为它需要一个回应，一个立足点。它产生于对话关系之中，渐次地又催生出对话关系：符号作为对话中的应答而滋长（参 Bakhtin 1970－71；Ponzio 1998，2004a）。

就语词而言，符号是一个完整言说；它并不脱离于社会语境、意识形态领域，并不脱离于它实际从属的话语类型［巴赫金在“1970—1971 札记”（Form Notes Made in 1970－1971）中所说的“无穷多样的话语类型”］。[②] 言说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社会、历史关系的构成部分，是一个有生命的文本，而不是一件无生气的东西——并非在语言单位和抽象语言之间关系基础上得到解释

① Ponzio and Petrilli 2003 指《符号伦理学》这部著作（Ponzio，Augusto and Susan Petrilli，2003，*Semioetica*，Rome：Meltemi），它是意大利文本，故有其后“英文本可参看”之说。——译者注

② 巴赫金去世之后所出版的未完成文稿，包括“话语类型问题”（The Problem of Speech Genres），英文译本参看 Bakhtin 1986。

的与世隔绝的独语。

如庞齐奥所表示的那样（Ponzio 1990，2006a），在巴赫金式和皮尔斯式符号概念相互联系这一基础之上，有可能构建出一种强有力的符号模式来，它能够解释符号或符号活动的复杂性，远远胜过倾向于把符号化约为两个完美地彼此关联的部分——“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那种模式。这里所谈及的，是以索绪尔思想为母体的符号学（semiology）［指《教程》（*Cours*）中的那个索绪尔，而不是经过学界交错配列的那个索绪尔］，它不仅用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平等交换来思考符号，而且，像巴赫金本人所说的，只是对所有语言的和（以语言学作为模式）所有符号学现象发生于其中的语言生活两极做出了理论梳理：此两极，即整体性系统［语言（*langue*）］，以及单个说话人对该系统的个人运用［言语（*parole*）］。

不过，如皮尔斯（及其之前的普安索）所表示的，符号或再现体在某个方面对于某人代表着某物，它的对象，是因为它在此人头脑中产生出“一个对等的符号，或者可能是更为发达的符号”，即解释项（*CP* 2.228）。所以，且让我们补充说，符号的意义就是包括该符号和它所有可能的解释项在内的（开放性的）一类。符号的意义和对象之间的中介功能，是通过其他符号的中介而渐次达成的。按照皮尔斯的看法，符号根据“第三性”（Thirdness）范畴而存在——换言之，它预设了一种三元关系，把它本身以及解释性的思考（它也是一个符号）等连为一体。就其在解释项符号和它的对象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而言，符号总是起着“第三方”（the third party）的作用。

符号得以滋长，是作为跨出本身之外的结果，与其他符号的关系的结果。我们所说的关系也并不是平等交换的关系。相反，平等交换是以信号为特色的，与符号不同，在这种关系中确立起来的是能指和所指之间一种一对一的对应［在这个方面，巴赫金—沃洛辛诺夫（Voloshinov）所做的分析充满启发性；参看 Voloshinov 1928，1929，1980］。

八、符号中的意义与信号中的意义

更确切地说，信号的意义，根据单纯替代关系，是包括该信号及其解释项的那一类（红色交通灯有一个单一意义，是一个信号，换言之，它的意义就是用红色替代图像或者声音形式、伸出手臂的警察等表示“停止”的那类意义）。

符号无疑也包括一个关于信号性及其彼此关联方、自我身份的因素，但它作为符号的特点不在于此。对符号的理解不只是一个对固定的、可重复的构成要素进行辨识的问题。人类符号的特点在于其语义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灵活性，

这使得它们能够适用于新的、不同的意指语境。哪里有符号存在，信号性和自我身份因素就被符号专有的特点所超越：可变性、多义性、多声部性（Voloshinov 1929；英文译本：69[①]）：

> 在说话人的本族语中，即因为特定语言社群中成员的语言意识，信号的辨识性肯定在方言这个方面被消除了。在掌握一门外语的过程中，信号性和辨识性仍会让人们对其有所体会，这么说吧，仍然有待逾越，语言还没有充分变成语言。掌握一门语言的理想，是通过纯粹的符号性吸收信号性，通过纯粹的理解吸收辨识性。

这是根据符号是自我身份与异质性的一个对话单位这种主张而得来的理解。符号的实际意义，相对于使得其辨识性或身份特征成为可能的要素而言，包含"某种更多的东西"。实际意义是符号某种意义上为其所独有、特有的那些语义—意识形态方面所构成的。此外，它不可分割地和进行之中的符号活动场合语境相关。

巴赫金—沃洛辛诺夫（参 Voloshinov 1929）坚持符号这两个方面的对话性关系，把它们标识为"意义"（meaning，符号中所有可复制而且稳定的东西，受身份辨识操作支配）和"主题"（theme，符号的新方面，它要求积极的理解、回应、立足点，并且与符号活动发生的特定场合相关）。基于对语词符号的特别考虑，同时，考虑到"主题"和"意义"之间的对话关系，巴赫金有如下观察（Voloshinov 1929：100）：

> 甚至传达一个特定单词的意义也是不可能的（譬如，在教另一个人一门外语的过程中），如果不使它成为一个主题要素，即不建构出一个范例言说。另一方面，一个主题必须把自己的基础放在某种意义固定性之上；否则，它就失去了与它之前和之后东西的联系，即它全然丧失了它的意义。

九、初始意义与附加意义

在《意义、交流与日常话语》（*Significato, comunicazione e parlare*，1961，新版 1998）中，罗西—兰迪勾勒了从皮尔斯到莫里斯的思想发展脉络

---

① Voloshinov 1929 指《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这部著作（Voloshinov, Valentin N.，1929，*Marksizm I filosofija jazyca*，Leningrad），它是俄语文本，英文译本指 English trans. L. Matejka and I. R. Titunik，*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973，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译者注

[连同来自牛津分析哲学、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语言哲学以及雨果·丁格勒（Hugo Dingler）的“操作主义”（operationism）等因素一道]，将其置于欧陆的、非唯理论的历史主义这一根基之上。在这本书中，他引入了“日常话语”（common speech）这个概念，后来，他将它发展成了“语言作品”（linguistic work）概念（Rossi-Landi 1968，新版 2007），同时，他还提出了“初始意义”（initial meaning）与“附加意义”（additional meaning）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前者是明确的意义，后者是不明确的意义。

初始意义与附加意义之间的区别，是把意义看作真正交流和解释操作的组成部分并且与之不可分割这种总体认识的一个部分。它不能被化约成乔姆斯基（Chomsky）关于“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和“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这种区别。乔姆斯基把语言与它的交流功能分开，也把它与它的社会的、主体间的、社会的方面分开。相反，罗西—兰迪的“初始意义”涉及经验、实践、价值、与特定环境的熟悉，以及来自从有限的家庭群组到整个文化群组乃至之上的扩展语境的可能的说话人。“附加意义”是在意指实践那种主体间的和对话的特性中被决定的，并且它以知识、朝向他者视角、朝向文化生活各个组成部分作为预设前提。

初始意义与附加意义之间的区别，不同于因使用而得以固定的意义与依据语境的意义之间的区别。不明确、间接、潜含、隐藏、缺失、遥远、次级、无意识的意义，不仅在依据语境的意义中存在，而且在就特定交流场合而言具有自主性的意义中存在。不明确的意义也在因为传统而得以固定的意义中存在。任何情况下，“初始意义”和“附加意义”都活跃于“语言”与“言语”，“意义”与“主题”（巴赫金—沃洛辛诺夫），“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与“最终解释项”（皮尔斯）。

罗西—兰迪在其著述第二阶段所提出的观点是日常话语可以通过经济科学范畴，在符号生产一般理论框架之中，用作品来加以解释（参看 Rossi-Landi 1992b）。

十、意义与单义

在 1896 年的论文《意义与暗喻》（Meaning and Metaphor）中，维尔比批判了“直白意义”（plain meaning）这个概念，强调需要从教育学的和理论的角度来辨识语言的象征特性，需要承认类比和暗喻的——常常是通过无意识的——广泛使用，从而对象征系统与它们所象征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Welby 1893b：511）：

我们可以从更好地了解象征在表现仪式中起什么作用开始，同时自问：语言本身之外除了象征是什么，它象征的是什么。于是，我们应该重新考察“象征”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形象、手法、暗喻与我们所谓字面或实际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与我们所有人都有关。可以这么说，像喻进进出出，在“象征”与“真实”世界之间来回反复。

维尔比对多义和改变意义特性做出了理论化梳理，批判了“直白的、常识的意义”（plain，common－sense meaning）以及“直白而明显的意义”（plain and obvious meaning）这种神话，她将其看作一种谬误（一种妄想）。文本必须从狭隘地按照“去编码化”（decodification）操作来理解的这种解释偏见中解脱出来。维尔比强调了将“我们真正想表示什么”这个问题置于第一位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意在充当一种邀请，邀请我们去明晰意义，去欣赏表达的意味、意义和终极意味。同时，她还批判了化约论和过分简单化的倾向，从而批判了文本可以一读了事并进而变成永远有效的绝对而明确的解释项这种谬误，这一点，正是她对直白意义的批判的要旨所在［参看 Welby 1983b：513；1983（1903）：143；又参看笔者为 Welby 1985b，2007 所撰绪论；另参看 Petrilli 1998b，2006a］。

充满矛盾的是，“清晰”“直白”“令人信服”的话语，在过分简单化和神秘化的控制下，很容易变成含混、悖理的话语。即使“直白的意义”“常识”“寻常”这些表达本身，在打着“简单”和“清晰”的旗号，强迫多义性变成单一意义的一元思想的这种情况之下，也会变成这样——譬如暗喻意义被替换成单义的、固定的、明确的意义（Welby 1839b：510－516）。神秘化常常源自没有意识到解释和意指操作之中某些本质性的却又未得到辨识的方面——譬如，省略式三段论、未说出的东西、说得不明白的东西在话语之中所起的作用（这些作用是可能变化发展的），语词和符号总体上各自有着自己的意指历史，朝向符号的异质性逻辑，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囊括在“符号物质性”（semiotic materiality）这个概念之中（参 Petrilli 1986，1995a：197－207，1998a：38－48，2005a：19－145；以及收入本书的第 9 篇论文）。事实上，理解和表达正是站在未说出的、非明确的意义之上，在被理解的东西之上，在意指和解释操作的异质性维度之上。

维尔比通过批判不变、统一、单一意义概念，批判把单词和用语描述成仿佛它们如同有着一致认可的数字、标签或者象征符号一样这种做法，对意义的动态的、结构的、生成的认识做出了理论梳理。暗喻化和象征化操作既没有体系的界限，也没有类型的界限。相反，它们充斥着整个符号网络，有时可能属

于解释路径，这些路径如此深地扎根在语言之中，以至于它们看上去与“直白意义”已经同化了，尽管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参看 Petrilli 1995a：323－360；2006a）。结果，通过对语言“多声部”和“多义”能力的重估——即便她没有使用这些术语——维尔比终结了与对意义本身的化约性描述相关的那种含混。①

维尔比对定义在某些情形中的有用性以及在某些其他情形中的欠缺做出了辨识，譬如，当问题涉及说明语言含混性时，对异质性的包容能力——这是意指行为发展的前提条件，意味能力，成功交流方面能力。在为语言问题寻求答案的过程中，维尔比提出了意义学：她的意义理论，以及她的“感觉”“意义”“意味”三元体和她对“直白意义”，“实际的”“字面的”或“直接的”意义与“比喻意义”，“间接的”或“映像的”意义所做出的区别。定义只有在充分的意义理论照耀下才是有用的，尽管它从来不是医治有关语言含混、误解的疗药。在科技语言范围内的最终有用之外，定义去除了单词在表达上的可塑性或弹性，它们内在的生命力因而成了对语言问题有所欠缺的回应（参 Welby 1983［1903］：2；Petrilli 1998b：VI. 1，2003）。

十一、意义与含混

在对含混所起作用的思考中，皮尔斯认为，对话人之间的交流从来就不是完全明确或完全含混的，因为变化始终是可能的，而绝对的精确却是不可能的。排开关于不同人的感觉品质可能有一天被生理学家拿来比较而不再代表一

① 1982 年，维尔比匿名在国际实验心理学大会上提供了一本小册子，分发给参会者，小册子名为《心理学中内与外的运用：暗喻是提供了帮助还是设置了障碍？》（*The Use of Inner and Outer in Psychology：Does the Metaphor Help or Hinder?*），得到了热烈讨论。小册子收入了各种心理学和哲学出版物摘录，来支撑自己关于坏的语言运用减弱了观念的清晰与精确并导致伪问题出现这一论点。维尔比分析了这些摘录，对比喻语言的使用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对暗喻和类比的反思尤其深入。她证实了，譬如，错误使用“内/外”“里/表”“里/外”等作为暗喻来指“心理/身体”“主观/客观”“思维/事物”“意识/无意识”这类对立所带来的效果是负面的。在这次大会上，维尔比遇见了詹姆斯·J. 波尔德温，之后两人保持通讯直到 1908 年。这次大会还使她遇见了弗雷德里克·范·伊登，事实证明，这次见面成果显著，因为正是在她的思想影响下，范·伊登毕生致力于荷兰的意义学运动（参 Petrilli 1998b：VII. 2）。1893 年，维尔比出版了《〈思维〉（1876. 1—1892. 7）、〈自然〉（1870，1888—1892）与〈自然科学〉（1892）段落选编》［*A Selection of Passages from "Mind" (January, 1876, to July, 1892), "Nature" (1870, and 1888 to 1892), "Natural Sciences" (1892)*］，在此书中，维尔比继续自己对语言的批判，强调语言对于成功人际交流的重要性。1891 年的著作《见证含混》（*Witnesses to Ambiguity*）同样是一本有关术语批判的专著，1893 年，她在《一元论者》发表了论文《意义与暗喻》（现收入 Welby 1985b），在理论方面对意义问题进行了更精细的反思。之后，她 1896 年的另一篇重要论文《感觉、意义与解释》（现收入 Welby 1985a），分为两个部分发表在《思维》这份刊物上。

种误解来源这种乐观看法，皮尔斯辨识出不同人交流的智识支撑和经验的多样性之中的一个误解原因。交流必定是含混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对字词的解释是建立在与另一个人完全相同的基础上的。”（*CP* 5.506）所以，正如我们抛开总的语境而一心关注细节便看不到一幅画的总体意义一样，我们在忽略意义的“可塑性”（如维尔比所说，总体性的意指语境）的同时，越是想要精确，就越是不可能达到精确，即便这是一个有关智识观念的问题（参看 Petrilli 1998a：95—105）。

皮尔斯所描述的含混是异质性逻辑所瞄准的方向，而且进入了我们所称的“符号物质性”层面。如此，含混性是面对交流的符号质料，构成了交流本身可能性的条件，表述我们想要交流的命题的前提条件。从这一角度看，含混来自于指涉从有机的一本性的生活到智性的生活的不同经验。由此着眼，含混并非误解的缘由；相反，如皮尔斯和维尔比一道告诉我们的那样，是交流可能的条件，而可能则是通过对话方式达成的——无论这对话是内部的（自我限界之内）还是外部的（与其他对话人）。

单一个体经验中的变化，意味着不仅是明确的解释而且是非明确的解释方面的变化。更有趣的是，含混对于理解的可能性而言是结构性的。的确，我们越是想要精确，如维尔比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我们就越不能彼此理解。为了让非明确或非确定的意思得以明确，将其变得可见，意味着开辟新的解释路径，新的意指道路，因而也就意味着引进新的涵义、新的变量，注入新的含混和意指的异质性（参 Petrilli 2003）。在这样一种框架之中，交流是对话人或解释项一种对话性的考察和接近，关系着话语的指涉——无论它是一般性的指涉（真实），还是有限的、直接的指涉。言说、阐析、决定，由此而来的理解，都预设了被理解了、尚未说出却又是暗含着的意义、悬而未决和含混。再一次的，正如维尔比和皮尔斯以及本文提及的其他道路开创者所告诫我们的，所有这些方面都为我们话语意指世界的生成能力做出了贡献。

论意义学

……一种完备的哲学语言，在任何知识并不完备的阶段，譬如现在，都会成为进步的阻碍：我们并不期待我们的语言适合我们知识的任何特定阶段，因为那样，它就不会适应下一个阶段：我们就好比一个身着旧衣服、正在成长中的孩子，被拘束、被限制，充满尴尬，不知道拿自己如何是好［约翰·格洛特(John Grote)，《哲学探索》（*Exploratio Philosphica*），1990，第二部分，第23页，引自 Welby 1983（1903）：59］。

本章最初的想法，是对维多利亚·维尔比和乔治·F. 斯道特（George F. Stout）以及詹姆斯·M. 波尔德温（James M. Baldwin）共同撰写的“意义学”条目进行评述，该条目发表在《哲学心理学词典（三卷本）》(*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in Three Volumes*，1902，现可参见 Petrilli 2009a：195—196）。条目内容如下：

意义学［Significs］：德语 Bedeutungslehre；法语 théorie des significations；意大利语 teorie delle significazioni。1）意义学暗含着与 a）感觉或者符号活动，b）意义或者意图以及，c）意味或者理想价值三者之间的谨慎区别。可以看到，相对而言，a 主要是语词性的（或者感觉性的），b 是意愿性的，c 是道德性的（譬如，我们说某一事件“其意味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在这种情形中，换成“感觉”或者“意义”来表达这类事件而不发生任何重要失误是不可能的。意义学处理的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符号与它们各自之间的关系。

2）一种构想的思想训练方法，旨在集中研究被含混地认为构成每种研究形式首要和终极价值的智性活动，即目前被不加区分地称为其意义或感觉、蕴含或意味那种东西。

同时，意义学提供了一种方式，使我们关注语言相对于其他人类交流模式的落后性，关注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中逻辑、实践以及审美价值的兴趣创造来激发思考的紧迫性。并且，它提供了一个便利的一般性用语，有可能为国际性的认同发挥作用，并且通过赋予语言某种社会和学术方面的

“限制”这种威慑，对随心所欲地浪费或者滥用现有语言资源做出自然检核（参见编者前言，第 viii 页）。

意义学以着眼实际的方式，考察隐蔽的含混表达或者模棱两可的断语，而这些方向是形式逻辑这一学科难以提供直接明了帮助的。要说明的是，这门学科根本不是要取消、替代已经得到认可的各门学科，甚至连分散后者的注意力也谈不上，它是要让后者更具效力，因为它让后者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更加明显地和平常经验和兴趣相关。而且，它让传统的更大方面的道德价值以及语言的未来得到了凸显，并且，在为拓展清楚表达界限提供支撑的同时，创造一种语言良知，这必然会对思想产生作用，从而逐步、自然地带来定义方面的自觉认同。

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意义学作为一种科学，会集中、协调、解释、关联，并致力于展露各种形式中的意义，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清晰明了地划分种种符号化特征的运用。

文献参考：A. 斯基维克（Sidgwick），《信念的区分和批判》(Distinction and Criticism of Beliefs)；卡尔·佩尔森（Karl Pearson），《科学的语法》(Grammar of Science)；马赫菲（Mahaffy），《现代通天塔》(Modern Babel)，载《十九世纪》(*Nineteenth Cent.*) 1896 年 11 月号；格施·尤肯（Gesch Eucken），《哲学术语学》(*d. philos.* Termiologie, 1879)，载《一元论者》(*Monist*) 1896 年 7 月号；布里尔(Bréal)，《论符义学》(Essai de Sématique)；叶斯柏森（Jespersen)，《语言进展》(Progress in Language)；F. 托尼斯（Tönnies)，“维尔比奖”获奖论文（Welby Prize Essay)，载《思维》(*Mind*) 1899 年 1 月号和 4 月号；培根（Bacon)、霍布斯（Hobbes）以及后来的惠特利（Whateley)、G. 康涅沃尔·刘易斯（Cornewall Lewis）和 J. S. 米尔（Mill）都对这个普泛性主题有过探讨。（本词条由维多利亚·维尔比、乔治·F. 斯道特和詹姆斯·M. 波尔德温共同撰写）

“意义学”这个表达是维尔比在 19 世纪末（1894 年左右）创造出来的，用以表示她想为自己关于符号和意义的研究打下的特别印记，表示她所特别感兴趣的意义，不仅是认知意义上的，而且和（感情的、伦理的、审美的、语用的）价值观有关，就像“它代表什么?”这个问题中所标识的那样（Welby 1980)。同一年，费迪南·德·索绪尔引入了术语“符号学”（*sémiologie* 或 *signologie*，Saussure 1916，英文译本：48；又参 Auroux and Delesalle 1990：106)。意义学以文字及非文字语言和行为做参照，围绕意义问题及其条件、变

化和变体（连续的和同时的）展开研究。有心如此，她有意与诸如“符号学”和“符义学”等已经存在的术语拉开距离，认为它们在视野方面太狭隘、太专门化，无法包容她更具广阔性的方法。可能用作替换“意义学”的术语，是她在1893年的论文《意义与暗喻》中用过的“感知学”（sensifics），但她因为它与感觉世界的联系过于密切而将其抛弃；还有“符因学”（signics），可惜这一术语未能抓住意义与价值之间的联系，而这是她研究的焦点。“感知学”和“意义学”共同出现在她1896年的论文《感觉、意义与解释》之中。除了“符号学”和“符义学”，其他这个时候用到的还有“符征学”（sematology）、“符涵学”（semasiology）和“符号学”（semiology），最后也被摒弃，因为就她本人的研究规划而言，它们都太局限、太专门化。“意义学”完全摆脱了技术方面的联想，显得更适于她从所有意指蕴含中的价值观和意义的关系角度聚焦符号和意义。意义学超越纯粹的描述思想，在逻辑—认知限界之外来分析意指操作，以求探索符号活动的伦理、审美和运用维度。在致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费迪南·托尼斯的信中（Schmitz 1985：cxvii-cxli），维尔比解释说，自己要找到一个词来表示符号和意义之间的融合，这样的词是没有的，但自己发现了“意义学”。尽管创造一个新术语要冒着看上去不过是术语革新上的一厢情愿这种危险，她却成功地让查尔斯·S. 皮尔斯以及吉奥瓦涅·瓦伊拉提（Giovanni Vailati）等学者认可了自己选择的有效性。正是因为维尔比，瓦伊拉提发现了皮尔斯，成为第一位不仅理解皮尔斯符号学重要性，而且理解皮尔斯实效主义重要性的意大利人（参见 Petrilli 2009a：第三章和第四章）。符号学的当代思潮超越所谓“符码与信息”（code and message）、“去符码化”（decodification）或“平等交换符号学”（equal exchange semiotics），迈向皮尔斯充满智慧之光的“解释符号学”（interpretation semiotics），而意义学就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对维尔比而言，广义理解中的意义，包括“感觉”“意义”和“意味”，是处在成为开放的意指操作这一过程之中的，有着解释创造性、对话思想、异质性、多声部性和多义性的特色。

当对意指操作进行思考时，一个问题立刻出现，它涉及梳理某人反思的语言：这是维尔比曾做专题讨论并立志解决的问题。她对“意义学”术语的引入——如她在与迈克尔·布里尔（Michel Bréal）和安德烈·拉朗德（André Lalande）的通讯中，在与吉奥瓦涅·瓦伊拉提的通讯中，充分讨论到将它翻译成法语、翻译成意大利语的困难——已经清楚表明术语在哲学—语言学分析的新发展中的阻碍作用。按照维尔比的说法，语言问题与语言具有双重的指向，语言不仅是研究的对象，而且是有关语言的思考得以表述的媒介。维尔比

把所用的语言工具看作因为限制和缺陷而变成了古旧的、修辞性的东西，而她要做的，正是克服那些限制，矫正那些缺陷。她的情况，是以知识的转换与革新为特色的时代里人们的典型做法：她所面对着的是交流新观念这一任务，同时也面对着为此目的而更新和再造所用语言这一要求。

维尔比核心关注的是处在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核心的那些问题，到今天为止，一般来说，它们实际上也是符号科学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成了她意义学研究的专题对象，成了她对总的语言批判探索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关系到她所用的概念工具，即以她本人为例的专题研究所使用到的语言。这些问题包括："复义"的意指价值、"定义"在意义决定方面的作用、"字面意义"与"暗喻意义"之间的关系、使用暗喻和类比来加强语言的表现蕴涵（参看 Petrilli 2009a 以及收入 Schmitz 1990 中那些为纪念维尔比 150 周年诞辰所征集到的论文）。

作为其发展完善术语学计划的一个部分，她创造了"官能的"（sensal）这个术语，表示生物层面的感觉以及整个的意指能力，不同于更单纯地让人想到语言形式、声音、书写等的"语词的"（verbal）。"解释"（interpretation）这个术语在她 1896 年那篇重要论文《感觉、意义与解释》中被引入，表示意指过程的一个特定阶段，但是，要认识到那个解释操作，则涉及意指过程的每个阶段。后来，她用"意味"（significance）取代了"解释"。她还引入了一系列相关术语，譬如以"意义学家"（significian）指从事意义学研究者，用动词"表示"（to signify）和"标示"（to siganlize）分别指符号的最高意指价值、为符号赋义的行为。在同一篇文章中，她在"意思学"（以及其对应的动词形式 to sensify）之外，正式引入了"意义学"这个术语。不过，"意思学"似乎和感觉世界联系太紧密，所以后来被摒弃，而选择了"意义学"。即使是使用那些现成的术语，譬如"感觉""意义"和"意味"，她也是以独有特色来使用，因而它们在她本人的理论话语语境中充满新意。

事实上，这些术语标出了维尔比以她的意义三元体所描述的意指过程的三个不同方面。"感觉""意义"以及"意味"表示和经验、实践、意指行为相关的表达、解释和意指能力发展中不断推进、相互联系的三个阶段。主要在她对之进行过批判性阅读的达尔文主义影响下，维尔比用进化的眼光来看待人类表达、解释和意指能力的发展。她的"感觉"概念在根本意义上是生物性的。"感觉"对应于前理性生活的元初层次，它的价值是它对环境直接的、非意图性的、有机的反应所赋予的。不过，在其所有意义上，"感觉"也用于指经验的整个价值：符号和感觉之间的关系，被比作有机体对环境刺激的反应。就语

言使用而论，生物类型的类比用于强调语言中表达可塑性和更新的潜力，这是与知识和经验方面的进步结伴同行的。维尔比还提出了有关“感觉”的更特别定义，根据该定义，意指价值是使用所赋予的，是环境、心态、指涉以及与之相关的话语世界所赋予的。从这一角度看，符号获取的是与具体交流语境相交融的一种特定意义。

“感觉”一般涉及通过符号而指涉感官所认知的现实，它被看成是一切经验所必须的东西。“意义”涉及理性生活，意指操作的意图性和意愿性方面。如此，与“感觉”类似，符号的“意义”并非一劳永逸地固定而明确，而是从具体意指和操作条件中协商而来。用莫里斯的术语来说，尽管“感觉”总是有“意义项”的，“意义”却可能只有“指示项”，这取决于指涉对象根据话语相关世界的存在模态是否实际存在。“意味”既意味着感觉，又意味着意义，但是它超越二者，涉及某事件或经验的特征、结果和终极价值。“意味”在维尔比后期工作中，也在一个更具一般性的意义上使用，“意义”并不一定包含其中。既然所有符号都有指涉价值，因而必定被赋予意味，就其作为符号而言，每个符号对于使用它的个体都具有意味。下面是有关维尔比所认为的意义三个层面的陈述，引自她1903年的重要专著《何谓意义?》：

> 严格地说，没有单词的意义这种东西，只有它被用于其中的意义——环境、心态、指涉，属于它的“话语世界”。单词的意义是被期望能传递使用者意图的那种蕴义。意味总是多重的，通过表达其重要性、对我们的吁请、对我们的重要，通过表达其情感力量、理想价值、道德方面、全方位的或者至少是社会方面的使用领域，对其感觉和意义加以强化。(Welby 1983 [1903]：5—6)

尽管维尔比在碰见查尔斯·S. 皮尔斯之前就有成型的观点，而且当然从事着独立学术研究，两人的研究却体现出有趣的契合性。皮尔斯把意义学描述成那个关注符号与解释项之间关系的符号学部分，在维尔比的符号意义三分和自己把解释项分作“直接解释项”（immediate interpretant）、“动态解释项”（dynamic interpretant）和“最终解释项”（final interpretant）之间建立起一种对应关系。他的“直接解释项”把符号意义看作是解释项所一般地、习惯地使用的，它关系到解释项对符号的直接回应，正如维尔比在“感觉”这一术语中所表示的那样。“动态解释项”在特定语境中来看待符号的意指，因为它是按照特定意图来加以使用的，这与维尔比的“意义”相呼应。“最终解释项”与处在解释可能的最末端的符号有关，指它在从一个符号到另一个符号这条无

休止的延迟链中所激发出的一切可能的回应。同维尔比的“意味”一样，“最终解释项”也和符号的创造潜能有关（Peirce in Hardwick 1977：109—110）。

意义学在其他人那里，并不被看作一种新的独立科学或理论，而是一种跨学科方法，与所有意指体系都有关的一种批判性元语言。它把对语言和知识的批判与对实践的批判结合起来了。通过意义学，维尔比倡导一种关于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的方法学，它通过异质性逻辑和倾听而得以确立方向，即它是辩证的、对话的，是负责任的、积极回应的，是摆脱了教条主义的。她还把意义学描述成“意味的哲学”“解释的哲学”以及“翻译的哲学”。通过联合各门科学与哲学，意义学成为一种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就探讨手段方面，维尔比对演绎法、归纳法和试推法［abduction，她称之为“预断”（prediction）或“投射”（projection）］进行了理论梳理。她强调意义学方法的超验性，不要把它同形而上学的“超验”混同。在意义学的意义上，超验（transcendence）和所做的工作是为了“去总体性”（detotalization）而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是为了超越（transcend）任何一种实用—认知系统的限制，而人们通常认为该系统是植根身份逻辑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整体性。

从意义学的角度看，“翻译”这个概念是和“解释”紧密相关的，而且，正因如此，它对符号活动是结构性的。不仅是作为“语际的”（interlingual）翻译，维尔比还用“语内的”（intralingual）和“符际的”（intersemiotic）翻译对“翻译”进行了理论梳理，以之作为一种获取知识和经验的方法：既是发现、检测和运用类比（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同义项）的方法，也是辨识不同经验和话语领域之中类比和同类关系的方法。意义学起着诊断作用，是和治疗语言失调的方法彼此关联的。

> 不幸的是，习俗认定，须把术语诊断限制在情感领域。对于“通过其而知晓”而言，可能很难发现一种更好的方法，而意义学方面的训练却能够做到。我们必须受到教育，执着地相信我们就是诊断者，我们会发掘出最大的力量，去发现真正的区别和解读符号，不论多么微弱，符号总能揭示感觉和意义。诊断可以被称为意义学的典型操作。［Welby 1983（1903）：51］。

在维尔比的符号研究核心之处，意义和语言仍然是今天符号科学，包括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在内的论争焦点：文字符号的“复义”和“弹性”所具有的意指价值、“定义”在明确之中的作用、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之间的关系、暗喻和类比的使用、讨论语言表现蕴含中像喻和修辞手段的一般运用、类比和同义

在知识和解释操作发展中的作用、对语言的批判，等等。这些论题和研究领域，都是维尔比在其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意义学语境之中所直面的东西，而且它们本身也服务于改进概念工具的最终目的。同时，尽管她孜孜不倦地追求表达的精确，维尔比并没有过度使用技术性术语。她对唯技术论思想做出批判，抨击了以定义作为手段来消除由消极理解的复义所产生的含混这一做法，与之相反，她高度重视诸如语言多义性能力这类特点。定义在语言中是有所作为的，但一定不能加以神秘化。为此，她辨别了她所谓的“僵化的”（rigid）和“弹性的”（plastic）定义。她特别关注提升日常语言这一需要。“意义学”这个单词本身就是针对“它表示什么”这个日常表达而提出来的，它的目的就是证实符号的终极价值和符义学意义之外的意味。维尔比致力于在逻辑、行为和价值观方面，通过对语言和蹩脚表达的批判性再造来重新创造，她认为，语言的劣质使用暗示着推理牵强、逻辑不严密、论辩无条理。针对于此，她倡导要发展一种“语言良知”（linguistic conscience）。

根据维尔比的看法，意义研究必须打破哲学—历史符义学或形式逻辑学的局限，并且本着伦理—语言的使用方向，把焦点放在符号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上，尤其是放在每个意指行为——文字或非文字的——的“终极价值”“蕴义”和“意味”上。意义学关注的是“人类交往的条件，一如人之主宰其世界的条件”，她在自己1911年的专著《意义学与语言》的前言中如是说。从意义学的观点看，意指问题是理解符号对于我们具有何种真实价值的问题，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身处“人类兴趣和目的的每一可能领域”，从日常经验到不同科学研究领域，关系到文字的和非文字的所有类型的语言，从哲学—科学到日常话语的所有类型的话语。作为她朝着全面理解经验终极价值、文字的和非文字的一切意指操作这一整体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意义学倡导要发展批判、质询和更好地运用语言这种能力。就教育而言，从孩提时代就要鼓励一种批判性质询。意义学提倡的是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它引导说话人/符号学者提出诸如“这是什么意思?”“你用这指什么?”以及“这有着什么意义?”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她的意义三元体所辨明的三个层次——感觉、意义、意味——是彼此一致的。

意义学是庞齐奥（Ponzio）和我称为“符号伦理”（semioethic）框架之中的一种哲学—语言学分析方法。如上所述，就20世纪符号、语言和交流研究的发展而言，意义学和所谓“解释符号学”（interpretation semiotics）相关，却并不把自身局限在认知研究领域；意义学的领域要更为宽广，因为它朝着与价值论的融合敞开，集中关注符号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意义学远远不是把人类

经验道德化或者用道德考量去替换伦理学，也不是要把经验化约为任何形式的服从，因为它关注意指价值，关注将后者转换到具体的符号实践场合，所以它所重视的是文字和非文字的意指操作的伦理—语用或者"符号伦理"维度。

维尔比习惯和别人讨论自己的观点，为此而与全世界无数知识分子建立起非常广泛的通讯联系，其中一些人她还亲自见过面。这些人包括：M. 布里尔、B. 罗素（Russell）、亨利・詹姆斯（H. James）和威廉・詹姆斯（W. James）、H. 柏格森（Bergson）、R. 卡尔纳普（Carnap）、A. 拉朗德、F. 勃洛克（Pollock）、G. F. 斯道特、F. C. S. 席勒（Schiller）、C. K. 奥登（Ogden）、G. 瓦伊拉提、M. 卡尔德诺尼（Calderoni）。C. K. 奥登作为大学学生，在1910—1911年间曾大力推崇维尔比和她的意义学。然而，在他与 I. A. 理查兹（Richards）1923年（维尔比已经过世）合著出版的《意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书中，奥登并未承认他从维尔比那里所汲取的东西（仅仅在一条脚注中有部分提及），即使维尔比的影响在这部重要著作中从头到尾都能够发现痕迹，近年来的研究对这一点已经证实。维尔比的研究大都被忽略，即使她没有全然被遗忘，也是因为她与皮尔斯之间的通讯往来，而不一定是她本人作为意义学的创始人的缘故。她对她那个时代文化界的广泛影响如同过往云烟，并未得到认可。值得铭记的是，维尔比的思想，经由荷兰精神病学家和诗人弗雷德里克・范・伊登（Frederik van Eden）的中介，促成了荷兰意义学运动的发展（参看 Heijerman and Schmitz 1991）。在今天，意义学是许多研究者饶有兴趣的课题，并且正在逐步赢得它应有的关注。这方面，意义重大的推动力量是阿西姆・艾施巴赫（Achim Eschbach）和 H. 沃尔特・斯密茨（Walter Schmitz）所促成的维尔比重要著作的重新出版（见下），这开启了一系列其他重要学术工程。维尔比未发表的手稿，包括信函在内，现在可以在加拿大安大略的约克大学档案馆获取。我本人的专著《意指与理解：阅读维多利亚・维尔比的著作和荷兰的意义学运动》（*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the Signific Movement*, 2009），也收录了维尔比部分发表和未曾发表的文章。

维尔比关于符号与意义的重要著述，包括她的论文《意义与暗喻》["Meaning and Metaphor"，载《一元论者》（*The Monist*）3：4，1893：510—525] 和《感觉、意义与解释》["Sense,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载《思维》（*Mind*）5：17/18，1896：24—37，186—202，现亦可参看 Petrilli 2009a：421—430，430—449]；文集《感觉的微粒》[*Grains of Sense*（London：J. M. Dent，1897），部分选录亦可参看 Petrilli 2009：98－111]、《何谓意义？

意义学发展研究》[*What is Meaning.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s* (London: Macmillan, 1903), 第二版 (by A. Eschbach,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3)]、《意义学与语言：我们表达和解释资源的清晰形式》[*Significs and Language. The Articulate Form of Our Expressive and Interpretative Resources* (London: Macmillan, 1911), 第二版 (by H. W. Schmitz) 为《意义学与语言》(*Significs and Language*, 1985), 书中一并收入的，还包括她上述两篇论文以及几篇未曾发表过的论文]；信函集三卷，收录维尔比与460余位通信人的通信，头两卷为她的女儿妮娜 [Nina, 即亨利·卡斯特夫人 (Mrs Henry Cust)] 所编 (其中部分，亦可参看 Petrilli 2009a), 分别名为《丰饶生活的回声：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早期通讯选录》[*Echoes of Larger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Early Correspondence of Victoria Lady Welb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29] 和《侧面：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后期通讯选录》[*Other Dimensions: A Selection from the Later Correspondence of Victoria Lady Welb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1], 重要的第三卷是 C. 哈德威客 (Hardwick) 所编的《符号学与意义学：查尔斯·S. 皮尔斯与维多利亚·维尔比夫人通讯录》[*Semiotic and Signific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harles S. Peirce and Victoria Lady Welb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除了与 J. M. 波尔德温和 G. F. 斯道特共同撰写了发表在《哲学与心理学 (三卷本)》中的"意义学"条目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in Three Volumes*, vol. 2: 529, ed. J. M. Baldwin, New York/London: Macmillan, 1902), 维尔比还与 G. F. 斯道特撰写了同一卷中的"官能的" ("Sensal", p. 1902) 和"翻译" ("Translation", p. 712) 条目。最重要的是，维尔比在三十余年孜孜不倦的研究之后最终得到了正式认可：她所撰写的"意义学"条目发表在《大英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th. ed., vol. 25: 78—81,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现亦可参看《符号学与意义学》(Hardwick 1977: 167—175)]。(以上诸词条，笔者做了统一收录，参看 Petrilli 2009a: 194—196, 345—350。)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作为1983年和1985年维尔比两部重要著作——《何谓意义?》以及《意义学与语言》——重新出版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三卷本的意大利文本维尔比文集由我本人编订出版。意大利文本包括了她1893—1896年间的重要论文，《感觉的微粒》《何谓意义?》以及《意义学与语言》节选，她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的"意义学"条目，以及其他她本人称

为“随笔”（essaylets）的篇章和其他未曾发表过的短篇论文。所有三卷都由我本人编辑、翻译并撰写绪论，它们是《意义学、意义与解释》（*Significato, metafora, interpretazione*，Bari：Adriatica，1985）、《感觉、意义与意指》（*Senso, significato, significatività*，Bari：Graphis，2007）以及《解释项、理解与交流》（*Come interpretare, comprendere, comunicare*，Rome：Carrocci，2010）。

最近发表的维尔比的研究，包括收录在《意义学论文集》（*Essays on Significs*, ed. H. W. Schmitz，Amsterdam：Benjamins，1990）中不同作者的论文，其中有论文集主编H. W.斯密茨所撰写的《维尔比夫人及其意义学出版著作录》（“Bibliography of Publications on Lady Welby and her Significs”），H. W.斯密茨为《意义学与语言》撰写的长篇绪论。斯密茨还用英语和德语撰写了大量有关意义学的论文，其中包括对维尔比和罗素之间通讯的批判，还与A. F.海耶曼（Heijerman）一道出版了汇编本《意义学、数学和符号学：荷兰的意义学运动》（*Significs, Mathematics and Semiotics. The Significs Movement in the Netherlands*，Münster：Nodus Publikationen，1991）。我本人有关维尔比和意义学的著述包括：意大利文本专著《意义学、符号学和意指》（*Significs, semiotica, significazione*，Bari：Adriatica，1988），英文论文《维尔比、皮尔斯、瓦伊拉提和巴赫金的意指问题》［“The Problem of Signifying in Welby，Peirce，Vailati，Bakhtin”，作为附录收入A. Ponzio的专著《作为符号的人》（*Man as a Sign*，Berlin：Mouton，1990）］，意大利文专著《论维多利亚·维尔比：意义学和语言哲学》（*Su Victoria Welby. Significs e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Naples：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1998），以及上文提及的《意指与理解：阅读维多利亚·维尔比的著作和荷兰的意义学运动》（*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the Significs Movement*，Berlin：De Gruyter Mouton，2009）。最后一部著作包括维尔比发表过和未曾发表过的论文的选录，并且，对于维尔比的著作以及研究维尔比的著述，对于荷兰意义学运动及意义学的当代发展，都有详尽考录，远不止这里所提到的。

欧洲哲学和美国符号学之间的对话性交流[①]

在我看来，符号学的现代历史并不是从索绪尔开始的，甚至也不是从皮尔斯开始的，而是从查尔斯·莫里斯开始的，之后是雅克布森，最后是托马斯·A. 西比奥克。后者——利用1964年于布鲁明顿召开的大会——把这个领域系统组织起来并给予它一种建制性存在。为此，我们尤其要对西比奥克表示最深刻的感谢。在欧洲这边，我不会忘记布伊森（Buyssens）、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格雷马斯，不会忘记我们的意大利同仁在这一事业中所起到的作用。

——阿伦·雷（Alain Rey 1984：92）

费卢奇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把查尔斯·莫里斯视为符号大师，事实上，他正是在对莫里斯的符号学的研究中开始自己的研究的。罗西－兰迪1953年出版了关于莫里斯的一部专著（扩充后的新本出版于1975年），并且把莫里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符号理论基础》（*Foundations of a*

① 本文框架如下：
一、欧洲哲学和美国符号学之间的对话：符号与价值
（一）莫里斯：从罗西－兰迪眼中看
（二）莫里斯和罗西－兰迪的通讯往来
二、罗西－兰迪、西比奥克以及二者共同的老师——莫里斯
（一）莫里斯的行为学
（二）符号学与生物学
三、关于莫里斯
（一）行为主义符号学和实用主义符号学
（二）补充说明
四、关于罗西－兰迪
（一）他的关注焦点
（二）罗西－兰迪的语言哲学和符号研究
五、关于西比奥克
（一）模塑系统理论和总体符号学
（二）对“以部分代全体”谬误的批判

Theory of Signs）翻译成意大利文，此译本出版于1954年［莫里斯1946年的著作《符号、语言与行为》（*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已经于1949年翻译出版］。莫里斯研究符号与价值的关系，因此研究了符号学与价值论的关系，罗西-兰迪对老师的这一特别方面尤其感兴趣。如果说莫里斯对审美和伦理价值感兴趣，那么罗西-兰迪则是关注语言和经济价值。在莫里斯所阐明的符号理论的紧密联系中，他发展出自己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意识形态在社会规划和人类行为中的作用。莫里斯在自己的研究中潜心考察生物学语言，而罗西-兰迪在为莫里斯式符号学生物基础提供佐证方面不遗余力。根据罗西-兰迪的看法，无论人类还是非人类，任何动物都不会无交流而行动，这意味着，行为即符号行为。符号生命以及符号学语言的生物学维度，在莫里斯的另一位继承人托马斯·A.西比奥克那里得到了发展，后者成了生物符号学的倡导者和总体符号学的开创者。相对于莫里斯的研究，西比奥克和罗西-兰迪关注了不同方面，这可以简单地描述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物学的，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尽管两人在某些方面相互有所批评，罗西-兰迪和西比奥克的研究仍然可以看作是互补性的，同时，二者的研究又属于莫里斯所预见到，但由西比奥克充分阐述的符号学总方案的组成部分。

"现代符号学史传"是阿伦·雷于1984年提出的，值得我们注意。尽管，如雷所说，一方面我们承认诸如斐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和查尔斯·S.皮尔斯（1839—1914）等先驱肯定地直接影响了现代符号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符号学作为一个领域、一个学科的形成，则须归功于查尔斯·莫里斯（1901—1979），以及罗曼·雅克布森（1896—1982），并且，我要说，首先要归功于托马斯·A.西比奥克（1920—2001）。西比奥克强调了符号学作为一门总体性科学或理论、学科的特点［"学科"这个词是西比奥克更喜欢的用词，这个词是他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94）那里借来的］。对于涉及该发展的"欧洲这边"，在雷所提到的名字之上，我首先愿意加上罗兰·巴尔特（1915—1980）和路易·叶尔姆斯列夫（1899—1965）。雷所提到的我们"意大利同仁"也很重要，哪怕是仅就类型而言。这个问题上，允许我点出几个名字，首先是吉奥瓦尼·瓦伊拉蒂（Giovanni Vailati，1863—1909）。

瓦伊拉蒂的一大功劳，是他与马里奥·卡尔德洛尼（Mario Calderoni，1879—1914）一道，特别是就符号学方面把皮尔斯的研究介绍给了意大利。瓦伊拉蒂还就实用主义或实效主义的构成和发展，明确了皮尔斯而不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的影响要点——"实效主义"（pragmaticism）是皮尔斯在其著作的某一点上被迫采用的一个术语，目的是

区别他自己的方法和詹姆斯的方法。再者，瓦伊拉蒂的另一功劳是为传播维多利亚·维尔比（1837—1912）的意义学做出了贡献。因为维尔比，我们方能把意指研究从当时所构想的、更为狭隘的符义学方法中解脱出来。此外，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无数作者［除了皮尔斯本人，还包括柏特兰·罗素（Betrand Russell，1872—1970）、查尔斯·K. 奥登（Charles K. Ogden，1889—1957）、奥托·纽拉斯（Otto Neurath，1882—1945），等等］，在为其思考打下烙印的兴趣、观点和专题思考节点等方面，要感谢维尔比。考虑到我们“意大利同仁”，如雷所称呼的，值得记住的重要人物还有费卢奇奥·罗西－兰迪（1921—1985），他继续了瓦伊拉蒂的工作，而且是第一个撰写有关查尔斯·莫里斯专著的人，他把英美语言哲学和美国符号学以及欧陆哲学融为一体。和罗西－兰迪有联系和合作的人中，值得提到的是奥古斯都·庞齐奥（Augusto Ponzio）（连同罗西－兰迪和西比奥克，我可以骄傲地称他们为我的老师）。庞齐奥在意大利，除了继续沿着罗西－兰迪开创的方向进行研究，还通过他的著述，与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米哈伊·巴赫金（1895—1975）、亚当·沙夫（Adam Schaff，1913—2006）以及西比奥克本人有所交集（庞齐奥写过好几本有关这些学者的专著，其中两本是与我合作）。庞齐奥的研究还涉及所谓“蹑行符号学家”（cryptosemiotics，这个说法来自西比奥克），譬如卡尔·马克思（1818—1883）这位《数学手稿》（*Mathematics Manuscripts*）的匿名作者（庞齐奥将此著作从德文翻译成了意大利文），以及“早期符号学家”（protosemioticians），譬如西班牙的彼得（Peter of Spain，1205—1277）这位逻辑专论《逻辑总论》（*Summulae logicales*）的作者（因为庞齐奥，这本书得以以双语版的形式通行于意大利）。

但是，在本文中，我的目的只是聚焦符号学在意大利（通过费卢奇奥·罗西－兰迪）与美国（通过托马斯·西比奥克）之间的互动发展，因为这种互动发展在查尔斯·莫里斯的先驱工作中同根或同源；正是因为雷对于这一点的凸显，我以他的话作为本文的题记。

一、欧洲哲学和美国符号学之间的对话：符号与价值

（一）莫里斯①：从罗西-兰迪②眼中看

意大利知识分子费卢奇奥·罗西-兰迪一再回到查尔斯·莫里斯，继续自己从1953年出版《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这部专著［1975年再版时更名为《莫里斯与符号学运动》（*Morris e la semiotica novecentesca*）］开始的莫里斯研究。实际上，尽管两位学者的研究路径沿着不同方向发展，却常常有所交叉。尤其是他们两人都关注价值问题：莫里斯对审美和伦理方面的价值特别感兴趣，罗西-兰迪则对语言和经济价值更感兴趣。他们经常性的通讯

① 查尔斯·莫里斯（1901年生于科罗拉多州丹佛，1979年卒于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研究了工程学、生物学、心理学和哲学。1922年取得科学学位之后，又于1925年于芝加哥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并于1931—1958年间任教芝加哥大学。作为当代符号学的经典人物，我们在这里无需用几行脚注文字来交代莫里斯。我对罗西-兰迪和西比奥克会说得多一些，因为他们两人在时间上距离我们更近一些，而且我对他们有着私人了解。这些学者也值得我们深入了解，而且吸引我们对其作品的深入兴趣。

② 费卢奇奥·罗西-兰迪（1921年生于米兰，1985年卒于特里斯特）对符号学和语言哲学在意大利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其学术生涯早期，罗西-兰迪不仅从意大利文化之中，而且从奥地利和德国传统之中、英美思想流派之中汲取理念和方法工具。他的若干论文和著作最初是用英语发表的。多年以来，他都住在意大利之外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他1962—1963年间于安·阿伯尔的密歇根大学执教，1963年于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执教，后来还由于各种原因旧地重游。1964—1975年间，他担任了欧洲和美国若干大学的访问教授。他在古巴哈瓦那和圣地亚哥大学教授过哲学与符号学课程。在帕多瓦任教期满之后（1958—1962），他于1975年回到意大利学术界，担任莱切（意大利南部）大学的历史哲学教授。1977年他成为特里斯特大学的理论哲学正教授。罗西-兰迪的学术形成，尤为显著地受到他与莫里斯之间批判性交往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翻译了莫里斯1938年的重要著作《符号理论基础》）。不过，其他重要影响则来自美国实用主义、操作主义以及英国的分析哲学（1951—1953年间他生活在牛津），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对吉尔伯特·莱尔（Gilbert Ryle）［罗西-兰迪1955年出版了对莱尔《心灵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的译著］和维特根斯坦的研究。罗西-兰迪还复活了意大利传统——其中包括诸如朱塞佩·皮诺（Giuseppe Peano）、吉奥瓦尼·瓦伊拉蒂、马里奥·卡尔德洛尼、费得里戈·恩里克斯（Federigo Enriques）以及尤吉里奥·科洛尼（Eugenio Colorni）等重要人物——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本尼迪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和吉奥瓦尼·根迪尔（Giovanni Gentile）的唯理论。罗西-兰迪不仅仅是作者，也是编辑、译者，对知识界的贡献颇丰。他是若干期刊的编辑和编委，其中的一些实际上就是他所创办的：《方法论》（*Methodos*，1949-52）、《新潮》（*Nuova corrente*，1966-68）、《人类学》（*Anthropology*，1975-）、《意识形态》（*Ideologie*，1967-74）以及最后的《人文科学》（*Scienze umane*，1979-81）。这些期刊记载了罗西-兰迪对符号理论所做出的贡献。有关罗西-兰迪的批评综述，参看Ponzio 1988，2008。庞齐奥有关罗西-兰迪理论创造特定方面的著述，见于Ponzio 1990［其中包括笔者的一篇论文“符号的物质性”（Materiality of signs），收入Petrilli 1986］，1993。有关罗西-兰迪的思想，有《普罗塔格拉》（*Il Protagora*）评论刊物所出专号，以及《费卢奇奥·罗西-兰迪读本》（Reading su Ferruccio Rossi-Landi，参看Bernard et al. ed. 1994）。

持续了二十五年以上，也证明罗西-兰迪对符号与价值之间——因而是符号学与价值论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莫里斯所产生的影响，这从莫里斯 1964 年出版的著作《意指与意味》(*Significtion and Significance*) 中可见一斑。

在关于莫里斯的专著中，罗西-兰迪批判了莫里斯 1946 年的著作《符号、语言与行为》(*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 中对目的导向性行为这一概念的倾心关注，他观察到，这预设了行为与目的导向性行为之间的一种区分。例子涉及被导向某物的有机体：一只寻找食物的狗、一个朝着特定目的地行驶的驾驶员。但是，是否存在非目的导向的行为呢？如果我们在导向行为中建立一种等级（上车、踩油门、选择这条而不是那条路，等等），是否我们就能避免有关诸如狗被导向什么（最后的分析，是以满足它的需要为基础的）、向某个城镇去的那个驾驶员被导向什么这类价值论性质的问题？罗西-兰迪说，“或许更难回答的是，人类被导向什么？动物被导向什么？”罗西-兰迪写道[1975c (1953)：71]：

> 当所有其他说明都缺乏的时候，我们很难知道人类和动物通常做什么；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区分如此这般的目的导向和非目的导向行为。或者再说一次：我们可能从已经达成的目的这种角度去谈论行为方面的目的导向行为；但是，如此这般的行为之中，没有什么告诉我们它是否是朝向一个目的的，除非它是我们通过比较而辨识出的一个特定行为。“目的”(goals) 是存在的，但“该目的”(the goal) 是没有的。而且，在引入目的概念时，莫里斯也许受到了某种实用主义典型矛盾的影响，把如此这般的目的本体化了。符号行为概念应该有赖其上的那个概念本身，似乎没能建立起来。

在题为“《符号、语言与行为》中作为生物科学的符号学”(Semiotics as a biological science in *SLB*) 以及“符号—行为与作为交流的行为”(Sign-behavior vs. Behavior-as-communication) 这些段落中，罗西-兰迪证实了莫里斯式符号学的生物学基础。他同时回到目的寻找行为和其他行为的区别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被用作确立某物何时是符号的一种标准。在这一语境中，他得出结论：将符号行为和非符号行为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他甚至坚持认为，所有行为都是符号行为（同上：第 31 页）：

> 在这里，我们并不仅仅讨论到莫里斯的思想，而且讨论到事物本身。论点是：任何行为都交流某种东西；反过来说，如果不通过一个行为，任何东西都无法被交流。

根据罗西-兰迪的看法，任何动物，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不可能被认为在没有交流的情况下行事。同时，如果它是交流，那么就意味着，行为即符号行为。

罗西-兰迪立场的局限性，正如根据这一特定语境（尽管并不是根据他的其他著述）被归纳出来的，是他把符号活动等同于交流活动。我们现在知道，符号活动并不仅仅是限于严格意义上理解的交流活动，而且符号活动也是模塑活动；换言之，通过符号活动，我们解释、塑形和生产新的可能世界的建构之中的意义。托马斯·西比奥克提出的作为模塑手段的“语言”（language）与朝向交流的“话语”（speech）之间的区别，以及有关前者先于后者的说明，使得罗西-兰迪带有偏见的局限观点站不住脚①。此外，在为“语言”特色化建立自己的标准时，莫里斯也对“语言”和“交流”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别，为两位都提供了便利（参看 Petrilli and Ponzio 2003－2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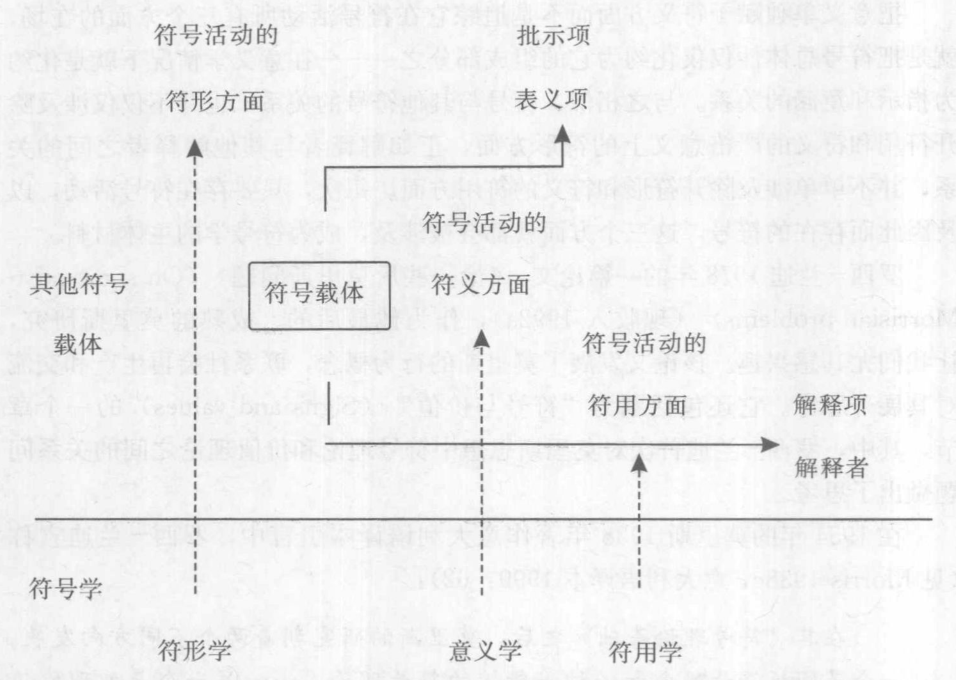
更为有趣的是罗西-兰迪的这一论点：行为是符号活动性质的，因为它总是计划的组成部分（参看 Rossi-Landi 1992a：31－32）。“今天我们知道”，罗西-兰迪说，“所有行为始终是计划好的——也就是说，是基于规则的”（同上：第 34 页），他所指的包括了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行为。接着，他自问，这些发展是否取得了偏离莫里斯基本直觉的价值和可信度？他的回答如下：

> 我要说不是；事实上，我要说的正相反。正是莫里斯以一种紧密的方式，头一次系统性地把行为的一般观念与符号的一般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更应该这么说，他是朝着一个远比他自己所以为的或能预见的更有成果的地方出发。这两个概念的结合蕴含着巨大的潜能。环境只得允许初步的发展——而整个人类和生命科学的景观都开始发生变化。莫里斯的局限必须以一种历史方式来看待。

罗西-兰迪为证明莫里斯所定义的符号活动三个方面——“符形”（the syntactical）、“符义”（the semantical）、“符用”（the pragmatical）——之中的意义存在，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他支持莫里斯的观点，宣称意义和符号学的所有三个分支都相关［参看 Rossi-Landi 1994（1972）：64－70］。为了清楚解释符形学、意义学、符用学三者之间的区别，罗西-兰迪提到了莫里斯本

① 参见 Sebeok 1984，1987，1988a，1991a。约翰·迪利（John Deely）说过，作为人类内部世界一种适应的“语言”与作为对外部世界的联适应的“语言交流”二者之间的区别，被证实对于理解符号学在整个哲学史中的地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参看 Deely 2001：10－11，以及其他位置；又参 Deely 2007。

人在1939年的论文《美学与符号理论》(Esthetics and the Theory of Signs)中所画的图表(见 Morris 1971: 417):



(图表中,"符形学"和"符用学"上的垂线在莫里斯著作中是倒置的,这里修改过来了)

图表的上半部分代表符号活动,在此过程之中,某物起着符号作用;相对的,下半部分代表"符号学"(semiotic,莫里斯偏爱此词胜过 semiotics)这种关于符号的总体性科学,它被分为符形学、意义学和符用学三个分支科学。如莫里斯在《符号理论基础》中所说,符号学和符号活动之间的区别是:"作为一门科学的符号学,运用特殊符号来表述有关符号的事实;它是一种谈论符号的语言"(1938c: 8)。的确,他本人所从事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谈论符号的一个符号系统。

图表的上半部分表明符号载体、作为符号起作用的对象,如何与"指示项"(designatum)和"表义项"(denotatum)相关。这种相关关系涉及符号活动的符义方面。不过,符号也是与产生出回应符号的解释项的解释者之间的关系。这涉及符号活动的符用方面。此外,符号必然与其他符号载体相关,这便成为符号活动的符形方面。符号始终涉及符号活动的三个方面。所以,只是为了分析的缘故,可能去区分符号载体与指示项(以及分析到最终的表义项)

之间、符号载体与其他符号载体之间，以及符号载体与解释者（惟有在被赋有解释项的条件之下）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有着符形学、意义学和符用学三个分支的符号科学，集中研究的是符号活动及其符形、符义和符用三个方面。

把意义单独赋予符义方面而不是追踪它在符号活动所有三个方面的在场，就是把符号总体性仅仅化约为它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意义学情况下就是化约为指示和意涵的关系。与之相似，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也并不仅仅涉及除开符用和符义的严格意义上的符形方面，正如解释者与其他解释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单单涉及除开符形和符义的符用方面。每次，只要存在符号活动，以及因此而存在的符号，这三个方面就都会被涉及，成为符号学的主体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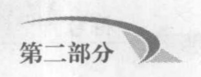
罗西－兰迪 1978 年的一篇论文，《论一些后莫里斯问题》（On some post-Morrisian problems）（现收入 1992a），作为他最后的、成熟的莫里斯研究，让我们尤其感兴趣。该论文发展了莫里斯的行为概念，联系社会再生产和交流对其展开思考。它还包括题为“符号与价值”（Signs and values）的一个章节，其中，罗西－兰迪首次对莫里斯思想中符号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做出了思考。

在 1954 年的莫里斯 1938 年著作意大利语译本引言中，罗西－兰迪宣称（见 Morris 1938c，意大利语译本 1999：62）：

> 在其《符号理论基础》之后，莫里斯的研究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一个是阐析符号观念和一种一般性的符号理论，……另一个是处理价值问题。

在《意指与意味》中，莫里斯最后把他的两个研究领域统一起来了。他对价值观的研究和他对符号的研究几乎一样多，而且他反对单凭研究符号就让人有权对价值观做出判断这种看法。莫里斯实际上把自己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研究奉献给了价值理论，尤其是伦理和审美价值判断问题，正如他 1956 年的著作《人类价值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Human Value*）所呈现出的那样。莫里斯研究的这一方面，和罗西－兰迪以一种理查德—马克思的角度展开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研究尤其相关。这些话题的原创性，相对当时主要以有关知识理论的问题为尚的符号学主流，是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的。

不过，对莫里斯的研究，主要关注的还是他以 1938 年和 1946 年出版的名著为代表的符号理论。唯有罗西－兰迪专门提到《意指与意味》以及莫里斯有关价值观问题（包括审美价值观）的早期著述。这些早期著述影响了罗西－兰迪研究查尔斯·莫里斯这位符号学大师的整个方法。



(二) 莫里斯和罗西-兰迪的通讯往来

莫里斯和罗西-兰迪两人之间的通讯往来时间跨度是1950—1976年，现在可以在《符号学》(*Semiotica*)杂志的一份专号中查看(Petrilli ed. 1992)，专号中附有笔者题为《社会实践、符号学与人类诸科学》(Social Practice, Semio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Man)的一篇绪论(Petrilli 1992)。专号中收有罗西-兰迪致莫里斯的信65封，莫里斯致罗西-兰迪的信差不多也有这么多封(个别遗失)。专号还包括罗西-兰迪的两篇文章：1951年的《论价值：一种协作性探讨》(On Value: A Cooperative Inquiry)，此文最初于发表于《方法》这份期刊；1970年的《语言异化问题》(Linguistic Alienation Problems) [最初是英语和意大利语形式出现在"社会版"(Edizioni di Comunità)出版人所发起的一份双语期刊中]。罗西-兰迪致莫里斯的第一封信日期是1950年6月23日，最后一封是1976年12月23日；莫里斯致罗西-兰迪的信未签署日期，但显然是对罗西-兰迪第一封信件的回复，莫里斯的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1976年10月26日。两人之间的信件全部是英文写就。

莫里斯与罗西-兰迪之间的这些信件之所以有趣，有两个原因。其一，通过它们，我们能够部分地重构他们的学术历程，因为他们彼此影响，因此这些信件代表着对观念史的一种贡献。其二，它们在更为严格的理论层面上是无比珍贵的，因为通信的两个人在讨论重要问题时常常带着鲜明的独创性。这些信件除了把我们对莫里斯和罗西-兰迪所知道的信息整合起来，而且，它们一方面揭示出莫里斯的符号学中那些并不为人所熟悉的方面，因为这些方面是在与罗西-兰迪的解释工作遭遇之中得以发展的，另一方面，它们证实了罗西-兰迪本人对今日符号学研究的专题意义。

举例说明：在1951年6月10日给罗西-兰迪的回信中，莫里斯对他的行为概念做了如下评价，强调了符号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他整个研究中的中心地位：

> 至于你认为我应该谨慎定义"行为"，我请你参看《关于关于符号的符号的符号》(*Signs About Signs About Signs*) (1948b)。就科学的目的而言，我认为"行为"是一个无法定义的术语，就像其他任何一个术语一样。如果要成为被认为是科学的符号学和价值论的基础，"符号—行为"和"偏好行为"当然需要谨慎的分析。我认为自己现在对"符号—行为"的处理胜过在著书之时；在我下一部关于价值论的著作中(1956)，对"偏好行为"的处理，我会做得比你现在看到的文章更准确。我把我的符号学和价值论看作(年青的)科学，而不是哲学。关于我对哲学的看法，

我请你再次参看《符号、语言与行为》(1946) 中的讨论。

莫里斯1952年9月14日的信证实，他一直关注着符号与价值观之间或者符号学与价值论之间的关系。在这封信中，莫里斯表示，自己对最近在纽约组织的有关“符号与价值观”(Symbols and Values) 的大会得到积极响应和参与很是满意，并且很是欣慰另外一个同主题的大会将在哈佛举办。

罗西-兰迪是莫里斯作品的一个批判性读者，对此莫里斯本人非常欣赏。这可见于莫里斯1953年8月31日针对罗西-兰迪建议有机会进行牛津日常语言哲学、交流理论和语言学研究的回信：

> 我对牛津学术团体的工作还研究得不多，尽管我认识到了其重要性。不过还要等一等。我计划有一天再版《符号、语言与行为》(Morris 1946)，之后我会考虑你的建议和批判，包括牛津学者的工作和交流理论及语言学。但是在之后的十八个月中，关于价值观的这本书 (Morris 1956) 比其他什么都重要。

下边一段话引自罗西-兰迪1951年11月14日致莫里斯的信，描述了罗西-兰迪对牛津哲学家关于莫里斯的语言和符号研究以及引入总体性的符号学所做出反应的个人体会。实际上，符号科学的技术术语与牛津学派对日常语言的推崇显然有别：

> 牛津是一个有趣的角落。人们思维开阔，并不像人们以为的，他们产出贫乏且无系统于是思维狭隘。……他们并非骄傲地以为发生在他们王国之外的就不重要。你的名字，譬如，就众人皆知，即使普莱斯 (Price) 教授正在开设的“思想与符号”(Thinking and Symbols) 讲座中我没有听到他引用你。我经常提到你，提到丁格勒 (Dingler)、布里奇曼 (Bridgeman) 和其他几个人。直到现在，他们还相当抵触。当然，技术化的必要性，我觉得你对之深有体会，在这里是受到忽视的；或许这被认为是针对日常语言（他们的主公，更不用说针对常识，他们的圣父，针对明白晓畅，他们的圣灵）的一种犯罪。但是，也有许多人感觉到，对他们过于琐细的结果有着一种总体性框架的必要。最后（并非“最少”），在这里，人们有机会碰到来自各处、思维开阔的众多学者。

在1952年12月27日的信中，罗西-兰迪表示，自己对莫里斯作为“一种理想（或技术）语言”的符号学感兴趣，一方面关注有关原始术语的问题和各种“理想的”“技术的”或“专门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关注日常



的说话，等等。在对罗西－兰迪的回信中，莫里斯对自己研究之中"话语世界"（universe of discourse）和"理想语言"（ideal language）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如下阐述，并未提及形式逻辑的理论框架。以下摘自1956年1月10日的信：

> 我对"话语世界"这个概念思考不多。但是稍作思考，我发现它可能有三个意指。1）为要谈论的一块世界划界。这样我们或许同意只谈A空间中的东西。2）为要使用的语言划界。这样我们或许同意只用经典物理学的语言来谈。3）以上二者相加。这样我们或许同意只谈A空间中的东西，而且只用经典物理学的语言来谈。按照这些用法，我看不出与"理想语言"之间有什么关联关系。

和莫里斯情况一样，罗西－兰迪在其整个研究生涯中也反复回到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在1968年的划时代著作《作为劳动和交换的语言》（*Language as Work and Trade*，英译本出版于1983年）这本书中对他的语言运用观进行了公开批判，而且批判采用的是马克思的方式。这使得他坚持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运用理论的局限，在于缺乏劳动—价值概念。下面内容摘自1966年4月16日的信，罗西－兰迪在这里宣布，自己对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且提到了自己的两篇论文，两篇中的第一篇让他有了1968年著作《作为劳动和交换的语言》的标题，并作为其中一章被收入该书中：

> 我对语言问题的研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努力，而且我的思考有了不同，我的思考包括（i）传统欧陆哲学，这主要指（当代欧洲的）黑格尔—马克思传统；以及（ii）语言学和其他对语言感兴趣的学科，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哲学家对之说过些什么。沉寂了大约五年之后，我最近发表了一篇篇幅很长的论文，"*Il linguaggio com lavoro e come mercato*"（英语大意是*Language as Work and Trade*，听上去不像意大利语中那么顺耳）。我会在几周内把它送呈给你，另外还有五月初肯定就会发表出来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的，另一篇是关于文字的和非文字的语言）。

在1966年4月16日和1967年3月21日的信中，罗西－兰迪描述到莫里斯对价值观的研究与自己"黑格尔—马克思转折点"之间的关系，正是这导致他写出《作为工作和交换的语言》这部著作。参照莫里斯在《意指与意味》中所描述的价值类型学，罗西－兰迪对莫里斯研究价值问题的方法和马克思的方

法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反思。此外，他分析了莫里斯在三类价值和符号学三个方面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罗西-兰迪正在寻求“莫里斯式行为主义”和他本人关于作为劳动的语言和作为商品的信息这种理论之间的一种联系。这种探寻将使得罗西-兰迪去研究莫里斯式符号学/价值论和他本人的语言异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参看 Rossi-Landi 1970 以及他 1970 年 12 月 17 日致莫里斯的信）。以下摘自他 1967 年 3 月 21 日致莫里斯的信：

> 三种“作为价值的意义”（meaning-as-value）和符号学的三个方面之间，肯定具有一种联系性，但就我目前所见，看不到它们之间有一对一的匹配关系。我所致力的目标之一，是为“语言异化”（linguistic alienation）这个观念找到某些基础；我必须能够按照“说话的商品”（speaking commodities）来描述说话人。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批判非常适合对异化的一种更普遍性的批判，但是，必须要有一种关于社会的理论，而这在维特根斯坦和大多数其他所谓的“分析”中完全是欠缺的。因此我要回到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去寻找基础。

二、罗西-兰迪、西比奥克以及二者共同的老师——莫里斯

（一）莫里斯的行为学

现在，我们将重点考察被认为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符号行为的某些方面（截至目前它们已经被提到了），并且对一些观察做出预测。莫里斯在他 1946 年的著作《符号、语言与行为》的开始就阐明了他的“信念”：“符号科学”必须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之上”，在“行为科学框架之内”[1971（1946）：80]。不过，在 1938 年的《符号理论基础》中，他就使用到了“行为学”（behavioristics）这个术语，声称符号问题是“从行为学的角度”来架构的，并且有个有意思的观察，“符号定义的这一解释……是不必要的”。他做了如下解释[1971（1938）：21]：

> 在这里采用它，是因为这种角度已经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为心理学家所普遍熟悉，还因为符号学史所揭示的许多难题似乎都源自这一事实：在其历史上大多数时候，符号学都和能力心理学和内省心理学联系在一起。

在莫里斯看来，符号科学和行为学是彼此暗含的：一方面，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符号科学在行为科学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行为学并没有因为莫里斯的目标而得到充分发展。然而，既然符号和行为彼此相关，关于行为的科学或行为学实际上是可能通过符号科学而得以发展的[参看 1971（1946）：

367]。

观察这个概念在定义符号条件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观察”“观察到的”“可观察的”指的都是可以被看到、触到、听到、闻到的东西，即可以通过感官体察到的一切，而无论是直接还是通过工具延展的方式。符号行为的这一条件，即观察构成了莫里斯符号概念的限制或界限之一，这一点可见于 1946 年的著作《符号、语言与行为》。

此外，我们知道，莫里斯选取了生命物作为符号活动过程中的行为主体和解释者。“生命物”（living being）被理解为被赋予了“肌肉和腺体”的整体的有机物［这在区别“回应”（response）和“反应”（reaction）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不只是有机体的一个部分，譬如一个细胞。但是，如我们从托马斯·A. 西比奥克的生物符号学那里所知道的，符号活动过程中的行为主体和解释者“可能只是有机体的一个部分”，甚至可能在微生物层面发生（这并不是莫里斯的“肌肉和腺体”）（参看 Sebeok 1997：437）。纵然有着这一根本的不同，西比奥克在 1997 年的这篇论文中，仍追忆起莫里斯［1971（1946）：366］，并且把符号活动定义成“一个符号过程，即其中某物对于某有机体是一个符号的一个过程”——尽管西比奥克把生命物这一概念拓展到了整体的有机体实际形成之前的某个位置，宣称生命出现在符号链条中一个更早的点上。在莫里斯方面，莫里斯拓展了符号活动，超越了人类文化界，但是并没有把微观有机体生物学包括进来，也没有（出于偶然的原因）把有着新近迅猛发展的分子生物学纳入其中。可是，尽管其视域中有这些局限性，莫里斯在生物符号学基础上建构了他的一般符号学却是事实。

还应该注意到，对“整体”和“部分”二者的区别不能想当然：从这一角度看，罗西-兰迪对《符号、语言与行为》的细腻分析是有用的。这一说法暗示着允许从整体性和结构两个方面对某物展开思考的做法。实际上，解释操作就是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的。西比奥克正确地指出，唯有从生命开始——确切地说，是物种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层面上的人类生命的开始——在其构成部分和结构中被决定的非生物性现实才清晰地出现。在这一点上，西比奥克（1997：437）的观点和惠勒（Wheeler）（1986：viii）是一致的，后者说：“惟有通过（生命的）中介，才可能建构出存在世界或我们所谓的现实。”

罗西-兰迪观察到，整体—部分这种区别涉及特定场合和特定操作。这一区别可以通过平常用法得以预见。譬如，有机体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整体，它的组成成分和器官被认为是其部分，但是书架上的书一般并不因为这放书的书架而被当作是一个整体的部分。所以，整体—部分的区别要根据完成特定操作的

条件而变化［参看 Rossi-Landi 1975c（1953）：65］。

（二）符号学与生物学

在今天的发展中，分子生物学涉及与有生命宏观有机体相关的整体—部分之间的区别，对于后者，莫里斯在他那个时代未能考虑在内。根据莫里斯的观点，符号学的生物基础必须始终按照科学的现有发展来确立。所以，对生物学以及其他科学中的最新发展的了解与时俱进，对于符号学这个特殊领域中的研究者十分重要。无疑，西比奥克本人就是如此描述下的符号学研究者的楷模。从这一角度，我们还必须承认莫里斯的优点：如上所述，莫里斯在学术成型的一开始，就已经和生物学打上了交道，同时，他对生物学对于充分理解哲学和符号学的核心作用充满赞许。

重要的是注意到莫里斯为了达成对其符号理论的充分理解而诉诸生物学语言。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开发适当的语言工具来谈论符号，关于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二者的符号［参看 1971（1946）：75］。这种方法使得他超越了严格的“人类符号学”视野，后者常常错误地被用于替代一般符号学［在“符号学”（semiology）的名称下尤其是如此］。不过，与美国行为主义者不同［以柏尔鲁斯·斯金纳（Burrhus Skinner）为代表］，莫里斯并不简单地把自己局限在运用根据对非人类动物行为观察而发展起来的人类行为术语上；相反，他关注的是整体上的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中的符号。他的观点显然属于“生物符号学”性质，包括今天以生物符号学为基础的“动物符号学”和“人类符号学”在内（尽管这些术语是在他去世后才有的）。

三、关于莫里斯

（一）行为主义符号学和实用主义符号学

莫里斯所构想的符号学（他实际上用的词是 semiotic 而不是 semiotics）提出了对包括属于生命世界的一切的符号的一种总体性描述，尽管他的方法旨在解释所有类型的符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选择了从生物学语言来构建他的符号学术语，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 1946 年的著作《符号、语言与行为》之中。莫里斯为他的符号理论选择了一种生物学框架，这一点意义重大，这使得罗西-兰迪，他最为敏锐的解释者之一，用了“行为学的生物心理学”（behavioristic biopsychology）来对他的研究进行描述。

（二）补充说明

莫里斯对生物学的兴趣明显始于他对符号或象征理论的研究，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如是说。实际上，“象征主义”（symbolism）和“生物学”

(biology）这些术语在他1925年的博士论文《象征主义与现实》（*Symbolism and Reality*）中已经成为关注核心（尽管1993年才得以出版，不过，在1981年就出版了德文版)。他的博士论文中有一章就题为“一些心理学和生物学思考”(Some Psychological and Biological Considerations)。同时，在他1932年的著作《关于心灵的六种理论》（*Six Theories of Mind*）中，莫里斯就已经表明，自己的意图是基于思维与象征性操作相一致这种信念，发展出有关象征主义的一种普遍性理论。

莫里斯把符号学描述成“关于行为的科学”（a science of behavior)。这个表达，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并不指所谓行为主义的一种哲学—心理学思潮，而更多地是指尚且有待发展的一种“科学”或学科，用他自己的话就是“领域”。莫里斯的学术定位受到了乔治·H. 米德（George H. Mead）以及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Tolman)、克拉克·L. 胡尔（Clark L. Hull）和奥托·纽拉斯等人的强烈影响，从他们那里他汲取了“行为学”这个术语。不同于把譬如在研究老鼠之中得出的心理学原则用于人类的那些行为主义者（莫里斯的一位评论者曾如此抗议)，这些学者所致力的是有关行为或“行为学”的一种普遍性理论，如莫里斯所说，他们的目的，不仅要描述人类的行为，而且要描述老鼠的行为，与此同时，还要对它们之间的差异做出解释。

查尔斯·S. 皮尔斯的实用主义，或者更应该说，实效主义[①]，对莫里斯符号学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这可明显见于他1937年的专著《逻辑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科学的经验主义》(*Logical Positivism, Pragmatism and Scientific Empiricism*）以及1938年的两篇论文《科学的经验主义》(Scientific Empiricism）和《皮尔斯、米德与实用主义》(Peirce, Mead and Pragmatism）[前者发表于《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后者发表于《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他对符号科学的奠基性贡献——《符号理论基础》这部著作，也发表于1938年。在《皮尔斯、米德和实用主义》一文中，莫里斯坚持认为皮尔斯和米德之间，或者说，在前者开创的实用主义（实效主义）与后者的实用主义新近样式之间，具有紧密关联。他在1970年的专著《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运动》（*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American Philosophy*）中也论述过同一话题。

与1938年的《符号理论基础》相比，在1946年的《符号、语言与行为》

---

① 皮尔斯杜撰了“实效主义”（pragmaticism）这个词，以便区别他本人的实用主义和他之后各种解释中的实用主义，关于这种区分对于符号学的决定性影响，参看 Deely 2001：616ff。

中，莫里斯进一步发展并强化了生物学、行为主义和符号学之间的关联关系。此外，重要的是强调，他为符号学术语而诉诸生物学，并不意味着消极意义上的“生物主义”（biologism）。换言之，莫里斯的工作中并没有倾向于“化约论”（reductionism，即一心把话语世界的多元性化约为唯一的一个——譬如这里的生物学话语），并没有表现形而上的幻想或者自然主义式的存在之物，看不到符号活动的历史—社会方面。从这一角度看，莫里斯的态度远不同于逻辑经验论者或新实证论者及其公然的物理主义面相。

莫里斯发展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意义认识，使得他不仅关注符号，而且关注价值观。《生命之路》（*Paths of Life*）问世于 1942 年，《开放的自我》（*The Open Self*）问世于 1948 年。这些著作关注的是人类中的偏好行为，描述了不同文化中的“根本选择”操作。《人类价值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Human Value*）出版于 1956 年，收入了莫里斯对价值观的试验性研究结果。他 1964 年的著作《意指和意味：对符号与价值观关系的研究》，继续联系他对符号的研究来研究价值观，并且强化了符号学与价值论之间的关联关系。英语单词“meaning”有双重涵义，不仅指符号的符义方面（意指），而且指符号的评价性方面（意味），“某物意指的东西和被意指的东西所具有的价值或意味”（Morris 1964：vii）。此外，这部著作证实，莫里斯的符号学研究方法是一项“跨学科工程”（interdisciplinary enterprise），它关注在其一切形式和表现之中的符号，关系到人类和非人类动物，常规的和病态的符号，语言的和非语言的符号，个人的和社会的符号。

四、关于罗西-兰迪

（一）他的关注焦点

罗西-兰迪在 1968 年写出了《作为劳动和交换的语言》（现有 2003 年版，英文译本 1983 年出版），就前瞻性和分析才华而言，这部著作直到今天仍然具有话题性。罗西-兰迪预见到后期资本主义体系现阶段发展中目前具有中心重要性的问题，在这样一个体系中，交流是生产中的一个构成要素，所谓“非物质性劳动”（immaterial work）是主要资源。交流不仅在生产循环的中介阶段（按照市场逻辑的流通或交换阶段）起重要作用，而且在生产和消费阶段也起重要作用，尤其是对技术的发展而言，所以，在自动化、计算机化和总体性的交流网络方面也起重要作用。有了商品是信息，在当下，信息是商品这种认识之后，于是，显然，消费本质上就是交流的消费，生产就是交流的生产，反之亦然。

罗西-兰迪对与“物质性生产”（material production）具有同质性关系的“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中的“语言生产”（linguistic production）、“语言劳动”（linguistic work）和“语言资本”（linguistic capital）等概念进行了详细阐述。正如今天在日常语言中使用到的某些表达一样，这些概念描述了今天社会再生产循环之中同样具有根本性的那些方面。我们所提到的表达包括“非物质性资源”（immaterial resources）、“非物质性资本”（immaterial capital）和“非物质性投资”（immaterial investment）等。这些表达随着人们对今天的知识社会中发展和竞争所需要的教育、信息和专业化知识重要性的认识而做出的种种表述，变得通用起来。直到最近，物质性生产和语言生产，以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形式，还被认为是分离的，尽管在深层的基因和结构层面两者其实同质相关。新颖之处在于，在一个全球性交流的世界中，语言生产和物质生产已经合流并且变为同一。随着计算机的出现，硬件和软件在其中共处一个单一的单位之中，一方面是劳动和物质产品，另一方面是劳动和语言产品，两方面的联系已经毫无疑问地得到了证实——关键在于，语言劳动这种“非物质性劳动”的卓越能力已经显而易见。换言之，语言劳动领导着生产和发展的诸过程。

罗西-兰迪 1968 年的著作《作为劳动和交换的语言》的潜台词就是，语言生产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根本因素，而且因为如此而与器具和产品的生产具有同质性。这一设想在他之后的著作，譬如《语言学与经济学》（*Linguistics and Economics*，1975）中，在理论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文字语言被描述成一个产品系统，其他产品系统则按照非文字符号系统加以概念化。这种方法导致按照符号生产来阐发语言生产概念。在这一框架之中，显然来自文字的最初在不同领域里发展起来的概念，譬如“消费”“劳动”“资本”“市场”“财产”“剥削”“异化”和“意识形态”，可以用于对语言的研究。同样的，在与文字语言研究的关系中被发展起来的概念，可以用于非文字的符号系统，譬如我们可以论及“语言消费”“语言劳动”“语言资本”“语言异化”，等等。

罗西-兰迪的研究为研究一般符号学打下了方法基础，一般符号学包括并且联合了语言学和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他对人类行为的看法是总体性的，同时，他以卓越的前瞻性证实，主张各门科学间的分离在生产的社会中——全球化了的交流—生产社会中是站不住脚的，是彻底落伍的。

（二）罗西-兰迪的语言哲学和符号研究

从 50 年代早期到 80 年代后期，罗西-兰迪以其领先的语言哲学和符号学

研究在意大利开辟出新境界。他的方法既是统一的，又是多面的，而其整个的方向可以说是以总体的符号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过程研究这一语境中的符号、语言和意识形态批判为特色的。然而，与之相悖的是，如罗西－兰迪在以下引文中所说，他思想的总体结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简化为它的一个方面（Rossi－Landi 1992a：2）：

> 在欧洲大陆，人们认为我是对历史和社会不具有充分重要性的符号学家、语言学家或者分析哲学家；在英语国家，人们认为我是历史学家而不是分析家，或者说，我只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或者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等等。

罗西－兰迪的研究可以分成三个各有特色而又相互联系的阶段。

第一阶段涵盖了 20 世纪 50 年代，包括他 1953 年出版的著作《查尔斯·莫里斯》［1975 年的再版增编本名为《查尔斯·莫里斯与二十世纪符号学》（*Charles Morris e la semiotica novecentesca*），补充了 1975 年的一篇论文《关于一位符号大师的符号》（Segni su di un maestro dei segni），现收入 Rossi－Landi 1992a：17－57］（参看 Petrilli ed. 1992，罗西－兰迪与莫里斯之间的通讯）；以及他 1961 年的著作《意指、交流与公共话语》（*Significato, communicazione e parlare comune*）（1980 年和 1998 年共两次再版），后者可以被视为他五十年代研究的一个总结。

第二阶段和 20 世纪 60 年代有关，包括四部著作构成的一个系列。1968 年的《作为劳动和商品的语言》（Il linguaggio come lavoro e come mercato）（现版本为 1992b，英文译本出版于 1983 年）提出了一种总体性的语言生产和符号生产理论，为语言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同质性关系研究打下基础。1972 年的《符号学与意识形态》（Semiotica e ideologia）（现版本为 2007）通过补充一批重要论文，尤其是《语言相对论的意识形态》（Ideologia della relatività linguistica），使得前一部著作得以完善。“语言相对论的意识形态”这篇论文在 1973 年单独作为一本书出版为英文本：《语言相对论的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语言学与经济学》（*Linguistics and Economics*），这是 1970—1971 年间为“当代语言学潮流”（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图书系列而写的一部英文著作，是该系列中的第 12 卷，出版于 1975 年（1977 年再版）。

第三阶段涵盖了 20 世纪 70 年代，包括 1978 年的《意识形态》（*Ideologia*）（现版本为 2005）。在这一阶段，罗西－兰迪讨论了意识形态和文

字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其中特别关注的是语言异化问题。在这一阶段，他还写有多篇论文，后来收入《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Metodica filosofica e scienza dei segni*）一书（1985，现版本为2006）。

若干散佚论文来自全部三个阶段，其中一些是首次以英文出版，在他去世之后辑为《符号与非符号之间》（*Between Signs and Non-signs*）（Petrilli 1992）。这一辑录本来是在罗西-兰迪本人计划之中的，但却成了他一生中的憾事之一。

罗西-兰迪的研究对于分析性批判今天大众媒体社会中的交流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点。人类由于语言学与非语言学劳动、符号劳动在符号活动方面被置于危险境地，同时听凭社会规划的摆布。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被描述成社会再生产中这样一个阶段：交流和市场合一。因此，不仅其中的商品而且信息也被物神化了，被与生产它们的社会关系两相分隔。在这一语境中，人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听凭社会异化操作摆布，因此，也更多地听凭语言异化和总体的符号异化摆布。这些问题在罗西-兰迪那里已经加以探讨了，他研究的发展是与意识形态批判工具相互协调的，而后者是与对符号的批判相关联的。

五、关于西比奥克[①]

（一）模塑系统理论和总体符号学

在西比奥克之后，符号学作为"总体符号学"而出现，约翰·迪利（John Deely）在为修正过的第二版《符号及其大师们》（*The Sign & Its Masters*）（Sebeok 1979/1985）所撰的题为《一项总体性工程》（*A Global Enterprise*）的序言中提到了这一点（Deely 1989：vii）：

> 在那些认为自己——不只是在存在这一意义上（这是一切生命形式要成其为生命形式所必需的，而且似乎甚至是前生命的环境要素有图发展所必需的），而且是按照符号根据其自身在形成事物的过程之中的存在和功能这一理论意义上——从事着掌握符号这一使命的人之中，西比奥克具有独特的核心的作用。

① 托马斯·A.西比奥克（1920年11月9日—2001年12月21日）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卒于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1937年他移民美国，1944年成为美国公民。1944年起，他一直是印第安纳大学教员，并且从1969年自国际符号学会会刊《符号学》（*Semiotica*）在巴黎成立以来就担任总编。西比奥克可以算是对符号学在国际上的建制化、对"总体符号学"的形成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之一。他的研究主要受到查尔斯·S.皮尔斯的启发，同时也深受查尔斯·莫里斯和罗曼·雅克布森的影响。他的研究兴趣广泛而多样，涉及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非常广阔的诸多领域。

根据西比奥克首先表述过的总体符号学的观点，符号和生命合一，符号活动是生命物之间的行为。

（二）对“以部分代全体”谬误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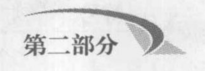
整个世界，既然它有所意指，都进入了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参看Sebeok 2001）。符号学是“生命科学”和“符号科学”两相汇聚之地。这意味着符号和生命合一。所以，可以推出人类就是符号世界之中的一个符号。

西比奥克拓展了传统符号研究的边界，提供了远比“符号学”（semiology）更为综合的一种“符号学”（semiotics）方法。“符号学”（semiology），斐迪南·德·索绪尔所规划的符号研究，所具有的局限在于它以文字标准作为基础，因为“以部分代全体”（*par pro toto*）这种错误而失去效力——换言之，它错误地用部分（即人类符号，尤其是文字符号）来取代全体（即所有可能的符号，人类的和非人类的）。[①] 在这种神秘化基础之上，“符号学”（semiology）不正确地宣称自己是关于符号的一般性科学。与之相反，当关于符号的一般性科学为自己选择“符号学”（semiotics）这一术语的时候，它便同“符号学”（semiology）及其谬误拉开了距离。[②] 西比奥克在符号研究中把“符号学”传统称为“小传统”（minor tradition）。相比之下，他所推崇的是现代学者中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查尔斯·S. 皮尔斯、中世纪拉丁学者中的约翰·普安索（John Poinsot，1589—1644）、古典学者中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约460—公元前377）和盖伦（Galen，129—约199）及其关于符号和病征的研究作为代表的那种传统——西比奥克把这种传统称为“大传统”（major tradition）。沿着这一脉络，同五位同道一起，西比奥克在1984年发表了一份“立场告白”（position paper），他非正式地称之为“符号学宣言”（semiotic manifesto），称其目的是“探索符号学可能性，提供一种新的范式或框架，据此，通过为综合层面上人类和自然科学过时的重组指出方向，超越孕育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种种呆板对立的错误二分法，有可能征服所谓的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Anderson et. al. 1984：35n1）。

因此，通过他的众多著述，西比奥克提出了一种与生命演进合一的非常宽

① 因此，在编辑《符号学诸前沿》（*Frontiers in Semiotics*）这部展现专属于作为符号学科的符号学的革命性范畴的作品时，为了有别于当时占主流的“符号学”（semiology），视之为西比奥克所标举的更大的全体之中以人类为中心的那个组成部分，迪利等人选择了“以部分代全体”这个表达作为此书序言的标题（Deely，Williams，and Kruse 1986：viii）。

② 西比奥克关于“semiotics”和“semiology”之间的名称对比，首先见于Sebeok 1976（参看Deely 1978，这篇文章是对此所作评论），之后在Deely 2004和Deely 2006中得到了充分阐述。



泛的符号学。在西比奥克的工作（深受皮尔斯、查尔斯·莫里斯和罗曼·雅克布森的影响）之后，有关符号学领域和符号学历史的认识都发生了改变。由于西比奥克的努力，位于新千年之始的符号学有着广阔的视域——远比西比奥克进入符号学景观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之前所设想的要来得广阔。

西比奥克对“符号生命”（life of signs）的研究方法是“总体的”或者“整体的”，或许与他对“生命符号”（signs of life）的关注直接相关。在他的看法中，符号活动和生命是合一的。符号活动起源于生命的第一丝颤动，由此引出了符号学至关重要的一条原则：符号活动是生命的标准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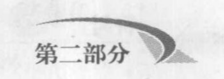
“总体符号学”为研究符号生命和生命符号提供了一个交汇点，提供了一个观察点。与符号学中的“大传统”一致，西比奥克研究符号生命的总体方法预设了他对人类中心和语言中心的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在对符号“学科”的边界和边缘的探索中（他偏爱“学科”这一用语：参看 Sebeok 1976：ix，对此 Deely 1977，1978，1982，1986 有所评述），西比奥克开放研究领域，纳入了“动物符号学”（zoösemiotics，该术语由他于1963年引入），甚至更广阔，一方面是“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一方面是“体内符号学”（endosemiotics）。在西比奥克的认识中，符号科学不仅“研究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Saussure 1916：26），即研究文化中的交流，而且研究生物符号学视野中的交流行为。因此，西比奥克的符号学的特色是朝向最大化的能力拓展。

如上所述，西比奥克研究中的一个中枢性概念是，符号活动与生命合一。符号活动被认为是区别生命物和非生命物的标准特征，符号操作并不总是存在于世界发展进程之中：符号操作和生命物一道随着生命发展而发源。我要提醒的是，关于西比奥克在1990年所表述的符号活动下限的这个论点，受到了约翰·迪利的直接挑战，这篇挑战性论文（Deely 1991）正是应西比奥克本人的邀请写就的，而且发表在西比奥克本人所主编的著作中。开放地直接面对挑战，这正是西比奥克的特色，也是他学术魅力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迪利的论文对论辩做出了拓展：符号行为［“生理符号活动”（physiosemiosis），参看 Deely 1990：第六章；现版本为 Deely 2008］在世界为生命到来而做的早期准备之中已经在起作用了；西比奥克则认为这个提法有问题，尽管它可能是正确的。他们两人在这一点上的对话，因为西比奥克的不期离世而被陡然打断了。

无论这场涉及符号活动更广袤疆界的辩论如何，甚至无论是否把符号活动等同于生命，符号学都被赋予了一种不同的作用。譬如，不同于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75）所认为的符号学，后者当时把符号活动和生命的会合

描述成关系到“符号学的低门槛”。按照艾柯的看法，符号学是一种文化的科学。西比奥克把符号学解释成为一种生命科学、生物符号学，并据此展开实践：生物符号学也不能被化约为仅仅作为符号学的一个“部门”这种解释。问题在于，符号世界有多大，是如何无处不在的？

在我看来，莫里斯和罗西-兰迪很相像，他们都主要从事发掘动物，尤其是人类动物，在行为和互动中对符号的种种依赖。西比奥克将此拓展到整个生命，但是作为三元关系的符号本质，以及因为如此的存在——作为三元关系的存在——方才会有的“活动”［activity，我也许会用“纯粹的符号活动”（pure semiosis）这个表达，因为它本身与动物意图是不相混淆的］，正如迪利所说，打开通向甚至比西比奥克最终所设想的更为广阔的符号学大门的东西，在这种符号学视界，在诞生生命的世界形成过程之中，符号活动甚至比生命出现得还要早。



实体和符号的物质方面

符号的物质性在不同层面上自我呈现。在这一基础之上，有可能提出有关符号活动物质性的一种分类。

物理的（物理—化学的）和生物的（有机的、生命的）物质性，二者都是符号须拥有的必要条件。当被解释的符号不是有生命的实体，而是无机的物理—化学实体，那么它只有通过有生命的解释者才能变成符号。后者，通过其环境界中所固有的解释项链条，为“被解释的符号”（包括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在内）赋予意义。信息符号活动的情况就是如此。相反，在征象化符号活动以及交流符号活动中，被解释项，类似于解释项，必定已经是有生命的实体了。在信息符号活动中，并不是符号的实体可能因为解释项而成为符号——不过，解释项必定是有生命的实体。在征象化符号活动和交流符号活动中，被解释的实体已经是符号了。

无机的物理—化学物质性以及有机的物理—化学物质性可以联系指涉对象、符码和渠道（媒介）进行分析。

“符号活动—文化的”（semiosic－cultural）物质性，或者，如果我们愿意，可以称之为“符号学的”（semiotic）物质性，是植根于如此描述的符号活动物质性之中的。

符号学的物质性是专门的人类符号活动物质性的一个区别性特征。

符号学的物质性的专门特点是语言（不同于话语），语言构成了一级模塑，不同于历史—自然语言（二级模塑），也不同于其他文化符号系统（三级模塑）。

这些是我在本文中所提出的有关符号活动物质性的分类的前提。不过，在发展该分类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旦这个过程本身涉及某种虚拟的或者“先行的”（anticipatory）行为——吉奥尔吉奥·普洛迪（Giorgio Priodi）称之为“元初符号活动”（proto－semiosis）（1977，1982，1984），约翰·迪利（John Deely）称之为“生理符号活动”（physiosemiosis）（1990，1997，1998，2001）——也许必须补充一个前提，才能与把原本完全无机的世界变成有机并

最终使得一些区域真正充满生命活力这个过程相适应。

在1985年于意大利巴里为其同年出版的著作《哲学方法与符号科学》(*Metodica filosofica e scienza dei segni*)所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就在其匆匆离世前的一个月),费卢奇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评判了托马斯·A. 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和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研究,认为二者分别代表着符号学中的两个极端立场:西比奥克的方法被判为"过头"(excess)——实际上,被他划分为人类交流符号类型之中的同样的符号,也可以在非人类动物交流中发现痕迹;巴尔特的方法[如在《符号学原理》(*Eléments de sémiology*)中所表现出来的]被判为"逼窄"(restriction),因为在他的眼里,符号研究被描述成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包括了后者(参看Rossi-Landi 1985b)。

罗西-兰迪本人提出了一种有关符号物质性的分类,在1985年的著作中给出了他为之而做出的最新梳理之一(Rossi-Landi 1985a:137-166;1992:271-276)。本质上,罗西-兰迪感兴趣的是人类符号学,如此一来他所关注的便是人类交流符号。他对文字符号和非文字符号都做了研究,坚持认为"符号学"(semiotics)(对他来说,这在根本意义上说就是人类符号学)不能化约成"符号学"(semiology)。我在不同论文中对罗西-兰迪的符号物质性分类有过考察,还根据查尔斯·S. 皮尔斯的解释符号学对之有所发展(参看Petrilli 1986,1990a,1998)。

从罗西-兰迪1985年做出的观察开始,西比奥克对他的工作做出了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这些工作在其2001年的著作《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中,有着最为成熟的体现,该著作出版之后的几个月,也就是同年的12月,他就匆匆离开了我们。与他的研究同步,而且与之紧密相关,生物符号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实际上确证了西比奥克广阔的符号学视野,他是本着符号活动与生命合一的这种信念来看待符号学的。这一信念使得西比奥克得出一个让人兴趣盎然的假设:既然符号活动或者符号行为涉及整个有生命的世界,那么,对于符号活动及其动态关系的充分理解,最终有可能会导向对生命本身的一种界定。在这一假设中,符号活动是随着这个星球上生命的第一次颤动而开始的。

这使得西比奥克归纳出一条核心原则,他认为这对于符号是至关重要的:"符号活动是生命的标准属性"(Sebeok 1991b:124),即"一切生命的标准性标志是符号活动"。他的第二条核心原则,"符号活动以生命为前提"(Sebeok 2001),把第一条补充完整了。因此,一点也不奇怪,所有生命科学都在西比

奥克的知识视域中找到位置，见证它们在充分理解地球“生物界”中符号及其作用之中的重要性（Verdansky 1926）。所以，“总体符号学”为有关“符号生命”（the life of signs）和“生命符号”（the signs of life）的各门研究提供了一个交汇点、一个观察哨。

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及其系统化工程的意义，可以从三卷本的百科全书式手册中看出。该手册题名《符号学：自然与文化的符号理论基础手册》（*Semiotik / Semiotics. A Handbook on the Sign－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Nature and Culture*），由西比奥克与罗兰·波斯纳（Roland Posner）和克罗斯·罗勃灵（Klaus Roberling）共同主编，头两卷出版于 1997 年至 1998 年间，第三卷出版于 2003 年。关于头两卷，笔者与奥古斯都·庞齐奥（Augusto Ponzio）联合撰写论文《符号旅行的符号载体：两卷新手册》（Sign vehicles for semiotic travels：Two new handbooks），对之有过分析，这篇文章被西比奥克称为“古灵精怪的评论文章”（monster review article），发表在《符号学》（*Semiotica*）这一国际期刊上（Petrilli and Ponzio 2002）。

下面，对于自己的符号物质性分类我将做出进一步阐释，这在过去秉承罗西－兰迪的思路所撰的论文中已经有所表示（参看 1992：271－299；Petrilli 1990a：365－401）。不过，与罗西－兰迪把方法限定在人类世界不同，我想做的是超越人类符号活动界域，以总体性的眼光来看待符号活动，这包括了人类符号活动在内，不过观照点则是它在广大的生物符号活动界之中的语境化，同时，我还汲取了来自西比奥克以及他之前的查尔斯·S. 皮尔斯那里的若干范畴。

从总体符号学角度看，似乎首先要做出的声明是，生物物质性存在是符号物质性或者符号活动物质性存在的初始前提。不必说，化学—物理物质性的存在对于生物物质性的存在是同样必要的。所以，我们或许要首先声明：符号物质性在不同层面自我呈现，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提出有关符号活动物质性的分类。

于是，符号须拥有的必要条件，既包括物理的（化学—物理的）物质性，又包括生物的（生物—化学—物理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质性。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因此标记出两类物质性：

1. 物理的物质性（physical materiality，化学—物理的物质性）
2. 生物的物质性（biological materiality 生物—化学—物理的物质性）。这渐次地又可以分为：

2.1. 无生命的有机的物质性（non living organic materiality）。

2.2. 有生命的有机的物质性（living organic materiality）。

此外，暂且不论以前论文中我所谓的“工具性的外符号的物质性”（instrumental extrasign materiality），对之我将在本文结尾作为物质性3加以介绍，那么，每当我们有符号，或者更确切地说，有符号活动，我们也就有：

4. 符号活动的物质性（semiosic materiality），这是以物质性1和物质性2作为前提的。

物质性2.2，即有生命的有机的物质性是符号活动须拥有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这类物质性在如图尔·冯·尤科斯库尔（Thure von Uexküll）在《生物符号活动》（Biosemiosis）这篇论文所描述的三类符号活动的每一类之中都有呈现；这篇论文被收入《符号学》（*Semiotik* / *Semiotics*）卷一（Posner et al. 1997－1998，Vol. 1：449－450），三类符号活动指：a）信息符号活动（semiosis of information），b）征象化符号活动（semiosis of symptomatization），以及c）交流符号活动（semiosis of communication）。

在我们的评论文章《符号旅行的符号载体》中，奥古斯都·庞齐奥和我提出对图尔·冯·尤科斯库尔的上述分类进行重新梳理（参看 Petrilli and Ponzio 2002）。事实上，尤科斯库尔的分类是以“发送者”和“接收者”概念为基础组织起来的，这些概念对于“交流符号活动”是非常适当的。与之相反，在我们的重新梳理中，按照皮尔斯的“解释符号学”，我们的符号活动分类是以“被解释项”（对象—符号）和“解释项”（以及“解释者”）作为基础的。我们的重新梳理各条表示如下：

a）在信息符号活动中，被解释的符号（可以是任何东西）纯粹是因为它得到来自解释项，即做出解释的符号——的解释才变为符号。所以，这种情况下，解释项是被解释项所未曾要求的回应。

b）在征象化符号活动中，被解释项本身已经是解释项回应（征象）——也就是说，甚至是在它实际性地被解释项解释成一个符号之前。不过，在征象化符号活动情况下，已经是解释项回应的被解释项并不专门地为了被解释者解释成一个符号而出现。

c）在交流符号活动中，再一次地，被解释项在实际性地被解释项解释成一个符号之前本身就是解释项回应了。不过，与前者不同，这种情况下，已经是解释项的被解释项，现在渐次地要求另外一个解释项回应——也就是说，它作为一个符号是指向解释的。

现在，我们可以尝试把这种符号活动分类（a，b，c）和上面所列的三种物质性（1，2，4）关联起来。

物质性 1，即无机的物质性、化学—物理的物质性，要成为符号物质的必要条件是有物质性 2，即生物物质的存在。换言之，要让无机的物质之物成为符号之物，必须要有生物之物、有生命的有机之物。换言之，要让物理的无机的物质成为符号物质，我们需要有生命的实体。这就是信息符号活动这种情况（根据图尔·冯·尤科斯库尔的分类）。

进一步说明：物理物质被解释成符号物质，因此，就是被解释成有生命有机体的先决范畴基础之上的符号活动物质，这些先决范畴于是成为有机体环境界的组成部分。所以，符号活动物质就特定环境界而言始终是内在的。于是，我们可以宣布说，化学—物理物质在进入有生命有机体环境界的时候就成了符号物质。

所以，物理的物质性纯粹是因为有生命有机体的活动才变成符号活动的物质性。归根到底，到符号活动物质性这种过渡的预设前提就是生命。然而，反过来说，是生命预设了化学—物理的物质性。做出这样的声明，我们实际上是在谈及西比奥克在《符号活动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Semiosis）这篇论文中所处理到的有趣主题［该论文收入《符号学》卷一（Posner et al. 1997－1998，Vol. 1：436－446），是“符号活动类型”（Types of Semiosis）这个专题下的开篇论文］。

有特定的化学—物理操作可以对生命起源进行解释，这些操作被认定为“元初符号活动”操作。在吉奥尔吉奥·普洛迪提交给由“意大利符号研究协会”（Italian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简称 AISS）主办的第四届大会的论文《作为自然符号学的生物学》（La biologia come semiotica naturale）中，它们处在研究的核心位置。这篇论文代表了普洛迪在其理论思考中达到的一个相当的高度。而且，我注意到，近年来，迪利也独立地在“生理符号活动”这个话题下论及这个话题。

1974 年，在为国际符号协会第一届大会提交的题为《符号与实体》（Signs and Bodies）的论文中（参看 1992：271－276），罗西－兰迪提出了如下阐述：A.“所有符号都是实体”；B.“并非所有实体都是符号”；C.“所有实体都可能是符号”。这些现在可以通过化学—物理的物质性是符号存在的必需条件这一说法得到证实，尽管这不是一个充分条件。非符号实体如果被有生命的有机体解释就会变成符号实体。但这并不是实体与符号之间关系的唯一意义。

可以说非符号实体可以变成符号实体，这一说法有两重涵义。其一可以通过如图尔·冯·尤科斯库尔所提出的符号活动分类得到预见。换言之，如前所述，无机的实体可以通过有机的实体、有生命的实体得到解释（信息符号活动），因此而成为符号实体。其二涉及有生命物质的生成中从无机到有机的过渡。显然，第二个过渡是第一个的预设前提：实际上，如果无机实体通过有生命实体的解释而变成符号实体，那么，为了让有生命的形式存在，无机的实体必定变成符号实体。换一种说法，在整个地球星球上符号活动的基因操作之中（我们尚不知道宇宙中有其他符号活动场所存在），可能已经发生了从非符号活动到符号活动、从无生命到生命的过渡——这就是我们按照元初符号活动描述过的那种过渡。

所以，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分类增加另外一种物质性，将其命名为"元初符号活动的物质性"（protosemiosic materiality）。这是一种生成之中的符号活动的物质性形式，因此作为从一个到另外一个的过渡阶段，可以放在物质性 1 和物质性 2 之间的中间地带。这样，我们现在就有：

1. 化学—物理的物质性

1. →2. 元初或生理符号活动的物质性

2. 生物的物质性（生物—化学—物理的物质性），进一步分为：

2.1. 无生命的有机的物质性

2.2. 有生命的有机的物质性

3. 符号活动的物质性

参照图尔·冯·尤科斯库尔的研究，我们宣布，并非有生命的实体、然而始终是符号的被解释项，可能唯有通过有生命的有机的解释者的工作，才能成为符号。信息符号活动情况就是如此。然而，我们必须对无生命的实体可能成为符号实体的两种情况做出区别：一种情况是我们有无机的实体，另一种情况是我们有有机的实体，但是该实体是无生命的有机的实体。

很明显，无机的实体唯有通过作为有生命实体的解释者才可能变成符号实体。在此，我们是处在信息符号活动领域中的。与之相反，真正的问题在于无生命的有机的实体在解释者进入之前是否就已经是符号物质。如果是，在我们目前为止所说的基础上，它就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是符号物质：如果在解释项的回应被产生之前就已经是符号实体的被解释项并不是作为该回应的功能而被产生出来的，那么，我们就处在征象化符号活动领域，而不是在信息符号活动领域；与此相反，如果解释项是作为解释功能而出现的，那么我们就处在交流

符号活动领域。从这一角度看，区别不同有机体的物质性情况是有必要的，因为有机的物质性在场这一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取得征象化这种情况。

相反，无论被解释项是无机的物质还是无生命的有机的物质，信息符号活动都可以取得。譬如，如果猎人通过粪便或尿液辨认出他在追踪的动物的行迹，粪便或尿液于是成了符号物质，那么，这更多的是信息符号活动情形而不是征象化符号活动情形。相反，从尿液中提取的血细胞如果被医生读作病理符号，则可能更专门地属于征象化符号活动情形。最后，狗为标记自己领地而留下的尿液，似乎应该就是交流符号活动情形。然而在我们选择使用条件方面，实际上并不能将刚才描述的三种符号活动截然分开。的确，符号活动情形可能是含糊的，以至于对所有三种类型都适用（可以想想，猫竖起自己的毛，这可能既是对威胁的回应，同时又是为吓跑潜在敌人而增加威慑）。

根据图尔·冯·尤科斯库尔的分类，在第二类符号活动即征象化符号活动中，解释的物质对象已经是符号活动物质，即使它并没有带着如此这般被解释的功能出现。这里，我们需要区分，符号活动物质是属于不同的有生命有机体，还是相反地，属于同一个有生命实体。譬如，在动物世界中，我们可以在这二者之间做出区别：母猫把猫崽的叫声解释成它们需要食物的符号，同样是这只母猫，它把自己的感觉解释成它自身对食物的需要。当然，化学—物理的物质性在征象化符号活动中也起着它的作用。实际上，在解释自身饥饿这种情形中，被解释项和解释项都属于同一有生命的有机体，解释是由化学—物理因素决定的，特别是由缺乏腺苷磷酸或者环腺苷酸决定的（参看 Sebeok 1979：23）。另外一个例子是基因符码提供的，其中属于某特定有机体的化学序列被来自同一个有机体的细胞解读为特定信息。免疫符码提供了其他有关征象化符号活动和信息符号活动的众多例子，其中两者彼此混杂，有时十分复杂难解。

以上全部话语可以联系托马斯·A. 西比奥克所理解的“符号自我”（Semiotic Self）来思考。被解释项和解释项是相同符号自我的组成部分，符号自我必须提防非自我。在专门的人类符号活动中，这种防卫是按照皮尔斯所理解的“思想—符号”进行的，据此，自我被分裂成被解释项和解释项。举一个征象化的例子，其中，被解释项和解释项并不属于同一有生命的有机体，我们可以指病人和医生，或者婴儿（譬如，饿了）和母亲（注意到自己的婴儿饿了，并且起身去照料）。

除了来源和被解释对象之外（如此这般成了符号），无机的化学—物理物质性和有机的化学—物理物质性都可以联系符码、渠道和媒介进行考察。无论整个符号过程是否发生在生物媒介、社会媒介还是技术媒介之中，它都必然需

要通向被解释对象的渠道，以及解释所需的符码。

对于来源，在我们对图尔·冯·尤科斯库尔符号活动类型的重新梳理中，我们声明，在信息符号活动中，被解释项仅仅是因为它得到了来自解释者的解释才变成符号的。后者可能是完整的有生命的有机体，或者更简单的，只是有机体的一个部分——譬如一个细胞。尽管注意到在三类符号活动中确立一种清晰的分野很困难，我们现在必须补充说，在信息符号活动这种情形下，来源是无机的对象。相比之下，在征象化符号活动和交流符号活动中，来源是有机物质或者有生命的存在（有机体或成分），要么属于无法说话的生灵，要么属于智人。联系符号来源类型，西比奥克在1991年的著作《符号就是符号》（*A Sign Is Just a Sign*）里"交流"（Communication）一章中，特别地提到，交流的来源是一切有生命存在——完整有机体及其组成部分——的标准属性（参看 Sebeok 1991a：25－26）。尽管如此，他的分类还是包括了根据图尔·冯·尤科斯库尔而来的信息符号活动和征象化符号活动的来源。

此外，重要的是要记住，在征象化符号活动中，被解释符号在被解释项实际地解释成符号之前，就已经是解释项回应了。然而，这种回应并不是专门为了被解释这个目的出现。相反，在交流符号活动中，被解释项在被另一个解释项实际地解释成符号之前，就已经是解释项回应了，解释项回应专门地意在被解释成符号。

且让我们联系渠道来对物质性问题进行思考。当有机体或机器把对象解释成另外一个对象的符号，它必须有通向该对象的"渠道"。可能的渠道，就物质而言，包括气体、液体和固体；当涉及能量问题，渠道是化学的和物理的，就物理的渠道而言，可能属于声学（气体、水、固体）或者光学（反射日光或者生物体发光），等等（参看 Sebeok 1991a：27－28）。《符号学》手册（Posner et al. 1997－2003，Vol. 1）的第六至第十一篇文章，分别考察了以下渠道：光学［第六篇，克罗斯·兰德维尔（Klaus Landwehr）撰写］、声学［第七篇，杰拉德·斯特鲁布（Gerhard Strube）和杰尔达·拉扎鲁斯（Gerda Lazarus）联合撰写］、触觉［第八篇，克尔伯特·赫尔（Kerbert Heuer）撰写］、化学［第九篇，于尔根·克罗勒（Jürgen Kröller）撰写］，电学、电磁学［第十篇，彼得·莫勒（Peter Moller）撰写］，以及热学［第十一篇，科特·布鲁克（Kurt Brück）撰写］。此外，符号活动可能同时涉及几个渠道，如第十二篇《眼睛活动的组织多渠道符号活动案例研究》（Die Organisation von Augenbewegungen：Fallstudie einer mehrkanaligen Semiose）［尼尔斯·戛利（Niels Galley）撰写］和第十三篇《作为多渠道符号活动的身体行为》

(Body behavior as multichannel semiosis)［里卡多·卢奇奥（Riccardo Luccio）撰写］，对人类交流中同时使用到一种以上渠道的情况进行了考察。

“媒介”可以用作“渠道”的同义词（Sebeok 1991a：27），但是，“媒介”还意味着符号活动发生于其中的“世界”。媒介可以是生物的、社会的或者技术的媒介。第十四篇《符号活动中的技术媒介》（Technische Medien der Semiose）［卡林·博姆－杜尔（Karin Böhme－Dürr）撰写］和第十五篇《符号活动的社会媒介》（Social media of semiosis）［特里·史里德戈尔德（Terry Threadgold）撰写］，根据媒介的双重意义，对技术工具和社会建制所构成的世界做出了考察，媒介的双重意义还与“模型”和“模塑”概念有关。如同一卷中的第十六篇《符码》（Codes）［加文·T．瓦特（Gavin T. Watt）和威廉 C. 瓦特（William C. Watt）联合撰写］和第十七篇《符码变化》（Kodewandel）［鲁迪·凯勒（Rudy Keller）撰写］所示，根据不同渠道和媒介，符码的形成和运用是不同的。

此外，《符号学》（Posner et al. 1997－2003，Vol. 1）中，题为“符号活动诸方面——渠道、媒介与符码”（Aspects of Semiosis-Channels，Media，and Codes）的第二章所收的全部文章，处理的都是符号与实体、指示项（*signata*）和被指项（*signantia*）、媒介/渠道和被指项、符号活动和物质性。

在这一点上，我将介绍第四类物质性。我所指的是符号活动—文化物质性，或者，如果愿意，可以称之为“符号学的物质性”（semiotic materiality）。符号学的物质性是根据上面所描述的分类中划为符号活动物质性的部分作为基础的。所以，要完整表现上面所提出的样式，我们现在有：

1. 化学—物理的物质性
1. →2. 元初或生理符号活动的物质性
2. 生物的物质性（生物—化学—物理的物质性）
2.1. 无生命的有机的物质性
2.2. 有生命的有机的物质性
3. 符号活动的物质性
4. 符号学的物质性

符号学的物质性是专属人类符号活动物质性的一个区别性特征。实际上，我们可以把人类动物的特点概括为“符号的动物”（semiotic animal），这首先是罗西－兰迪在其 1978 年名为《意识形态》（*Ideologia*）的专著中提出的（参看 Rossi－Landi 1978：217，新版 2005：347；又参 Deely 1990：1 &124；

Petrilli 1998：8－10；Deely，Petrilli，and Ponzio 2005）。这意味着，人类符号活动的区别性特征是元符号活动，也就是说，是产生能够反思符号的符号这种能力，而且这正是构成人类符号学意识的东西。符号学的能力标志着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那种物种专有的差别，不仅是认知层面的，而且是伦理层面的。实际上，符号学的物质性把人改造成为能够为整个星球上的生命承担责任的唯一动物，到今天为止，而且今天比之前更甚，人类生命的命运是与整个星球上的生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人类符号活动的这个方面，笔者在与奥古斯都·庞齐奥的《符号伦理学》(*Semioetica*，2003）一书中已经进行过探索。

符号学的物质性的规定性因素是语言（有别于话语者），其中，"语言"被理解为"人类一级模塑"（human primary modeling)。对语言的这一认识必须和把语言理解为"历史—自然语言"区别开来，后者对应的是"二级模塑"(secondary modeling)。其他文化的非文字符号系统则与"三级模塑"(tertiary modeling）有关。在所有三个方面，西比奥克都为我们留下了系列的重要研究，它们被包括在如下著作中：《符号就是符号》（*A Sign is Just a Sign*，1991)、《符号：符号学引论》（*Sign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1994)，以及《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2001)。

如上所述，符号学的物质性是历史—社会物质性。如此一来它就是：

5.1 意识形态的物质性（ideological materiality)

5.2 意图外的物质性（extra－intentional materiality)，可以再分为：

5.2.1 客观的物质性（objective materiality)，不依赖于意识和意愿；

5.2.2 意指他性的物质性（signifying otherness materiality)，即从任意特定解释路线所预见的指示项产生出不同被指项的可能性

5.3 精确/晓畅的物质性（elaboration/articulation materiality)

对于5.1，意识形态的符号学的物质性，它指的是这一事实：符号被现实组织，而它自身渐次地又根据特定观点，即在特定文化传统的历史框架之中——组织现实。社会现实并非某种模糊不明之物。通过其研究的整个历程，罗西－兰迪表明，社会现实按照不同物质生产、劳动划分以及不同经济制度并因此而按照其总体性中的特定文化—意识形态体系而发展并得到表述。尤其是文字符号，它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不同于它所再现和曲折呈现的、由自然事实或人类作品构成的现实。在这一意义上，文字符号干预它所组织的客观现实，并因之而干预世界观。

对于5.2，特别是考虑到5.2.1，不依赖于意识或意愿的意图外的客观的

物质性，或者换种说法，他性或者异质性：我们必须即刻予以明确，尤其是文字符号的“他性”（otherness）或者“异质的”（alien）性质，不仅指他人的语言，而且指每个个体发话人的语言。无论有无意图，我们都进入了一种对话关系，不仅与他人之语对话，而且还与我们“自己”之语对话。朝着他性的这种倾向有利于主体的碎片化，有碍于总体性、自我的重构。结果，后者对于让其结构上的他性从属于整体而封闭的同一性的任何尝试都进行抵制［有关这个方面，参看 Sebeok，Petrilli，Ponzio，*Semiotica dell' io*（《自我符号学》），2001］。

继续我们对符号学的物质性的思考，5.2，特别是考虑到意图外物质性5.2.2：意指他性的物质性是在我们对符号学的物质性的最初描述这一语境中取得的。这一类物质性指向符号的异质性关系，所以，就它的各种解释项而言，它指向符号变动的边界，就任何单一解释而言，它指向其抗拒性或者符号一致性，其迂回和变动的能力，它指向拉开距离，带领我们超越意图的、意识的交流各种界限的能力（参看 Ponzio 1990；Petrilli 1990a，1998：38—48）。

对于5.3，精确/晓畅的符号学的物质性，指的是精确和/或晓畅中不同层次的复杂性。话语比单个的字词更晓畅，书面文本比话语更精确，被看作文本的文化体系比书面文本更精确也更晓畅，在这一意义上，精确/晓畅的物质性是变化多端的。

罗西－兰迪（1972，1985）分辨出人类对物质材料操控中，从最简单到最复杂，有关不断增强的劳动、晓畅、精确的十个层次。就客观物质生产而言，这意味着从罗西－兰迪所谓“物质素”（mattermemes）到构成生产单位的所有客观符号系统的一种推进；就语言材料的生产而言，这种推进是从音素到构成生产单位的所有文字符号系统层次，即从缺乏语义内容的前意指要素到可能具有语义价值的最高程度的要素；就实际而言，我们所喻示的是精确和晓畅中的各种差异，正如在对单个的字词和一篇科学文本进行比较时所出现的那样。

还必须注意到，精确的层次和晓畅的层次并不一定是平行的。高度精确并不一定涉及高度的晓畅。完整的文学文本当然比单个的字词更精确也更晓畅，但是，单个字词就其构成的历史—意识形态物质性而言，也许就是高度精确，并不需要高度晓畅。举一个来自艺术品生产这个物质世界中的例子：想想钻石和它的多个表面。尽管晓畅程度低，一如钻石并不是按照不同层次构成的，但考虑到把这块石头转变成一颗完工的珠宝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工作程度——当然，产品的品质也要考虑在内——那么，精确程度则是极高的。

符号是实体。但是有形的客体可以转换成符号，同时由于，罗西－兰迪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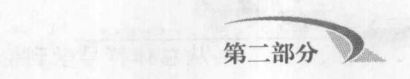
说的，“符号劳动”（sign work），而仍然属于有形之物［参看杰夫·贝尔纳（Jeff Bernard）所撰“费卢奇奥·罗西－兰迪”（Rossi－Landi，Ferruccio）词条，见 Bouissac 1998：547－549；有关罗西－兰迪与查尔斯·莫里斯之间的关系，参看罗兰·波斯纳在第 113 篇文章中的描述，见 Posner et al. 1997－1998，Vol 2：2222－2223；又参 Petrilli 1992］。作为符号物质，有形实体取得在与另一事物的关系中所产生的意义，它听从自身之外某物，它反映和折射不同于自身的另一种现实。在人类世界中（Voloshinov 1929，英译本：10），

> 符号同时又是具体的、物质性的东西；而且，……任何自然、技术或消费的物件都可能成为符号，在此过程之中取得一种超越其既定的具体性的意义。符号不只作为现实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它反映和折射另一种现实。

根据迄今所说的，我们现在可以提出，对符号活动的物质性和符号学的物质性可以作以下区分：符号活动的物质性的表现可以留给被有生命的存在形塑的世界中的符号活动，其中符号操作是无语言的；而符号学的物质性可以留给以被语言形塑的世界作为前提的符号活动，这个世界也就是人类所专有的世界。

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所表示的，“精神”从一开头就被物质“负载”，它是用振动着的空气层和声音来描述的［参看 Marx and Engels 1968（1845）：42］。在此，语言是有形的物质性。但是语言也是人类意识和人类生活的组织：这涉及被理解为人类一级模塑的语言的符号学的物质性。再次地，如马克思所表示的那样，语言和意识一样古老，就为这个理由它又是个人地为我而存在的（同上：第 42 页）。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或者语言都不是存在于一个独立于生活的王国之中的［同上：第 503－504 页。又参第十章第 74 篇文章的第 19 节“马克思的符号世界”（Die Semiotik der Warenwelt bei Marx），见 Posner et al. 1997－1998，Vol. 2：1428－1462；另参埃里克·劳（Eric Louw）所撰“唯物主义符号学（Materialistic semiotics）词条，见 Bouissac 1998：393－396］。

作为实体，符号在有形意义上是物质；作为符号，它在符号活动意义上是物质；作为人类历史—社会材料，它在符号活动的意义上是物质。在被语言模塑的人类世界中，符号因为它的历史—社会物质性而是符号。当实体被作为人类符号加以思考和研究之时，也就是，在符号学框架之中，处在我们关注核心的正是这种物质性。



在这一点上，我将回到我在其他文章中（参看 Petrilli 1986，1990，1994b，1995）按照罗西-兰迪的思路所提出并构建的符号物质性分类。

指示项的物质性（参看 Rossi-Landi 1992：271-299；Petrilli 1990：365-401）并不局限于：

A 外符号物质性（extrasign materiality），可以分为：

A.1. 有形的物质性（physical materiality）（指示项实体及其渠道）

A.2. 工具的物质性（instrumental materiality）（非文字符号的非符号实体残留，即它们的非符号使用和功能，参看 Rossi-Landi 1985a：65~82）。到目前为止，这指本文中呈现的物质性 1 和物质性 2 分类样式，即物理的（或化学—物理的）物质性和生物的（或生物—化学—物理的）物质性。

指示项的物质性还包括：

B. 符号物质性（sign materiality）（在罗西-兰迪的术语中称为被指项），它可以分为：

B.1. 符号活动的物质性（semiosic materiality），在人类符号活动领域中，这也就是

B.2. 符号学的物质性（semiotic materiality）

通过 B.1. 和 B.2. 我们进入到本文中表示为 4 和 5 的类型模式领域。

罗西-兰迪主要关注人类符号活动，他把物质性分为符号物质性和非符号物质性。这种划分和劳动的划分是相互对应的。劳动或工作产生出作为符号的实体和不是符号的实体。所以，工作就是符号工作和非符号工作，或者，按照罗西-兰迪的说法，语言劳动和物质劳动。在“语言劳动”（linguistic work）这个表达中，“语言”并不是按照文字的意义来理解的，而更多地指生产和使用符号的人类专有模态。换言之，它指的是人类物种专属的模塑，对此，西比奥克也称之为“语言”。

两类物质性，符号的物质性和非符号的或外符号的物质性，以及它们对应的工作类型——罗西-兰迪把自己的大量研究和著述奉献其中，最终是要证实把它们连为一体的同源相似关系——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体制中的当下阶段走到了一起。如其他著述中所提到的（参 Ponzio 1999），这个阶段可以命名为交流—生产阶段。在本文开始提到的 1985 年 3 月的讨论会上，罗西-兰迪首次观察到，这两种物质性形式，符号物质性和非符号物质性，以及两种彼此关联的劳动形式，物质劳动和语言劳动，最终聚到了一起。他谈到了计算机中的一

体化地位：的确，如罗西－兰迪所说，计算机硬件，即构成非符号物质和相应的非符号物质劳动的部分，以及计算机软件，即符号物质和相应的符号物质劳动，第一次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不可分割地结为一体。

按照我们的看法，这个方面，如罗西－兰迪所证实的，不过是一个方面，事实上或许最为典型地代表了我们当今社会体制所达成的交流与生产之间那种一体化。

另一方面，这种一体化涉及人类生产机器的能力，而机器在今天可以被当作符号机器。在提交给1999年德内斯顿的德国符号学会第九届国际会议“机器与历史”（Machines and History / Maschinen und Geschichte）的一篇题为《符号机器：语言劳动和世界交流》（The sign-machine：linguistic work and world communication）的论文中，我们坚持认为，符号机器不仅有符号活动的能力，而且有符号学的能力。此外，在同一场合，我们还指出，这一创新还涉及人类劳动的一场革命或者改造，它让人性从劳动—商业中、从相关的社会异化中解放出来（Ponzio 1989，1992，1993，2002）。

另一方面，交流与生产之间的一体化还意味着，交流不再局限于生产循环的中心阶段，即交换或市场。作为自动化和机器化的结果，交流现在成了生产的构成部分。生产也是交流。此外，在当今世界，消费也成了交流的消费，以至于不仅商品成了信息，而且反过来，信息也成了商品。

今天，在社会再生产体制的当下阶段发展中，所有形式的社会控制都最终是控制交流的种种形式。

根据以上思考，我们现在能够说，符号学的物质性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然而，这涉及尤其是被理解为精确/晓畅的物质性的符号学的物质性。相反，还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是人类中的意识，作为独特的符号的动物，人类对于整个星球上生命的责任，到今天，较之以前任何时候更甚，与人类生活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我用下面的图表来结束本文并做出总结：

A. 符号（指示项）的外符号物质性
 1. 化学—物理的物质性
  1. →2. 元初或生理符号活动的物质性
 2. 生物的物质性（生物—化学—物理的物质性）
  2.1. 无生命的有机的物质性
  2.2. 有生命的有机的物质性

3. 工具的物质性

B. 符号（被指项）的物质性

4. 符号活动的物质性

5. 符号活动的物质性（人类符号活动）

5.1. 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5.2. 外意图的物质性

5.2.1. 不依赖于意识和意愿的客观的物质性

5.2.2. 意指他性的物质性

5.3. 精确/表达的物质性

符号和外符号物质性样式图

像似性和语言的起源：查尔斯·S.皮尔斯和吉奥尔吉奥·法诺[①]

吉奥尔吉奥·法诺（Giorgio Fano，1885—1963）的著作《语言的起源和本质》（*Oigini e natura del linguaggio*）的非完整初版，是1962年问世的，当时名为《语言起源论集》（*Saggio sulle origini del linguaggio*）。增编版问世于1973年，和1962年版相比，1973年版不仅研究了语言起源问题，而且还对语言的性质或本质问题进行了探讨。受托马斯·A.西比奥克委托，我为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将增编版翻译成了英语。1992年英译本出版，题名《语言的起源和本质》（*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Language*）。

书里的"起源"与"本质"两个部分，我相信第二个部分更为有趣，也更具话题性。总体框架是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而第一部分更多地却是为分析语言起源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相对而言，这些努力超出必要而且未见效果。事实上，法诺本人宣称，自己对各种语言起源论（glottogonic theories，即涉及人类语言起源的种种理论）缺乏信心[②]，还批判了具有经验—推导、心理和神学一类特色的各种解释。他强调，尤其是考虑到科学数据的实验性质，要得出对语言起源问题的一个确切而科学的答案，即便不是绝对不可能，至少是困难的。根据法诺倾向于赞同的"姿态—模仿理论"（gestural-mimetic theory），人类语言最初是一种伴随情感发泄的模仿性语言，这当然算不上是一种新理论。这是相对较晚的时期由俄罗斯语言学家贾·马尔（Ja. Marr）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他是以其肤浅而轻率的语言理论闻名的；另一个极端，是另一位俄

① 本文是笔者在修改Fano 1973英译本绪论的基础上写就的。这项翻译工作是受托马斯·A.西比奥克委托而得以完成的，对之我始终心怀感激。——作者注

② "Glottogony"（语言起源论）这个术语及其各种变体形式实际上在今天的英语语境中并不存在，但它在意大利语语境中由来已久，其意义即如这里所用的。譬如，《意英词典》（*Dizionario delle lingue italiana e inglese*，1989）所给出的信息如下：*glottogenesi*，语言诞生；*glottogonia*，语言起源研究；此外还有glottogonico，glottogonic等形式。因此，《韦氏百科全编词典》（*We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这部英语工具书中收入了这个词条，并且正确地将它定义为有关语言推断性起源的研究。

罗斯人米哈伊·M.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今天，因为他对语言、符号、文学类型（特别是对于小说）研究方面的贡献，他的名声世人皆知，传遍整个美国和欧洲。①

语言起源问题不应该被低估，尤其是在试图避免以理论方式制造分隔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交流的鸿沟方面，由于这道鸿沟，我们看不到联系生物界中两个不同领域的那种本质性的符号连续性（对此，西比奥克的动物符号学有过很好的证明）。西比奥克从人类和非人类动物符号系统之间的交流和连续性这一角度来集中考察连续性问题，他（1986：13）引用格里高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说法，把"艺术、音乐、芭蕾如此等等的复杂形式，甚至日常生活中人的动作交流、面部表情和说话语调等细微之处"描述成动物的非文字取向和官能的完美形式。不过同时，在人格化的意义上，动物语言和人类语言却不是同质性的。西比奥克说得很明白，文字语言是"智人"（Homo sapiens）的一种物种专有的特征，所以"惟有人才具有通过非文字和文字方式进行交流的能力，而这两种方式常常是不可分割地彼此交缠的"②。

和所有支持姿态—模仿语言起源观的那些理论一样，吉奥尔吉奥·法诺的起源论，虽然有其非科学性，但是很难被驳斥。不管如何，法诺的假设与那些因为缺乏可信的科学证据而以假设推定或者科学—虚构试验为特色的那些理论，即便是其中最有说服力的那种，相去甚远——这里所指的，主要是那些在寻求对语言起源做出解释过程中，通过上个世纪相关文献"发言"给予"说话

① 参见 Voloshinov 1929：93－113；Clark and Holquist 1984；Ponzio 1992，1998。［这里提到 Voloshinov 1929 这一参考文献，须注意，和瓦伦丁·N.沃诺辛诺夫（Valentin N. Voloshinov）的其他著作一样，在著作上都与巴赫金有着如此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一般都归入后者名下，而究其实，应该被当作一种双方合作的大度表现。］

② Sebeok 1986：12。人类的文字的和动物的非文字的（尽管常常是听觉的）交流，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在西比奥克与洛特曼（Lotman）的论辩中得到了清晰梳理："内部世界"（*Innenwelt*）是一级模塑系统，语言交流是二级模塑系统，依赖语言交流的文化构成的是三级模塑系统。内部世界，当然，在基因方面是所有动物所共同拥有的，是把动物与之物符号活动区别开来的东西。从类属方面来思考动物的"内部世界"，西比奥克把语言作为一种人类物种所专有的适应放在根基位置。与生物上决定了的动物的模塑系统或者"内部世界"相比，语言把一个生物上未决的成分引入动物模塑之中，这一成分使得人类动物能够塑形世界，一个并未完全被化约为可直接对感官作具象呈现的对象的世界，同时，正是这一成分，经过关联适应，导致了同样是人类物种所专有的语言交流的出现，把动物生命的客观世界——"环境界"（*Umwelt*），改造成了开放的"生活世界"（*Lebenwelt*），即人类物种所专有的环境界，其中，对象还作为能够根据其构成，而不仅仅是根据人类动物和非人类动物所共有的＋、－、0的范畴，被考察的独立性事物而出现。参看《动物中的一级模塑系统》（The Primary Modeling System in Animals），Deely 2007［见笔者所主编的奥古斯都·庞齐奥（Augusto Ponzio）的《纪念文集》（*Festschrift*）］。

的”狗、马、猴、海豚等毫无置疑的支持的理论。为摧毁这些科学幻想理论而做出的最为彻底而且在科学方面充满启示的贡献之一，来自西比奥克，譬如[①]：

> 在任何祖先物种的交流系统中去寻求“语言起源”的企图，都是以虚谬的错误算计作为基础的。因而一干心理学家的天真努力是纯粹的自欺欺人：他们试图说服公众，使之接受他们错误的信念，即个别被豢养的灵长目中有类似语言的各种特性，并声称自己由此而揭示出了语言的根基。未受过训练的公众，被不负责任但规模不小的媒体部门——不论是出于讥诮，还是单纯地因为与其读者同样偏信——煽动起热情，被骗得相信人的独特语言符码是一种进化型的连续体，有着灭绝了的人科动物那些多重多样的非语言符码，并且认定这些东西在现存的大猩猩那里还依然存在着。

人类文字语言的起源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而且现实中人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兴趣也并不大，因为要为这样一种考察提供科学上有效而且穷尽性的证据是不可能的。巴赫金—沃诺辛诺夫完全抛开了这个话题。把人类劳动等范畴用于研究语言演变，譬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做的，这样的理论肯定更为有趣：恩格斯把人格化看作通过社会环境进行的再生产，把劳动看作人类起源的必要条件。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人类劳动和语言是决定人格化的两个主要的控制因素［参看 Engels 1940（1896）］。意大利语言哲学家和符号学家费卢奇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运用更具当下性、经过更多完善的概念工具，沿着同样的方向展开研究[②]，他有关劳动、交换、社会再生产等范畴的研究，使得他在人格化和语言生产及本质等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另一方面，罗西－兰迪也警告我们，要当心这样一些理论：它们正确强调了人类劳动和社会环境的重要性，最终却抛开自然在有机体生物结构生成中缓慢而延续不断的工作，同时，有机体又是身处与环境相关的一个复杂关系网络之中的（有关这些方面，参看 Rossi-Landi 1968，1972，1985）。

不过，法诺的研究中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他为表明自己论点所提供的丰富细节和“证据”。这些证明本身是很有趣的，不管它们是否能够充当有效证明法诺倾向于认可的那种起源理论科学性的“扎实材料”。因此，他著作的第二部分，对语言性质和本质的探讨，在他研究工作的整个经济性方面起着首要作

---

① Sebeok 1986：12。有关人类起源解释的进一步批判，可参看，譬如，Sebeok 1979。

② 他的著作《作为劳动和商品的语言》出版于 1968 年（英译本，1983），这是在法诺著作初版问世的六年之后。

用，同时，在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上，在之前被认定为第一部分。另一方面，因为各种理由（包括法诺对论点的论证、给予不同类型符号和文字系统的注意力，尤其是他与语音中心观念之间的区别）[①]，第一部分（旨在从文字语言方面支撑模仿语言优先这一论点）是通过整合和完成第二部分来结尾的，而只有这样，它才获得了自身价值。作者第一部分中关于语言发展的历史漫论，所起作用更多的是证明了语言的性质，而不是（与他的意图相反）解释了语言的起源。

语言的性质，如查尔斯·S.皮尔斯所示，可以从文字语言中像似性相比指示性和象征性所具有的显著优势（从形成和发展角度上看，还包括时间上的领先——这使得用法诺的分析来支撑语言源自模仿这个论点成为可能）中得到分辨，这些概念在皮尔斯对一切符号中的像似、指示和象征成分进行的分辨中得到了描述。简明地说，就文字而言，交流的模仿和姿态方面这种被认定的时间领先，再度证实法诺所采取的是反语音中心论这一立场。所以，有些矛盾的是，在文字语言中，视觉因素在基因和构成方面看上去比听觉因素来得重要。这种视觉及其可拓展性［譬如，可以从"to see"动词的用法中得到证明："see to it yourself"（亲自关照）、"see what I mean"（明白我的意思），等等］揭示了形象在文字符号和非文字符号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索绪尔所说，这里的形象不仅包括视觉的和精神的，也包括听觉的形象）。尽管对于人格化过程之中文字语言的生成了解甚少，然而在语言的个体发生中（即每个个体婴儿的语言习得中），像似性要素无疑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的局限之一，如其所批判的行为学理论一样，在于在意指和交流过程之中对像似性要素完全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

在皮尔斯的符号学观照之下，尤其是他把符号分成像似符、指示符和象征符这种三分法的思想指导下，再次阅读法诺，可以发现后者的研究在理论和证据方面有着令人瞩目的价值。皮尔斯对美国和世界哲学—符号学的学术影响，法诺不可能感受不到，实际上，他对皮尔斯将逻辑等同于符号学曾有过批判［法诺说的是"意义学"（semantics），但是语境清晰地表明，他实际上指的是我们现在称为"符号学"（semiotics）的那种东西］。

当然，法诺的批判在这一点上是无效的，我们知道，皮尔斯实际上是在他

① 参见雅克·德里达（Jaques Derrida）在《书写与差异》（*L' écriture et la difference*）中对语音中心理论的批判，又参茱莉亚·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对德里达所进行的访谈《符号学与文字学》（Sémiologie et grammatologie），1971。

的符号认识科学中，作为一个整体来发展他的逻辑和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①]

法诺区别了"逻辑"和"意义学"，从而区别了"思想"和"词语"、"概念"和"象征"、"再现"和"表达符号"。他对这些术语的使用今天看来有些怪异，需要澄清。譬如，法诺本人解释说，他用"词语"或"语言"，意在指任何一种表达符号构成的系统，无论它是文字的还是非文字的。这些是今天意义学的研究对象，而语言学被描述成意义学的一个分支或者次级学科，只和文字符号有关。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法诺称之为意义学的，是一般人们理解为符号学的东西，后者包括了语言学这一分支。按照法诺的描述，意义学涉及关于逻辑再现的表达工具。

对意义学和符号学辨别的批判性阐释，是罗西—兰迪做出的（1972）。罗西—兰迪秉承皮尔斯和莫里斯的思想，对意义学和符号学进行了区别，意义学（semantics）被描述成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另外两个是符形学（syntactics）和符用学（pragmatics）。法诺批判皮尔斯把意义学（事实上是符号学）等同于逻辑，是没有看到符号和解释项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也看不到符号活动和解释、符号活动和推论之间的联系，所以，也就看不到符号学和逻辑之间的联系。这是法诺的研究中一个致命的局限，但他仍然属于意大利最先承认皮尔斯研究和20世纪60年代早期符号学重要性的符号学者之一，当时，这样的话题在意大利不过刚刚激发起人们的研究兴趣。

法诺没有认识到，符号，尤其是文字符号，并不仅仅是工具，同时还是材料——换言之，我们的思想，在对我们自身作为人类、作为有意识的生物（包括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生活之间的联系）这种分析的最后，是由符号材料构成的。[②] 符号链中一个解释项到另一个解释项之间的延宕使得思想和意指活动在此类过程之中成为可能，而符号在此类过程之中，不仅是工具，而且是此类过程的材料，不断地被完善、被改造。这些概念是罗西—兰迪在其1968年的专著《作为劳动和交换的语言》（*Language as Work and Trade*）中发展起来的（英译本，1983）。

因此，法诺对他所认为的思想和他所认为的符号进行了区别，皮尔斯却极为不同，把二者合并在他所杜撰的"思想—符号"（thought-sign）这个表达

---

① 这一点上，来自皮尔斯研究界的论据非常充分，如美国学者曼克思·费什（Max Fisch）（1986）、托马斯·A. 西比奥克（1976，1979，1981，1986），如意大利学者罗西-兰迪（1953，1975，1985）、奥古斯都·庞齐奥（1985，1990）、马西莫·博梵蒂尼（Massimo Bonfantini）（1980，1987）以及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84）。

② 参见皮尔斯对人、思想、符号之间关系的论述（*CP* 5.264—317）。

中了，最终强调了思想实际上就是符号现实，是由文字和非文字符号所构成的。[①] 他争辩说（*CP* 5.314）：

> 人的意识中，不管什么因素，在世界上都有与它对应的东西，理由显而易见。人所使用的语词或符号，就是人自身。因为，正如每个思想都是一个符号，连同生命就是一连串思想这一事实一道，证明了人就是一个符号；所以，每个思想都是一个外在的符号，证明了人就是一个外在的符号。也就是说，人和外在的符号是同一的，正如"homo"（人，人属）和"man"（人，人类）是同一的。因此，我的语言就是我自身的总和；因为人就是思想。

根据皮尔斯的定义，逻辑是有关再现的一种普遍性理论，有关使符号能够实实在在地和世界相关的有效条件的一种理论。在涉及符号通过解释项而指涉其对象这一意义上，这是一种三元性关系（*CP* 5.283）：

> 既然符号具有，如此这般的，三种指涉：首先，对于解释它的某思想而言，它是一个符号；其次，对于该思想中它所等同的对象而言，它是一个符号；最后，在使之与其对象发生关联的父母或者品质之中，它是一个符号。

或者，更为著名的说法（*CP* 2.228）：

> 符号，或者再现体，是对于某人代表着某方面或某能力中的某物那种东西。

因此，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本身是三元的：它与之前所提到的符号分成像似符、指示符和象征符三大类这种区分有关。在像似符中，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似和被认为是共有的某些品质这一基础之上的：符号的特点是就其对象而言的相对自主性所赋予的，也就是说，是它的"第一性"所赋予的。像似性不仅包括绘画和相片之类更为明显的"现实的"形象，而且包括诸如几何公式、图形、图表等。指示符与其对象在邻近性基础上有关，即它

---

① 当然，今天，随着对符号学整个历史的概括尘埃落定（Deely 2006），毋庸讳言，皮尔斯的"所有思想都在符号之中"这一论辩是最早由拉丁学者所达成的符号认识的回响；在奥古斯汀（Augustine，354—430）和普安索（Poinsot，1589—1644）之间这段时期，拉丁学者对符号认识达到顶峰，尤其是孔布拉学派（Conimbricenses，1606/1607），他们不仅公开表达了皮尔斯的观点，而且写进了著作，对于这些著作，皮尔斯是非常熟悉的（Beuchot and Deely 1995）——一般的皮尔斯研究者对此基本事实至今视而不见（Short 2007 无疑是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例子，对此，Deely 2008 有充分揭示），无疑，有皮尔斯的榜样，学习拉丁语便成了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们通过与其对象之间的必要联系来表意。另一方面，象征符则不直接地与其对象相关，而是任意性符号，在受规则制约的符码这一基础上表意。通过他的“退化”概念（degeneracy，取自数学语言），皮尔斯规定说，任何符号都不纯粹地是像似符、指示符或者象征符，三种样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时性地在场，根据行为中的符号活动类型，其中一种样式要比另外两种更占优势。换言之，在符号与其对象之间通过解释项而形成的意义学关系之中，主导作用是由规约性（象征符）、邻近性（指示符）或者相似性（像似符）三者之一实现的。

法诺对皮尔斯把逻辑和“符号学”等同起来所做的批判，根源在于他私底下是认可索绪尔那种符号模式的，后者凸显了符号的规约或任意性质，集中关注（皮尔斯描述和认定的）象征符——而不是关注符号活动进程之中解释项—符号的关键和潜在作用。不过，法诺通过对表意活动像似性构成要素的坚持，实际上克服了自身的局限，即便他这么做的目的是支撑他的语言姿态起源观！这就是我在本文开始所说明的东西，如果不看其意图支撑的论点，法诺著作的第一部分在研究专题上而言就是一种关于语言性质的理论。尽管语言的规约性是显而易见的，像似性要素却似乎在文字语言中，即在一般的语言交流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①] 法诺凸显了这一事实：他对种种书写系统的发展史进行了平行考察，展现了从高度像似性——诸如原始人的图画和记忆书写，或者古代中国人的会意文字或古代埃及人的象形文字等更具风格化的形式——逐渐过渡到规约性（象征性）占据优势的字母文字，即使在两个极端，保证和控制信息传输，靠的都是诉诸规约性的符码。通过类比，法诺分辨出口头语言中的同类发展，指出诸如暗喻、感叹、拟声这些表达上的权宜之计的像似性品质。此外，法诺的研究，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具有前卫性质，因为他按照图画要素（或像似符）比规约要素（或象征符）优先这种考虑，对模仿语言的符形结构进行了深入分析。

皮尔斯本人注意到了原始书写的非逻辑的、像似的性质，并且，和法诺一样，假设语言中存在着从融入了模仿的像似性占主导到如听觉符号所展现的规约性占主导这种逐渐过渡。像似性方面并没有从后者中被排除，相反，对于理解它们十分必要（*CP* 2.280）：

> 存在于所有一般语法命题中的几何类像似符，尽管通常都非常简单，却是布尔逻辑所昭示的哲学事实之一。在所有元初书写中，譬如埃及的象

---

① 参见笔者发表在《美国符号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西比奥克学者专号”上的压轴论文《像似性与翻译》（Iconiciy and Translation）。

形文字，都有属于非逻辑类型的像似符，会意字。在最早的话语形式中，也许有很大成分的模仿。但是，在所有已知语言中，这类再现都已经被规约性的听觉符号所取代。不过，这些就是这个样子，因而只能用像似符来解释。但是，在日常语言句法中，则存在着那种受规约性原则之助的逻辑性像似符。

此外，人发现新事实的能力，即创新和创造方面的天分，也对像似性作为推论操作中的“第一性”这种作用有所贡献。而且，尽管象征符用于通过受规约控制的那种精神联系而让某物浮现脑海，这些象征符的意义仍然是通过联系构成符号链的解释项—符号那种像似性关系而得以交流的，甚至是以之作为基础的（*CP* 2.278）：

直接交流想法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像似符，每种间接交流想法的方法都必须依赖于它在像似符运用基础上的建构。所以，每个断言必定包含一个像似符或者一系列像似符，或者必定包含其意义唯有通过像似符才可解的符号。①

在文字语言情况中，新事实或新观念的发现，常常是以使用修辞话语和暗喻技巧为特点的，这些技巧是在不同经验场之间同类性质的和同系性质的相似关系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② 同系关系在于，根据有利于人的创新和创造能力的综合—像似手段，在看上去全然无关的东西之间建立起关联性。

在对语言性质或本质的分析中，法诺也集中关注了人的创造性，强调了记忆（他也将其作为一个语言起源范畴的概念来使用）在把可感印象转化成所谓“审美意象”（aesthetic image）中的重要性（Fano 1992：198－199）：

我们之中的那道光，我们在沉思我们内心所发生的东西方面取得成功时所体验到的那种净化性的解放，源自于记忆的召唤行为。这一行为在其综合统一中汇聚了我们印象和感情的多重性。记忆通过对未经调和的感官要素的最初概括进行加工，使得审美的沉思变得可能：希腊神话之中把“记忆”（Mnemosyne）命名为“缪斯”（the Muses）之母，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

① 参见 Poinsot 1632：第二卷，问题 2，第 240～253 页，尤其是第 241 页脚注 3。

② 参见迪利的论文《字面的与暗喻的》（The Literal and the Metaphorical）以及笔者的论文《意义、暗喻和解释：形塑新世界》（Meaning，metaphor，and interpretation：modeling new worlds），两篇论文收入 Neussel（ed.）2006；又参庞齐奥 2006 年的《维柯作品中的暗喻和诗歌逻辑》（Metaphor and poetic logic in Vico）一文。

记忆被认为是认知的组成成分，即它的功能不限于对再现的简单再生产和保存，而是涉及这些再现实实在在地形成。法诺在科学综合和审美综合之间进行了类比，其中，“综合”可以按照像似性能力来理解（与“分析”相对，包括康德那种对象征式的感觉），能够通过和因为记忆行为把概念和感官的复杂经验联系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

法诺，和皮尔斯一样，认识到，审美表现中（譬如舞蹈、音乐、绘画、文学等之中展现出来的）以及各门科学中这个创造性方面主要是像似性的结果。

在其著作的第二部分，名为“论语言的性质或本质，普通语言学诸原则”（On the Nature or Essence of Language, Principles For a General Linguistics），针对本尼德托·克罗齐（Bennedetto Croce，1866—1952）和卡尔·沃斯勒（Karl Vossler，1872—1949）所阐发的“美学”和“符义学”概念，法诺采取了一种批判立场，这一点意义重大（1992：384－385）：

> 克罗齐不承认技巧在创造过程中有任何重要性，因为，由于他的直觉的个别性，他不愿接受两个意象可以相互比较，也不会同意一个意象可以比另一个更宏阔、更精妙。但是，事实上，艺术家会不断比较他的意象和表现，从轮廓模糊的再现过渡到更为精细的再现。在技巧和创造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行为，因而，在完成对某物的认识之后，艺术家把它固定在画纸或帆布上，而这会有助于他看得更真切，从一种差劲的、不完美的再现过渡到让他觉得更为满意的再现。

这段话集中表现出法诺对任何表现形式的“审美”（我们可以读作“像似”）成分的意识，它不仅在更明显的文字和非文字创造性活动中得到辨识，更重要的是充当了文字语言和总体上的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就提出有关表现符号的一种普遍性理论而言，他在其中区分了图画（即像似）符号和记忆（即规约）符号，显示出语言（即文字）符号同时具有两种符号的特点，并且证明了使它们归入一类而排开另一类有多么困难。为了明确对文字符号本质属性的这一描述，他提请我们注意，非文字艺术表现和以原始人语言为例的语言发展早期阶段中的文字交流，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分野。

在法诺的研究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他对查尔斯·莫里斯的符号行为主义的兴趣，从而预见到仅仅是近年来才被意大利符号学家注意到的理论思潮。而且，法诺并没有对罗西－兰迪论莫里斯的专著视而不见，该著作早在1953年就在意大利问世，却注定到了1975年再版时才大规模地得到关注。此外，法诺对抽象唯心主义的批判也很重要，这也许让人联想到巴赫金—沃洛辛

诺夫在前面提到的1929年著作——以沃洛辛诺夫为署名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所阐发的批判立场。

我想通过结论的方式，强调法诺在其对语言起源和性质的考察之中，关于文字交流的像似方面的出色意识。我以为，首先是他著作之中的这一特征，使得他的这本书不只是有关语言起源的历史纵览；不仅如此，它更是对语言结构分析的重大贡献。

翻译中的符号：论符号间关系之中的相似性、异质性和对话性[①]

一、解释与“被翻译项”和“翻译项”之间的异质性（对话）逻辑

我们对翻译与像似性之间关系的思考，特别是就语际翻译而言，属于符号学框架之中所观照的广义翻译语境。在“严格意义上”（*strictu sensu*）的翻译之外，即作为一个文本从一种历史—自然语言到另外一种的转换这种理解下的翻译操作之外，通过维多利亚·维尔比（1837—1912）、查尔斯·S. 皮尔斯（1839—1914）、米哈伊·M. 巴赫金（1895—1975）和罗曼·雅克布森（1896—1982）等人的工作而得以充分展现的符号学方法，强调了在符号活动和总体性的符号操作中翻译的重要性。根据这一更广阔的语境，根据符号和翻译的一般理论，我们能够更为充分地理解特殊翻译操作所暗示的东西，譬如从一种历史—自然语言到另外一种的转换，或者，更专门地，从一种特殊语言到另外一种历史—自然语言中的另外一种特殊语言的转换，譬如文学著作，特别是诗歌。翻译是一种操作，其中，一个符号实体被认为与另外一个——之前的一个符号——等同或者更发达，它以一种对话方式回应前者，在拥有无限潜力

① 本文框架如下：
一、解释与“被翻译项”和“翻译项”之间的异质性（对话）逻辑
二、对皮尔斯特色的像似性的进一步探讨
三、回到文本与像似性、指示性、象征性之间的文本动力学
四、翻译的悖论：同一的他者
五、翻译中文本之间的转世与化境
六、从不可见到可见：文本之间对话关系中并非第一位的第一性
七、翻译言语，而非翻译句子
八、可译性/不可译性与受质疑的元语言能力
九、生活、模塑与翻译
十、像似性与文字和非文字符号系统之中和之间的翻译
十一、暗喻和作为翻译—解释模塑手段的像似性

的符号活动流中解释前者，而符号活动流则创生自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之间的关系动力学。

就语际翻译而论，如果用创造和解释来理解“信”，而不是仅仅用到对原文的模仿、重复、复制（即另外一种语言中的字面照搬），则“翻译文本”（the translating text）必须与“翻译文本对象”（the text object of translation）之间确立起一种异质性关系。

这里的“异质性”[alterity，或称“他性”（otherness）]被理解为，某物的存在是因其自身理由的，是自主的，是不依赖“我”的动机、意愿、意识或承认的。按此描述，异质性与被理解为客观物质性的东西同义。物质对象相对于我而言是他者。一个人自己的身体，我们之中每一个人的身体，就其独立于意图和意识而言是“他者”。翻译中的文学文本，相对所谓原作的符号物质性而言是他者。他者作为他者的异质性——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这位我们这个时代中的伟大哲学家称之为 *autrui*——是“绝对的异质性”（absolute alterity）。在皮尔斯的术语中，绝对的异质性对应于“第一性”（firstness，下文将论及），在符号关系方面受到“像似性”（iconicity）的辖制。与之相比，“相对的异质性”（relative alterity），如巴赫金对之也有所指教的，在皮尔斯的术语中其特点是“第二性”（secondness）和“指示性”（indexicality），尽管它受到了限制，是他性的另一种模态。譬如，就主体性而言，相对的异质性属于被认为与某角色有关的符号（好比学生与老师有关、母亲与女儿有关）。也就是说，相对的异质性属于被认为与另外一个符号有关的符号。就语际翻译而言，相对的异质性属于被认为与翻译对象文本有关的翻译文本。

我提出，遵照皮尔斯引入的“解释项符号”（interpretant sign）或“解释项”（interpretant）等表达，我们用“翻译项文本”（translatant text）、“翻译项符号”（translatant sign）或者直接地以“翻译项”（translatant）来指前述之“翻译文本”，即所谓的“译入语文本”（target text）；对于后者，遵照我本人[与奥古斯都·庞齐奥（Augusto Ponzio）]把“被解释符号”（interpretaed sign）这个表达简化成“被解释项”（interpreted）的做法，则用“被翻译文本”（translated text）、“被翻译符号”（translated sign）或者直接地以“被翻译项”（translated），来指前述之“翻译的对象文本”，即所谓“译出语文本”（source text）。值得强调的是，被解释符号包括了符号与对象之间

的关系在内①，并且与解释项有关，在其本质性框架中，它呈现出一种符号三元运作模式：被翻译文本和翻译项文本之间的关系，则是被解释符号与解释项符号之间的关系。

翻译理论不可能脱离翻译符号学。反之亦然，符号理论能够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贡献中受益，无论它是有关一般性符号的问题（独特地存在于与翻译它的解释项的关联之中），还是有关被理解为元符号活动的人类专属符号活动（即通过符号来思考符号）②，并因此而成为"跨符号活动"（trans-semiosis）的问题。从符号学角度看，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是被解释符号与解释项符号之间的关系。

翻译问题在本文中被置入符号—理论和跨符号活动框架，这一框架让人想起皮尔斯，正是他引入了作为概念的解释项。由于皮尔斯的工作［一如比他早三百年的普安索（Poinsot）在《论符号》（*Tractatus de Signis*）中的工作，这一点务必说明］，符号学范型从符码化或再现符号学转为解释或意味符号学。皮尔斯从"以一物代另一物"（*aliquid stat pro alio*）这条原则出发，但引入了位于第一和第二个"物"（*aliquid*）之间的解释项这个概念③，藉以对符号反映理论做出了富有成效的质疑［Bakhtin and Voloshinov 1973 这部著作也断言，符号不是"反映"（reflect）而是"折射"（refract）符号和意义］。本文中还有一个要点，是强调尽管皮尔斯最早（1857—1866 年间）使用"再现体"（representamen）这个术语来表示一般性的符号，之后又回归到"符号"这个普通用语，但是，由于其具有构成符号三元关系这种凸显工具这一意义，因而使它始终清楚地是"符号"，是符号活动所需要的三要素之一，而非意指活动的载体；而统一三者的三元关系本身，则成为构成符号的（皮尔斯所说的）"真正的存在"（proper being）。根据皮尔斯的看法，符号活动是一种三元性的操作，它的构成要件是符号（或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符号，或再现体，

① 参见 Ponzio 1985，1990；这一观点在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挣脱束缚的符号学：符号开放网络中的解释路线》）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② 注意迪利（Deely）最近所讨论到的"元符号活动"（metasemiosis）与"元符号学"（metasemiotics）之间的区别，前者是独特地发生在有能力知道符号存在并且有能力运用符号的动物身上［"符号动物"（semiotic animal），参见 Deely，Petrilli and Ponzio 2005］的符号活动，后者则由于暗含一种描述中的矛盾（*contradictio in adjectis*），目前为止尚是一种矛盾修辞。这是一种新发展出的看法。

③ 然而，迪利对此做出了重新梳理［始于 1993 年在西比奥克奖启动仪式上的演讲，完成于其 2004 年的"对话"（dialogue）］，将其表述为"一物相对于另一物代表着非自身的又一物"（*Aliquid alicuique stance pro alio*），其中，"相对之物"（alicuique）清晰表明了三元符号关系中的解释项作用。

是第一项，它在一种真正的三元关系中与第二项——称之为它的对象——相关，因而能够决定第三项——称之为它的解释项——采取相同于它本身与它的对象相关的同一种三元关系与同一个对象相关。”（*CP* 2.274）所以，符号代表某物，即它的对象；对象“并非在所有方面，而是根据某种观念”（*CP* 2.228）“中介性地决定”（*CP* 8.343）符号。不过，符号只有在它决定“中介性地被对象所决定的”解释项这一条件下，才能办到这一点（*CP* 8.343）。“符号在解释项符号和它的对象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是因为第一个在某个方面或者观念、条件之下被它的对象决定，而且“通过把解释项带入与对象的关系之中，对应于他本身与对象的关系这种方式”决定解释项（*CP* 8.332）。

符号的解释项一般是（在语言语境中，始终是）另一个符号，是前一个符号在解释者那里创造出来的符号。它是“一个同等的符号，或者可能更为发达的符号”（*CP* 2.228）。所以，解释项符号不可能是与被解释项一样的符号——它不可能仅仅是重复——确切地说，正因为它是经过中介的、解释的，并且因为如此而始终是新的。就前一个符号而言，解释项是一个回应，并且因为如此而开启新的符号进程、新的符号活动。这一意义上，它是一个更为发达的符号。作为一个符号，解释项决定另外一个符号，后者渐次地又作为一个解释项：以这种方式，解释项向着新的符号活动敞开，它开发符号进程，它是一个新的“符号发生”。的确，每次都有一个符号发生，除了“第一符号”，还有“第三符号”：经过中介的某物、一个回应、一个解释性的新东西、一个解释项。因此，就构成而论，一个符号就是一个解释项（参 Petrilli 1998e：I. 1）。解释项（第三符号）渐次地是一个符号（第一符号），该符号（第一符号）渐次地是一个解释项（已经是第三符号），这一事实使得符号被置入一个开放的解释项网络之中。因此，我们得以明了皮尔斯关于无限的符号活动或无限的解释项系列这一原则（参 *CP* 1.339），即迪利所谓的“符号螺旋”（semiotic spiral）[①] 唯死方休。

所以，符号的意义是一个回应，一个呼唤着另外一个回应的解释项，另外一个解释项。这向我们暗示了符号与符号活动的对话性质。一个符号的意义在另外一个符号中，或者对它做出回应并且渐次地，如果有另外一个符号来回应和解释它，它又是一个符号，如此以至无穷。要有一个被解释的符号，一个解释对象，那么，必定要有一个解释项，即使在严格意义上的认知符号情况中也是如此。这个符号，就其作为一个符号而言，是他者；换言之，一个符号能够

① 首先见于 Deely 1985，之后见于 Deely 2001，2003，2004，2008。

被赋予符号特色，正是因为它朝向他者的结构敞开，它是与他者的对话。这意味着符号的身份是植根于异质性逻辑之中的。

在我的术语中，符号活动三元关系中的“第一符号”，即接受意义的对象是被解释项（重复，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而赋予意义的是解释项。解释项可能有两种类型：使符号得到承认的解释项是“辨识解释项”（an interpretant of identification），或称“起辨识作用的解释项”（an identifying interpretant）；相反，符号的特定解释项（对符号的含义或实际意义做出解释）是我们所谓的“做出积极回应的理解的解释项”（the interpretant of answering comprehension），或者更简单地称之为“积极回应解释项”（an answering interpretant）。第二类解释项不只把自身限定在辨识被解释项这个范围，更表达出它的符用性的意义，为它注入了一种关涉和参与关系；它“回应”被解释项，并针对后者持有某种立场。

对解释项的这种双重心认识，是与皮尔斯的符号学保持一致的，而后者与他的实效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在1904年致维尔比夫人的信中[①]，皮尔斯写到，当我们广义地看一个符号，那么它的解释项就不一定是一个符号，因为它可能是一个行为或经验，甚至只是一种感觉。在本文特定语境中，符号是严格意义上来理解的。事实上，作为表意的回应，使某物有意义的东西，并因为如此而渐次成为一个符号，解释项只可能是一个符号发生、一个符号行为，即便在行为、经验或感觉情况中也是如此。

这里，我们所处理的是“积极回应理解的解释项”，因而所处理的是符号。在他本人对解释项的分类中，皮尔斯（参看 *CP* 4.536）顺从了自己对三元体的狂热，将其区分为感觉、施为和符号。在他的一份手稿中[②]，皮尔斯进一步将其分为“情感解释项”（emotional interpretant）、“力量解释项”（energetic interpretant）和“逻辑解释项”（logical interpretant）。这个三元体，以及另外一个三元体——“直接解释项”（immediate interpretant）、“动态解释项”（dynamical interpretant）和“最终解释项”（final interpretant）——也许是皮尔斯为了针对各种不同方面的解释项进行归类，所构想出来的两个最为知名的三元体。

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就是符号类型学的符号活动顺序产生的结果，是推导与论辩类型学的逻辑顺序产生的结果。就皮尔斯最为根本的三元体——像

① Pierce *CP* 8.332；关于皮尔斯与维尔比之间的通信，参看 Hardwick，1977。

② MS 318，部分发表在 *CP* 5.464-496。

似符、指示符与象征符（参看 *CP* 2.275）——而言，我们得到这个还是那个结果，取决于如何组织符号和解释项之间的关系。而且，既然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同时又是根据符号和解释项之间的关系来理解的，那么，演绎法、归纳法和试推法[①]，也就取决于符号—解释项关系。[②]

就“对话的异质性”（dialogic alterity）而论，两个文本之间的差距越大，通过位于从一个符号到下一个符号的延宕所构成的具有潜在无限性的符号活动链上的另外一个解释项——被翻译文本就是此链条的组成部分——创造出艺术性重新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考虑到皮尔斯关于符号的一般理论，尤其是他的像似符—指示符—象征符三元体，当一个翻译从创造和解释来看是成功的，那么，“被翻译文本”与“翻译项文本”之间的关系就是被像似性这种特殊的相似性关系类型主导的，而不是被指示性或象征性所主导。因为文字语言不仅用于概念，而且用于暗喻，这也和像似性问题有关。翻译中的一个困难，是翻译来自其他语言的暗喻。在皮尔斯的分类中，暗喻是一个像似性符号。维尔比这位符号学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家之所以不仅用解释，而且用翻译来描述暗喻，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且，维尔比对暗喻问题是有着特别关注的（参看 Petrilli 2006，2007a，b）。符号学方法对翻译理论中可译性/不可译性这个核心问题也富有启发。无论问题关系到共同语言还是文学语言（特别是诗歌语言），或者是专门的、行业化语言，对可译性问题的更好处理，都是借鉴托马斯·A. 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1920—2001）所谓的“第一模塑”（primary modeling），或者费卢齐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先前称之为“共同话语假设”（common speech hypothesis），后来称之为“语言劳动”（linguistic work）的那种东西。

翻译必定同时是既相似又不相似，既是同一个又是另一个（参看 Petrilli 2001）。这就是翻译的悖论。

二、对皮尔斯特色的像似性的进一步探讨

在 1867 年的论文《论新范畴表》（On a New List of Categories，见 *CP* 1.545－559）中，皮尔斯首次提出像似符、指示符和象征符这一他本人称之为“最根本的”符号三元关系，在他之后，西比奥克（1976 年）继续发展了他的

---

① 我们可以说，和这一特定三元体有关的皮尔斯术语有点不同寻常，而且可能会“在放大镜下”加以改进；对此的完整讨论，参看 Deely 2008：Section 15.5，尤其是脚注 4。

② 参见 MS 318，部分发表在 *CP* 5.464－496。

符号“学科”。从符号（或皮尔斯当时所称的再现体）与真实——对解释者而言，真实是在符号质料中被模塑的——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看，像似性是根据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或者相像特征而出现的。但是，相似性本身不足以决定一个像似符号。作为相似性标准而相关的东西，取决于控制解释操作的那些行为习惯。双胞胎看上去相似，但并不是彼此的像似符号。我在镜子中的映像看上去像我，但并不是像似符号。要得到像似符号，规约或者习惯的影响、社会实践或者特殊功能就必须被补充到相似性上。像似的相似性是一种特殊的相似性：它是规约基础上的抽象，因为它是从与其他东西的相似性中取得某些特征的。一张银行支票和另一张价值 50 美元的银行支票之间的相似性，无疑在于第一张银行支票也是价值 50 美元的一个符号。但是，如果相似性完成于两张银行支票的序列号相同这一点上，那么，我们就有一张假支票，它不能作为一个像似符号在货币市场上实施合法的功能。这本身已经揭示出，像似性并不是纯粹的，而是“退化的”（degenerate，这是皮尔斯从数学中借来的一个术语），因为存在着其他符号维度——在这种情形中，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象征性。实际上，在皮尔斯的意义中所理解的象征性，就习惯而言正是符号之间的关系的特点，而且正因为如此，这种关系才有“任意性”关系的资格。这意味着，人类世界中的像似性，也同时是由文化决定的，最终要受到习惯、信念、规约、价值观体系、态度和意识形态等制约，这一点正是指示性和象征性共同存在所强调的东西（亦参 Tabakowska 1999，2003）。

同样的，如皮尔斯所说，像似符是最不依赖规约和因果性/邻接性的（*CP* 2.247）：

> 像似符是指涉对象的符号，它仅仅因为自己本身的特性而指示对象，而且，不论这样的对象存在与否，它都同样地拥有对象。的确，除非真正有这样一个对象，像似符是不会用作符号的；但这与它作为符号的特性无关。无论什么东西，平等性也好，存在的个体或者法律也好，只要它像那个东西并用作它的符号，它就是那个东西的像似符。

像似符是这样一个符号，它拥有不依赖于它在相似性方面相关的东西而使它有意义的那种特性；这样一个符号，即使它所指涉的东西并不属于可见的、经验的对象所构成的世界，也能够意指，譬如用作几何线条的像似符的粉笔标记：“像似符是拥有使它有意义那种特性的符号，即使它的对象并不存在；譬如一条铅笔画线代表一条几何学上的线条”（*CP* 2.304）。当皮尔斯讨论到“什么会作为此时此刻的存在，全然与过去和未来断开”这一问题时，对于像

似性的这个方面说得很明白，他宣称："我不能把它叫做整体性，因为即使整体性也设定了多元性。我会把它的形式叫做第一性、发源地或元初性。它就是它那个样子，无关任何它之内或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无关一切力量、一切理由。"（*CP* 2.86）

皮尔斯进一步把像似符分成三个子类，又称为"次级像似符"（hypoicons）：意象、图表和暗喻。之所以如此分类，是根据它们共享第一性的模式。意象享有简单性或者"首要第一性"（First Firstness），因而像似性关系是基于总体的和直接的相似性；表格按照类比呈现不同事物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暗喻描绘出一种平行思想。像似符表现出解释项最大限度地独立于对象，对象得以辨识的基础既不是必须的邻接性（指示符），也不是习惯（象征），而是假设的相似性。此外，在推理层面上，还考虑到假设的相似性关系，像似性在创新能力的不同程度上对试推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①]

同样的，意大利哲学家和符号学家费卢齐奥·罗西－兰迪（1921—1985）教导我们，像似符——无论问题涉及意象、图表还是暗喻——自身并不构成试推法的创新价值。他解释说，创新能力取决于特殊的一类相似，他称之为"同源相似"（homology，这是一个借自生物学的术语，参看 Rossi-Landi，1985，1992）。创新性符号操作尤其指的是同源相似的像似性在其中占据优势的那些，即，在那些操作中，被解释符号和解释项符号之间的关系并非直接地显现出来，而是关系到那种直接的、已经给定的相似性这一表层之上的动态基因结构形成操作，罗西－兰迪称之为"类比相似"（analogy）。所以，像似性和不同创新程度上的推理有关，关系到是否以类比相似或同源相似占据主导（参看 Petrilli，199a，2005a）。

像似性问题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的暗示力量、召唤力量。就人类世界而言，像似性的重要性是有迹可循的，譬如，可见于仪式系统、宗教信仰、占星、魔术、艺术话语、科学研究（因为它为文化史带来了丰富成果）。[②] 符号像似方面在文字语言中的体现，不仅是在声音（运用拟音）和词汇（其中像似效果只是虚拟的）层面，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在句法层面。[③] 按照皮尔斯的观点，语言是一种代数，或者形成表格的方法，其中，单词的意义一般取决于把种种品质混合起来再去辨识相似，把各个部分在相似性基础上联系在一起这种

---

① 关于皮尔斯思想的所有这些方面，又参 *CP* 2.247－2.249，2.266－2.270，2.273－2.302。

② 弗雷泽（Frazer 1922：12－13）区别了根据"相似性法则"（Law of Similarity）通过使用像似符进行的魔术，以及根据"接触法则"（Law of Contact of Contagion）通过指示符进行的魔术。

③ 参见 Jakobson，1965；Sebeok，1979：115。

倾向。皮尔斯注意到“表格或像似符对我们的生动影响，它们的若干组成部分在思想中和同等数量的感觉或观念联系在一起……”（*CP* 7.467）

充分理解皮尔斯的像似理论，需要理解他的存在主义图表（参看 *CP* 4.530—572），这正是他建议维尔比去研究的东西（参看 Hardwick 1977：96—108）。而西比奥克在联系皮尔斯的存在主义图表和雷尼·托姆（René Thom）的类型学方面，令人欣喜地展现出了可能的发展。

三、回到文本与像似性、指示性、象征性之间的文本动力学

但是回到翻译中的文字文本这个问题上来，这是本文的关注焦点，皮尔斯关于像似符、指示符和象征符的三元区分，联系他有关“符号”“对象”和“解释项”之间关系的分析（在我的术语中，即“被解释符号”——如前所述，这包括了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在内——和“解释项符号”之间的关系）[①]，为被翻译文本和翻译项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带来了启迪。在指示性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被解释项和解释项的关系就具有时间—空间的邻接性和/或因果性（原因和后果）基础上的必然性特点；象征性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被解释项和解释项之间的关系就由规约或习惯来决定；像似性情况下，关系则为彼此间的自主性和相似性所主导。

就跨历史—自然语言的语际翻译而言，翻译项文本并不只是在指示性基础上与被翻译文本相关。不论满意层次如何，不论如德里达所说的（1999—2000）多么“相关”（*relevante*），“翻译项”和“被翻译项”之间的关系都不可能被化约为指示的对应这一简单事实。自然，正如皮尔斯就他的类型学所澄清的，联系被解释项与解释项符号的三种关系中，没有哪种可以脱离另外两种而存在，哪怕在很低程度上，另外两种也都是存在的——指示性、象征性和像似性始终是共同在场的——所以，在皮尔斯的术语中，它们是“退化的”。毫无疑问，翻译项文本不能脱离原有的被翻译文本而存在。翻译项文本的总体格式化受到被翻译文本的满意形式这一特性的影响，这是翻译项在某种程度上有义务达成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原有的”文本而言的确是寄生性的，它欠前者某种东西（某种它“必须翻译”的东西）。这种依赖性让人可以合法地谈论到指示性。但是，如果“被解释—被翻译”与“解释项—翻译项”之间关系中的指示性程度不成比例地增加，那么，就原作而言，翻译就不仅在价值方面受损，而且可能在满意性和关联性方面受损。

---

① 参见 Petrilli 1998a；Petrilli and Ponzio 2005b；Ponzio 1990。

对任何解释项而言，要成为让人满意的解释项，翻译项文本就必须不仅重复被解释项，而且必须建立一种“积极回应的理解”的关系，用巴赫金的话说，就是建立一种对话的、创造的、积极回应的距离关系——一种对话的异质性关系。[①] 译者的解释能力，就创造性而言，是与减少其文本中的指示性成分直接成比例的。我们还可以说，翻译项和被翻译项并不是在演绎法基础之上彼此相关的——一旦定下被翻译文本，既定的翻译就必然不可避免地由之而来了——情况并不是这样。这和我们前边的说法并无不同：换言之，翻译项文本与被翻译文本关联，不是必须靠因果性关系、原因和后果的关系，甚至更不是靠邻接性关系。翻译项文本能够独立于所谓原文而存在，与后者拉开距离。同时，翻译项文本和原文之间的关系也不纯粹是象征性的或者规约性的。要按照象征性或者规约性来描述语际翻译操作中这种被解释项—解释项关系，会陷入这样一种谬误：从一种历史—自然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从一种语言规约到另外一种语言规约，这之间的转换仅仅意味着把相同的意义传递到不同的能指之中。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关于“相同的”意义从原文到翻译项文本的转换问题。如前所述，翻译项文本必须针对原文尝试“积极回应的理解”这样一种关系。更有趣的是，原作的意义事实上是在这种解释工作中被确定和决定的，它一直保持不变，直到另外一个翻译、另外一种解释提出一个不同的解释项、一个不同的翻译项，从而使其意义得到强化。

这种最能体现翻译本质的被解释项—解释项关系是“像似性的”。指示性和象征性必须是在场的、活跃的，但是，在成功翻译这种情形中，像似性维度必定是占主导的。如皮尔斯所说，如果像似符被理解为这样一个符号——它的最大特点是倾向于依赖它所指涉的“相似性”关系，而不是因果性或者邻接性关系，也不是具有任意特色的规约性（指示性和象征性所呈现的那些），那么，翻译项文本和被翻译文本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就是像似性的：译作必须要像原作。

同时，如皮尔斯在其有关像似符的讨论中所澄清的，相像并不排除相对于原文的创新、创造和自主能力，恰恰相反，相像正是这些能力的条件。的确，如皮尔斯所说，像似符是因为其自身而最大限度地被赋予了价值的符号，它并不依赖于它所相像的东西。译文可以做出不同主张，拥有不同构想：它可以单纯地逐字逐句地陪伴原文，或者走到另一个极端，以在另外一种语言之中重新创造原文并取得炫目成功为目的，关键在于译文本身有价值——在文学文本的

① 参见 Bakhtin，1963，1965，1975，1990。

情形中，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它都有可能在审美价值上达到如此高度，以至于以其自身的名义而成为一件艺术品。

四、翻译的悖论：同一的他者

正如我们倾向于相信，在一个重复自身的序列中，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所说的先来者引出后来者这种顺序中，二者通过必要性关系得以相互联系，我们倾向于相信，文本的顺序是必须的和不可改变的，在我们熟悉文本和根据既定框架和习惯操作文本的时候，尤其是如此。这一思路甚至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文本中的任何改变都是一种亵渎。根据这一推论路线，文本只可能是那个文本；所以它的翻译，任何形式的翻译，分析到最后都是赝品。

且让我们这样来举例：对一位习惯于阅读但丁（Dante Alighieri）意大利语文本的《神曲》（*Divine Comedy*）的读者，《地狱》（*Inferno*）只能用"*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在我们人生的中途）开始；变体不会被其欣赏——不仅在转移或转换到另外一种语言中这一意义上是这样，在同一语言的释义形式中也是这样。相反，对于一个不熟悉古希腊文的读者来说，《奥德赛》（*Odyssey*）可以在无数种不同变体中看到，没有哪种作为评价忠实与否的标准而被提到——然而我们的确是在讨论翻译。这些变体是散体还是诗体也没有区别。想想荷马的文本吧。在意大利，文森佐·蒙蒂（Vincenzo Monti）的《伊里亚特》（*Iliad*）意大利语译本行使着原作的作用，对第一次碰到该译本、初入学堂即开始并且继续阅读它的那些人，尤其是如此，只要他们不想承认非蒙蒂译本。不过，根据尤果·佛斯科洛（Ugo Foscolo）的说法，蒙蒂根本不配称为研究古希腊的学者！的确，他的翻译似乎是出自其他译本，而非出自原作。佛斯科洛称他为"荷马译者中的骗子"（*Traduttor dei traduttor d' Omero*）。

想起芝诺（Zeno）[①] 关于阿喀琉斯与乌龟的谜题，且让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阿喀琉斯总是追不上乌龟，因为乌龟总是在阿喀琉斯赶到那一点的时候已经爬过了那一点）：善跑的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阿喀琉斯）像不像技艺娴熟而且相关的译本？"相关的译本"，就像阿喀琉斯，有义务抵达原作，而原作就像那只乌龟，只有开始的出发优势，先出发的优势。然而，恰恰是因

① 伊利亚的芝诺（Zeno of Elea，公元前 490？—公元前 430？）：古希腊伊利亚学派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称之为辩证法的开创者。他以悖论著称，这里的"阿喀琉斯和乌龟"和"飞矢不动"都是他所提出的著名悖论。——译者注

为这种优势，就像阿喀琉斯和乌龟之间的关系，译作、翻译项文本，便不能抵达原作、被翻译文本。

任何情况下，我们需要记住，芝诺用来否定运动、变化和变成的逻辑或辩词（譬如关于阿喀琉斯和乌龟，或者关于飞矢不动），最终都是想要支持巴门尼德（Parmenides）[①]及其与多元存在针锋相对的不变统一这一论点。巴门尼德反对多元性观点，坚持统一性观点，他引入了存在这一概念，认为存在就是一。[②] 在某个方面，坚持那个唯一的一、唯一的统一性与翻译问题有关这种论点是可能的。反对多元性，反对派生性，对于一般人有关原作、被翻译作品独一无二而译作（无论数量多少）总是其译作这种关系的看法，是适用的。根据本文观点，则重要的是强调，芝诺对多元性的反对，如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中所说，是基于相似性概念的，也就是说，是基于通常被拿来对被翻译文本及其众多译本之间关系做出解释的同一个观念。

即使译本只是以同一种语言“改写”的文本，它也不可能和原作一样［即使是皮埃尔·米纳尔（Pierre Menard）的《堂吉诃德》（*Quijote*）和米盖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堂吉诃德》（*Quijote*）也不可能；对此，可参看博尔赫斯（Borges）名为“《堂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米纳尔”（“Pierre Menard，author del *Quijote*”，1939b）这篇论文］。如果译本与原作完全相似，它就是一样的东西，是同一文本的另一复件。这就是翻译的悖论，是派生性的悖论。承认翻译可能，就是承认某物可能既相似又不相似（ομοια ανδ ανομοια），这是一种真正的矛盾。我们可以求助于芝诺的辩词，如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127d－128e）中所说的那样，并且否认既相似又不相似的多元的存在。即我们可以表明，既作为原初的被翻译文本而存在，又作为翻译项文本而存在，这样一种文本观念是荒谬的。按照这种推理思路，并且考虑到，让不相似的东西相似、让相似的东西不相似这种做法是不可能的，那么，既然有了这些不可能条件，各种译本的存在也就是不可能的。

相反，按照阿喀琉斯和乌龟这个悖论所表达的，“翻译悖论”存在于这一事实：为了抵达翻译中的对象——文本，翻译项文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找回前者一开始就在先的这一优势。参照阿喀琉斯和乌龟，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Physics*，239b 14－20）中的辩论是这么讲述的：在比赛中，跑得最快的人不

---

① 伊利亚的巴门尼德（Parmendes of Elea）：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伊利亚学派创始人，唯一传世的是《论自然》（*On Nature*）这首诗残篇，在他眼中，现实是一，变化是不可能的，存在是无限、统一、必需和不变的。——译者注

② 关于芝诺的谜题，参看 Colli 1998；Deely 2001：40。

可能超过跑得最慢的人，因为追赶者首先必须抵达被追赶者开始的那个点，所以跑得慢的人必然始终保持领先。这个论辩原则上与飞矢不动那个悖论是相同的：箭永远无法抵达目标，因为它必须飞过射程中等分的无限多的对半，而其中等分是无限可分的。但在阿喀琉斯的论辩中，他每次试图抵达乌龟所要完成的距离则不是持续对半的。

博尔赫斯用略有不同的方式表述了这个论辩［参《阿喀琉斯与乌龟的永远赛跑》（La perpetua carrera de Aquiles y la tortuga），1932b，以及“乌龟意象”（Avatares de la tortuga）］：阿喀琉斯比乌龟快十倍，所以，在比赛中，他有十倍的优势。但是，如果阿喀琉斯跑得比乌龟快十倍，那么阿喀琉斯跑一米，乌龟跑十米；阿喀琉斯跑十米，乌龟跑一百米；阿喀琉斯跑一百米，乌龟跑一千米，如此到无穷。所以，善跑的阿喀琉斯将永远赶不上慢吞吞的乌龟。博尔赫斯报告并考察了下列诸位反驳芝诺悖论的各种尝试：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斯图亚特·密尔（Stuart Mill）（逻辑系统）、亨利·柏格森（Henry Bergson）［《论意识的直接材料》（Essays upon the immediate date of consciousness）］、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哲学问题若干》（*Some Problems of Philosophy*）中，他坚持认为，芝诺的悖论不仅对空间现实发动抨击，而且对更耐受也更微妙的时间现实发动抨击］，以及白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数学哲学引论》（*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博尔赫斯认为，就论辩力度而论，唯有罗素的尝试称得上是“原创性的”。之所以把这个评价放在引号中，是因为所有后续的论辩都是始源文本的变体或翻译，它们都想和芝诺的悖论比一比，想要在辩论力度上和它打平。

皮埃尔·米纳尔，这位《堂吉诃德》的译者，也关注到阿喀琉斯和乌龟这个谜题。博尔赫斯讲过一个有关米纳尔的小故事，收在《小说集》（*Fictiones*）里，这个故事也是悖论的。在故事中，米纳尔的《堂吉诃德》作为《问题的问题》（*Les problems d’ un problèm*）被列在他的作品集里，时间署为巴黎1917。米纳尔按照时间顺序，讨论了解决阿喀琉斯悖论的不同方案，并且在第二版里在献词之中引用到莱布尼茨（Leibniz）的建议“先生，不要害怕乌龟”（*Ne craignez point, monsieur, la tortue*）。为什么我们要怕慢吞吞的乌龟？因为它的优势，因为拉开的距离，流逝时间就像一道鸿沟，在空间和时间中把乌龟和善跑的阿喀琉斯分开。害怕乌龟就是因为原作、被翻译文本具有先来的优势而害怕译作、翻译项文本。害怕原作并且忠实地尊重它：米纳尔决定，他不会创作另外一个堂吉诃德，要的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原有的堂吉诃德。当

然，这不只是一个模仿或者复制原作的问题。这将意味着再次提出原作优势，把譬如米纳尔所创作的《堂吉诃德》变成第二文本。米纳尔对原作有一种神圣的恐惧，而无论他对于创作出恰好与塞万提斯字对字的东西来这一点是否有恐惧。米纳尔成功地从《堂吉诃德》的第一部分创作出第九章和第三十八章。他的权宜之计是什么？在排除与塞万提斯竞争这个想法并对后者的生活、时代、生平背景产生认同之后；在抵达《堂吉诃德》之后，他在某个意义上变成了塞万提斯（塞万提斯之所以决定性地占有优势，唯一原因就在于他计划写这同一件艺术作品的时间更早），他决定，更大的挑战是，抵达《堂吉诃德》的同时，通过自己身为米纳尔的经验，让自己依然是米纳尔。

米纳尔的《堂吉诃德》（只是一件不完整的艺术作品，不死之人才能完成）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只是“文字上一样”。为了证明不同，在其小故事中，博尔赫斯引用了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的一段（出自第一部第九章），并从米纳尔的《堂吉诃德》中引用了对应的一段。即便两段在字上对应，米纳尔，这位威廉·詹姆斯同代人的版本，明显有着语言运用方面的弦外之音。同塞万提斯不同，对米纳尔来说，以同样用语在两段话中都讨论到的历史真实，并不是发生过的东西，而是我们认为发生过的东西。阿喀琉斯能够找回乌龟的优势并且超过它，原因只在于，是阿喀琉斯给了乌龟优势，即便它先开始，也是阿喀琉斯让乌龟先开始的。考虑到这所有一切，是乌龟依赖于阿喀琉斯，因为是他慷慨地给了乌龟优势；事实上，阿喀琉斯击败了乌龟，超越了乌龟。时间也起到了作用。米纳尔《堂吉诃德》的风格不可避免地是古老的、造作的，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相比当时所说的西班牙语，已经被更新了、跟上了时代。

五、翻译中文本之间的转世与化境

安托宁·阿尔托德（Antonin Artaud）这位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作品译者所提出的翻译（1989），情况有所不同：原作之后到来的文本宣称自己是第一，事实上，它宣称自己就是原作性质的。这种情况中，译作质问原作，强调自身相对原作、写于之前那个文本的差别。这种情况中，译本不仅与原作发生争执，而且也与它所译成的语言发生争执。这种翻译情况中，“存在”和“肉身”、身体与生命，都在操作之中悬而未决，好比在残酷戏剧中一样。

卡罗尔的文字游戏并不超过对所指与能指之间交换关系的戏弄。卡罗尔并未成功地废止虚伪和压抑，而交换关系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他也没有处

理交换对之起作用的社会结构、生产机制、意识形态假设。卡罗尔对镜子飞快地看了一眼，但是与这种双重性保持距离，只凭借天性捕捉到它的影子：无心的、神经质的玩笑层出不穷；语言装腔作势。正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96：37—38）所观察到的，《爱丽丝地下历险》[*Alice's Adventures Underground*，这正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的最早标题]中，内心深处的战斗、心中的魔鬼、身体的混搭、骚乱、秩序颠倒、最底下与最高尚碰在一起、食物和排泄、吃人的单词、地下冒险，等，都被表层游戏所替代了：没有坍塌，只有边缘滑行动作。

最终，与阿尔托德睥睨语法的壮举相比，卡罗尔的文本被描述成一个差劲的模仿，一个粗俗的复制。预先所认定的原作只是经过去酸（"加糖"）的剽窃，缺乏由阿尔托德首次写出的那一作品的锋芒和活力。事实上，阿尔托德想要给《继承与发扬》（*L'arve et l'aume*）补上一篇后记，说明是他第一个构思出关于鱼、存在、服从、海洋、上帝、揭示被遮蔽的真相等的这首诗（所有这一切都包括在他对卡罗尔的翻译中了），他的确写了这篇后记，而几百年之后，人们只会再次发现，是卡罗尔蹩脚地复制了他（参看 Ponzio 1997b，1998；Petrilli 1999）。

这是一个转世的例子：原作在一个虚弱、没有血色的肉体中获得灵魂，现在，通过阿尔托德的写作，它最后得到解脱，回到它原来的样子。这不仅是有关从一个作者到另一个作者的转换，而且是有关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世问题：文本摆脱了语言肉身，甚至摆脱了翻译它的那种语言。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吗？或者，每种翻译——每种文学文本的翻译——都是文本的转世，以求摆脱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作者、自己的当下性？但是，每个文本都是它自己时代的囚徒，阅读这文本的行为就是试图解放这文本，难道不是这样吗？一旦文本被阅读、被翻译，难道它不是成了解释它的新文本中的囚徒吗？每个阅读、每个翻译，都是一种转世，一种无穷尽的转世。

翻译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被翻译文本从阅读和解释它的文本、翻译项文本中撤出，因为它是不可抵达的。但正因为如此，它始终是无穷转世的囚徒。乌龟悖论的一个转世就是翻译问题本身。博尔赫斯用了"乌龟转世"（"乌龟意象"）这个表达来指复制芝诺悖论的所有论辩。这个悖论及其所有转世都和"弄垮和逼疯其他"的无穷概念有关。无穷这一理念就体现在"阿喀琉斯与乌龟的永远赛跑"这个表达之中，这正是博尔赫斯两篇关于阿喀琉斯和乌龟的文章之一的标题。

这是《传道书》（*Ecclesiastes*）或《圣经》（*Qohélet*）中"太阳底下无新

事”（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那种无限。意大利语译者吉多·塞洛内蒂（Guido Ceronetti 1970）把它翻译成“*Un infinito vuoto*”（无限的虚空），之后在他对同一文本的不断修订中（参1988年的再版），把它翻译成“*Fumo di fumi*”（无中之无）。这是圣哲罗姆（Saint Jerome）所谓的“*vanitas vanitatum*”（虚荣之虚）；圣哲罗姆本人就是对翻译悖论有过思考的一位翻译家［写有《论最好的翻译》（*Liber de optimo interpretandi*）］。他的格言是“勿要字对字地去翻，要依据所表达的意义”（*non verbum et verbo redder*，*sed sensum exprimere de sensu*），然而，如德里达所注意到的（Derrida 1999－2000：30），当面对圣经中的“神秘词序”（*verborum ordo mysterium*）时，圣哲罗姆却又表现出例外。这是阿喀琉斯对乌龟的永远追逐中的无限，是译作对原作的追逐中的无限。塞洛内蒂在自己对昙花一现“原作”的追逐中，将《圣经》翻了又翻。[①]（《圣经》，意大利语译本，见 Ceronetti 1970）：

Andare e girare il vento / Da Sud a Settentrione / Girare girare andare / Del vento nel suo girare / Tutti fiumi senza riempirlo / Si gettano nel mare / Sempre alla stessa force / Si vanno i fiumi a gettare / Si stanca qualsiasi parola /Di più non puoi farle dire.

以下是重译（《圣经》，意大利语译本，见 Ceronetti 1988）：

Andato a Sud gira a Nord / Il vento nel suo andare / Dopo giri su giri / Il vento ricomincia il suo girare / Si versano nel mare tutti fiumi / Senza riempire il mare / E là dove si versano / Seguiteranno ad andare / Stancabile è ogni parola / Oltre il dire non può.

博尔赫斯知道无限，知道乌龟永远的比赛及其转世，但是他不是像一个想要解决悖论的哲学家那样而知道。由于他的文本经验，由于他阅读—改写方面的实践，他是像一个作者和译者那样而知道。就像“我们的”同样身为译者—作者的吉亚科莫·里奥帕迪（Giacomo Leopardi），博尔赫斯知道无限。在“传道书，1—9”［“Ecclesiastés，1－9”，见 *La cifra*（《数字》），Borges 1981］中，博尔赫斯通过关于永恒的反复开始、永恒的趋向、太阳下永恒的奔跑这样的圣经用语，表达了无限观念。但是，当太阳再次开始，没有分别，反反复复，慢慢前进；它使得所有运动都显得停滞，仿佛被限制在向某种东西伸出手

① 以下两段翻译，翻译的是希伯来语《圣经》中《传道书》的同一内容，汉语大意如下：“风刮向南，又转向北，周而复始流转不歇。江河入海而海不满，江河如何来则如何去。世事无穷匮，夫复何言。”——译者注

去这种姿势中。一切都注定始终无法满意，无法满足，无法结束。

通过他的悖论，芝诺提出了无限这个问题，但是，和其他哲学家不同，他并未声称要解决它。实际上，如果像柏拉图所说的（1997a），哲学就是质询累积和生产的能力，强调人的非功用特性的能力，那么，哲学家，像芝诺一样，就是重新发现悖论（圣经的）真相的那个人——换言之，善跑的阿喀琉斯被慢吞吞的乌龟击败了。即使这里所说的哲学家受教于如亚里士多德一般的最重要哲学家而不是半人半马的克戎，就像在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情形中，情况仍然是如此（参看 Ponzio 1990）。[1] 无疑，通过无限的重新阅读和翻译所达成的文本转世，可以被算在"乌龟的转世"之列。应该存在一个翻译项文本，甚至是一个阅读文本，这一事实是一个悖论。文本是一，不可能是多，因为这些会与第一个发生矛盾，成为既相似又不相似，既是同一个又是另一个。然而同时，文本从一变为二，从二变为三，如此而至无穷，仅仅是因为它存在。文本自身，由于它作为符号的本性，便是一个无限的转世。

六、从不可见到可见：文本之间对话关系中并非第一位的第一性

如皮尔斯所清晰阐明的，意义不在符号之中，而是在符号之间的三元关系之中。这里指的不是构成符码的语言（langue）这个确定而封闭系统的符号，而是指解释过程中所产生的符号，这一过程在从一类符号到另一类符号、从一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的转换/翻译中没有限界。解释越是非简单重复、字面翻译、同义替换，越是重新阐发、说明性和创造性的改头换面，越是不以之前确立的符码为借口和保证的冒险，这个过程就越能够充分翻译出符号的意义来。符号身份要求不断的位移。每次符号被解释，它就变成别的，它实际上就是另外一个符号，起着解释项的作用。符号的身份通过它的转世而达成，通过它从一个符号到另一个的化境而达成。辨识一个符号，如果不通过展示另外一个符号这种方法，是不可能的。之前的符号只能作为另一个符号的镜中映像而被把握，它包括了这样一种镜子游戏所涉及的所有变形。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有关"乌龟转世"的悖论。

翻译悖论显然是有关文本的悖论，有关符号的悖论。如果相似性问题是翻

---

① 克戎（Cheiron）：希腊神话中人首马身形象的智者，阿喀琉斯等众多英雄的老师。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 356—公元前 323）：马其顿帝国国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年少时，亚里士多德曾担任他的老师。——译者注

译的核心的话[1]，这个问题对于文本及其在特定历史—自然语言中的构造就不会不重要，而文本本身，在成为无止境的阅读和翻译操作中进一步解释项的被解释符号之前，就是一个解释项符号。文本与其所指涉的东西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在相似性中表现出自身。此外，文学文本——事实上，一般的艺术文本——都有这样一个特点：相似性关系是以“描绘”或“刻画”的方式而不是以模仿、再现、辨识或者统一的方式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不是作为另外一种语言中的简单复制品，这正是巴赫金特别说明的一个事实。[2]

受保罗·克里（Paul Klee）启发[3]，我们可以补充说，文本——一般性的文学、绘画、艺术的文本——并不描绘可见之物（剧场表演或再现中的戏剧文本会这样），而是让不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从不可见到可见”（*per invisibilia visibilia*）正是第二届尼西亚大会上教会神父们所引入的一条古典规则，当时他们开始捍卫圣像（icon），制止其被同化为一众形象（idol）。[4] 文学文本以及范围更广的艺术文本，把自己表现得更像圣像而不是形象。[5] 就其作为圣像而言，艺术文本可以摆脱妖怪身份，摆脱一种被客体化和具体化世界的形象崇拜。这一转换是从再现的形象——在再现中主体和客体由于注视和具体化而被凝固下来，到根据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前行运动所描绘的圣像——遵守异质性逻辑的一个单边的、开放的射体。这个“理想形象”（*eidolon*，*eido*，*video*）让自己呈现并且被再现；它被注视捕获，被自身、主体所拥有。形象把自己直接地给予注视，满足注视；渐次地，注视始终完全是附着在可见东西上的，从未试图超越它。圣像暗示着超越的能力，因为超越我们此刻使用的意义上的“再现”的界限，表示可见的、明显的、已经给出的东西。

跨文本的翻译（无论这暗示着跨越不同历史—自然语言，还是单一的历史—自然语言中的不同语言），意味着随意指潜能的增加而增进超越能力，强化符号之间关系的像似性方面。这意味着强化被解释符号与解释项符号之间、翻译文本对象与翻译项文本之间绝对他性和创造性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之中，

---

① 2001年在纽约召开了有关“翻译中的相似与差异”（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的国际会议，参见 Arduini and Hodgson，2004。

② 参见 Petrilli and Ponzio，1999。

③ 保罗·克里（1879—1940）：出生于瑞士的著名画家。他曾任教于德国包豪斯艺术学校（Bauhaus School of Art），著作《论形式与设计理论》（*Schriften zur Form und Gestaltungslehre*）对西方现代艺术有着深远影响。——译者注

④ 第二届尼西亚大会（The Second Council of Nicaea）是公元787年召开于尼西亚（今伊朗伊兹尼克）的一次世界性基督教大会，目的是为了恢复使用和崇拜圣像。——译者注

⑤ 参见 Luciano Ponzio，2000，2002。

我们根据适宜于我们时代、适宜于新意指的语境，寻求并发明新的解释项，以求开发出之前符号、之前文本的意义。符号的意义不可能被局限在某类符号或符号系统之中，譬如，特定的历史—自然语言之中。意义和解释性射体耦合，后者并没有类型或者系统方面的限界。当翻译操作涉及解释项时，这尤其明显，而无论这解释项是文字的还是非文字的，是否属于另外一种语言，是否属于另外一种语言—文化模塑系统。

文学文本、一般艺术文本，避开了某特定射体从某前提开始到得出某必然结果结束这种演绎法。就文学创作而言，演绎逻辑被联想逻辑取代，这是被理解为阅读—写作的翻译的逻辑，它涉及积极参与和最高程度的积极回应的理解。就联想逻辑而言，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通过基于译者个人记忆的联想——记忆、兴趣、好奇、经验、"旁骛"的能力等变换——得到确立。这种情况下，被解释符号到解释项符号之间的延宕，不是像指示性关系中那样通过抑制关系、通过演绎法来决定或主导的。联想性逻辑主导的地方，被解释项和解释项之间的关系根据假设发展推进，它要求读者的动力和创造性，要求主要属于引证类的推导，即高度创造性和开创性，其中，按照符号学的说法，是像似性符号占据优势的。如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观察到的那样[①]，阅读文学创作就意味着对其进行改写。这个过程在跨不同历史—自然语言的切换中被强化了。文学创作的特点是对话思想和文本间性，是通过强化意指的符号活动流去切换能指那种能力，从意味方面来说同样是如此。意指过程的这个方面，当它把读者注意力引向作者所说的东西，引向之所以这么说的自传、心理学、意识形态、历史—社会理由，便避开了文学批评。跨语言的翻译辨析了阅读/创作（再创作）过程的联想特征，为把文本从单一符号类型或系统中解放出来做出了贡献。同一语言中的文本实践，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翻译活动了，跨语言翻译操作则让这种活动得到了强化，在这一程度上说，对话性的文本间性对文本具有结构性意义。

像似性确立了异质性与当下形象之间的关联关系，对于后者它保持着距离——但这是就他性而言，而不是就可替换项而言。换言之，像似符并不因为考虑到当下性而提供一个可替换项，而是超越当下、再现和客体化的。列维纳斯（Levinas）会说[②]，就对象而言，像似符是它的影子；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会说，是它的他性，"绝对的他性"（absolute otherness）。作为

① 参见 Bartes，1982；以及 1993－1995 多处。
② 参见 Levinas，1948。

我们时代的像似符，艺术文本，无论是文学文本还是其他什么，就它并非始终拘囿在当下限制之内，它并不认同世界就是所是的那个样子这一意义上，并不属于当下。从这一角度看，像似符对当下是超越性的。像似性暗示着绝对他性的那种他性，而不是指示性的那种相对他性。就圣像问题而言，展示它自身的并不为注视所拥有，而是抗拒注视，拒绝被注视所限制和摆弄。像似符坚持它的他性，拒绝与再现的直接性、与对象的界限合为一体。和形象不同，圣像回避同一性、总体性逻辑，以描绘的方式，以呈现而不是再现的方式出现，呈现出不在场，呈现出绝对的他者。

当像似性主导符号之间的关系——犹如在所描绘情形中那样，在次级的、复杂的文本，文学文本或者更一般性的艺术文本中那样，这并不同于原初的、简单的文本，属于共同话语类型的文本——符号及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中介的、拉开了距离的。对比而言，就形象而言，主体从镜中被映照，不可能撤出，不可能是相对再现的一个越界的、超越的幻象（参看 Bakhtin 1990：5—22）。像似性主导的地方，幻象超过注视，进入描绘的逻辑；主体从超本土化和超量关系之中撤出。在描绘中，有关他者的体系论，一个他者和另一个他者（绝对他者）之间关系的独特性（参看 Levinas 1961，1974，1993；又参 Marion 1979，1984），不再稳定并且取代了有关自我及其价值观的体系论（参看 Bakhtin 1993）。像似符超越了注视、客体化的对象和可见之物。如前所述，像似符并不描绘可见之物，而是使之可见，使不可见的变得可见。对象是被揭示，而不是被揭去面纱。像似符并不因注视而来，而是超越注视。像似符来自唤起注视并使其觉得不满的那种东西；它要求一种幻象，这幻象在对他者的孜孜以求中超越寻常限制，从来就不会被拘囿在可见之物的限界之中。像似符描绘出不可化约的他性，没有原作的源头；它呈现出本源（arché）、发源地、第一性，正如皮尔斯在本文开始所引文段中所说的那样（*CP* 2.86）。

皮尔斯用“创造性”（originality）来分析像似符号。像似符是“创造性符号”（originalian sign），对其也用数学意义上的“退化”（degeneracy）来描述（*CP* 2.92）：

> 在更大程度上退化的符号是创造性符号，或像似符号，此符号的意指纯粹因为其品质而来。譬如，我如此这般想象我在某些情形之下会如何行事，以便让自己明白另一个人可能会如何行事。我们说，一张我们未曾见过的人的肖像是有说服力的。仅仅基于我在肖像中看到的东西，就会引导我对肖像所呈现的人形成某种看法，就此而言，它就是像似符。但是，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像似符，因为我知道它是一种效果，通过艺术

家，由那本人的表象所引出的效果，这让我大受影响；同时，它因此而与那本人具有一种真正的“条件逻辑”（Obsistent）关系。此外，我知道，肖像与那本人只有最少的相似，除非是在某些规约性的方面，而且是排在有关价值观等的规约性量度之后。

就皮尔斯区分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的三元体而言，像似性与第一性耦合。“第一性”（Firstness）是给予皮尔斯所辨识世界中三种范畴现象之一的名称，另外两种，如这里所示，是“第二性”（Secondness）和“第三性”（Thirdness）。第一性有助于解释种种逻辑—认知操作，所以，也就有助于解释符号的构成。按照皮尔斯符号类型学来分析，第一性与像似性范畴耦合。把自己呈现为第一性、在场、“如此这般的性质”（suchness）、纯粹品质的这种东西，是以相似性关系为特征的（参看 *CP* 1.356—358）。正如我在先前一篇论文，《谓词判断的符号现象学》（semiotic phenomenology of predicative judgment）[①] 中所阐明的，第一性也被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关于认知和谓词判断的现象学预见到了，尽管他所用的术语不同。第一性主导的地方，他性不可能被化约为同一关系。下边一段话强调了，就第一性和像似性而言，相似性关系有着有趣的复杂性和意指潜能（*CP* 2.276）：

> 像似符是再现体，它的再现品质是它作为第一的第一性。即它作为事物所具有的一种品质，这种品质使它适宜于作为再现体。因此，任何东西都适宜于充当它所相像东西的替代者。[“替代”（substitute）这个概念涉及有目的的东西，因而具有真正的第三性。] 是否存在其他类替代，我们下边将会看到。因为第一性而来的再现体只能有一个相似对象。因此，因为对比而来的符号仅仅是因为对比而指示其对象，或者两种品质之间的第二性。因为第三性而来的符号是其对象的意象，更为严格地说，只能是一个观念。因为它必须产生一个解释项观念；外在的对象通过对大脑的反应而激活观念。但是，按照最为严格的说法，即使观念，除非是在可能性或第一性的意义上，否则不可能是像似符。单独的可能性纯粹因为其品质而成为像似符；它的对象只能是第一性。但是，符号可能有像似性，即，可能主要因为其相似性而代表其对象，无论它的存在模式是什么。如果想要一个实质性的东西，那么，像似性的再现体可能被命名为次级像似符。任何物质性意象，譬如一幅画，就其再现模式而言主要是规约性的；但在其

① Petrilli 1998d（意大利语），1999a（英语）；又参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b：10.1。

自身，在没有传说或者标签情况下，它可以被称为一个次级像似符。

文学文本，事实上一般性的艺术文本，从可见中寻求他者；可见总是在可见中呈现自我：不可见的可见（*invisibilia visibilia*）。次级的、复杂的文本——文学或艺术文本——所产生的幻象，不同于形象世界，不同于之前确立的行为、熟悉的对象和规约所构成的世界。回想起胡塞尔这位《经验与判断》（*Experience and Judgment*）作者的说法[①]，就如其所是的、已经给定的世界而言，艺术文本所对付的是“新纪元”（*epoché*），并且回归到第一性所主导的像似性类型的元初关系。作为研究中世纪符号学的专家[②]，皮尔斯对于“圣像—意象”（icon－image）和“形象—意象”（idol－image）之间的区别相当清楚。这可能影响到他最后决定引入“像似符”（icon）来区别“指示符”和“象征符”，而不是有欠妥帖的“相像”（likeness）、“复制品”（copy）、“意象”（image）、“类似”（analogue）等。[③]

和所有文本一样，文学文本在初始也是一个解释项。文学文本进行描绘，之后才被描绘，通过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文字的或非文字的符号系统被变得可见。类似于翻译项文本，被看作与之前的被解释符号相关的解释项符号的文学文本，把不可见的变得可见了。它也和他者相关，而非与同一相关。如上面分析的，如此这般的、如列维纳斯所阐述的艺术作品，把不可见的、同一的他性变成了它的影子。如列维纳斯所告诫我们的，所有身份，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自我身份”（Identity of Self），携带着一个影子，即它们的他性，后者绝不可能通过努力就被消除。在他的论文《现实及其影子》（La realité et son ombre）的某一处[④]，列维纳斯在提到芝诺的飞矢不动这一悖论时，叫他“芝诺，残酷的芝诺……那支箭……”。尽管没有明说，但列维纳斯是从瓦雷里（Valéry）的《海滨墓园》（Le cimetière marin）引用出这句的。在这首诗中，瓦雷里还提到了芝诺的第二个悖论：阿喀琉斯追不上慢吞吞的乌龟。换言之，阿喀琉斯，自我身份，在留下自己的影子时无法成功抗衡他自己的异质性。用皮尔斯的话说，自我、主体，是一个符号，而正因为如此，它在从一个解释项到另一个解释项的延宕过程之中连续地被置换，被变成他者，从来就没有与自身合一。

---

① Husserl 1939；又参见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b：10.1。

② 参见 Petrilli and Ponzio 1996；Deely 2001：第十五章。

③ 参见 Poinsot 1632，*Tractatus de Signis*，“Sequel to Book I”（第一卷续编），216－219，尤其是219、29－48；又参《第二卷》之“问题 2”。

④ 参见 Levinas 1948：142。

在《海滨墓园》第十三节中，即提到芝诺之前（第二十一节），相对中午纹丝不动高挂空中的太阳而言，唯一的变化是通过自身来体现的（高处的正午，纹丝不动的正午/……我是你之中秘密的改变）。在第二十一节，情况发生颠倒：不管如何的自我挣扎，太阳底下无新事，乌龟的影子对自我来说，尽管跑得飞快，看上去却似乎不动，好比阿喀琉斯一般（Valéry 1920）[①]：

Zénon! Cruel Zénon! Zénon d' Élée! / M' as－tu percé de cette flèche ailée / Qui vibre, vole, et qui ne vole pas! Le son m' enfante et la flèche me tue! / Ah! Le soleil... Quelle ombre de tortue / Pour l' âme, Archille immobile *à* grands pas!

意大利语文本是这样的（Ponzio 2000）：

Zeno! Crudely! Xenon elata! / M'hai tu trafitto con la freccia laata, /Che vibra, vola, eppure in vol non è! / Mi *dà* il suon vita che la freccia fuga, / Ah! Questo sole... Ombra di tartaruga / Per l' io, l' immoto Achille lesto piè!

但是，且让我们回到文本及其翻译这个悖论上来。就文本作为艺术作品既是同一个又是另一个、既相似又不同而言，乌龟的转世便是一个活生生的意象——尽管不只艺术作品是如此。艺术作品以圣经式的方式强调并凸现出，何以任意一种身份、现实本身是乌龟转世这一活生生的意象。如列维纳斯所描述的，在艺术作品中，相似性似乎[②]：

> 不像是意象与原作之间进行比较得出的结果，而像是产生意象的那种运动。现实并非只是它所是的那样，它在真实之中展现自我，以及它的复制品、它的阴影、它的意象。

这和皮尔斯（普安索也会如此）对“像似符”的描绘彼此呼应，如上所述，符号及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相似性的，不同于以规约性关系为特征的“象征符”，也不同于以邻接性和因果性为特征的“指示符”。

文学文本翻译对象，被翻译项—被解释项（而且不仅是它的语际翻译，翻译项—解释项），被赋予了像似性，即“被翻译项—被解释项”给不可见之物、同一的他者、现实的阴影配备有一种相似性关系。通过其作为相似性基础上的

---

① 此节诗歌大意为：“芝诺！残酷的芝诺！伊利亚的芝诺！/ 你用那支箭射穿我的心窝 / 它颤动，飞翔，又不飞翔 / 弦响使我生，箭到我命丧 / 啊！太阳啊……何等的龟影笼罩着灵魂 / 阿喀琉斯大步飞奔，又动弹不成！”——译者注

② Levinas 1994：133；参见 Ponzio 1996：127－142。

符号的构成，文学文本把那种不可见的不可化约的异质性变成了可见。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原作”是一个像似符而不是一个像。当它所提供的异质性被否定时，它就变成了像，被弄得与同一性合一了。

圣像一意象与形象一意象相对：在瓦雷里的《海滨墓园》中，“形象”一词出现在“De mill et mill idoles du soleil”（太阳成千上万计的形象）一行。在由内斯托·伊巴拉（Néstor Ibarra）翻译，博尔赫斯作序（1932c），出版于1932年的西班牙语译本中，“形象”被不正确地翻译成了“意象”，因为博尔赫斯争辩说，意象是“等同于形象的同源词”。然而，尽管词源如此，历史方面而言，从对圣像的捍卫开始，意象就不只是一个形象，而且是一个像似符了。

原作，在“海滨墓园”这一情形之中，是受像似性主导的，它的翻译同样如此——针对从像似性方面看后者可能实际超出原作这一点而言，譬如内斯托·伊巴拉的西班牙语译本。博尔赫斯把伊巴拉的下一行和瓦雷里的进行比较，记录下了这个事实：伊巴拉的西班牙文是“La pérdida del rumor de la ribera”，瓦雷里的法文是“Le changement des rives en rumeur”。[①] 博尔赫斯说，法文原文听上去像是“模仿”，因为它没有成功地“复原”西班牙语译文的“拉丁”味儿。基于瓦雷里那行是“原作”而坚持反面意见，意味着给予作为“作者—人”（author－man）的瓦雷里以特权待遇（巴赫金会这么说），而原因仅仅是，他在时间上是第一个。相比之下，作为“作者—创造者”（author－creator）的瓦雷里，则是就像似性描绘而言的第二个——至少就特定的这一行而言，这一行似乎是对地道西班牙语的拙劣复制。阿尔托德宣称自己对卡罗尔的翻译才是原作时，针对卡罗尔的那些话，其实与此完全一样。这种宣称基于这一事实是可能的：面对像似性所主导的两个文本（一个出自作者，另一个出自译者），就像似性而言，译者的版本的确可能超出作者，可能比原作更好地描绘出它想描绘的东西。

时间方面的第一个，并不能阻止第二个文本替代第一个，超越第一个。实际上，第二个文本和第一个文本都是解释项符号，都是像似性的。从这一角度看，不存在作为第一个文本、原作的东西。相反，存在着一连串的解释项，其中，每次一个解释项超越另外一个，第二个符号又被下一个（第三个）所超越，如此至于无穷：文本是乌龟转世的另外一个例子，因为它是在从一个解释项文本到另一个解释项文本的化境之中滋长。不仅对跨不同语言的文本如此

① 此行诗的汉语大意为：“涌动的大海表面的宁静。”——译者注

(语际翻译中的文本)，而且对同一语言和同一文学体之中的文本同样如此。认定各种因素构成的新组合——博尔赫斯在他关于瓦雷里"海滨墓园"论文的第一页上写到，这与他论荷马作品翻译的论文的第一页上所写的几乎是一样的——必定比不上所谓的"原"作，意味着认定作品第二稿必定比不上作品第一稿："文稿"（draft）是个准确用词，因为，分析到最后，除了文稿，什么都没有！换言之，我们可以宣称，就像似符这种情形而言，除了一连串的解释项文本，别的什么都不存在。坚持认为"原作"（original text）、"定本"（definitive text）、"终极本"（final text）被排斥在这串像似性符号之外，是一种偶像崇拜。

像似符的相似性关系区分开了翻译和"配音"（dubbing）。博尔赫斯说，配音产生出"声音—视觉方面的怪异"，在另外一种语言中有意把另外一个声音嫁接到一个人的身体上、他/她的面部表情上、他/她的身体姿态和动作上。在博尔赫斯的整个著述中都贯穿了对翻译的赞美，但是，博尔赫斯对配音保持着距离（参看 Borges 1984：434—455)。配音是一种替换。翻译可能看上去是一种替换，但只有当与原作确立起一种偶像崇拜关系之时，才会在现实中碰到。

七、翻译言语，而非翻译句子

严格地说，人表达自我（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从来都不是在某种历史—自然"语言"之中[法语中的"*langue*"，意大利语中的"*lingua*"，指被理解为一种抽象系统——一种"范型"（a schema）——的语言]，而总是在一种特殊语言之中（法语中的"*langage*"，意大利语中的"*linguaggio*"），即语言的一种具体形式之中。"句子"属于按照其不确定的抽象性来理解的语言。但是，句子并不属于任何人，它是语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说给任何人，它并不是伴随精确的意义被说出口的。与之相反，"言说"（utterance）—主体所做出的具体的、意图性的表达，是说给对话一方，在话语中被语境化，与情景语境相关联，对话方式构成的交流场景中的回应，渐次地它也要求回应——则总是属于语言的一种具体形式的。只有身在语言学、语法和语言理论之中的文本译者，才被希望去翻译作为分析对象而被引入的"句子"。句子是孤立于鲜活话语语境的，并因此而总是歧义的。歧义从一种历史—自然语言到另一种程度不等。所以，可能发生的是，作为抽象语言的例子（有时甚至不是作为例子）而引入句子，但又声称是为了举例证明人类语言运用的普遍规则[想想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言学吧]，不仅不应该，而且是



不可能被翻译的。

在收入《埃诺迪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Einaudi*)的“翻译”词条中,[①] 吉利奥·C. 莱普西(Giulio C. Lepschy)犯了一个错误,把为句子赋义这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当成是翻译的困难。他举了英语句子“His friend could not see the window”(他的朋友没有看到窗户),只为得出这一结论:即使是在如此简单的情况下,翻译为意大利语也要求从至少二十四种不同可能中做出选择。事实是,译者——如果有的话——从来就没有面对这种选择(即现实中没有任何选择是可能的),这一点是莱普西被迫承认的。相反,在变为言说的句子这种情况中,模棱两可、歧义或者翻译的困难大部分都消失了,意大利语译者自动地就知道是翻译成“*amico*”还是“*amica*”、是“*suo*”还是“*sua*”、是“*riusci*”还是“*riusciva*”、是“*finestra*”还是“*frinestrino*”或者“*sportello*”。[②] 所以,这是关于翻译困难的一个不成功的例子。实际上,关注句子的语言学家(这是常见情形),无论是在传统的结构主义分类语言学还是在生成—转换语言学中,都不会对译者谈起翻译中涉及的困难,因为翻译的对象一般是言说而不是句子。

我们甚至可以宣称,从事从一种“语言”,即一种历史—自然语言(一种抽象的形式结构,如法语 *langue* 和意大利语 *lingua* 所示)——到另一种“语言”这种翻译的译者,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上,译者从事的是从某种特殊语言(如法语 *langage* 和意大利语 *linguaggio* 所示)、从属于某历史—自然语言的特定话语类型,到另一特殊语言和从属于另一历史—自然语言的话语类型这种翻译。翻译能力和特定部门或特殊语言以及话语类型方面的能力相关。在这一意义上,译者是“专家”,不是作为译者,而是作为在某特殊语言中有专长的译者。换言之,一般性的译者是不存在的。的确,“译者职业”这个概念本身可能受到质疑。医学文本不可能由某个只是声称“翻译”能力强的人来翻译:能力强的译者必须在医学语言中能力强,原语和译语两种语言均须如此。对哲学、文学、小说文本也要求这样,(同时,如果可能)诗歌文本更要求这样。翻译诗歌文本可能吗?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针对医学文本、哲学文本,甚至一本烹饪书。难道一个“好的”一般性译者就能胜任翻译《阿尔图西》(*Altusi*,著名的19世纪意大利托斯卡纳人的烹饪书,书中充斥着大量专门术

---

① 参见 Lepschy 1981:456—457。

② 这里成对的意大利语单词,涉及名词单复数、动词时态、代词格等差别。本句意指,对于莱普西所举例子,一旦置入言谈中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句子中,单复数、动词时态、代词格等都是译者心知肚明、可以成功地自动选择的。——译者注

语)？翻译诗歌文本不仅需要翻译能力，而且需要“诗歌”能力。只要在好的英语语言词典中查找诸如“翻译”、“翻译活动”、“译者”以及“解释”、“解释活动”、“解释者”等相关条目，我们就能对依附在这些词上的共同之处得出看法。

在《被背叛的遗嘱》（*Les testaments trahis*）这本书中，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针对按照“解释”所理解的翻译中所涉及的困难，做出了一些有趣的观察。[①] 他注意到译者以完全不适合它的规则的名义，逾越翻译文本对象所带来的问题。这发生在，譬如，为了避免“字面翻译”的时候，译者夸大了他为暗喻所赋予文学价值的程度，从而把意义和表达提高到近乎歪曲。另外一种谬误是译者遵守一般性规则造成的（譬如，学校里传授的避免重复规则），对此，被昆德拉称之为“同义化反应”（synonymization reflex）。这在于根据“良好风格”（*bello stile*）而求助于大量同义词，以便避免使用重复手法的风格美化［对此的思考放在“对同义化的观察”（Postilla sulla sinonimizzazione）一节，参看意大利语译本，第112页］。昆德拉强调了卡夫卡（Kafka）的《城堡》（*Château*）法文译本中的这类错误，其中，暗喻、重复、词汇根本性质在凸显卡夫卡的文学用词方面，起着核心的作用，“迷人的旋律……完全是重复所造就”（同上，第138页）。不过，“简单化”的需要，加上浅薄的“审美”理由，可能导致译者把原文中被认为太长的句子或者连续长达几页的段落碎片化。无疑，历史—自然语言在处理一连串替换性表达的时候能力各异，在一种语言中作用显著而在另一种语言中显得太长、太复杂。昆德拉指出，这个文本，所有其他文本也一样，之中的这些段落，以散文手法对行动进行了形象描绘，是不可能根据某人自己的想象来意译的。他抱怨说，在《城堡》手稿中，构成第三章的只有两段话，在布罗德（Brod）的译本中却成了五段，在两个重要的译本中［亚历山大·维亚拉特（Alexandre Vialatte）译本，及其之后的克洛德·大卫（Claude David）与伯纳德·洛索拉里（Bernard Lotholary）评注本］，分别有90句和95句。

与文学文本翻译有关的问题，和与非文学翻译有关的那些问题并不一样。完全一样的是，对文学翻译中所涉及问题的意识，有资证明译者/解释者与所翻译文本之间的对话性关系，而无论所讨论的是什么话语类型。的确，如果译者不是简单地以任何一种方式逾越或冒犯文本，那么，为了达成合格而具有创造性的翻译，译者/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性关系是建立在作为必要条件的

① 参见 Kundera 1993：121—143。

他性基础之上的。

八、可译性/不可译性与受质疑的元语言能力

在历史—自然语言中考虑可译性问题，须问问历史—自然语言彼此之间的交流是否无关紧要。任何情况下，我们的回答都是，两种语言在历史形成方面也许看上去非常紧密，它们却无法彼此直接交流。两种语言有共同方面，或许是因为它们彼此熟悉，或许是因为它们在形成和转换过程方面有着共同的过去，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消除区别。由两种语言所体现的两个独特话语世界和世界观也不一定彼此重合。每种语言在所有分析层面上都是特别的：语音、语调、句法、语义、词法、用法、符号—文化等等，不一而足。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重要观察结论是，语言中只有差异存在，这一点在语言学中却很大程度上遭到忽视，在符号学中也同样如此。在 1908 年致 C.G. 荣格（Jung）的信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如此极端地称自己的《释梦》（*Interpretation of Dreams*）是不可译的，只能在想要拥有它的那种语言中去重新创造、重新构建。

缺乏意识的译者可能被看上去“相似”的单词欺骗，即便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这是一个常识。被称为“假朋友”（false friends）的术语和表达就属于这种情形。路易·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mslev，1899—1965）贡献卓著，他指明了相同质料、内涵或意义如何在表达层和内容层上被不同语言以不同方式进行组织。叶尔姆斯列夫举了一个例子：拉丁文 Nescio，英文 I do not know 和意大利文 Non so，三者都有相同的内容质料。然而，这一内容质料在不同语言之中在语义层面上被以不同方式进行组织。实际上，不同语言使得某些方面比另外一些方面更显合宜，并且诉诸不同词法和语法策略来表达这种差别。与正确的问题相关的，不是交流，而是“可表达性”（expressibility）。所以，有关可译性的问题是这样的：一种历史—自然语言中所说的东西，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表达吗？答案不应该属于归纳类型，即要求一个一个的例子在所有语言中得到验证。它也不应该属于演绎类型，因为我们处理的是人类科学而不是某个形式性学科。相反，答案应该是试推类型的或是假设—演绎类型的，即当情况发生时，在能够验证假设的推论基础之上来做出梳理。

从这一观点看，翻译（这种在历史—自然语言中不可能的交流活动）始终是可能的。这一信念是以文字符号的元语言性质作为基础的。语际翻译发生在所有历史—自然语言、文字语言所共有的领域之中。它涉及“文字内的”

(endoverbal)翻译和“语言内的”(endolingual)翻译。所以，语际可译性发生在共有基础之上，涉及已经为单一语言之中的说话人所熟悉的共有实践：指的是有关跨文字可表达性的实践。文字语言，就其自身而言，被赋予了不同于非文字特殊语言的一个独有特征：“元语言能力”(the metalinguistic capability)。[①] 和非文字符号系统相比，文字符号系统能够轻易用于言说自身，使自身成为对象、话语的被解释项。我们知道，一种历史—自然的语言之中有多种特殊语言，增强了说话人在不同元语言层面使用语言的能力。同样的，在“内在多语性”(internal plurilingualism)情况下，在某历史—自然语言中元语言与对象语言之间拉开距离的程度，一般低于跨不同历史—自然语言进行翻译时拉开距离的程度。所以，如果我们用可表达性来思考可译性问题，我们必须不可避免地同意，与另一历史—自然语言的关系有利于可表达性，翻译不仅是可能的，它甚至还增强了说话人的元语言能力。

就语际翻译也是文字内的翻译这一程度而言，它是在罗西-兰迪(1961)所谓“共同话语”(*parlare comune*)这一基础上达成的。罗西-兰迪引入这一表达，是为了假设一个由相对不变的人类技巧构成的系统，此系统广义而言是跨民族的，即并未受到民族—文化界分的局限(同上：第165页)。“共同话语”(common speech)表示话语中对人类成功交流具有本质性的所有那些操作。它指的是超越历史和地理差异，处在生物和社会结构之中的所有人类群体之间的基本相似方面(又参 Ponzio 1990：121-149)。“共同话语”这一假设凸显了被翻译文本和翻译项文本之间的相像和相似，这是翻译过程必须予以重视的，它既不是一种同源相似，也不是一种表面的类比相似，而是一种异性同体。换言之，不管有何差异，与历史—自然语言相互关联的相像关系是基因—结构性质的，是由这一事实决定的：来自两种不同历史—自然语言的两个文本共同拥有一种精细工艺，这就是罗西-兰迪所称的“共同话语”。

由于元语言能力，对已经说出的东西进行重新梳理始终是可能的，无论是在同一历史—自然语言中，还是在特殊语言中，或者在不同的历史—自然语言中。可译性对于一般符号是结构性的，所以对于特别的文字符号也是结构性的；可译性之可能，另一个原因在于所谓的“共同话语”。一方面，这一立场

① 更为技术层面的，元语言能力——运用符号来以模态方式指涉符号自身或者作为其他符号的符号这种能力——是作为符号动物的人类物种所特有的能力，并且不限于语言符号。但是，因为语言交流是人类物种所特有的，并且文字语言是这种交流中最为普遍的(但绝不意味着是唯一的)表达[或“模态”(modality)]，“元语言能力”可以被看作文字交流尤其有特色(尽管不是唯一特色)的一个特征。参看 Deely 2008：第14节。



与把历史—自然语言描绘成封闭而且自足系统的那些观念不同；另一方面，也与按照“语言相对性”（linguistic relativity）对历史—自然的语言之间的差异进行极端描绘不同。按照元语言用法，可译性是所有历史—自然语言所共有的一个特点，并且因此而成为“共同话语”能力的组成部分。

作为“被传达的话语”（reported discourse），翻译诉诸所有历史—自然的语言都在其中得到训练的实践，即传达他者的话语。当然，在被传达的话语中，不仅涉及“语言”（*langue*），而且涉及“言语”（*parole*）。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专著有两个不同版本（1929，1963），根据他在其中分析过的所有模态，个体的“言语”始终是或多或少地以模仿、风格化、仿拟化、直接或隐蔽的矛盾等形式来体现被传达的话语。他者之辞出现在某人自己之辞中，某人自己之辞必须在他者之辞所具有的意图和涵义中奋力前行这一事实，支持了对翻译项用词的对话性处理，强调了被翻译项和翻译项用词在构成方面的对话主张。对他者的话语做出回应和传达这种向往，对于历史—自然语言、对于言说而言，是结构性的。这就是说，以语际翻译形式来回应和传达他者的话语这种处理，本就是嵌刻在话语之中的，即嵌刻在使得话语可能的语言功能和传统之中的。充其量，译者可能碰到的重大困难之一，是翻译中的言说或文本可能属于自己不一定熟悉或者不充分熟悉的一种特殊语言（部门性的或者专业化的）。但是，这个问题原则上与文字内翻译或语言内翻译并无不同。任何情况下，谨记我们的如下思考，就会明白，这些困难都无法合理支撑起语际的不可译性原则。

考虑到文学文本的翻译，首先被想到的是用诗歌文本来证明翻译不可能这一主张，翻译项用词有距离、不直接这一特点，可以用于强化可译性上的这个论点。从这一观点看，论辩是如下进行的。文学用词和翻译项用词以异性同体的方式，即在像似行基础之上，彼此相关；就相似性而论，它们彼此相关，这种相关不仅是在表面层次上的，而且是在形成和结构上的。文学用词与翻译项用词都能与首要或者直接话语类型区别开来[①]，即有别于同产生了它的主体合一的用词，同主体的意指意图合一的用词。作为次级文类的组成部分，文学用词不再像通常发生在普通的话语中那样，是直接用词、某人自己的用词、等同于话语主体的用词——或者，至少声称是如此，相反，次级文类强调用词的间接特点，用列维纳斯的说法，是唤起“带着自身影子的用词”（a word with its shadow）。文学用词是对象化了的用词，是被描述的、与话语的自我拉开了距

---

① 参见 Bakhtin 1979。

离的用词。作者并不等同文学用词，相反，文学用词、次级文类的用词，是他者。无论是谁使用这一用词来说“我”，他/她都不曾与这个代词等同。譬如，这发生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中；发生在剧作家让自己的角色直接说话的戏剧中；甚至发生在抒情诗和自传中，其中，作者和叙述中的“我”之间总是插入某种距离：“超本地化”（extrolocalization）（一个来自巴赫金的术语）是文学性的条件，是一般性艺术话语的条件。

翻译是以直接话语为掩盖的非直接话语，就像“作者—译者”之间那样，存在一定距离。实际上，译者说“我”，没人把他/她等同于话语的“我”，即使在口头翻译和同声传译中也是如此。大使说：“谢谢你们的欢迎，我非常高兴来这里。”口译者译：“Grazie per l'accoglienza，sono davvero onorato di essere qui。”没人会做梦似地认为享受欢迎款待的是口译者。从这一观点看，且与有关文学文本（尤其是诗歌文本）的翻译可能性上的偏见不同，“外位”（exotopy）能力、保持距离、外本地化、控制翻译作为翻译的像似性的相似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把翻译放在了一个朝着文学性话语方向的特权位置。文学用词和翻译项用词所共有的这些特点，实际上让它们之间的距离并不如料想的那么远。

但是，“可译性”不仅意指翻译的可能性，它还表示一个处于原作及其翻译之中的文本之间的开放关系。作为文本一般性的“可解释性”——“可译性”相对而言是一个特例——可译性还表示，一个文本的翻译始终是开放的、绝非确定的；被翻译文本可能继续被翻译，实际上，可能被翻译了又翻译，即使是在它已经被翻译进的同一种语言之中，最终，由同一位译者产生出可能性上数量无限的翻译项文本来。被翻译者的符号物质性、它的异他性、相对任何一个解释射体而言的抵抗力、它的复杂性，通过原作在翻译它的文本之中的永不衰竭性而得以凸显。在思考翻译的限制时，“可译性”这个表达的意义也必须被考虑到，正如对一般性的解释那样。

可译性问题必须密切联系不可译性来面对，这是同一过程中的两面。可译性问题是对于不可翻译、不可解释、不可表达东西的可解释性、可表达性问题。由于符号物质性（符号的绝对他性、符号面对那些对其解释—翻译等尝试的阻抗能力），可译性概念必定关联着不可译性，关联着不能被拥有、规避可理解限制的东西，关联着有限中的无限，关联着就总体性而言非终极化的东西，关联着就有意识而言无意识的东西，关联着不可能的东西。语言是含混和误解的所在；它在每次发生之时都重新创造自己，在这里，有东西失败，有东西尚未说出。话语行为，断言、陈述，必定暗示着省略某种东西，某种凭借意

志避开控制的东西，它规避意指意图性，不能在言说中被说尽，是产生出新解释项语流的意指残留，而渐次地，新的解释项会抗拒控制，逃避意志、意图、目的、意识和那个最终词语的权威，对此，根据列维纳斯（以及巴赫金）的说法，我们称之为“绝对他性”。按照这样的描述，语言是无意识的条件。语言并非一种术语集合。如果情况真如此，跨语言的翻译就变成了非中介的了，因为每个单词在自己那种语言中都有一个同另外一种语言中的直接对应物相应的概念。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关系并不是单词和预先认定的观念之间这种关系，既直截了当又清楚明了。断言、发言、以言辞或话语行为行事，同时也意味着压抑、去除和沉默——这通过做梦、文字游戏、艺术话语和病征等现象得到了清晰揭示。

如果压抑、去除、沉默、未说出的东西、影子、绝对他性是世界的另一面，那么，这对于翻译行为是有影响的，因为语际翻译使它们变得尤其突出了。一方面是“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共同话语、不变性、符号活动流、“连续论”（synechism）、能量、进步、连续、回归、“及物写作”（transitive writing）、改写、延续，而另一方面则是“单一数学”（*mathesis singularis*）、独特性、他性、碎片化、死亡、失去、“不及物写作”（intransitive writing）、可变性、不可重复性、非延续性，语言就在二者的互动之间展开。[①] 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彼此交叠，在明暗错落的、衍射性的不确定和不清晰关系中相互激发。遗忘、湮没、忽视、否认、失误、省略、视而不见、疏忽等行为，表明语言是如何不一致、不协调，相对的每组词是如何不统一、不系统。自我并非自己家园的主人，说话人在自己的母语中并非如鱼得水，相反，是被另外一种语言所言说。说话人，自我，是游牧性质的。我们始终都是“我们自己的陌生人”（strangers to ourselves）[②]，所以，陌生性、绝对他性这种条件才是我们所共同拥有的东西。

我们必须不断问自己的这个问题，关系到翻译的本质，什么是意义上的翻译？翻译和解释之间是什么关系？翻译并不是解码化，语言也并不因此而是符码。根据阿尔曼多·维尔迪格里奥涅［Armando Verdiglione，他引入了“语

① “普遍数学”是笛卡尔和莱布尼茨提出的以数学为模型基础的一种假想中的普遍科学观念；“及物性写作”和“不及物写作”是巴尔特在《零度写作》（*Writing Degree Zero*）中提出的概念；“连续论”是皮尔斯哲学中的一个观念，强调以连续性的眼光来看待时间、空间、法则等。——译者注

② 参如 Kristeva 1988。

用解码学”（cyphermatics）一词]，“符码是一种前语言实在”。[1] 换言之，并不是语言作为意义条件，而是语言符码预设了意义作为语言的条件，意义是语言之外所给出的东西[2]，被语言符码化和解码化的东西。引用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中的说法，维尔迪格里奥涅宣称，如果单词代表了预先存在的概念，每个单词就会有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意义确切对应方。但情况并非如此。在“一种关于语言的语言”（a language of languages）这一意义上，并没有元语言这种东西。此外，就翻译即言说这一程度而言，翻译还必须考虑到意指残留，考虑到逃避占有的、没有被说出来的东西，考虑到意指的他性。[3]

与可译性概念一道，对双语概念、双语说话人概念，也需要进行反思，做出质询。我们甚至会说，双语说话人是不存在的，这看上去自相矛盾。双语预设了一种起中介作用的语言、语言的语言、跨语言的符码，它确立了对等、可转换性、双边对应。但是，问题并非确立和辨识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合一和对应。当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关系并不是转变关系，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这种关系（我们已经说过，语言并不直接交流）。翻译就是重读、重写、重释、重造，以创造和批判的方式从一种语言切换到另一种语言——无论是跨越不同民族语言，还是在同一种语言之内——这一意指活动过程是由符号的像似性维度来控制的。类似于口头用词，写作、阅读、解释、回应、翻译——这一切都发生在能指的延宕之中。翻译对于试图吸纳言说，倾听和解释这种独特行为的普遍数学这种主张而言，是功能性的。在心理分析中，在“美国心理分析学说”中，解释经过一种基于符码的翻译，变成了解码化活动。但是可译性符码是建立在不可译的东西这一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他者、绝对他者这一基础之上的。可译性原则必须从不可译的东西着眼来做出质询。

可译性符码可能试图通过取消他者，通过把他者向自我同化，通过坚持总体化、权威、作者特色，通过取消写作，使翻译变得自动化。然而，翻译操作是受逻辑支配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受他性的“双方/对话逻辑”（dia—

---

① 参见他 1977 年著作《精神分析探险》（*La psicanalisi questa mia avventura*）中针对翻译问题所写的题记。

② 迪利（Deely 1980）恰当地将此称为“内嵌在语言交流之中的非文字性东西”——西比奥克称之为“内部世界”（*Innenwelt*），是所有动物共有的分类上的一级模塑系统。

③ 参见 Petrilli 1990，1998，2004。

logic）支配的[1]；它在差异中出现又奔着差异而去。正因情况如此，翻译所以是解释、写作、不及物写作、再创造：翻译既不是词对词、字母对字母的［即西塞罗（Cicero）所说的 *verbo verbum reddere*］，也不是基于意义的（即前文中，圣哲罗姆所说的 *non verbum de verbo*，*sed sensum exprimere de sensu*）。翻译的经验，就像写作、不及物写作，是与物质伴随发生的；翻译是涉及字母、能指延宕的一种物质过程。翻译碰到的是语言的扭曲、含混和解释轨迹的扭扭捏捏、拐弯抹角。无论我们是“按字母”还是“以意义为基础”进行翻译，我们都不可能离开字母、能指的专门性和物质性，就不可能同化、削平或画上等号的那种东西而言，它造成了差异。我们不可能翻译字母，因为能指的物质性，字母（即意指材料）是不可翻译的。决定对歧义起到了作用，却不是驱走它们，因为除了强调它们的意指内涵、被解释项和解释项的意指内涵——通过跨其他语言的被解释项—解释项之间的延宕而使它们进一步被强化——什么都无法决定。所以，翻译是动态的、不透明的。它关联着重读、重写和重造的工作。经典译本的基础，是符码、规约、权威、作者特色、尊重。和这一方向相反，翻译项的任务则不是要给人留下它不是译本这一印象，而是要传递独特性、解释项的专门特征、它的不可重复性、它的不可译性的意义。翻译在能指的专门特征中得到理解，因此“它是字母对字母的”（同上：第 191 页）。因此，翻译操作是像似性主导的，它的意指价值，依据皮尔斯所说的“品质”，是“原作”所激发出的语言“效果”，而绝非处在符号之间延宕的符号活动流中的那个始源、被翻译文本。

九、生活、模塑与翻译

“trans”（跨越/转换）、“inter”（间/际）、“dia”（交换/贯穿）是描述符号存在，即符号活动，所用的介词和前缀：transposition（换位）、translation（翻译）、transference（转移）、intersemiosis（符号活动之间）、intertextual（文本之间）、interverbal（文字之间）、interlinguistic（语言［体系］之间）、interlingual（语言之间）、dialectic（辩证法）、dialogue（对话），等等。符号只可能存在于符号之间的关系之中。符号活动是一个跨符号过程、一个符号间过程。一种东西，如果不能与意指它、言说它、解释它、回应它的另一种东西相关，它就不是一个符号。某物成为符号的条件，如皮尔斯所说，在于它具有一个解释项。

---

① 关于有关符号的对话理论和他性概念，参见 Ponzio 2006a。

"跨符号"(trans-signs):这是符号存在的条件、符号生命的条件。符号活动发生于其中的"环境界"(*Umwelt*),必定是一个跨符号或者"符号间际"(intersign)网络。所以,存在着两种符号活动:构成形成环境界符号网络的,即塑造符号在其中滋长的世界那种符号活动,"模塑"(modeling);以及存在于交流中,即符号生命中那种符号活动。就其关涉到物种而言,"模塑"属于"物种进化"(phylogenetic)一类,换言之,他指的是在物种演化过程之中形成的一种手段。模塑因为"适应"(adaptation)而出现,也因为"联适应"(exaptation)而出现。一个直接与我们相关的联适应例子——因为它涉及人类符号活动——文字、话语。最初,话语因为交流而出现,之后它发展成为次级模塑手段,合并而且强化了一级模塑手段,或者我们又称之为"语言"的那种东西。这是人类根据其起源所专有的模塑手段的名称,贯穿其作为"沉默的原人"(mute hominids)的整个漫长历史时期。皮尔斯和雅克布森(Jakobson)都强调像似性符号在符号活动过程之中的重要性,西比奥克也秉持与两人相同的思路,也相信,语言作为一种模塑手段,以一种像似方式与它所塑造的世界相关。[①] 这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出版于1921年的一部重要著作《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有着同样重要的关联,尤其是"图示"(picturing)这个概念。

这种研究语言与世界之间的方法,对于知识理论、认知过程和心理学富有启发,西比奥克从心理语言学和心理符号学方面直接如此宣称。他把符号学和神经—生物学关联起来,把人脑描述成一个符号系统或模型,再现通常称为周围世界、对动物意义重大的"客观世界"或者"环境界"。这个模型是一个像似符,不同于表格或者地图,其中,最相关的关系是时间和空间类的。这些关系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的;相反,它们是可调整、可变化的,而且在与动物有机体"内部世界"(*Innenwelt*)的对应(相似关系)中还可以再调整。基于这一模式,人脑从符号网络中的一个神经节切换到另外一个神经节,每次都选择和产生被认为最适当的解释路线(参看 Sebeok 1986:第7章)。

与模塑不同,"交流"属于"个体发生"(ontogenetic)一类。也就是说,交流涉及物种所规划的个体发展,在给定的环境界之中,是个体所属物种的特定模塑系统所预见到的。这两种根本性的符号活动——模塑和交流——涉及符号之间的关系、跨符号关系。所以,我们能够论及翻译。这个术语用于生物学

① 参见 Sebeok 1984,1985,1985a,1986a,1986b,1986c,1987,1987a,1988,1988a;Deely 2007。

之中（而且一般用于生命科学之中），而生物学本身就是一种翻译。[①] 但是，什么语言运用不是这一意义上的翻译呢？考虑到字面和暗喻之间的差异问题，难道就这两道虚拟边界而言符号不是贯穿它们吗？[②] 难道翻译本身不是越字面就越难称之为翻译吗？难道解释项不是越不能与它所解释的符号拉开距离就越难称之为解释项吗？生物学就基因而言论及翻译。神经学就化学操作和电操作之间、电操作和内分泌操作之间的相互转换而言论及翻译。一旦生物学，按照生物符号学方向发展起来的生物学，采用符号学标准，那么，它就涉及"跨越/转换"操作，"之中""之间""跨"的操作：符号操作就是"符号间""跨符号"操作。

"生命""符号"和"翻译"，在总体符号活动网络之中是彼此关联的，西比奥克用他的总体符号学对这一点有着清晰表述。[③] 实际上，西比奥克设想，符号活动与生命是合一的——符号活动是生命的标准属性。[④] 符号活动并不局限于文化，而是在成为生命的一个标准特征这一点上赋予了整个生命世界，不过，并不一定意味着生命就只是符号活动，符号活动也并不局限于生命世界[⑤]，世界——生命的和非生命的，也并非仅仅为符号所占据（"泛符号学"话题）。[⑥]

这导致两个重要的规定。首先，如罗西-兰迪所告诫我们的，并非每种东西都是符号材料，但它能变成符号材料。[⑦] 其次，符号活动，就其所有引申方面来考虑，是在极为多元的不同层次之中得到表述的，从化学—物理、非自觉、无意图、无意识（至少根据与人类意识相关的标准来说），经不同生物符号活动层次，到随人类出现而来的认知方面——在认知中，符号活动操作能够把其他前认知符号活动层次对象化。[⑧] 这种对象化能力是人类符号活动的特色，它还拓展到无机材料，所以拓展到整个世界。而且，由于世界是不同层次的解释的材料，同时，对于经验到科学的不同领域而言，它是能够变成"符号

① 参见 Petrilli 1999—2000，2000，2001，2003a。

② 参见 Deely 2006。

③ 参见 Sebeok 2001。

④ 参见 Petrilli and Ponzio 2001。

⑤ 这一点我在收入本书的《符号伦理学与责任生命、符号、他者》中已经指出，尤其参见第 5 部分和本书第 56 页脚注②；另参收入本书的《欧洲哲学和美国符号学之间的对话性交流》的结尾段。参见 Deely 1989。

⑥ 这个话题在斯特恩菲尔特与迪利的对话中有大量清晰阐述：Stjernfelt 2006，Deely 2006a。

⑦ 作为 2006 年迪利与斯特恩菲尔特之间对话的背景，参见 Rossi-Landi 1992。

⑧ 这就是"符号动物"（semiotic animal）这一理念，参见 Deely，Petrilli，and Ponzio 2005。

材料”的材料：通过解释操作，非符号身体变成了符号身体，即便它们继续作为非符号身体存在。就整个世界都能够在符号操作中被对象化这一程度而言，变成符号活动是可能的；就它进入符号网络而言，作为人类符号活动，它为决定这种对象化的符号活动性质做出了贡献。

一般性的生命，以及它的特定呈现（譬如人类社会符号活动中的文字文本、文学文本，以及——甚至更专门的——诗歌文本），由于符号活动流的翻译操作而滋长、存活，这些符号活动流跨越了极为多样的不同生物符号活动现象，跨越了文字和非文字符号系统，跨越了一代又一代。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符号之间相互联系这种变动之中，在被解释符号和解释项符号的相互作用之中，在被翻译文本（即作为翻译对象的文本）之中，在翻译项文本之中。

翻译是一种生命形态，其中，符号之间、被解释项和解释项符号之间、被翻译项和翻译项符号之间的关系，受到绝对他性这种逻辑、符号生命的像似性方面、积极回应的创造性等因素的制约。从总体符号学的观点看，被产生的是另一个生命，符号活动链中的另外一个文本，在这一活动链中，所谓“原作”与翻译项符号相互关联，它们关系的特点，就是皮尔斯意义上的第一性、始发地、元初性。在无限符号活动流之中，符号在连续性逻辑和（用列维纳斯和巴赫金的话说）特殊性、随机性、碎片化、专门化、绝对他性逻辑之间相互关联的变动之中滋长。符号之间的相似性暗示着差异、不相似、不可化约的异质性。

就语际翻译而言，我们已经看到，跨越不同历史—自然语言的翻译发生在相似性、契合性关系基础之上，同时被“共同话语”（罗西-兰迪后来将其发展成为“语言劳动”）中的共同参与决定[①]；被从文字到更宽泛的符号的切换决定，西比奥克将其称之为“一级模塑”或者“语言”——任何一种翻译的语言交流中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在对符号的规定和将其再分为文字和非文字之外——这分开了人与其他动物（实际上，是分开了人与就我们目前所知的整个世界的剩余部分），在无机和有机符号、动物符号和专属人类的符号、文字和非文字符号、有声的和无声的符号、内在和外在、有意图和无意图等的再分之外，符号活动流是不断的、连续的，从未明确被打断。所有符号都是以“盖亚”(Gaia)[②]为代表的巨大符号网络的组成部分。同时，就它们拥有符号材料这一程度而言，它们拥有能够根据超越上面所列巨大分野界限的类型学做出分

① 参见 Rossi-Landi 1968，1975，1992。

② 盖亚：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神，众神之母。——译者注

类的共同特征。象征符、指示符和像似符三分法就是其中之一。西比奥克强调了像似性对于一般性的进化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在动物符号活动中，有关像似性的例子不计其数，尤其是它对于单一个体的存活所起的作用，也已经得到了强调。①

符号彼此翻译：这一说法反映出它们身为符号的状况。但是，这也是与符号活动合一并且通过符号活动得以维系和发展的生命的状况。生物学区分了“pro-”（前/元）、“proto-”（原始/元初）和“eu-”（优/优化）：原生菌（procariots）、优化菌（eucariots）。类似的，同样的区别也可以在“原始译作”（prototranslation）和“优化翻译”（eutranslation）之间做出。这两类翻译操作彼此相关、相互依赖，因此难以区分，正如难以区分无意识和意识。任何情况下，这两类翻译都大致对应模塑与交流之间、系统发生类符号活动与个体发生类符号活动之间的这种区别。就人类被赋予语言这一程度而言，也就是说，对于被赋予句法特色而且能够构建无限世界的一种模塑手段这一程度而言，我们能够（不同于其他生命物）做出高程度的新译本。换言之，人类被赋予了一种“逻各斯翻译”（logotranslation）能力，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符号学”或者“元符号学”（“符号学”的这一意义不应该和作为研究符号活动的有关符号的一般性科学这种理解下的“符号学”相互混淆；“符号学”，作为“元符号活动”，首先是更多地用于指明知道有符号存在这种人类专有的能力）。人类，地球上的动物中唯一有能力从事元符号活动者，是高水平的“优化译者”（eutranslator），即“逻各斯译者”（logotranslator）——换言之，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人类是“符号动物”。

符号与生命——生命自始至终都是依赖于符号的——只有在相互关系、解释、换位、翻译中才可能，这意味着，意指而且有意义的任何东西的存在、身份，都是植根在他性之中的。同一个符号永远是同一个他者，相似又不相似。实际上，为了成为自身并且保持如是，同一个符号必须在解释、翻译的符号间操作之中变成他者。就文化间关系而言，这样一个前提清楚地指明，所有文化方面和要素必然包括妥协、杂合和磋商。的确，这样的操作，对于差异，对于身份构成，对于幻想中的互补性自主，对于差异与同一之间的无所分别，以及对于种种对立甚至冲突关系而言，正是前提。

且让我们对“trans”（跨越/转换）、“inter”（间/际）、“dia”（交换/贯穿）

---

① 参见 Sebeok 1976，意大利语译本 1979：125-126；1979，意大利语译本 1985：157-182；以及 Deely 2005。有关遗传因子像似符的讨论，参看 G. Bateson，见 Sebeok 1968：614ff。

等做出思考：符号是“间际符号”（intersign），否则它就不是符号。符号靠符号生活，在符号中生活。它需要符号才能成为符号。符号生活、滋长、壮大、存在、维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与其他符号相关，因为它跨越自身的界限，只是为了经过确认和强化地回归，满足它自身的“本质属性”（*conatus essendi*）。符号不只是靠符号生活；它也是在符号之中得以滋长。第二个条件，在符号之中滋长，提供了让符号得以作为符号存在的前提条件（符号是唯一可能的生活样式），即让符号得以依靠符号生存。这种“among”（之中）、“between”（之间）和“trans”（跨越/转换），并不仅仅代表关联，而且代表着分隔。符号之中的关系并不是连续不断的，而是非连续、离散的。中断的缺场正是符号的在场本身。一个符号和另一个符号之间，存在着虚空、分离和跳脱。为此，每个符号都是另一个。符号的同一性在于它依靠符号生活，符号的同一性不能掩盖、化约、取消符号的异质性，符号的异质性就在于它是符号之中、其他符号之中的另一个。符号在符号之中滋长，既不意味着把符号化约为依靠符号而生，化约为它的存在，也不意味着与符号而在：对于符号，没有群体这种东西，没有融合、耦合、共和这种可能性。符号是离散的、不可化约的他者。它在其他符号之中的连续延宕并不仅仅意味着它在同一性、确定性方面的差异；还涉及异质性方面的差异，不可能找到穷尽它的解释项，不可能找到完全翻译出它的翻译（在没有提示情况下），不可能找到与它合一的符号、与它同一的存在。

从这一观点出发，“跨符号”（trans－signs）中的“trans”与“dia”类似，并不具有与在“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中相同的价值，在后者之中，对比与综合在转换、延宕中得到了强调；不如说，它的语义价值和与“共时”（synchrony）相对的“历时”（diachrony）这个词之中的价值是相同的。也就是说，“dia”和“sun”是对举的（diachrony 对 synchrony）：它说出了非共在、非共存、并不合一的东西。同时，如果历时性是这样理解，那么，它不仅标志着连续性、连贯性，而且标志着非连续性、离散性，不可化约为在场、术语之间关系中的他性；说得更明确一点，它标志着一种真正的连贯性，一种有效的历时性，不可弥补的损失、不可填充的缺场，通向无结果的尽头那种颓败。

“跨符号”（trans－signs）中的“trans”，跨符号的、符号中的存在，标志着符号没有在存在之中、同一性之中、依靠符号而生存之中被耗尽。相反，这一表达宣示出就存在而言的所有符号的异质性——从原生菌到形成居住在超王国的有机体的优化菌领域；从单一的转瞬即逝的言说到持续存在的文本及其解

释和翻译。如此理解的异质性，并不是存在的本质，它并非虚空，而是时间，客观的时间，不能从在场之中、从连续性之中抽离的时间：一种没有大小衡量的历时性——死亡分开符号，使得它们成为其他中的其他。列维纳斯称之为“期间”（*entretemps*），濒临死亡的时间，它标志着存在之间无法连通的深渊，导致它们让人瞠目的多元性。符号生活在自己的时间之中，在使它成为不同于其他的其他的时空体之中：不可翻译——尽管它在可译性基础上滋长；不可解释——尽管它在解释项基础上滋长；不可变换位置——尽管它在位置变换基础上滋长；不可延宕——尽管它在延宕基础上滋长。对于可译性问题（也适用于文字文本）必须记住，翻译超越了濒死时间所呈现的虚空、离散的单位、不可翻译的东西；可译性原则违背了客观的分离，后者并不依赖于对主体的尊重或者主体所采取的动机；它试图把以缺场为特征带入在场，缺场是非关联的异质性，或者绝对他性，是客观历时性中的时间本身。

新翻译，如其在语言翻译中的高水准意识上所展现出来的那样，是非连续符号之中的翻译。意识也并未成功地使这些非连续符号在在场的共时性中共存。语言翻译是交换性语言翻译，它的特征是对话、异质性、像似性、理解可能性和有所回应，同时，又是不可化约的外空间、超本土化。正因为如此，翻译是与阿喀琉斯和乌龟这个悖论相关、与（甚至此前的）生命悖论相关的一种转世，生命也是没有回头的符号中的延宕、终有尽头的偏离。

十、像似性与文字和非文字符号系统之中和之间的翻译

维尔比宣称，“尽管语言本身是一个符号系统，它的方法却主要是图画性的”[Welby 1983 (1903): 38]。通过求助于皮尔斯最根本的象征性、指示性和像似性符号三元分类（参看 *CP* 2.247–2.249；又参皮尔斯 1904 年 10 月 12 日致维尔比的信，见 Hardwick 1977: 22–25），我们可以这样“翻译”或“改写”这句话：“尽管文字语言本身是规约系统，它的方法却主要是像似性的。”换言之，维尔比的说法承认了像似性作用的重要性，即文字语言发展中假设相似性的像似关系作用重大。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也对产生语言—思维加工的操作、对符号—认知手段进行了研究。后来，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他抛开了自己研究中的这个方面，集中关注“作为运用的意义”［*meaning as uese*，普安索称之为“来自规约的符号”（*signum ex consuetudine*）］和语言规约［语言游戏（linguistic games），普安索称之为

“通向愉悦的符号”（*signa ad placita*）]。[1]《哲学研究》常常被描述成维特根斯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分析哲学家那里尤其如此。不过，他的《逻辑哲学论》的重要性不应该被低估，尤其是因为它和他关于语言像似性方面的研究相关。[2]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区分了名称和命题：名称，或者命题中使用的“简单符号”[simple signs，维尔比所谓的“最低符号”（bare sign)]，以及他们的对象或意义，二者之间的关系是规约类关系。实际上，关联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的规则或规范是任意性的，因此不能简单地通过猜测得以发现：符号任意性是索绪尔 1916 年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范畴，是某些类的符号——文字符号和非文字符号——的特征。相反，在“命题符号”[propositional signs，维尔比的“图画符号”（pictorial symbol）和“再现行为”（representative action)] 的整个命题情况下，与所意指东西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似性关系，即像似类的关系。命题是一幅逻辑图示。[3] 所以，尽管包括一个强的规约—符号部分，命题根本上说是基于相像关系的，并因此而可能被打下像似性方面的烙印。这种关系很像皮尔斯的“存在之图”（existential graphs)，被认为属于均衡或结构类型。维特根斯坦的“命题”，同维尔比的“图画符号”和“再现行为”一样，特点是都具有一种意指他性方面的高超能力。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关注了完成命题的再现或意指功能的情景语境所具有的作用。通过如此语境化，“命题”变成了如巴赫金所理解的“言说”(utterance)，后者在俄文单词“*vyskazyvanie*”（utterancell，言说细胞）启发之下对这一范畴进行了透彻分析。[4] 当构成言说的被解释符号和解释项符号之间的关系受到像似性主导，它就作为或高或低的异质性程度上积极回应的理解所构成的对话性关系而出现。如此描述下的像似性关系，便被赋予了对批判、认知创新和创造性的一种或大或小的能力。无疑，这种规约—符号关系在命题和言说中是起作用的，但是，像似性模式是主导的，类似于皮尔斯的“图表”，其中，像似性关系是属于均衡或结构类型的。就维特根斯坦的分析而言，命题是受到意指操作的像似性方面主导的一幅逻辑图画，相应的，如此描述下的命题，它的成功的跨语言翻译必然渐次地涉及高度的像似性。

---

① 又参 Poinsot 1632：第三卷，问题 4。

② 参见 Ponzio 1991：185－201，1997a：309－313。

③ 又参 Peirce：*CP* 4.022，4.026。

④ 参见 Bakhtin 1986；以及 Voloshinov 1929，1927。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知道一个命题，意味着知道它所代表的情景。此外，理解一个命题，并不意味着去解释它的意思，因为“命题显现它的意思”（4.022）。因此，虽然“简单符号（单词）的意义必须被解释”，但是“通过命题……我们让自己被人所理解”（4.026）。奥古斯都·庞齐奥（1991：199）强调，维特根斯坦的图示理论，对于更好地理解一般地涉及产生语言中的操作和意指加工的操作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能够方便地适用于如前所论及的维尔比本人对语言的分析：

> 作为一幅逻辑图示，再现指出了产生命题的机制，解释了语言通过命题符号，何以能够避开可能会使（语言）变成全然重复的那种纯粹而简单的名称规约。这个问题渗透了产生机制和思想发展，因为“事实的逻辑图示是思想”，因为“思想是具有意义的命题”（这里所指的是《逻辑哲学论》的命题3和4）。

如上所述，对维特根斯坦这位《逻辑哲学论》的作者而言（对维尔比也一样），语言分析不应该局限于对意指现象、对语言和思维加工、对推论—认知操作的表层描述。相反，它必须对这类现象的产生过程做出解释。这里，可以再次标识出与罗西-兰迪及其“共同话语”“语言劳动”之间，尤其是与他理论研究更为成熟阶段的“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概念之间，所具有的一种理想的联系。此外，像似性关系可以根据罗西-兰迪（1968）讨论过的“类比”（analogy 相似）、“异质同构”（isomorphism）、“同源相似”（homology）之间的区别，做出更加明确的表述。类比和异种同形之间的区别，考虑到它与使得这种区别成为可能的生物科学之间的密切关联，也是和西比奥克本人研究的总体方向相互呼应的。

维尔比、维特根斯坦、巴赫金，尤其是皮尔斯，他们对世纪末景象的研究有助于解释文字的和非文字的（当其并未化约为简单的信息和消息的交换功能之时的）意指、表达和交流操作的更为复杂层面。这些思想家中，每个人都让我们把注意力投向像似性再现和异质性在交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也让我们关注到超出系统限制的符号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一方向还有助于彰显持续进行的解释—翻译操作所具有的辩证和对话的性质，这些操作，如维尔比在前面引文中所说，发生在“统一与分离”之间；如巴赫金所说，发生在语言中作用的种种向心力和种种离心力之间，发生在向心化和离心化的各种力量之间，在单语和多语、独白和杂语、同一性和异质性之间；发生在同一个和另一个、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之间。根据这样一种辩证法，显然，知识和真理绝对不

可能一劳永逸地给出，只会朝着不断更新过程之中的考察和调整敞开，以适应新的解释、表达和交流需要。这样一种动态变化，把简单层次的日常交流也牵扯进来了。

上述思考可以和雅克布森按照皮尔斯的象征符、指示符和像似符三分法对翻译所做的分析（1959）联系起来。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给定的符号（唯有通过从真实符号活动过程中抽象出来，才可以如此地可分辨）都是规约性、指示性和像似性之间辩证和对话的互动的产物，在这种符号状况中，其中一个方面胜出其他方面。雅克布森提出了区分三种不同翻译—解释过程的一种三分法：(1)“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或称“改写”（rewording）；(2)“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或称“严格意义上的翻译”（translation proper）；(3)“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或称“嬗变”（transmutation）。通过联系两种三分法，我们得出对翻译和符号之间更为恰当的表述，更具广泛性但又更为精确地阐明构成并滥觞于我们的符号活动界之中的解释—翻译操作所具有的特征。雅克布森所辨识的三种解释—翻译模态中的任何一种，都受到规约性、指示性或者像似性之一主导。换言之，被解释项和解释项、被翻译符号和翻译项符号之间的关系，都受到象征符、指示符或者像似符之一主导。此外，雅克布森所辨识的三类翻译始终是彼此关联的，或多或少在不同程度上彼此共存。譬如，就语际翻译而言，为了充分理解翻译对象、被翻译符号的意思，为了使得意思在“目的”语言、翻译项符号之中充分呈现，还有必要求助于所涉及的两种语言中的语内翻译。当规约性占主导，符号及其对象（指涉项）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符码基础之上的。这种关系发生在文字语言之中，维尔比指明了这一点，她说：“（文字的）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我们知道，对符码的指涉对翻译文本的语言成分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翻译—解释操作的初始阶段。当对符码的指涉起主导作用时，解释项符号和被解释符号之间的距离是最小的。在翻译—解释操作的这一层次上，是单纯的辨识和分辨活动占主导。

此外，符号和解释项还通过必要关系连为一体，即通过皮尔斯所理解的指示性关系。双语词典，当把译出语种的词汇和它在译入语中的对应项关联起来之时，给机械的必要性增加了符号及其解释项之间的邻接关系（这与因果性一道，是指示符所特有的）。所以，语际翻译操作在规约性之外还涉及指示性。现在，且让我们来读读维特根斯坦在《逻辑语言论》中从这一角度对翻译进行



的观察[①]：

> 当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我们并不按照把一种语言的每个命题都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命题来进行，而仅仅是翻译命题中的构成成分。

指示性指符号及其对象之间这种关系的必要性质。它受因果变化和时空邻接性关系的制约，而邻接关系就解释而言是预先存在的。当指示性占主导，翻译—解释操作仅仅强调它们已经存在于其中的对应关系，所涉及创造性工作的程度是最低的。

通过瓦伦丁·N. 沃洛辛诺夫（Valentin N. Voloshinov），这位《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929年版所署名的作者，巴赫金（沃洛辛诺夫）按照同一性和异质性之间的辩证和对话互动，对交流和社会交往进行了概念化梳理，并且在他对文字语言的分析中引入了另外两个重要的范畴，它们也可以被延伸为其他符号系统："主题"（*smysl*）和"意义"（*znacenie*），或者，如果我们更愿意，称之为"实际意义"（actual sense）和"抽象意义"（abstract sense）（1929：106）。两对词中的第二个，涵盖了每次言说被重复之时所有一样的、可复制的、直接可辨的东西——它涉及语言成分的意义，譬如构成言说的"音素"（phonemes）和"符素"（monemes）。[②] 如此理解的"意义"所对应的，更多的是"标识性"（signality）而非"符号性"（signhood），更多的是"辨识性解释项"（interpretant of identification）而非"回应积极的理解性解释性"（interpretant of answering comprehension），更多的是"直白的意义"（plain

---

① 参见 Wittgenstein 1922：4.025。

② 英语中，"morpheme"（词素）比"moneme"更为常用，所以下面的注释对于读者可能有所帮助。在关于符号学和语言的《分析词典》（*Analytical Dictionary*）中，格雷马斯（Greimas）和库尔特（Courtes）于1979年提供了以下信息。在"Moneme"词条下写道："A. 马丁内（Martinet）提出了moneme这个术语，用于指最小语言符号，或者morpheme（按照美国人使用这个词的意思），即指'一级表述'[first articulation] 的最小单位 [不同于'二级表述'（second articulation）的最小单位，即音素（phoneme）]。"在"Morpheme；Articulation"词条下写道："1. 根据其传统定义，morpheme是单词（或者语段 [syntagm]）中标识其语法功能的那个组成部分（譬如前缀、后缀、介词、语格，等等），不同于被理解为单词词基的'义素'（semanteme）。因此，A. 马丁内把moneme这个术语的使用限制在语法要素上，把lexeme（词项素）的用法限制在词基上：在马丁内看来，是morpheme和lexeme构成了moneme。2. 对直接的成分分析而言，如在美国所做的那样，morpheme是语法分析的最小单位（构成单词的单位），或者，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最小符号'（minimal sign，按照马丁内的术语，等于moneme），它携带着意指，而且在其之上，我们就进入到'音系分析'（phonological analysis）。持这一观点，我们就能区分开'词项词素'（lexical morphemes，常常称之为lexeme）和'语法词素'[grammatical morphemes，常常称之为grammemes（语法素）]。"

meaning）而非“多声部的意义”（plurivocal meaning）。在它所对应的翻译操作（和阶段）中，控制解释项符号和被解释符号之间关系的对话程度最低，距离最小。相反，“主题”指言说中原生态的、不可化约的一切，指总体的意思，意指内涵和评价方向，因为这些方面都出现在特定的交流互动实例之中。“主题”按照回应积极的理解、辩证—对话回应以及多重声音来说明交流和意指过程。主题涉及的翻译—解释操作中，像似性占主导，决定知识和认知中质的飞跃能力，因此而放大话语的语义多价性，向新的意识形态疆界敞开[①]：

> 主题是复杂的、动态的符号系统，它竭力要满足生成过程的特例。其生成过程中的意识，对于存在的生成过程具有反作用。意义是贯彻主题的技术手段。

符号及其解释项之间的像似性关系，在凸显话语的“主题”或“实际意思”方面，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当处理到语际翻译时，情况更是如此。如果翻译操作停在规约性和指示性层面，译者的任务就会失败。当维尔比在她关于翻译—解释的讨论中声称语言方式是图画性的，她所强调的是不可化约为指示性或规约性的文字语言的一个方面。译者必须深入语言的像似方面，超越词典的规定和义务，进入民族语言之间、某民族语言内部固有的语言之间、文字符号和非文字符号之间那种鲜活的对话。被解释项和解释项之间、处于高水准符号共鸣的被解释符号和解释项符号之间，必然涉及或高或低的像似性、对话以及异质性。

像似性暗示着，符号及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并非全然通过规则和符码而得以确立，好比在象征符情况中那样；意指项相比符码并不预先存在，好比在指示符情况中那样，不如说，这种关系是被解释项以自由和创新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在像似符情况中，符号及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既非规约的，又非必需的或邻接的，而是假定的。它对应于巴赫金所谓的“主题”或者“实际意思”。解释者—译者在用来自另一种语言的解释项翻译原作的解释项之时，必须记住这一点。当符号及其对象之间、不同类型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受到——皮尔斯会说——由相似性、契合性和吸引所构成的像似关系的控制，构成总体的逻辑—认知和意指世界的解释—翻译操作，会按照对话、异质性、多声部、多语言、多语种的逻辑发展，而这些，正是构成批判意识、试验、革新和创造前提的全部语言本质特色。我们称之为语际翻译的，对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同样有效。

---

① 参见 Voloshinov 1929：100。

语际翻译暗示着其他两类翻译。所以，翻译操作总是涉及皮尔斯所辨识的三类符号—对象—解释项关系的相互作用，或者我的术语中的被解释项（符号—对象）—解释项关系，以及雅克布森所辨识的三种翻译模态（但亦请参看Petrilli 1999－2000：11）。意义在解释—翻译过程之中存在并滋长，这个过程受到同一性和异质性之间的关系控制，而同一性和异质性处在一个多语言和多语种的语境之中，既在单一的一门语言之内，又在其外。

在解释符号学所描述的这个理论框架之内，以及本文提到的诸人——皮尔斯、维尔比、莫里斯、罗西－兰迪、巴赫金、列维纳斯、雅克布森、西比奥克和庞齐奥——所做的重大贡献中，交流被确认为人类语言的首要功能，但它伴随有一个重要规定：交流不被化约为信息交换，而是与生命、与生物界中的符号活动合一，并且以动态对话和彼此互补作为前提。但是，在本文中，我们必须做以下强调：就人类世界所涉及的东西而言，交流也与我们未说出、未言明、暧昧、歧义、费解、遮掩、含糊其辞、旁敲侧击、虚幻、暗示、伪装、模仿、虚情假意、模棱两可、多义、多语、多语种、异质性等的能力合一。所有这些都预设了符号活动中的像似性占主导，并且决定了成功交流互动和成功翻译实践的可能性。

具体鲜活的话语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从一种符码到另一种符码、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从一种交流语境到另一种交流语境的文段中，产生和解释两个方面的持续翻译操作。如我们所看到的，成功交流—翻译操作的根本条件是“回应积极的理解”。这意味着说话人能够重新梳理语言并且让语言适应其对话人的语言，在通过诉诸来自他者语言的解释项以得出和明确意义这种努力中，能够以元语言方式对语言进行反思，能够以元语言方式对他者的语言进行反思，以便按照来自其自身语言的解释项来明确意义。“主动的或回应积极的理解”涉及言说的“主题”或者“实际意思”。它的达成归功于不同语言和符码之间的对话性关系，是它们使得诸如改写、换位、嬗变等操作在相互替代而从未完全合为一体的解释项延宕之中成为可能。

人类语言远非简明、单一，如独石一块，可以把它描述成一个鲜活的意指过程，它始终在通过一代一代的不同习语、话语、逻辑和视角更新自己。这之所以也成为可能，要归功于去中心化、去整体化和他性这种倾向，这一点从符号的性质可以得见。多语种和多语言，既在单一的一门语言之内又在其外，来自人类语言拉开距离、表达属于他者的观点、不同的和他者的世界观这种潜质：的确，人类语言是作为这种潜质的功能而发展的。用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话说（1975），如此描述的语言是主要工具，通过它，人

类能够拒绝如其所是的世界——用我们的话说，世界的存在，符号的存在。每种语言都呈现它自身对现实的解释，但是，由于跨不同符号类别和系统的翻译所具有的符号活动能力（因此就是专门关系着我们的能力），跨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类也就能占据一个位置，来发现自由、避开界限这种快乐——这里的界限，包括以不同形式体现的文字语言系统的界限。而且，从西比奥克那里我们了解到，按照模塑来理解的语言，决定了皮尔斯所谓“沉思游戏”（the play of musement）这种人类天性，它在对话、他性和像似性的推动之下，不仅涉及真实世界，而且，如西比奥克这位皮尔斯解释者所指出的那样[1]，对产生数量无限的可能世界这种可能性做出了解释。

十一、暗喻和作为翻译—解释模塑手段的像似性

暗喻的重要性被传统语言学严重地低估了。相反，与最近的所谓“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一致，西比奥克，和马塞尔·丹尼西（Macel Danesi）一道，在二者2000年的专著《意义的形式：模塑系统理论与符号分析》（*The Forms of Meanings. Modeling Systems Theory and Semiotic Analysis*）中，赋予了暗喻以一种人类模塑中的主要作用，这也意味着承认翻译操作的主要作用。与之类似，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争辩说，暗喻在日常语言中，不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远比到目前为止一般所承认的要普及。他们1980年关于这个话题的重要研究《我们赖以生活的暗喻》（Metaphors We Live By），已经被描述成为“研究暗喻最有影响力的著作”。[2] 在I.A.理查兹（Richards）及其1939年的著作《修辞哲学》（*Philosophy of Rhetoric*）之前，暗喻在语言和思考中的作用已经被19世纪的维尔比和吉奥瓦尼·瓦伊拉蒂（Giovani Vailati）、18至19世纪的约瑟夫—马力·迪热兰多（Joseph-Marie Degérando）以及在他们之前、17至18世纪的吉昂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所强调。维柯把暗喻的重要性看作一种解释手段，今天我们也将其作为一种模塑手段。他提到了通过命名操作，某种未知之物变成已知，而且指出，命名操作是以相似性作为基础的。维柯得出结论，每个解释行为实际上都是暗喻性质的。此外，要被知晓，世界就

① 参见Sebeok 1981。

② 参见查尔斯·佛斯维尔（Charles Forceville）所撰的“暗喻”一条，见Bouissac 1988：411－414。

必须被解释。维柯的结论是，世界是作为一个暗喻性的创造而形成的。[①] 从维柯的观点看，暗喻是人类思想中一种独特而根本的结构，是一种"解释手段"，而不仅仅是用于点缀的修辞手段，不仅仅是简单的有关风格的问题。[②] 根据维柯，我们还能够对暗喻和概念之间的区别作出充分说明。暗喻和概念二者都是通过联想，在相似性或相像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从这一观点看，维柯的诗歌逻辑还与认知语言学的当代发展密切相关。[③]

维尔比想象了一种意义理论，称为"意义学"（significs），并且与瓦伊拉蒂合作，对暗喻在思维操作和语言中的关键作用展开研究，特别注意到像喻和修辞性语言的问题。"意义学"是维尔比为其意义理论所选取的名字，同时，她还将其视为一种有关解释、翻译和意味的哲学。[④] 在为了意义学努力工作时，维尔比与瓦伊拉蒂和皮尔斯都有通讯往来（两人在她的影响之下都有意义重大的著述问世），她证实了暗喻在意义生成和总体的意指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她的研究结果体现为《意义与暗喻》（*Meaning and Metaphor*，1893）和《感觉、意义与解释》（*Sense*，*Meaning*，*and Interpretation*，1896）这两篇重要论文，以及她的专著《何谓意义？》（*What is Meaning*？1903）。[⑤] 维尔比承认"可塑性"（plasticity），即"语义歧义"（semantic ambiguity），是人类符号、思想和语言操作的一个本质性特点（她把人类符号与思维和语言操作看作同一意指过程中两个相互关联的面相）。她弃绝"直白意义"（plain meaning）这种谬误，坚持认为直接指涉"实实在在的事实"（hard dry fact）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我们会说翻译成我们自己的说法就是如何，与存在之物的关系是通过符号、模塑过程和世界观作为中介的。在维尔比的分析中，像喻、类比、异质同构、修辞语言、暗喻等，都不是被看作抽象的东西或者修辞上的点缀，而是被看作对推论、话语和交流的发展起着工具性作用的种种解释手段。

翻译是西比奥克和达内西做出理论概括的"关联形式"（connective form）的一个方面，是传统上被描述成暗喻性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模塑策略。暗喻是人类推理中的核心手段，它不仅仅存在于再现对象之中，而且呈现在图示对象、

---

① 参见古斯塔夫·古厄拉（Gustavo Guerra）所撰的"吉昂巴蒂斯塔·维柯"一条，见 Bouissac 1988：627－629。

② 参见 Ponzio 2007c，e。

③ 参见 Danesi 1995，2000；《关于符号学中的维柯》，参见 Sebeok 2001：135－144，以及 Deely 2001：570－572。

④ 参见 Welby 1902，1903。

⑤ 参见 Welby 1903，1911；Welby ed. Petrilli 2008；Petrilli 1998b。

描绘对象之中。就皮尔斯的符号学而言，我们声明，暗喻是一个图像，他还把它与图表和意象一道划成像似符的子类（*CP* 2.276—2.277）——西比奥克和达内西将其描述为“像似性元符号”（iconic metasign）。暗喻和像喻在文字语言中的使用，预设了人类模塑手段及其符形表述，即被理解为模塑的语言。语言作为模塑手段以像似方式关系着其所塑形的世界，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皮尔斯、雅克布森和西比奥克所描述的符号学传统之中。①

这个方面，我们上面已经强调过，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之间也能够确立起一种同样重要的联系，尤其是他的“图示”概念。命题的像似特征意味着，图示理论意味着某种比异质同构的相似性更为复杂的东西。回顾罗西—兰迪及其有关类比相似、异质同构和同源相似的区别，像似符涉及同源相似性，这是结构性的和/或基因性的。作为并不直接再现现实的符形手段，语言（即语言交流，不同于生物学上并不明确的符号动物的内部世界构成成分的“语言”），按西比奥克的说法②，确切地说，是一种次级模塑系统。非人类的动物和人类动物都类似地使用到的那些相对简单的非文字模塑是一级模塑的例子。这些模塑提供了对“现实”多少可变的再现，使之在其生活世界中安全生存。联想—暗喻操作是思想和语言的特征，是人类特有的模塑的特征。因此，像似性主导的翻译过程不仅对跨不同历史语言的旅行起着根本性作用，而且是这些旅行的前提条件。

既然一般而言相似性对符号活动是结构性的，而且面朝人类符号活动中的所有认识和逻辑—认知过程、所有范畴化，那么，更仔细地分析相似性概念就非常有用，埃尔茨比塔·塔巴科斯佳（Elzbieta Tabakowska）就是这么做的，她提出了这个与此有关的问题：“什么是相似性？”③ 以我在本文中所用的方法为背景，考虑到人类模塑问题，我们可以在两种不同逻辑基础上区分出两种相似性：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集合逻辑”（assemblative logic）；另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选择逻辑”（elective logic），或者用皮尔斯的叫法，称之为“爱的逻辑”（agapastic logic）。④ 相似性可能属于“集合”类型，即由合一、同一而来的相似性，然而也可能属于“选择”类型，即由“吸引”“契合”而来的相

---

① 关于“模塑”（modeling），参看 Danesi and Sebeok 2000；Deely 2202；Petrilli and Ponzio 2005b，2007；Ponzio 2006；Sebeok 1991，2001。

② Sebeok 1987，1991：57—58，等等，参看本书第 240 页脚注③。

③ 参见 Tabakowska 2003：362。

④ 参见 *CP* 6.302—305；以及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b：60—61。

似性。[①]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还能够区分来自逻辑概念的暗喻。暗喻根据契合、选择、吸引、爱的逻辑推进；相对而言，逻辑概念则根据集合逻辑推进。

集合逻辑（概念）由同一性逻辑来定位，它通过根据类型来划分实体而推进；在集合逻辑基础上，个体被分配到相同的阶级、群体、性别、种族等之中。换言之，集合逻辑根据阶级、群体来辨识个体，而且只是因为个体可以根据某种同一性逻辑划分才承认个体。集合逻辑并不承认各种单独特征，而是在同化那些不能被同化的东西、翻译那些不能被翻译的东西的种种过程中吸收它们、合并它们。

相比之下，选择、吸引、契合这种逻辑控制下的相似性（暗喻），则在他性基础上推进，只承认单独特征；关系方面被留在它们不可化约的他性中了，并被承认是独特的。暗喻是在选择、吸引和契合构成的相似性关系之上建立起来的。与集合逻辑不同，受到选择性契合逻辑、吸引和爱的逻辑所控制的相似性，把给予它自身的那种东西看作他者，而就集合逻辑而言，这种东西是不同的、难以驯服的。根据选择逻辑，关系方面始终是互补的他者，用列维纳斯的话说，是“绝对他者”（*autrui*），它们彼此之间并非老死不相往来。差异并未被取消。选择的相似性，或者爱的相似性，由吸引、契合而来的相似性，并不涉及把自己呈现为相同、属于同一范畴、一样那种东西，如同在集合相似性中所发生的那样。在集合相似性中，关系方面相互认同、彼此相等、合为一体：由同一性而来的相似性，不同于由异质性而来的相似性。选择逻辑是受“像似性”“第一性”主导的。

像似性、爱的逻辑、第一性涉及避免整体性、同一性、相同这种能力，因为它们天生向往，如列维纳斯所说的，“绝对他性”，向往单一性、不可化约的独特性。正是这种东西，使得暗喻不同于逻辑概念，在意义生成和更新中占据一个特殊地位并成为意义生成和更新的一个永不衰竭的源泉，并且，在其跨不同符号活动界的翻译之时成为强化意义的一种解释—翻译手段。在人类世界中，意指创造的能力，我们今天认作“语言创造性”（linguistic creativity）的能力，就是形成新的暗喻联想、开创新认知联系那种能力，就是不同于单纯再现的形象化表示、图示、描绘、刻画和呈现那种能力（我们在本文前边就提出了这种区别）。暗喻能力是由我们的一级模塑手段，特别是西比奥克称之为“根基意义上的”语言（即被理解为模塑而非语言交流的“语言”）所规划好的，暗喻能力是人类象征行为的先决性基础，是对人类具有结构意义的，是对

① 参见 Ponzio 2007c。

人类具有结构意义的一级、二级、三级系统的构成要素。这种能力由于跨语言的翻译操作、像似性主导的语际翻译操作而得以进一步增强。

创造、创新、变革特性，并非诗人、科学家和作家的特权，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做到的，只要我们能够驾驭暗喻联想，就能够尝试在人类文化这个宏观网络中彼此相距遥远的方面建立联系，并且拓展我们的视线，超越人类文化界，放眼于符号的庞大世界。这种模塑手段，这种解释—翻译手段，由像似性关系主导，由选择的、爱的逻辑导向的手段，构成了人类世界中所有类型翻译的前提条件。

最后，我们可能注意到人类话语中对避免永恒和解释/翻译的始终需要，即便在集合逻辑构成的框架中也可以得到清晰阐述。[①] 即使是从同一性逻辑的观点看，处理通行的"x 是 y"这种表达时，对主体术语的理解或"意义"也要受到对表述它的术语的理解和意义修正！这就是"x 是 y"这种表达所做的：它使对说话人所用 y 的理解进入了——无论对或错，真或假——作为主体术语的、被说的 x 的理解。由此可见，与"谓项"（predicate）相对的"固定不变的指示项"（rigid designator）是分析哲学的一种空想。符号之间的关系中，逃避对话绝无可能。

① 对这一观点的全面展开，参看本书中《符号学和谓项判断现象学》一文之第三节："谓项判断的生成"。



全球性交流中的修辞、大众传媒和社会异化

交流的增加，不仅无法在评价和行为模式方面达成一致，而且可能被用于孳生冲突、竞争和奴役。和他人共同享有一门语言，提供了控制他人行为的一种最为微妙也最为有力的工具，有利于自身——挑起争端、推动自身目标达成、剥削他人。在现有国家中，现代宣传见证了这一点，一门世界语言会使得同样的现象可能在整个地球发生。符号学自身，随着它的发展，会被个人和群体做同样的利用——按照自身利益用它来控制其他个人和群体。

如果符号理论的现实任务之一是推进协作行为，那么另外一个补充性的、同样迫切的任务，就是鼓舞和强化个人，让他在面对现代世界中企图使之沦为被社会方面控制的交流之线所牵引的木偶的诸多力量时，能够保持自己创造性的完整。[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符号，语言与行为》（*Sign, Language, and Behavior*)，1946，载 Morris 1971：293－294]

今天的全球性交流，严格地说，是与受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控制的主导性的社会再生产体系相互关联的。这些是植根于同一性逻辑之中的，因此是植根于伴随其有限责任和借口的角色逻辑中的，最终是植根于自我利益这种逻辑中的。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和意识形态行为，换言之，它从来就不是中立的，而是相反，渗透着价值观念并且为社会规划所控制。总体符号学和符号伦理学所致力的，是对今天的交流、对符号活动的批判性理解，是在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之中，辨识对话思想、倾听和创造性，这是以他性逻辑而非封闭和短视的同一性逻辑作为基础的一种新式人文主义的前提条件。

一、前提

本章中，我将区别“修辞”（rhetoric）与“论辩”（argumentation)。修辞与劝导性话语有关，用于欺骗。譬如，政治话语、大众媒介话语和宣传即属于此种。修辞作为一种强加意识形态的手段而用于宣传之中。欺骗性修辞和意识形态有关，其中，后者是按照狭义来理解的。但是，只有在未受质疑的条件下，修辞才具有欺骗性。它和心安理得、和机构的官方话语有关，以捍卫主导

的意识形态为己任。心安理得靠的是找到借口，其基础是同一性逻辑、话语秩序、伴随有限责任的角色逻辑，是无所质疑地服从社会秩序。修辞致力于维系清白良心、有限责任的必要条件，分析到最后，它要的是对他者冷漠以待。由此，它以强加主导意识形态、保持所控制的大众服从主导的社会秩序这样一种有效的手段而出现。

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和意识形态行为，这里我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按照广义来理解的。换言之，“意识形态”在这里，指人类行为从来就不是中立的，而总是渗透着价值观念并且受到社会规划的控制。由此，人类行为需要从符号理论、交流理论和价值理论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此外，研究意识形态和社会规划的符号学方法必须关注与他者之间的对话性关系。

对话思想是一种既是总体的又是去整体的方法的前提条件，它能够向着他者敞开，能够关涉他者，能够倾听和批判。在当前发展阶段，如此理解的符号学被称为“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Sebeok 2001），它通过证实那个使得每个人与每个他者全球性地相互连通的符号网络在拓展、在延续，来致力于发展他性人文主义（与同一性人文主义相对）。在总体符号学之上，所提倡的“符号伦理学”（semioethics）（Petrilli & Ponzio 2003），强调了需要发展批判能力，它是他性逻辑导向、与他者相互关联的，而它的一项特别工作，就是证实符号网络在看上去不存在的地方是存在着的。为了符号活动的健康——符号活动，从总体符号观来看，是与生命彼此叠合的——与他者的关系，根据对话性的身体间性和相互关联性、并非冷漠无关的差异、倾听、包容、无限责任这样一种逻辑，得到了建构。惟有在这类价值观念基础之上，才可能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人和非人，创造出可持续的生活环境。

本章标题中的“全球性交流”这个表达，指的是我们今天要继续生存下去的环境条件——当代性。我区分了“修辞”和“论辩”这两个方面。如果我们对两个方面进行想象，在修辞方面，我们有劝导艺术、欺骗话语、主导性意识形态、有限责任（与无限责任相对）。修辞涉及求助藉口这一基础之上的心安理得，即便这么做是无意识的。分析到最后，修辞是基于“同一性逻辑”的，其中，这个表达是按照消极意义来理解的，它被当作是封闭化的同一性，之所以是封闭化的，是因为其短视、自私、全然不顾他者、不欢迎他者，因此对倾听和包容不闻不问。

接下去，我要对如此理解的修辞和论辩进行区别。与修辞不同，论辩是基于他性逻辑的，是基于对话和向着他者敞开的，其中，对话并不必然地被理解为说话，而是指生物符号活动意义上的对话思想，即与他者的对话性的相互关

联，身体间性，因此是对他者的倾听、欢迎。我们在说话之前需要倾听，但并不仅仅如此。倾听并不在语词之外，相反，它对语词而言是结构性的。世界作为一个鲜活的语词，对他者是倾听、包容、敞开的。就第二类想象内容而言，论辩关系到米哈伊·M. 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所谓不同于“形式性对话”（formal dialogue）的“实质性对话”（substantial dialogue）与“积极回应的理解”（responsive understanding），是基于创造性倾听、检讨和批判能力的，即以对话性的批评和对他者的回应作为基础的（参看 Ponzio and Petrilli 2008）。

二、修辞与论辩

修辞与论辩是并置的：修辞负面，论辩正面。这似乎是一个经典的位置：很像柏拉图那样。但是，把话语在其不真诚的时候描述成是修辞性的，也是一个常识问题。当话语在逻辑方面不清不楚、含混其词，当其在伦理方面以自我为中心时，听上去就是修辞性的。有鉴于此，或者应该说，正因如此，它想要进行劝导。修辞作为欺骗的企图回荡在话语中，并在因为其所是而实际得到理解之前，被认为是如此这般的。实际上，我们此刻所描述的修辞在狭义上是意识形态话语，并因此是欺骗性话语。

但是，欺骗性修辞的符号是什么？修辞性话语利用精神联想的即刻性和指喻性，催生暗示性的、高效率的推导过程，尽管这类话语只有在其不受质疑的条件下才能欺骗得逞。修辞话语的逻辑和直接推理的逻辑不同吗？这些不同话语有着同一种逻辑结构吗？两种话语之间的差异是什么造成的？修辞性话语仅仅是为了通过做出虚假承诺达成诱导的摆布性话语吗？事实上，这过分简单化了。譬如，当修辞性话语是阿谀的、颂扬的，即赞美性话语，它就不仅是欺骗的，像宣传那样。阿谀、颂扬的话语对于机构的修辞是结构性的，而后者旨在捍卫主导的意识形态、主导的价值观念，通过为其提供借口而心安理得。

要想“心安理得”，关系到诉诸借口，关系到在价值论基础中、在同一性和归属逻辑中、在此种逻辑控制下的角色中，找到合理性。同一性逻辑导向为按照协议和公民赞同确立起来的民族、气质、义务等概念背书。通过保障权利，确立义务和责任——有限责任——这些概念成了让大众快乐、受控制、安于其位的各种安抚策略的组成部分。和市场、消费意识形态、宣传相互关联的修辞，虚构出满足和幸福感，使得人民做着白日梦。的确，如查尔斯·S. 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在其著名文章《信念的确定》（The Fixation of Belief）中所说，当其捍卫着“信念和习惯”（beliefs and habits）之时，修辞

可以是愉悦而充满慰藉的。修辞被理解为“虚伪的良知”（false conscience），它确认并利用教条和谬论以达成确切的目的，而不是对其做出质疑。实际上，如前面所预料的，欺骗性的修辞只有在其不受检讨的条件下可以大展其长。和机构相互关联的宣传性修辞，如其在诉诸格套这一基础上可以推断的那样，承诺要保护和捍卫大众。通过建构故事和呈现事实，它不仅变得可以接受，而且变成人心所望，修辞手段成了信息游戏的组成部分，在赢取大众的普遍同意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人们所希望的似乎是不带有任何其他意图的告知，仅仅是告知，是为信息而信息。但事实截然不同：如果信息的唯一目的是信息，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信息的唯一目的是对信息生产过程进行再生产。而信息生产过程只有通过消费信息才能得到再生产。意大利20世纪语言哲学家和符号学家费卢奇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1921—1985）运用到了语言和交流研究与经济学之间的同源原则。罗西-兰迪表明，为信息而信息不过是为生产而生产的另一面。

在信息范畴以及在普泛的大众交流中（我们已经论及宣传），修辞一般使用有利于主导意识形态、既定价值观念（而非其他）、官方机构的那些话语手段。譬如，一种重要的修辞伎俩就是过度地反复强调。反复强调利用的是把意义导向消费而非反思、批判检讨和责任行为的重复幻象。事实被提交给公众，就像药片或者麦当劳里供应的汉堡包一样，被精美地包装在范畴和框架之中，当然，从来没有人对口味有所质疑……

柏拉图文本（至少在他比较好的那些中）的一个突出特色，是对话性换位、神秘色彩的解释或叙述，以及辩证或逻辑推导的怀疑论这三个元素交互编织所达成的那种和谐。这些元素有利于推动论辩性话语。但是，它们也有可能在三种修辞话语中消失不见：在辩解中，少了对话；在信息中，少了叙述——若是有叙述，那么它被削弱到主题骨架的地步，没有情节、冒险或者任何装点；在宣传中，少了辩证性推导。

修辞在科学和定义梳理中也起着作用。罗西-兰迪举出一个有关定义修辞的例子——他引用本尼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关于艺术的定义：“艺术是封闭在意象或精神特定理论面相中的直觉或感动”（引自Rossi-Landi 1972）。在被解释符号和解释项之间，也就是“定义项”（*definiens*）和“被定义项”（*definiendum*）之间，确立起了一种虚假的对话。已知术语对需要定义的未知术语起着主导作用。克罗齐把“艺术是直觉，等等”这种交换价值引入语言市场，他的后继者于是能够这样写：“艺术，如我们所知，是直觉”。

在写给维多利亚·维尔比（Victoria Welby）[现代符号学之母及“意义学”（significs）的创立者]的一封信中，意大利数学家及哲学家吉奥瓦尼·瓦伊拉提（Giovanni Vailati）强调在发展批判性和创造性对话中诸如漫画、仿写、讽刺等教育手段的重要性。按照瓦伊拉提的观点，漫画是我们能够运用的最有效的教育手段之一：它涉及分辨话语中的弱点，使用他者的用语，让它回荡着嘲弄它、仿写它的另外一个人的声音。这是一种形式暧昧的报道语言：它既不是直接话语，也不是间接话语，而是加上了评价的自由间接话语。

考察话语和文本，意味着从分析学到辩证法及其之上，从辩证法到对话学。这种方法证实了所有话语中特定的对话思想。当今的媒介世界与形式性对话、独白性对话息息相关，并由此而并不在高度对话思想上表意。相反，“实质性对话思想”（substantial dialogism）是他性逻辑和倾听导向的。这证明，把查尔斯·S. 皮尔斯的符号学研究和米哈伊·M. 巴赫金联系在一起是适当的，这意味着把“解释符号学”（semiotics of interpretation）和“对话哲学”（philosophy of dialogism）联系在一起，这正是奥古斯都·庞齐奥（Augusto Ponzio）在自己根据“积极回应的理解”（answering comprehension 或者 responsive understanding）和对话思想来分析解释问题这类研究中所倡导的东西（参看 Ponzio 1984，1990，2006）。

还可以在对话问题和维尔比及查尔斯·莫里斯的工作之间建立联系。两位学者都关注符号、价值和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关注符号学、价值论和符用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两位都证实了这种相互关系在认知过程和实践中的重要性。价值以符号为载体，事实上就是由符号材料构成的，而反过来则不一定是对的。并非所有符号都必然涉及价值，譬如非人类动物世界中的符号，或者构成我们基因编码的符号等等，但是，价值一定涉及符号。换言之，符号和价值是与行为相关的。

莫里斯把“意义”（meaning）分成“意指”（signification）和“意味”（significance），前者是符号学的对象，后者是价值论的对象。意指表示“拥有意义”（having meaning）的状态，而意味表示“有意义”（being meaningful 或者 significant）的状态。在莫里斯之前，维尔比也已经有了类似立场，她提出了“感觉”（sense）、“意义”（meaning）和“意味”（significance）这种三分的观点。对两人情况而言，“意味”这个术语都强调符号和意义与价值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联关系。维尔比用“意味”指符号整个的意指内涵，指产生价值的符号过程——无论这些过程是认知、情感、审美、伦理还是操作一符号使用过程；同时，她对“意味”问题和责任问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主题讨论，她

认为这是符号和意义生产中的一个核心论题。维尔比和莫里斯都对符号行为进行过描述，尤其是产生知识和真理价值的语言的符号行为。但在此之外，符号行为也和伦理和审美判断的生产有关，因此和批判与责任的能力有关。这暗示着意指过程是在高度对话潜在可能上产生的，意指过程要求一种立场，要求植根于他性逻辑和对话逻辑中的回应和理解。

和价值关联的研究意义，即从意味角度研究意指过程，意味着在其系统表述之外对意义的价值做出检讨，并对它与责任的关系加以思考。这暗示着，跟随康德考察意义的“可能性条件”这种批判的努力，以及跟随马克思为人类而复兴按照“社会再生产”来思考的符号活动的意义（参看 Rossi-Landi 1968，1985，1992）。实际上，把符号与价值相连，按照意味的生产来研究意指过程，暗示着做马克思关于其商品批判所做的工作。也就是说，关注符号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意味着对意义解构，表明事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生产事物与符号的人类之间的关系，事物与符号之间的关系的目的就是生产出既定的价值，譬如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谓的“事实”“事物”“关系”，都是生产过程的组成部分，并不独立于其外。这也意味着把意义恢复到事物与事实，因为既然聚焦于生产过程，也就有可能分析和批判人类在日常意指和交流实践中受其所制的生产语言和社会异化的那些过程。

根据对符号、价值、行为之间相互关联的看法，查尔斯·莫里斯提出了一种价值类型学和行为类型学，这在他 1964 年的著作《意指与意味》（*Signification and Significance*）中得到了系统阐述。价值分成“对象”（object）、“操作”（operative）和“认定”（conceived）价值类型，与分成“观念”（perceptual）、“操控”（manipulatory）和“消费”（consummatory）行为的行为类型相互对应。此外，按照皮尔斯最为知名的符号三元观，在三类价值和行为，与“指示符”（index）、“象征符”（symbol）、“像似符”（icon）三类符号之间，也能确立一种对应关系。实际上，对象价值（通常规范）对于解释项而言是以指示方式与其对象相关，即按照必要性法则。操作价值（伦理、法律、宗教规范）以象征方式与其对象相关，即以规约性作为基础。认定价值（意识形态）以像似方式与其对象相关，即以相似性作为基础（参看 Ponzio 1985，1990）。

真正的对话，无论是在几个对话者之间还是在单一意识之内，只有在允许讨论和争辩的条件下才是真实的、反修辞的。也就是说，对话须是辩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如巴赫金所理解的那样，须是在“实质”意义上具对话性的，对话须诉诸于“逼真性”（the verisimilar）（参看 Bonfantini & Ponzio 1986；

Bonfantini，Ponzio & Petrilli 2006)。真正的对话和辩论是仿照经验现实的。也就是说，和重“虚伪”(dissimulation)与欺骗的修辞相反，对话和辩论是重“仿真”(simulation)的。

“仿真”这个术语含混不明。正如有关像似性和试推法的研究有力地教会我们的，仿真在暗喻和模型中起着根本性作用，处在创造性和规划能力的根基位置。论辩与逼真之间的关系还为这一事实所决定——维尔比表示(1985a，p. 13)——“我们所有智识工具中最出色的之一”是“意象或比喻”。问题不在于废除比喻或暗喻话语以有利于所谓直白话语，而是辨识和废除把事物之间关系弄得神秘、把推理弄得扭曲的那些不充分的意象。维尔比说：“我们需要一位语言学上的眼科医师来恢复我们所失去的聚焦能力，通过某种使之正常化的镜片把我们的意象带回现实。”(同上，第16页)且让我们记住，真理是逼真性的姐妹！在这一舞台上，突出的是两个问题：首先，我们怎么辨识用于欺骗的修辞性推理所使用到的语言—逻辑陷阱？其次，我们怎么辨识使得论辩根基扎实而且具有批判性的那些策略(包括话语类型或者一般性的符号类型)？

三、大众媒介和行为规划

宣传语言的特点是模糊、指涉、多义、创造、想象、创新、暗示、迂回、比喻、暗喻。但尽管有这些意指特征，宣传话语却是独白的、重复的、刻板的。这使得宣传语言对主导话语具有功能作用，毫无批判地复制当前的生产体系，维系既定的秩序。在这一语境中，新的已经是旧的了：革新和市场上已经可以得到的产品的毁灭是重叠的。就消费阶段而言，再生产循环的终极目的是以为生产而生产、为信息而信息、为消费而消费的名义再次开始。属于体系的每个人都分担了一项共同的艰难工作：作为消费者投入市场中。

语言生产和物质生产都是同一符号过程、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再生产。所有经济—文化表达都是由文字的和非文字的符号系统构成的，即它们分担共同的符号过程。作为其“共同话语方法学”(methodics of common speech)的发展(Rossi-Landi 1961，新版1980)，费卢奇奥·罗西-兰迪提出了“共同符号活动方法学”(methodics of common semiosis)(Rossi-Landi 1985，新版2006)。这是以他20世纪60年代在语言学(文字的)工作和非语言学(非文字的)工作之间所发现的同源性为基础的，可见于他的著作《作为工作与贸易的语言》(意大利文版题为 *Il linguaggio come lavoro e come mercao*，1968，英文译本题为 *Language as Work and Trade*，1983)。根据罗西-兰迪的观点，一种有关社会的一般性理论，必须辨识连接

不同符号活动表现的那些结构—基因方面的相互关联，这些符号活动表现超越了历史—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分离，或者超越了与科学中专门化有关的分离。如此这般的关于社会的一般性理论，是与一般符号学相耦合的，因为人类须与整个社会组织相互交流。

文字工作和非文字工作之间、文字信息生产和商品生产之间，并没有什么强加的“天然分野”：两种情况都涉及符号活动。换言之，如果我们把罗西-兰迪的“劳动”（work）概念和托马斯·A. 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的研究及其“模塑”（modelling）概念相互关联——记住，西比奥克为人类第一模塑所引入的术语是“语言”（language）（Sebeok 1991，2001a，b）——可以说，文字的和非文字的工作，二者所表现的都是共同的“语言的”（不过是非文字的或前文字的）模塑工作。由于这个缘故，对人类文化和社会再生产中一个符号系统的研究能够在对另外一个的研究中有用，因为无论我们研究的是一个符号系统还是另外一个符号系统，本质上我们都是在研究同一种东西。无论问题是关于商品还是关于文字信息、物品的生产和交换或者符号的生产和交换，符号学所关注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生产它们并使得交换成为可能的那些劳动过程（Ponzio and Petrilli 2008：12—18）。

这个立场得到了被描述为“全球化”或“交流—生产”的资本主义发展当下阶段的确认（参看 Petrilli and Ponzio 2005）。在这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交流无处不在：我们现在知道，不仅是商品信息，而且信息本身已经成为商品；我们还知道，在今天的生产循环中，交流不仅发生在该循环的中间阶段——交换、流通和市场，而且，它现在还成了最初和最终阶段，即生产和消费阶段基本的组成部分。

此外，根据罗西-兰迪的看法（1972，1978，1992），作为符号行为，人类行为与交流和规划有关：人类符号行为是交流行为和被规划的行为。社会规划、方案和计划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是彼此关联又相互依赖的，就像一系列同心圆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越是发展，这种相互关联就越是不可避免。什么是规划？这里，“规划”（program）并不是按照“电视节目”（TV program）来理解的。它不是通过提出新的电视节目以便我们渡过今天的电视危机。相反，一种总体性的社会计划对于“新的、更为人性的规划”（new and more human programs）是必需的。“交流规划”（communication programs）这个概念首先是由罗西-兰迪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提出的。他揭开了人类社会交流的迷雾，表明交流如何构成交流规划，构成符号和行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人们明白，我们需要新的、更为人性的交流规划，

以面对语言和社会异化这种现实。

本章中，我们呈现了对交流和社会再生产的符号学观照。我们的观点是符号学的。但是参照并非对符号学进行编码和信息传递，对此罗西-兰迪在1961年年初就在其专著《意义、交流与共同话语》（*Significato, communicazione e parlare commune*）中进行过彻底批判，他讽刺性地将这标记为“邮包符号学”（postal package semiotics）。我所提倡的方法也与“营销符号学”（semiotics of marketing）没有关系。实际上，如罗西-兰迪在《作为劳动和交换的语言》（*Language as Work and Trade*）中所表示的，一般所理解的“营销符号学”失去了它的批判功能，归顺了“文字和非文字的市场”（verbal and nonverbal market）。换言之，营销符号学失去其批判能力并让自己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循环，服务于公平交换的市场逻辑，服务于产品—信息和信息—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中，符号学甚至不能对与响应主导意识形态的电视相关的交流做出批判。营销符号学是主导意识形态（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的帮手，它为既定秩序服务，顺从市场逻辑和宣传的流通。最近，符号学家的“职业化”，就是指作为广告机构的咨询师贩卖自己的学术专长，这渐次地凸显了电视作为其最有力交流渠道的地位。今天，符号学面临的紧迫问题是摆脱对官方意识形态、交流规划、市场的依附，恢复批判的能力。

罗西-兰迪把主导阶级定义为在特定社会群体中掌控着文字信息的散布和流通的阶级（1972：203-204）。近来，任何想要为其“本可受到阻止的发迹”[语出布莱希特（Brecht）的戏剧《阿尔图洛·尤伊本可受到阻止的发迹》（*The Preventable Rise of Arturo Ui*）][①] 获取民意赞同的人，都必须控制交流和交流网络——出版业，尤其是报纸，不过现在电视更是来势汹汹。阿尔图洛·尤伊现在必然求助于电视。和布莱希特那位向剧场演员咨询的尤伊不同，要想学会交易手腕并让自己成功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今天的尤伊必须去咨询广告代理商，去咨询营销符号学专家更好。这是今天交流的现实。电视和宣传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它们变得相互依赖。电视从财政角度看是依赖于宣传的，而电视和宣传渐次地又依赖于控制交流网络的人。所有电视节目都是同一个网络、同一个文本，即宣传网络的组成部分。对公众说话，就暗示着进入

---

① 《阿尔图洛·尤伊本可受到阻止的发迹》（又作 *The Resistible Rise of Arturo Ui*，德语原名 *Der aufhaltsame Aufstieg des Arturo Ui*）是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作于1941年的一部戏剧，它以编年方式描述了阿尔图洛·尤伊这位虚构的20世纪30年代美国芝加哥黑帮人物的发迹史。——译者注

了这个网络。即便政治都在某种程度上电视化了，电视化了的政治话语已经成了一个宣传的光照点。也就是说，政治信息本身已经成了正在发展的宣传序列中的一帧光片。

今天的符号学必须是批判的符号学。实际上，各种意识形态以及诸如现实、主体、情理、真理等概念，只有通过愿意面对全球性社会再生产语境中的符号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符号批判，才能够被去除神秘化。这种批判的符号学研究方法致力于发展一种新的、更有意识的人文主义的事业，这种人文主义不仅关注人的符号维度，而且关注符号的人性维度［为其提供参考的，除了皮尔斯，还涉及卡尔·马克思、维多利亚·维尔比、米哈伊·M.巴赫金、亚当·沙夫（Adam Schaff）、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查尔斯·莫里斯、费卢奇奥·罗西－兰迪等人］。通过其对政治经济的批判，马克思（如前所述及）证实了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人们过去认为，只存在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符号之间物化了的关系。

今天全球化世界中的趋势是消极地服从把经过改良的压迫形式当作解放行为的社会规划。这种神秘化在大众媒介和主导意识形态——或者，用庞齐奥的说法，"意识逻辑"（ideo－logic）（Ponzio 1992；又参 Petrilli ed.，2004；Petrilli & Ponzio 2005；Ponzio 2006）——那里最为典型，而且事实上指向整个全球化的多媒介交流网络。马西莫·A.博恩梵蒂尼（Massimo A. Bonfantini）（1985，1993）强调需要批判和创造的干涉，并且建议抵制电视侵略性使用所带来消极影响的一系列策略。根据博恩梵蒂尼的观点，人们需要进入一种面对面的人际关系，恢复事物与符号真正人性的维度，并且证实让它们相互关联的种种人类关系。他建议，人们可以用到的策略之一是制作自己的录像。

受益于电讯和信息科学，交流网络在整个地球开疆拓土。出现了就所产生信息的数量和速度、扩张和即时性而言史无前例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体系。电视频道和服务继续孳生，不同节目之间快速切换，使得消费者能创造出自己的互文本来。但是，先进的技术和增强了的符号交通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信息生产中的冗余。

四、社会和语言异化问题

在本文中，异化问题，社会的和语言的，仍旧是，而且在事实上很多情况下是，在恶化——人类主体，单个的个体主体，我们中的"每一个"，在异化。交流过程要求从其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方面进行批判性评估，所谓"进步"，将

不可避免地在与同时也是语言异化的社会异化这个问题的关联中出现。信息生产越是冗余，单个个体就越是受到交流过程控制，这些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异化问题而不是表面的积极参与，就越发突出。在全球化和电子革命的时代，主导意识形态和全球性交流推崇市场的语言和非语言产品的神秘化。意识在以生产本身为目的的生产循环中被与实践割裂，在这种生产之中，即使看上去不受平等交换市场意识形态侵扰的那些主体，也以种种方式为全球性的"符号市场地位"（sign marketplace）的扩张推波助澜（参看 Sebeok 1987）。

就被当作用户—消费者的主体的地位问题而言，交流网络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批判意识、创造性、负责任的参与或者"自由"的发展。相反，危险在于，随着交流网络的扩张和更具侵略性，被套在其中而无法脱身，被市场上的符号冗余压垮，被异化——社会方面如此，语言方面亦如此。我们需要对诸如电子设备等产品和用户—消费者之间关系的本质做出检讨，验证批判在主体与符号市场及其产品之间关系中的参与程度和创造性。反批评的主体被动地顺从主导意识形态、话语秩序，顺从这一按照交流网络的控制者利益来思考的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作为该系统的一种功能行事，而未对自己作为主体的地位或者自己行为对他者的意义和影响有所检讨。

大众媒介为把任何事物转换成商品做出了贡献，强调了物化过程，或者对市场具有功能性的更好的流通或流动，还起到了维系生产—交流循环的作用，正如在电视和宣传中所做的那样。如冈瑟·安德斯（Gunther Anders）（1956，1980）所观察到的，电视和广播产品，以及今天和远程信息处理相关的产品，不一定采用物品或产权形式，而更多的是他所谓流入总的社会再生产系统中的"液态"产品。"传播"（transmission）这个字是有问题的，因为听上去它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意义：传播行为以及被传播的对象。我们拥有用于传播商品的工具，但是并不拥有商品本身。"以一种悖论形式来表述"，安德斯说，"我们只是一种简单的被动性的主人。……各种比喻并不比马克思所嘲讽的斯特恩的'自己饥饿的主人'更滑稽（Anders 1956，1980）。"根据安德斯的观点，"物化"（reification）这个术语一般用于描述上个世纪中的各种趋势，并不能充分概括今天事态的特征。我们现在处在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其中，形式被获得，事物被液化，或者说，至少液化和物化同样特点突出。"我提议，我们使用'液化'（liquefaction）来表示仍然被理论所遗忘的这种事物状态（同上）。"磁带和录像带，譬如，在"以液体状态"生产产品的过程中，是不会和生产循环的利益发生冲突的，虽然这类产品"不是本着生产的利益被创造出来的"。相反，它们是为了那些想要以像书籍和绘画那样的形式拥有其传播物的消费者而

被创造出来的。不过，当问题涉及有利于资本发展时，资本主义工业会乐意生产新商品的，“即便新产品和生产原则相互矛盾”（同上：第49页）。

当下的社会再生产和文化系统以如此这般的方式相互关联，以至于对文字的和非文字的符号二者都进行了资本利用。在全球化和全球性交流语境中（参看Petrilli 2008），必须找出策略来反击直接来自这种资本化的社会异化符号。从社会—符号观点看，譬如，博恩蒂凡尼就提出，必须建立工作组来担负起解释、批判甚至改造大众媒体符号的工作。在这一语境中，重要的是强调，“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这个表达并不是一个装饰性的暗喻，而是现实结构的组成部分（参看Petrilli 2006c）。语言和非语言的工作产生和推动了文化资本，而且，与所有产生资本的过程类似，“文化资本”是在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基础上得以增加的（参看Rossi-Landi 1968，1992）。这些机制大多数的运作都无需主体的意识，实际上，主体不仅没有意识到对其活动做出定位的结果，而且他甚至常常不知道他在劳动。如罗西—兰迪所说：

> 我们可以承认，人们提供劳动力而没有意识到他是为了某个结果而这么做的，因此没有意识到他在劳动这一事实。所追求的结果可能是超个人的，因为它是一个尚不明确的社会规划所强加的。这些情况下，劳动不同于活动，因为它实施了规划（对之有意识或无意识并无区别）。如马克思所说，人类行之而不知之（1971：22）。

资本主义生产在今天已经被推向极端，这意味着主导意识形态为资本的发展服务。在这一语境中，意识形态是高度不可见的，是一种剥削，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现在对行为来说是结构性的，是不可理喻的。全球化时代对于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异化分析来说是最为艰难的一个时代。各个文化系统受到多媒介资本的自我利益所控制。主导社会秩序对诸如社会异化或剥削之类问题视而不见，或者宣称意识形态的“危机”甚至“终结”，或者忽视甚至不予承认诸如“异化”“阶级利益”和“社会剥削”之类表达，这些现象都不是偶然的。

反击和抵制这种状况的方式之一，是建构不同的交流情景并根据制约为文化资本再生产服务的生产循环的各种机制采取行动。这种干预需要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符号具有务实观，具有对通过大众媒介攫取的民意做出批判的能力。从这一观点看，电视的能力从1991年起，随着题名为《海湾战争》（*Gulf War*）的系列电视片，得到了特别的彰显。西方历史中的这一事件揭示出，通过诉诸电视，要使某个观点得到支持是多么容易，即便最初这个观点不得人心。当时，美国的布什政府需要民意来支持战争，这场战争被描述成解决国际争端和

贯彻和平的一种必要手段。

夸张可以被用作一种形构手段，针对格套和“共同地位”所产生的呛声效果，集中关注困扰今天世界的诸多问题。夸张可以用于变换意义、解构现在意义、直白意义并且建构新的意义和暗喻，这可能还涉及翻译和揭示那些看上去明显或者简单地被想当然的意义。通过诉诸这种话语手段而取得的一个有关反信息的重要例子，是下边题为“马科斯副司令并不仅仅是同性恋者”（Subcommander Marcos is more than just gay）的一份公报。这是恰帕斯的墨西哥萨帕塔分子[①]对《旧金山时报》（*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对他们的首领马科斯及其同性恋的专题新闻报道所做出的回应。马科斯被引用说，他曾为旧金山一家饭店工作，却因为身为同性恋者而被解雇。亲政府的墨西哥报刊利用这一事件来诋毁马科斯，讽刺他是“酷儿革命者”（queer revolutionary）：

> 关于马科斯是否是同性恋：
>
> 马科斯在旧金山是同性恋者，在南非是黑人，在欧洲是亚洲人，在圣伊司德洛是奇卡诺人，在西班牙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以色列是巴勒斯坦人，在圣克里斯托博大街上是马来西亚裔的印度人，在内撒这个墨西哥城中的大贫民窟是帮派分子，在国立大学这个民谣圣地是摇滚歌手，在德国是犹太人，在国防部是指控调查员，在后“冷战”时代是共产党人，是没有画廊或画册的艺术家……
>
> 是波斯尼亚的和平分子，墨西哥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个街区中星期六晚上只身出门的家庭主妇，CTM 机构中的罢工者（CTM 是一个人员庞大的亲政府工会，几乎从来不授权任何罢工），为无足轻重的页面写充数故事的记者，晚上十点地铁上的单身女人，没有土地的农民，失业的工人……心情郁闷的学生，自由市场经济圈子中的异见者，没有著作也没有读者的作者，当然，还是墨西哥南部群山中的萨帕塔分子。
>
>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马科斯是一个人，是任何一个人。马科斯是所有被剥削、被边缘化、被压迫的少数，反抗着，高喊着“够了！”（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46/4，Sept，1994：1）

五、交流与符号伦理学

从符号学角度看，对符号、交流和主导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研究方法需要高

---

① 恰帕斯（Chiapas）是墨西哥南部一个州的名字。萨帕塔分子（Mexican Zapatists）是对一群墨西哥革命运动党人的称呼。——译者注

度的倾听、向着他者敞开以及对话思想。敞开不只是数量上的（如总体符号学的囊括性所允许的，参看 Sebeok 2001a），而且是质量上的。符号学方法必须留意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对话性质（参看 Ponzio 2006）。如前所述，对话思想是研究符号与意义的根本性条件——一种去整体性的方法——它是全球定位的，是以倾听、向着他者敞开为基础的，而不是一网打尽式的和牺牲他者的。

如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所证实的，他性迫使整体性在与他所谓"无限性"（infinity）相关的过程之中不断地自我重组。这可以和查尔斯·S.皮尔斯著述中出现的"无限符号活动"（infinite semiosis）联系起来。与无限性的关系不只是认知方面的：这种与无限性的关系超越既定秩序，超越象征秩序，超越规约与习惯，是一种关于投身其中和责任担当的关系。符号和交流的去整体性研究方法是桀骜不驯的。和整体化趋势相反，去整体化方法是向着他者的他性、不同于自我的他者和自我的他者敞开的。其中，"自我"不是被理解为受同一性逻辑主导的像我本人那样的另一个自我、另一个"他我"（*alter ego*）、属于同一社会群体的另一个自我，而是被理解为绝对的他性。根据这种逻辑，他者是按照陌生性、差异性和独特性得到体验的，无论朝着相反方向如何努力，漠不相关都是不可能的。

为了符号活动健康，为了整个星球上生命的健康，符号学称道的是作为"符号动物"（semiotic animal）的人类的责任意识。和非人类动物不同，符号动物能够生产关于符号的符号。换言之，符号动物具有沉思、反思、批判意识的能力，具有采取立场和担当责任的能力。从这一观点看，符号动物也可以被命名为"符号伦理动物"（semioethic animal）。实际上，我们把符号活动的这一特定维度命名为"符号伦理学"（semioethics）（参看 Petrilli 1998，2001；Petrilli & Ponzio 2003，2005，2007）。"符号伦理学"能够为发展出一种针对全球性交流的消极甚至解构方面的批判理解做出贡献。今天，对于大众交流，一种批判性方法是必要的，大众交流现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多媒介交流，具有其进行欺骗的常规、惯例和职业特征，这一点明显表现在全球性营销和宣传话语中。

全球性交流对于"个人化身体的新正统"（new cannon of the individualized body）（巴赫金语）这种意识形态—社会的标准是功能性的，渐次的，它对于控制个人身体并将其植入社会再生产系统是功能性的。"生命之力"（bio-power），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讨论的，实际上和个人作为对应于世界范围的全球性交流系统的孤立而自足的实体这一概念有关。在这一框架中，身体是作为属于个人的孤立的生物性实在而被体验的，这



和基于身体间性、相互依赖性、向着他者暴露和敞开的文化实践和世界观几乎全然灭绝有关（所剩下的，不过是供民俗分析家们研究的木乃伊化的遗迹、保存在人种博物馆和国家文献史中的考古学上的残留之物——博物馆化这种普遍化状况的表达）。

相反，米哈伊·M.巴赫金（1963，1965）分析了对通俗文化中身体的认知，种种形式的“怪诞现实主义”（grotesque realism）。在这一语境中，身体并不是按照个体的或者与整体性中的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彼此分隔的方式来看待的。有关怪诞的身体的符号，今天只有微弱痕迹残存，包括了仪式面具在内——公众节日中所使用的面具，狂欢节上的面具。中世纪通俗文化中“怪诞现实主义”要早于与资产阶级崛起相关联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它把身体表现为在与其他身体的共生中洋溢滋长的未定性存在，和超越个人生活诸多界限、诸多阻碍、诸多分隔的变革与更新息息相关。由此，随着资本主义再生产系统的兴起和发展，个人的、私有的、静态的身体观念渐渐确立自身，并且现在在全球性交流这一语境中得到了强化。

主体性必须恢复主体—符号的自我—身体—生命存在之间的联系，这意味着谈及关联自我的身体和他者的身体、和全球性交流网络中其他生命存在那种延续和相互关联状态。正因为“全球性交流网络”被描述成与生物圈是相互叠合的，我们对交流的认识就远比通常对这个表达的理解来得更为广阔。我们关于主体性的认识，也可以按照他性逻辑适当地重新加以梳理，与之相对照的是独白式的同一性，后者与之相反，是牺牲和排斥他者的。同样重要，需强调的是，这种重新梳理并不是局限于认知—理论方面的，而是具体的、鲜活的，是和实践、生活质量相关的，换言之，它还是伦理—实用主义方面的。

和列维纳斯（1972）一致，同时也和巴赫金、皮尔斯、维尔比和莫里斯一致，我们提倡一种新型的人文主义：不是目前为止主导西方文明的那种同一性人文主义（在它之中，人权始终是同一性的权利），而是基于倾听和欢迎他者的他性人文主义。按照同一性逻辑所定位的人权收复大多数时候都忘记了他者的权利；相反，对他性人文主义来说，他者的权利是首先要得到承认的。他性人文主义把他者看作不同于自我的他者、自我的他者。的确，自我常常移除、遏制、隔离自身的他性，将其牺牲给同一性，而由此所取得的同一性是虚伪的，是注定在某一点上会坍塌的。

符号学通过证实符号网络的扩张性和一贯性而为他性人文主义做出贡献。作为该网络的组成部分，人类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轴上（从生物符号活动角度，指的是世界范围和整个星球的交流）是彼此相互关联的。人类的全球性命

运——从最邈远到最新近的种种表现，从过去到其进化中的未来，在生物方面，在历史—社会方面——都蕴含在每个人的行为和决定之中，反之亦然。

符号伦理学并没有一个带有意图性目标的规划要提出，也没有什么戒条，或者多少严肃、高调的准则去落实。人类批判和担负责任的能力是符号伦理学的特殊关注点，它提出要对之大力发扬。符号伦理学批判格套、陈规和意识形态。譬如，与查尔斯·莫里斯一致（1956，1964），它聚焦于不同类型的价值。符号伦理学的一项特殊使命，是证实符号网络和相互联系在看上去不存在的地方存在着。符号伦理学的符号活动研究方法实际上是把关注焦点放在了不可逃避的联系、蕴含和阐述上，在此之中，似乎只存在有着相关借口的种种分隔、界限和距离。借口可以服务于捍卫被狭义理解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基于同一性逻辑的，允许从“问心无愧”来说的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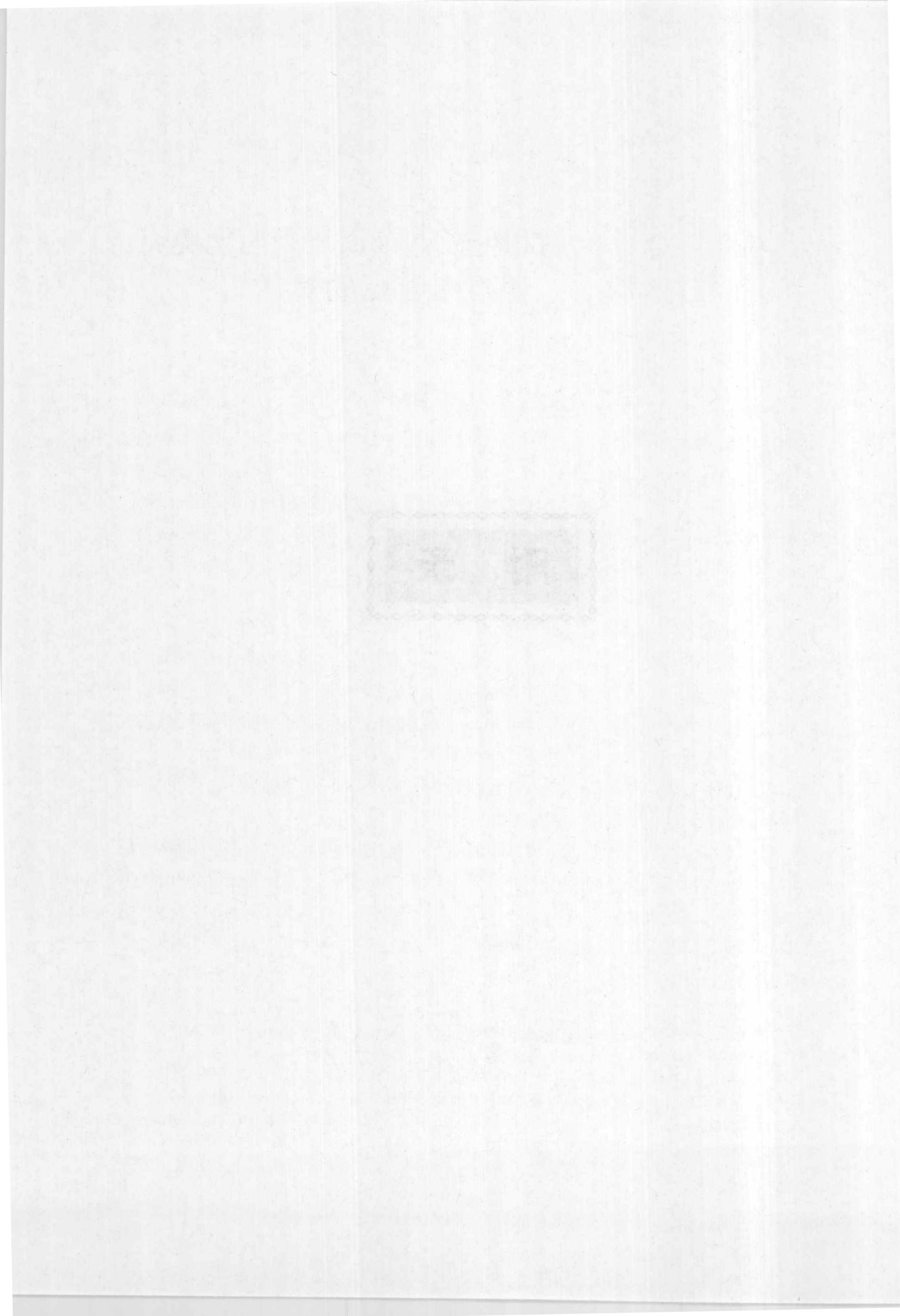
与巴赫金进行过理论阐述的“欢悦的相对性”（joyous relativity）这种状况不同，对话性的差异之乐、符号伦理学的批判工作表明，彼此冷漠的差异情形是虚幻的，分析到最后，整个星球的命运是蕴含在每个人的选择之中的，反之亦然。符号伦理学必须从分析和检讨今天的社会再生产体系开始——这意味着论及当代性，就历史和社会而言，即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并且打磨出一种有关今天交流—生产关系的无畏而且精确的分析来。

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生产模式，由此而来的全球性交流—生产关系，很大程度上变得同质化了。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符号伦理学的工作来说是一种“优势”。整个星球现在一个单一类型的市场、一个单一类型的生产循环所主导，不仅全世界范围都是同质化了的人类行为、习惯和样式（包括服装样式），而且想象性的生活也是同质化了的。在今天的全球性社会再生产体系中，因为其覆盖着整个星球，按照他性所理解的差异被按照可替代项所理解的更多差异所取代。这种对于符号伦理学的所谓“优势”，是这种呈现出一种统一化状况的分析对象，因而种种不同问题就不会受到关注，因为它们不再彼此相关了。然而，也很明显的是，“优势”这个词是带着讽刺意味的，因为暗含的意思是我们所处理的现实被当成了一个单一、紧凑、独白式的总体。但是，独白思想的“优势”不可避免地损害了批判能力，为检讨制造障碍。多声部性和多元思想的状况则与之相反，拥戴的是创造性的解释和批判性的质疑。此外，批判工作因为尚没有现成可得的合适的认识工具而变得困难；如果我们要恰当地处理当下历史发展阶段中所出现的新东西，就必须有超越那些想当然之上的新的范畴和假设。这种工作，由于全球性交流—生产系统以及全球性大众媒介交流——如我们所知，后者在全球化中是与社会再生产循环紧密地相互关联

的——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现在已经迫在眉睫。

符号伦理学提供了一种符号动物力所能及的全球性眼界。不同于独白思想的冷漠无关和对官方意识形态和社会规划无所批判的顺从，今天或许远比之前更甚，我们必须关注我们作为符号动物的符号伦理能力，并且不辜负它，也就是说，不辜负人类对于对话、他性、倾听、包容、创造性、批判和责任所具有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紧迫地认识到，诸如批判和创造意识、对话性的回应和责任担当，涉及人类符号活动的符号伦理维度的这些价值观念，为了生活质量，为了整个星球上的人类和非人类，必须得到充分的恢复和发展。


附 录



从皮尔斯（经过莫里斯和雅克布森）到西比奥克：与托马斯·A. 西比奥克的对话[①]

问：影响您学术思想形成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答：我最重要的那篇自传性文章名叫《鲜活的符号》（*Vital Signs*）（见Sebeok 1986a，第五章），您正在把它翻译成意大利文，它讲述了我是怎么走上符号学之路的。换言之，首先是经过奥登（Ogden）和理查兹（Richards），然后经过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然后，当然，是对我生命中影响最大的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事实上，一方面是从莫里斯，另一方面是从雅克布森，我走回到了皮尔斯（Peirce）。

问：您是什么时候见到雅克布森的？

答：我 1941 年 8 月见到雅克布森，是在新泽西州的弗朗茨·博阿斯（Franz Boas）的家中，当然，第一眼的感觉是敬爱。我成了他的第一位美国学生，而且主要是在他的指导下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我和他一生都保持联系。到他去世，他都一直是我的朋友。

问：美国的一般做法是从一个大学转到另一个大学，而您怎么会在布鲁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度过自己整个学术生涯？

答：我在印第安纳大学算是个异类，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在其一生中都会从一个大学挪到另一个大学。我在同一所大学呆了四十五年，担任这份教职的时间非常长。印第安纳大学为我创设了一个中心——“语言与符号研究中心”，我从 1956 年起就担任中心主席。这段时间太长了，三十一年，这期间我一直

① 这次采访是用英语进行的，发生在 1987 年 7 月 21 日，地点是意大利乌尔比诺这座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迷人山区小镇，当时，托马斯·A. 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于 1987 年 7 月 20 至 23 日在乌尔比诺大学国际符号学与语言学中心举办了系列讲座。这次采访首先由我翻译成意大利文，题为“从皮尔斯（经过莫里斯和雅克布森）到西比奥克：符号之路”（Da Peirce [via Morris e Jakobson] a Sebeok：I segni di un percorso]，载 *Idee* 2，5/6，1987：123－132），后来以英文收入西比奥克 1991 年的著作《美国人的签名：符号探索与方法》（Iris Smith，ed.，*American Signatures. Semiotic Inquiry and Method*，pp. 95－106）。——作者注

把印第安纳大学当作我的总部。

问：在美国，人们从一所大学挪到另一所大学是出于选择吗？

答：在美国，一般情况下，人们的搬迁并不全然出自选择，而是为了获取提升或者丰厚收入。您在一个地方教书，另一个地方邀请您。但就我而言，我的大学一直对我很好，我找不到任何理由离开。我在布鲁明顿一直过得很愉快。我整个教书生涯都在这里，与此同时，像您会在我的简历中看到的那样，我旅行期间在很多地方教过书。

问：您与意大利有什么交道？最初是怎么开始的？

答：我在匈牙利上过艺术体操（高等学校）。那里，至少从第五年开始，我必须学习第三门外语。拉丁语和德语是必修的，我选择了意大利语作为我的第三门外语。

事实上，我为这次采访首次披露：我的意大利语学得相当好，以至于有一天我得到了墨索里尼颁发的奖章。奖章是意大利驻布达佩斯大使带给我的，后来这位大使成了意大利这个地方的一位教授。当我多年之后碰到他的时候，我对他说："您还记得您给了我一枚墨索里尼颁发的奖章吗？"他说："嘘！"所以，我与意大利的交道是从那时开始的。更早一些，我父亲在阿巴奇亚或者奥帕提雅有过一栋别墅，今天这地方已经划入南斯拉夫境内。所以，我对特里斯特地区非常熟悉。以前，我和父亲、母亲等每年都去阿巴奇亚消夏。我和意大利打交道已经有年头了。

问：在学术圈中，您的交道又如何呢？

答：我通过语言学而与意大利有了知识交往。就我所受的训练而言，我是一位语言学者，我对许多意大利语言学家都相当了解。当然，我和昂贝托·艾柯（Umberto Eco）是至少二十年的朋友了。我很晚才碰到费卢奇奥·罗西－兰迪（Ferruccio Rossi－Landi）——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不管怎么说，罗西－兰迪和我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我认识塞萨尔·希格（Ceasare Segre）很长时间了，非常喜欢他。还有吉安弗兰科·贝特提尼（Gianfranco Bettetini）和其他人……

问：有没有可能调和查尔斯·莫里斯的行为主义与他的符号科学？今天，由于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对其的批判，我们对美国行为主义遭遇的危机已有所知，尤其是和语言相关的那些。不过，莫里斯的符号学在认识论层面上持续地具有重要性。莫里斯的符号学与行为主义关系密切，那么，我们该怎么解释它持续的有效性呢？

答：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这实际上一言难尽。我 1936 年在芝加哥大

学碰到莫里斯。他为人极好，是我所遇见的人中为人最好的之一。他是个禅宗主义者，极端的信奉者。我认为我是他当今在世的两三个学生中的一个。

问：还有谁?

答：就我所知，只有两个还在世的学生。一个是数学家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他去学数学了，但在我之前一年他上过莫里斯的符号学讨论课。第二年我来了。那一年的其他人都去世了。我之后的一年有伟大的音乐学家列奥纳·梅尔（Leonard Meyer)。所以，我认为马丁、列奥纳和我是在芝加哥跟随莫里斯学习过的尚在人世的几个人。您知道，莫里斯，就我所知，是讲授事实上属于符号学性质课程的第一个美国人。该课程被称为“讨论课”(Seminar)。他把课程重复了两三次。之后他离开芝加哥，去了佛罗里达，而且从未再讲授过符号学。莫里斯的其他学生是有的，但不是学符号学的。

1938 年，莫里斯写出了他关于符号学的杰出专著，这部著作和心理学没有任何关系。之后，在 1938 年到 1946 年间，他发现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我总觉得这是一大错误。我认为他犯了两个错：第一个是把符号学和心理学划在一起。我觉得两者是无关的。第二个是他把自己和一种特别的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划在一起，后者在当时的确非常热门，尤其是就克拉克·L. 胡尔（Clark L. Hull）和爱德华·C. 托尔曼（Edward C. Tolman）等人所实践的那种而言。

他还对一个名叫 C. E. 奥斯古德（Osgood）的人非常友好，我曾经和后者合著过一本书（Osgood and Sebeok 1965 [1934]）。我常常会对莫里斯说：“我喜欢您 1938 年的那本书，我认为它远比您 1946 年的那本书更重要、更出色。”他人很好，总是说：“好的，您可以有您的看法。我不同意您的意见；我认为 1946 年的那本书很重要，因为，确切地说，它把您划在了心理学中。”此刻，您的问题说行为主义本质上已经衰落。我会补充说，它已经衰落，而且还毁了莫里斯的著作，因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直截了当地说是行不通的，所以莫里斯当时的符号学，直截了当地说，是行不通的。

我想指出符号学中一个与此类似的有趣观点。雷·伯德维斯特尔（Ray Birdwhistell）发明了叫做“人体动作学”（kinesics）的东西，这是一种分析非文字的肢体的方法。很有趣地看到，伯德维斯特尔犯了一个绝对同样的错误。他说，所有非文字行为都像语言一样被组织起来，所以肢体分析方法必须以语言工作作为基础。这不仅绝对缺乏理据——认为非文字行为像语言一样被组织起来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而且伯德维斯特尔还犯了一个错误。他把自己划在了一种相当过时的语言学中，这种语言学非常具有行为主义特色，已经不

再行得通。它被称为“斯密斯—特拉格尔模式”（Smith－Trager model）。现在没有人听说过它了。句法上的斯密斯—特拉格尔模式完全被其他现代模式所取代。结果，伯德维斯特尔对成千上万的照片和绘画等进行了编码，却无法再适用，因为这种模式死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莫里斯身上，您可以看到，他按照行为主义框架对符号学做出了描述，因为行为主义框架消失了，所以他那部著作也就消失了。按照我的看法，它不再那么有价值了。不过，我必须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譬如，罗兰·波斯纳（Roland Posner）对这本书的评价就非常高。

但是我认为它已经不再有趣。此外，还有一件事情。对皮尔斯的发现越多，莫里斯就越是被遗忘——除了他 1938 年的那本书，我说过，这是非常好的一本书。

问：从以人类社会为中心的符号学开始，朝着动物符号学方向有所发展：今天动物符号学在人类科学领域中的作用是什么？

答：显然，符号学有两个方面：对文字的研究（即语言学）和对非文字的研究。不过，大多数没有受过生物学方面训练的符号学家并不理解，非文字符号学是一个巨大领域，它不仅包括人类所做事情 99％的内容，而且还是数百上千万动物构成的整个庞大世界。此外，它还包括植物符号活动和其他类型的符号活动，譬如那些发生在身体内部的符号活动——举例来说，有基因符码、免疫系统符码以及其他各种内部机制。所以，单单从数量上来讲，非文字符号活动已经远远胜过文字符号活动。然而，当然了，文字符号活动对于人类所占据并行动其中的这个星球的小小一角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我要说，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符号学家必须同时研究文字的和非文字的符号活动。把符号学兴趣限定于人类而对世界的 99％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99％的自然，我认为是由人之外的东西构成的。

问：在您的著作《我认为我是一个动词》[*I Think I Am a Verb* (1986a)]中，正如在您的整个科研生活中，都谈到动物世界和人类之间的延续性问题。

答：当然存在着连续性，存在着进化就存在着延续性。人类是进化的产物。人这一属类（Homo）发明了文字符码这个让人着迷的符码，让人叹服，但是这只存在于人这一属类和少数几个下属物种中。当然存在着连续性，因为整个世界都是相互关联的。

问：在人际交流层面，人以文字运用为特点，那么非文字呢？

答：非文字，我要说，是生命的标准属性。所有生命都伴随非文字符号运作。人类生命伴随文字和非文字两种符号运作。

问：我们说，当今有一种向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符号学的回归。在皮尔斯的符号学和雷尼·托姆（René Thom）的大灾难理论之间，我们可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答：如果您读过托姆的东西，那么，很有趣的是发现他很少引用其他人的观点。按照我的回忆，除了技术数学家，他实际上只引用过三个人的观点：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皮尔斯，以及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所以，雷尼·托姆读过皮尔斯，他对皮尔斯非常关注，并且他对皮尔斯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过分析，包括所谓大灾难理论视角下的像似符—指示符—象征符关系。我会说，大灾难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从皮尔斯符号学中产生出来的。毕竟，皮尔斯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事实上，他修习过托姆所修习的同一种数学，即拓扑学。托姆在《符号学刊》（*Semiotica*）上发表过一篇文章（1980），是对皮尔斯的拓展性分析，这篇文章一般没有收入他的文集。所以，雷尼·托姆的思想极为成熟，他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皮尔斯的进一步发展，对此我在《符号及其大师》（*The Sign & Its Masters*）（Sebeok 1979）中曾经说起过。

问：我的印象是信息学在技术方面发展了，但在人工智能方面则停滞不前，因而在语言方面（语言学习、语言教学、翻译等）只能算是原地踏步。您怎么看？

答：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您知道，某个叫做詹姆斯·R.本尼格（James R. Beniger）的人就此写有一本新书（1986），描述了他称之为“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的那种东西。皮尔斯和符号学在这本书中起着重要作用，这随即被带入现代信息科学、人工智能、计算机领域。这是我高度推崇的一本极富创见、饶有趣味的书。不过，我还要补充一点。未来，我们可望在人与机器之间有越来越多的相互转换。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产生出被称为“赛博”（cyborgs）的有机体，也就是，通过机器零件而变得完备的动物。譬如，基因工程很大程度上以机器手段和生命之物的结合作为基础。我肯定，最终我们有望看到一种新的进化方式，这种方式会产生出半有机半机器创生这样的有机体。

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概念，但我认为它正在到来。譬如，可以想想一个装着人工心脏、人工手臂的人，等等。这种进化会继续下去，所以，最终会出现这些奇特的、半有机半无机的东西。人类智能总体上已经因计算机而实力大增。您可以用计算机来做您从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哪怕质量不行，速度上肯定没问题，而且我认为质量上其实也可以。计算机、卫星以及其他机器人——换

言之，“机器人学”（robotics）——将不再是孤立的东西，而是与有机过程相互结合，这不过是几年之间的事情。我认为这就是未来的运作方式。

问：您对那些通过预设一种肢体语言来解释文字语言起源的理论怎么看?

答：哦，我写过一篇题为《语言的起源》（The Origin of language）（Sebeok 1986b，1986c）的论文。讨论的核心——我认为这也解释了该领域中的研究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人们必须对“语言”（language）和“言谈”（speech）进行明确区分这一事实。只要语言和言谈还相互混淆，这个领域的研究就永远不可能有进展。

我的讨论是，语言大约是在古生物学家所称的人之后两百五十万年前出现的。已知的首先出现的物种被称为“能人”（Homo habilis）。脑的发展经历“直立人”（Homo erectus）等继续进行——这是一种进化的适应。但是，语言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交流手段，这是一个致命错误。语言是一种模塑手段。所有动物都有关于世界的精神模式或者精神再现。语言也是一种模塑手段，一种对世界的精神再现，但是，语言之不同于所有其他动物的模式，在于它具有后者所没有的、被语言学家称为“句法”（syntax）的这个特点。

有了句法，人类就能够对模式进行拆解，仿佛它就像乐高积木一般。[①] 您可以用无限多的方式对它们进行重新组装。有了句法，您可以把句子拆开，然后用不同方式将其勾连在一起。正因为人类拥有这种能力，他们就不仅能够以动物创造世界的方式创造世界，而且能够创造出可能的世界，这是高特弗里德·威廉·冯·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经常谈及的论点。莱布尼茨说，存在着无限数量的可能的世界。所以，有了这种句法模式，您就能创造出无限数量的零件来：每个历史学家都建构出一种过去，这只是一个模式而已；您可以想象一个未来，就像科幻小说那样——您可以想象任何数量的科幻小说，您可以建构科学理论，您可以创造抒情诗，您可以想象死亡，您可以谈起独角兽，这只有人才能做到。

现在，在进化出这种有趣的模塑机制之后，“智人”（Homo sapiens）在两百万年之后出现了（这相当的晚，距今大约四十万年前）。大概在那时候，有了这种把语言外化并将其置入一种线性形式的可能，我们称之为言谈。在这一点上——这不是“适应”（adaptation），而是“联适应”（exaptation）（Sebeok 1991b：55—57）——当语言外化成为言谈，它也就成为一种交流手

① “乐高”（Lego）是总部位于丹麦的一家玩具企业，以所生产的乐高积木闻名于世。——译者注

段，并且这种手段强化了人类已经拥有的非文字能力。我们还能够通过我们的面庞、眼睛、双手、身体姿势以及许多其他方式表达自我。现在，我们能够做两件事情：非文字的和文字的。但是，这只有在语言变成言谈的时候才办得到，而言谈，我认为，不过是大概五十万年前的一个相当晚近的发展。这就是我论文的主旨。

问：所以，要说的话，语言是言谈的潜在能力。

答：言谈以语言为预设，但是语言并不意味着言谈。许多生物都有语言但没有言谈。

问：在语言学习理论中，像似符的作用，我认为，常常被忽略了。不仅在语言学习理论中，而且在机器人学中，并因此而在基于语言学习理论所构建的人工智能模式中，像似符到底有多重要？

答：是的，这并不完全对。20世纪6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曾经召开过一个关于模式的会议。乔姆斯基是主要发言人之一。当您想想模式到底是什么，一切都变得很清楚了：模式就是类似。它是一种缩微，是某种东西的精神再现。现在，模式在假想中被与其根据类似、相似性所再现的东西联系起来了。结果，模式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具有强烈像似符价值的符号。要让这个模式发挥作用，必须具有与其所再现的对象的某种相似性；相似的多少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可能很少相似：譬如，数学公式A+B=C是一种关系的像似符，其中的A、B和C能够代表几乎任何东西。并不一定要有相似，但是公式和公式所代表的东西之间必须有一种类似。

类似的，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模塑世界，并且因此而和世界具有一种像似性关系。现在，如雅克布森在最初发表在《戴奥吉尼斯》（*Diogenes*）（1965）这份刊物上的一篇题为《追寻语言的本质》（Quest for the essence of language）的著名论文中所说，存在着语言非常具有像似性的情形。譬如，雅克布森所举的例子是，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说“*Veni*, *vidi*, *vici*”（来了，看见了，征服了），而不是“*Vici*, *vidi*, *veni*”，原因在于前者是对恺撒实际所做事情的一种像似性再现。首先是他到来，然后他看到他看见的东西，之后是他征服。他不能反转顺序来说，因为那会没有意义。所以，这个句子是非常具有像似性的。而且，譬如，如果我问您：“您怎么从乌尔比诺到巴里？”显然您会说从这儿，到这儿，如此之类。如果我记下您所说的东西，看看地图上您所描述过的地方，那么，它就是乌尔比诺与巴里之间关系的一种像似性再现。如果您以颠倒或者侧面的方式描述，那么就全然乱套了：描述必须是像似性的，否则就会让人迷糊，就会成为一个笑话。所以存在着某些具有

高度像似性的语言场合。帕奥洛·瓦雷西奥（Paolo Valesio）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声音、语音层面的例子。其他语言再现也是像似性的，但是没有那么明显。雅克布森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比较等级，譬如“big，bigger，biggest”（大，更大，最大）这种情况。雅克布森的要点是，当您从big到比较级bigger再到最高级biggest，形式变得更长，或者至少不是更短。所以，比较的强度反映在了音素的数目上。

问：下面是我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皮尔斯对三类像似符做了区分——“图形”（graph）、“暗喻”（metaphor）和“意象”（image）。另一方面，我认为他并没有在三类相似性中做区分。譬如，费卢奇奥·罗西－兰迪就区别了三种相似——类似（analogy）、同形相似（isomorphism）、同源相似（homology），它们可以不加区别地通过意象以及暗喻或图形得到再现。一旦我们说像似符，以及由此而及的相似性，在语言的发展以及知识的发展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我们或许应该阐明我们所处理的那种相似性。为什么会这样？譬如，根据罗西－兰迪的划分，被理解为与类比或同形相似的相似性和同化有关，并由此而与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有关，而不是与知识的发展有关；相反，被理解为同源相似的相似性——它比较的不是个体物体而是决定着抽象的模式——被说成在知识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答：嗯，当然您是正确的。皮尔斯说过，存在三种像似符，或者如他所称的“次像似符”（hypoicons）：“图像意象”（visual images）（大多数人都忙于下结论说只存在这一种像似符，然而这显然是不对的）；“图形”（graphs），它在皮尔斯及其“存在之图”（existential graphs）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后者是皮尔斯所深刻阐发的一种数学理论，在数学中是极为重要而且非常有力的一种工具；以及“暗喻”（metaphor），对此皮尔斯只是提到而已——他从未对之做过什么。现在，从皮尔斯开始，关于不同种类的像似符以及像似性的意思是什么，有了大量的文献，却都没有结论性的表述。我认为，它是雷尼·托姆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当然，我本人也就像似性有过著述——艾柯也有写过。但是我认为罗西－兰迪让事情变得更简明了。

按照我本人的观点，不仅有三种像似符，还有更多。譬如，艾柯就有关于镜子、镜子意象的著述。要论的话，镜子意象是哪种像似符呢？还有其他一些关于相似性的概念，譬如，不仅是关于同形相似的，而且和双胞胎有关。我们且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您有一百辆大众车，一辆大众车和其他大众车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如果您看着一大片的大众车，您无法说出哪个是哪个的像似符。什么是像似符？什么是原作？当然您可以，像一些人那样，说原作是放在

生产所有大众车的机器里那张数学公式所构成的蓝图，所有大众车都是这个抽象数学工程公式的像似符。

罗西-兰迪正确地指出了可能对人脑有着截然不同影响的那种相似性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如我所见，不仅有三种像似符，还有更多。当然，看上去让人们着迷的是暗喻。每天都有讨论暗喻的新书出版，最新的一本是美国人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1987）所著。还有一本极好的书是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78）所著。所以，暗喻，一种超像似符，似乎让人特别有兴趣，但我认为它不过是一种像似符而已。

语言、文字、交流：又一次与托马斯·A. 西比奥克对话[①]

问：从人类社会符号学来看，存在一种动物符号学方向的发展：在今天，相对人类科学而言，动物符号学具有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答：正因为符号学研究的是文字的（语言的）和非文字的东西，显然，符号学就有这两个方面。不过，大多数符号学家都没有生物学方面的训练，所以似乎对非文字的符号学是一个庞大领域这一点不胜了解。这个领域不仅涉及人类的非文字行为——这种行为占到了人类行为的99%，而且还涉及成百上千万的非人类动物。此外，非文字的符号活动也包括了植物符号活动，乃至发生在身体内部的其他各种符号活动，譬如，基因符码、免疫符码以及其他各种内部机制。纯粹就数量来说，非文字的符号活动完全淹没了文字的符号活动。当然，文字的符号活动在人类所占有的地球上这个小角落中具有极度重要性，人类就是在这个区域中行为处事的。所以，我相信，严格的符号学家必须同时研究文字的和非文字的符号活动。直截了当地说，把符号学兴趣限定在人类上而忽略世界的99%，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要说的是，大自然包括了不同于人类的那99%的事物。

问：在您的著作《我认为我是一个动词》（*I Think I Am a Verb*）中，正如在贯穿您所有科学成果中的那样，您谈到了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之间的连续性……

答：当然存在连续性，在存在进化这个意义上就存在延续性。人类是进化的产物。人这一属类（Homo）发明了文字符码这种让人着迷的符码，令人叹服，但这只存在于人这一属类和少数几个下属物种中。当然存在连续性，因为

① 这次访谈是用英语进行的，但最先是用意大利文以《姿势、言谈、交流》（Gesto，parola，comunicazione）为题发表在 *Alfabeta* 杂志 1987 年第 102 期。随后，经过修订，以《语言、言谈、交流》（Linguaggio，parola，comunicazione）为题被收入西比奥克关于动物符号学的论文集中［该论文集 1998 年由我翻译为意大利文，以《动物如何无言谈而能交流》（*Come comunicano gli animali che non parlano*）为名出版］。本文还没有以英语发表过。——作者注

整个世界都是相互关联的。

问：就人际交流而言，我们可以说，文字的符号系统是人类符号活动中的特色，而非文字的……

答：……是生命的标准属性。所有生命都通过非文字符号起作用。人类生活使用两种符号：文字的和非文字的。

问：我的印象是信息学在技术方面发展了，但在人工智能方面则停滞不前，因而在语言方面（语言学习、语言教学、翻译等）只能算是原地踏步。您怎么看？

答：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您知道，某个叫做詹姆斯·R.本尼格（James R. Beniger）的人就此写有一本新书（1986），描述了他称之为"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的那种东西。皮尔斯和符号学在这本书中起着重要作用，这随即被带入现代信息科学、人工智能、计算机领域了。这是我高度推崇的一本极富创见、饶有趣味的书。不过，我还要补充一点。未来，我们可望在人与机器之间有越来越多的相互转换。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产生出被称为"赛博"（cyborgs）的有机体，也就是，通过机器零件而变得完备的动物。譬如，基因工程很大程度上以机器手段和生命之物的结合作为基础。我肯定，最终我们有望看到一种新的进化方式，这种方式会产生出半有机半机器创生这样的有机体。人类智能总体上已经因计算机而实力大增。您可以用计算机来做您从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哪怕质量不行，速度上肯定没问题，而且我认为质量上其实也可以。计算机、卫星以及其他机器人——换言之，"机器人学"（robotics）——将不再是孤立的东西，而是与有机过程相互结合，这不过是几年之间的事情。我认为这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问：您怎么解释文字语言的起源预设了姿势语言？

答：您知道，我写过一篇名为《交流、语言与言谈》（*Communication, Language and Speech*）的文章（见《我认为我是一个动词》1986 年版第二章）。问题的核心——我认为这也解释了该领域中的研究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人们必须对"语言"（language）和"言谈"（speech）进行明确区分这一事实。只要语言和言谈还相互混淆，这一领域的研究就永远不可能有进展。我相信语言大约出现在二百万年之前，古生物学家按照人（Homo）、"能人"（Homo habilis）、"直立人"（Homo erectus）等这一顺序来表示。这关系到进化的适应。但是，把语言看作一种交流手段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语言是一种模塑手段。所有动物都有关于世界的精神模式或者精神再现。语言也是一种模塑手段，一种对世界的精神再现，不过，它不同于所有动物模式，因为它具有语

言学家称为“句法”（syntax）的这个特点。有了句法，人类就能够对模式进行拆解，就像建筑材料一般，用无限多的方式对它们进行重新组装。有了句法，您可以把句子拆开，然后用不同方式将其勾连在一起。正因为拥有这种能力，人类于是不仅能够像其他动物那样创造世界，而且能够创造出无数可能的世界，莱布尼茨（Leibniz）曾如是说。莱布尼茨说，我们能够创造出无限数量的可能的世界。事实上，这种句法模式能够创造出无限数量的零件：所有历史学家都建构一种过去，而它只是一种模式而已。您可以想象一个未来，就像科幻小说那样，您可以建构科学理论，创作抒情诗，想象死亡，谈论独角兽：所有这些只有人才能够办到。现在，进化出这种有趣的模塑机制之后，“智人”（Homo sapiens）在两百万年之后出现了（这相当的晚，距今大约三十万年前）。大概在那时候，有了外化语言并将其置入线性形式的可能，对之我们称为言谈。在这一点上，这与“适应”（adaptation）无关，与“联适应”（exaptation）有关；一旦语言外化成言谈，它也就成为一种交流手段，并且，渐次地，这种手段增强了人类已经拥有的非文字能力。

通过我们的面庞、眼睛、双手、身体姿势以及许多其他方式，我们完全能够表达自我。我们完全能够在两个层面上行为处事：非文字的和文字的。但是，这只有在语言变成言谈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言谈，我认为，只是大概三十万年前的一个相当晚近的发展。这就是我在上述论文中所表达的主旨。

问：所以您会说语言是言谈的潜在能力……

答：我们且反过来说吧，言谈以语言为预设，但是语言并不一定暗示着言谈。的确存在人类（譬如聋哑人）有语言，却没有言谈。

问：就语言学习理论而言，我的印象是，像似符的作用常常被忽略。不仅是在语言学习理论中，而且在基于语言学习理论而建构起来的自动模式或者不同人工智能中，您认为像似符的作用到底有多重要？譬如，在乔姆斯基语言学习理论中，相似性的作用、图像、像似符，似乎都根本没有被提到……

答：这并不完全对。20世纪6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曾经召开过一个关于模式的会议。乔姆斯基是主要发言人之一。当您想想模式到底是什么，一切都变得很清楚了：模式就是类似。它是一种缩微，是某种东西的精神再现。现在，模式在假想中被与其根据类似、相似性所再现的东西联系起来了。结果，模式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具有强烈像似符价值的符号。要让这个模式发挥作用，必须具有与其所再现的对象的某种相似性；相似的多少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可能很少相似：譬如，数学公式A+B=C是一种关系的像似符，其中的A、B和C能够代表几乎任何东西。并不一定要有相似，但是公式和公式所代表的东西之

间必须有一种类似。

类似的，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模塑世界，并且因此而和世界具有一种像似性关系。现在，如雅克布森在最初发表在《戴奥吉尼斯》(*Diogenes*)(1965)这份刊物上一篇题为《追寻语言的本质》(Quest for the essence of language)的著名论文中所说，存在着语言非常具有像似性的情形。譬如，雅克布森所举的例子是，尤里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说“Veni，vidi，vici”(来了，看见了，征服了)，而不是“Vici，vidi，veni”，原因在于前者是对恺撒实际所做事情的一种像似性再现。首先是他到来，然后他看到他看见的东西，之后是他征服。他不能反转顺序来说，因为那会没有意义。所以，这个句子是非常具有像似性的。而且，譬如，如果我问您：“您怎么从乌尔比诺到巴里?”显然您会说从到这儿，到这儿，如此之类。如果我记下您所说的东西，看看地图上您所描述过的地方，那么，它就是乌尔比诺与巴里之间关系的一种像似性再现。如果您以颠倒或者侧面的方式描述，那么就全然乱套了：描述必须是像似性的，否则就会让人迷糊，就会成为一个笑话。所以存在着某些具有高度像似性的语言场合。帕奥洛·瓦雷西奥(Paolo Valesio)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声音、语音层面的例子[参看他的论文《语言结构中的相似符和格式》(Icone e schemi nella struttura della lingua)，载 Ponzio 1976]。其他语言再现也是像似性的，但是没有那么明显。雅克布森的另外一个例子是比较等级，譬如“big，bigger，biggest”(大，更大，最大)这种情况。他认为，当我们逐渐地从 big 到比较级 bigger 再到最高级 biggest，表达变得更长了，或者说至少不是更短了。所以，比较的强度就反映在音素的数目上。

问：那么就到这里了——时间到了。您坚持认为，只有人类动物被赋予语言和言谈，语言是物种专有的特点，言谈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同时，交流(在人类世界中既是文字的又是和非文字的)并不随人类符号活动的终止而终止。那么，但是，动物没有言谈，又是如何交流呢?

答：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见于我大量有关动物符号学的研究。我喜欢这样一种表述：Come comunicano gli animali che non parlano(动物如何无言谈而能交流)。我们或许记得我论文集的标题吧，您不是正在把它翻译成意大利文吗……①

---

① 西比奥克这里提到的论文集，见本文之前关于标题的注释，意大利语译本题名正是深受此启发而来。

译者后记

苏珊·佩特丽莉及其开辟和倡导的符号伦理学[①]

周劲松

2008年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举行的美国符号学协会第37届年会上，来自意大利巴里大学的苏珊·佩特丽莉教授成为符号学界最重要的荣誉“托马斯·A.西比奥克奖”的第七位得主。佩特丽莉生于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1993年获得意大利巴里大学的语言理论与符号科学博士学位。为了纪念她的获奖，美国符号学杂志为她出了2008年年度特刊，收入了她的八篇论文，具体反映了她在符号学研究上的造诣。佩特丽莉的研究广泛涉及符号伦理学、符号理论与符号活动、像似性与语言的起源、符号物质性、生物符号学、翻译学等诸多方面，同时，她也是研究维多利亚·维尔比——被誉为“符号学之母”的现代符号学奠基人之一——首屈一指的专家。

作为术语的“符号伦理学”（semioethics），新世纪之初（2003年）才在奥古斯都·庞齐奥和苏珊·佩特丽莉在其以之为题的专著中被正式提出[②]；作为学科的“符号伦理学”，是一门真正尚在发展中的新型学科样态，它通过以苏珊·佩特丽莉为代表的学者们的后继研究，迄今为止尚在不断地充实和丰富中。在获颁“托马斯·A.西比奥克奖”的美国符号学协会第37届年会上，苏珊·佩特丽莉宣读的论文就名为《伦理符号学与责任：超越形形色色的特殊论、普遍论和人文主义》（*Semio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 beyond specialisms, universalisms and humanisms*）。

从根本意义上说，符号伦理学更多的是一种世界观和一种态度，它既同步又带有一定批判距离地关注当下尚在进行之中的全球化浪潮，企望通过对全球性交流—生产的反思，从符号活动和符号伦理维度来凸显人作为“符号活动的动物”“符号的动物”和“伦理符号的动物”对地球、对生命的关怀和责任，

① 本文最初发表在四川大学符号与传媒研究中心主办的《符号与传媒》杂志［12012（5）：176—180］，应本书作者苏珊·佩特丽莉教授本人邀请，这里稍作修改，作为译者后记附于书末，以求帮助读者便捷地把握本书核心思想。

② C. f. Augustos Ponzio and Susan Petrilli, *Semioetica*, Rome: Meltemi, 2003.

所以，正如《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的主编保罗·科布里所评价的，伦理符号学为符号学研究所做的贡献，在于它代表了符号学的务实精神，在于它“满含政治热情地”拓展了应用符号学领域。①

一、符号伦理学的直接理论支撑，是托马斯·A. 西比奥克所倡导的“全球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

在托马斯·A. 西比奥克之前，符号学研究的是社会文化生活圈中的符号，即意图性交流符号，在他之后，符号学不仅是“人类符号学”(anthroposemiotics)，而且是“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植物符号学”(phytosemiotics)、“真菌符号学”(mycosemiotics)、“微观符号学”(microsemiotics)、“机器符号学”(machine semiotics)、“环境符号学”(environmental semiotics) 和“内部符号学”(endosemiotics)，而这一切都聚集在“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 或直截了当的“符号学”(semiotics) 这面旗帜下。按照“全球符号学”的看法，符号活动和生命是耦合的，符号活动开始于生命的第一次颤动，这使他得出符号学至关重要的总原则：符号活动是生命的标准属性；符号活动是生命的前提。②

托马斯·A. 西比奥克的全球符号学开始于符号活动和生命彼此耦合这一假设，并且集中研究符号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能量信息的元初符号活动直到生命在这个星球上演变的整个符号活动的各种复杂情形，都是它关注的对象。符号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构成了一个符号网络，这个网络，托马斯·A. 西比奥克比喻说，覆盖了从分子基因学和病毒学的小人国到与格列佛同尺寸的人的世界再到大人国，到被称为盖亚(Gaia，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母)的庞大生态系统。③

二、符号伦理学的伦理根基是古希腊医学

奥古斯都·庞齐奥和苏珊·佩特丽莉直言：符号学研究应该置放在以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 466 年—公元前 377 年）为肇始并经过盖伦（约 129 年—200 年）推动发展的一种医学思想传统之中，符号伦理学的宗旨，是要“恢复

① Paul Cobley, “Introduction”,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ed. by Paul Cobley,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3—12.

② Thomas A. Sebeok, *Glob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0.

③ C. F. Thomas A. Sebeok, *I Think I Am a Verb*.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7, p. 12.

符号学元初作为以病征研究为核心的'症状学'（semeiotics 或 symptomatology）所从事的职业"。[1]

早期希腊医学有着极为丰富的记录，其主要来源是《希波克拉底全集》（*Corpus Hippocraticum*），该著作中收集了多种多样的文本，生动说明了公元前第五和第六世纪期间的医学理论和实践。[2]《希波克拉底全集》中，有名为《预判》（*Prognostic*）的一整篇文章明确针对"预判"，它不仅是对病人未来的情况进行预测，而且涉及和现在与过去同时相关的知识要素，因为医生必须还能够对病人没有提及的症状和总体事实做出描述。由此，即使一方面我们能够在医学和占卜之间找到共同要素；另一方面，《希波克拉底全集》中许多篇章却都大肆强调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差距和分别，譬如，《预述·之二》（*Prorrhetic II*）对庸医进行了激烈批评，声称他们那些奇异的预测将其置于占卜者之流，而作者本人则不无骄傲地提供了属于自己的、不同于以猜测作为基础的占卜式推论的方法。

于是，除了获取有关其源起的知识，关联符号学同症状学这一研究病征的医学分支的做法，还暗示着恢复符号学研究的伦理考量。这种伦理考量在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尤其分明。这不仅是一个有关职业伦理的问题，并不只关系到担任医生这一角色的人；相反，这与日常活动中的每个人都相关，譬如，希波克拉底规定，医生必须帮助公民，也帮助外国人，如果必要，没有报酬也要帮助，因为只要有对人类的爱，便有对技艺的爱。

把符号学同古代医学符号学或症状学相互关联，意味着为了生命健康而复兴古代"符号学"（症状学）这一职业。符号伦理学开始于这一假设，人类个体在其具体的个别性中存在，无论研究对象如何，无论关于该个体的分析如何专门，都不能对他/她必定影响到其他人的命运这一点视若无睹。在这一意义上，符号伦理学家所进行的病征研究总是社会性的，但同时又总是个别描述性质的，所依据的是该个体与其他、与世界、与自身之间的个别性关系。因此，每个想法、愿望、情感、价值、兴趣、需要、渴求，无论善恶，都被符号伦理学当作病征加以考察。符号伦理学仔细地倾听这些声音并对之展开对话性的阐释，而对话并非出自我们对于对方的慷慨，而在于它对于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建构性质，在于它是让生命得以昭彰洋溢的条件。

---

① Susan Petrilli and Augusto Ponzio, "Semioethics",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ed. by Paul Cobley,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150－162.

② C. F. Giovanni Manetti, "Ancient Semiotics",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ed. by Paul Cobley,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13－28.

三、伦理符号学的（跨）时空展开，是与当今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的

今天的交流是处于全球化之中的，今天的交流是全球性的交流。因此，对于当下的符号活动，“伦理符号学”必须将其置于历史—社会进程中来看待，同时，今天的符号学家必须正视当下符号活动的病征，并且对今天的全球性交流—生产社会中所产生的功能失调做出阐释。

在今天的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理解的全球化到来之前，也就是说，在全球性交流网络由于技术的进步以及由于在社会—经济方面支撑这个网络的全球性市场而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扩张之前，全球化已经是一种生命事实了。也就是说，可以将全球化理解成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色的大公司主导的一种现象，也可以按照生物符号活动的方式，将其理解成由生命从其始源开始的演变与进化赋予特色的一种趋势。

事实上，按照第二种方式来理解的全球化，是生命本身在这个星球上的发展，是生命多种多样且彼此关联的呈现。相对的，第一种观照视域下的全球化，则意味着交流在整个生产循环中无处不在，即不仅渗入交换关系，如社会经济发展早期阶段那样，而且渗入生产和消费过程。卷入这种全球性的交流—生产之中的，不仅是人类生命，而且是整个星球上的总体的生命。这包括发展、福利、消费，也包括不发达、贫穷和难以为生；健康和疾病；规范与偏离；一体化与边缘化；就业和失业；转向以迁徙为特点的劳务，转向以移民为特点的人群，以及对其安居需求的拒绝；合法商品的流通与从毒品到人体器官和“非常规”武器的非法销售。

因此，全球交流，“去总体性的全球化”（detotalized globalism）是一个生命事实，而作为资本主义晚近时期发展特点的今天全球化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全球性交流—生产，“大公司主导的全球化”（corporate－led globalization），则不仅并非不可避免，而且威胁到这个星球上的生命。

“全球符号学之所以是全球的，最重要的首先就在于它倾听的能力。”[1] 考虑到社会角色、人权、个体身份，以及由受制于身份和公平交换逻辑的统治话语秩序所确立的内在和外在的冷漠，符号伦理学对于他者有着特别的兴趣。一种针对全球性的、去总体性的符号学的方法，同“异他性逻辑”（the logic of

---

① Augusto Ponzio, *Signs, Dialogue, and Ideology*, ed. by Sussan. Petrill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3, pp. 138－154.

otherness）是彼此关联的，要求为他者所用，善于倾听他者，有能力向他者敞开。

把伦理学当成“第一哲学”的法国哲学家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的“异他性人文主义”（humanism of alterity）给予了伦理符号学以深刻的启发。把握他者，不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思”之“我”（我、我、我……）的自恋式的喋喋不休，而是承认、接受和尊重“他者”的异质性。按照“他者”之思路，人的本质是“为他者”，而不仅是“为己者”，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指出：“从我到我自己终极的内在，在于时时刻刻都为所有的他人负责，我是所有他人的人质。我能够为非我所犯的过错负责，也能够承受不是我的苦难。”①

符号研究者所做的所有符号阐释，尤其是在元符号学层次上，都不能脱离与他者的对话性关系。事实上，对话是瞄准全球且同时敞向地方和特殊的符号学方法的基本条件。为了满足对“符号活动的健康”的义务，为了开发理解整个符号世界的能力，符号学必须继续深化其监督和批判功能，即坚持对话，坚持在对话中倾听和批判。

罗曼·雅克布森曾将古罗马戏剧家特伦斯（公元前185—公元前159）的名言“我是人，人之所属，我概莫能外”（*homo sum*：*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改写成“我是语言学家，语言之所属，我概莫能外”（*linguista sum*：*linguistici nihil a me alienum puto*）。我们人类，不仅如其他所有动物一样是“符号活动的动物”，而且是能够有意识地创造性地使用符号的“符号的动物”，更是能够批判、反思和承担责任的“伦理符号的动物”，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可以说：“符号之所属，我概莫能外。”

① （法）埃马纽埃尔·勒维纳斯：《塔木德四讲》，关宝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21页。

主要参考文献

BAKHTIN, Mikhail M.

1963. *Problemy poetiki Dostoevskogo* (Moscow: Sovetskij pisatel', 1963); English trans.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1929), by C. Emerson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1965. *Tvorchestvo Fransua Rable i narodnaja kul'tura srednevekov'ja i renessansa*. Moscow; English trans. *Rabelais and His World*, by H. Iswolsk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75. *Voprosy literatury i estetiki* (Problems of Literature and of Aesthetics), Chudozhestvennaja literature. Moscow; Italian trans. *Estetica e romanzo*, by C. Janovic (Turin: Einaudi, 1979).

1979. *Estetika slovesnogo tvorchestva* (*Aesthetics of verbal art*) (Moscow: Iskusstvo); Italian trans. by C. Janovic, *L'autore e l'eroe. Teoria letteraria e scienze umane* (Turin: Einaudi, 1988).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ed. M. Holquist, trans. C. Emerson and M. Holquist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Speech Genres & Other Late Essays*, trans. V. McGee, ed. C. Emerson and M. Holquist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0. *Art and Answerability. Early Philosophical Essays by M. M. Bakhtin*, ed. M. Holquist and V. Liapunov, trans. and notes V. Liapunov, suppl. trans. K. Brostro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3 [1920-1924]. *Toward a Philosophy of the Act*, trans. and notes V. Liapunov, ed. M. Holquist and V. Liapunov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BARTHES, Roland.

1982. *L'Obvie et l'obtus. Essais critiques* (Paris: Seuil). English

trans. R. Howard 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Forms. Critical Essays on Music, Art and Critical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1995. *Œuvres complètes*, in 3 volumes, ed. Eric Marry (Paris: Seuil).

COBLEY, Paul, Editor.

1996. *The Communiaction The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1.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6. *Communication Theories*, 4 vols., Critical Concepts series (London: Routledge).

2009.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2nd ed., rev. and expanded; London: Routledge).

DEELY, John.

1975. "Reference to the Non-Existent", *The Thomist* XXXIX. 2 (April, 1975), pp. 253—308.

1976. "The Doctrine of Signs: Taking From at Last", *Semiotica* 18: 2, 171—193. Essay review of Eco 1975/1976.

1978. "What's in a Name?", *Semiotica* 22/1—2, 151—181 (essay review of Sebeok 1976).

1989. "The Grand Vision", presented on September 8 at the September 5—10 Charles Sanders Peirce Sesquicentennial International Congrss at Harvard University. First published in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XXX. 2 (Spring 1994), pp. 371—400, after the submission of corrected proofs the journal repaged the whole and introduced such extreme errors as to make the text unreadable at some points. The corrrct version has appeared as Chapter 7 of Deely 1994: pp. 183—200; and in Colapietro and Olshewsky eds., *Peirce's Doctrine of Sign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6; one of the several volumes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Harvard Peirce Congress), pp. 45—67.

1990. *Basics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Expanded Italian edition presented by Susan Petrilli and Augusto Ponzio, *Basi della semiotica* (Bari, Italy: Edizione Giuseppe Laterza, 2004).

1993. "How Does Semiosis Effect Renvoi?", the Thomas A. Sebeok Fellowship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1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Semiotic Society of America, 22 October 1993 held in St. Louis, MO; published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11.1–2 (1994), 11–61, and reprinted in Deely 1994: 201–244.

1994. *New Beginnings.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and Postmodern Thought*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4a. "Membra Ficte Disjecta (A Disordered Array of Severed Limbs)", editorial introduction to the electronic edition of Peirce i. 1866 – 1913, the *Collected Papers*, q. v.

1997. "Looking Back on *A Theory of Semiotics*: One Small Step for Philosophy, One Giant Leap for a Doctrine of Signs", in *Reading Eco. An Anthology*, ed. Rocco Capozz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82–110.

2003. *The Impact on Philosophy of Semiotics. The Quasi-Error of the External World, with a Dialogue between a 'Semiotist' and a 'Realist'* (South Bend, IN: St. Augustine's Press).

2004. "A Sign Is What? A dialogue between a semiotist and a would-be realist" presented in dramatic reading forma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20. 1–4, 1–66. In straight dialogue form, this writing, from the 19 October 2001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Semiotic Society of America's 26th Annual Meeting held at Victoria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ppeared in *Sign Systems Studies* 29. 2 (2001), 705–743; and was reprinted in Deely 2003: 157–208.

2004a. "Why the Semiotic Animal Needs to Develop a Semioethics", Lyons, in press; available online: 〈http: // jgalith. univ-lyon2. Fr / Actes / articleAsPDF / DEELY _ (Sociosemio) _ _ pdf _ 20061030093000; jsessionid=10F1A50514B2BBB4C95FBD9C95C3CDEC. presbdd2〉.

2005a. "From Semiotics to Semioethics; or, How does responsibility arise in semiosis?", *Semiotics* 2004/2005, ed. Stacy Monahan, Benjamin Smith, Terry J. Prewitt (Ottawa, Canada: Legas, 2006), 242–261.

2007. *Intentionality and Semiotics* (Scranton, PA: Scran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a. *Augustine and Poinsot: the Protosemiotic Development* (Scranton, PA: University of Scranton Press).

2008b. "To Find Our Way In These Dark Woods' versus Coming Up Short", a review essay of Short 2007 in *Recherches Sémiotiques / Semiotic Inquiry* 28. 1–2 (2008), in press.

2008c. "Evolution, semiosis, and ethics: rethinking the context of natural law",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Natural Law*, ed. Ana Marta González (Aldershot, England: Ashgate, 2008), 413–442.

DEELY, John, Editor.

1992. Electronic Edition of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see below, entry for "Peirce i. 1866–1913"), with an Introduction (Deely 1994).

DEELY, John, Susan PETRILLI, and Augusto PONZIO.

2006. *The Semiotic Animal* (Ottawa / Toronto/ New York: Legas).

DEELY, John N., Brooke WILLIAMS, and Felicia E. KRUSE, editors.

1986. *Frontiers in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an anthology on the range of semiotic inquiry.

DERRIDA, Jacques.

1967.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Paris: Seuil). Eng. trans. A. Bas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CO, Umberto

1975. *Trattato di semiotica generale* (Milan: Bompiani); English trans. by David Osmond–Smith,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See review in Deely 1976.

1984. *Semiotica e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Turin: Einaudi). English trans. *Semiotics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FANO, Giorgio.

1962. *Saggio sulle origini del linguaggio* (Turin: Giulio Einaudi).

1973. *Origini natura del linguaggio*, ed. and intro. Prof. Luigi Heilman (Turin: Giulio Einaudi).

1992.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Languag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eing the translation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by Susan Petrilli of Fano 1973.

HOFFMEYER, Jesper.

1996. *Signs of Meaing in the Univers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trans. by Barbara J. Haverland of En Snegl På Vejen: Betydningens naturhistorie (Copenhagen: Rosinante, 1993).

2000. "The Central Dogma: A Joke that Became Real", the 3rd Sebeok Fellow address, delivered 29 September 2000 at the SSA 25th Annual Meeting held at Purdue University; published in *Semiotica* 138-1/4 (2002): 1-13.

2008. *Biosemiotics. An Examination into the Signs of Life and the Life of Signs* (= Approached to Postmodernity, vol. 2; Sccranton, PA: University of Scranton Press), ed. Donald Favareau; trans. by Jesper Hoffmeyer and Donald Favareau from the Danish, *Biosemiotik. En afhandling om livets tegn og tegnenes liv* (Charlottenlund, Denmark: ries, 2005).

HOFFMEYER, Jesper, and Claus EMMECHE.

1999. *Biosemiotica I. Semiotics*. Special Issue 127-1/4.

HUSSERL, Edmund.

1890. *Zur Logik der Zeichen (Semiotik)*, in *Husserliana*, vol, XII. Den Haag: Nijhoff, 1970; Italian trans. *Sulla logica dei segni. Semiotica*, in *Semiotica*, ed. C. Di Martino and C. Sini, pp. 62-96 (Milan: Spirali, 1984).

1900-1901.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Italian ed. G. Piana, *Ricerche logiche*. 2 vols. (Milan: Il Saggiatore, 1968).

1929.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äge* (Paris: Martin Nijhoff); Italian trans. *Meditazioni cartesiane. Con l' aggiunta dei discorsi parigini*, by F. Costa (Milan: Bompiani, 1960, new ed. 1989).

1948. *Erfabrung Und Urteil. Untersuchgen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 (Hamburg: Klaassen Verlag; posthumous ed. 1954); Italian trans. from German by F. Costa and L Samonà as *Esperienza e giudizio*, "Introduction" by Enzo Paci (Milan: Bompiani, 1960; new ed. 1995).

1950. *Idee per una fenomenologia pura*. Ed. E. Filippini. Bk. II

(Turin: Einaudi, 1965).

JAKOBSON, Roman.

1963.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Minuit.

1990. *On Language*, ed. L. R. Waugh and M. Burst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ULL, Kalevi.

2003. "Semiotics is a theory of life", the 4th Sebeok Fellow address delivered 10 October 2003 at the SSA Annual Meeting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published in Rodney Williamson, Leonard G. Sbrocchi, and John Deely, eds., *Semiotics* 2003 (Ottawa: Legas Publishing, 2005), pp. 15–31.

KULL, Kalevi, Guest-Editor.

2001. *Jakob von Uexküll: A Paradigm for Biology and Semiotics*, a Special Issue of Semiotica 134–1/4.

LEVINAS, Emmanuel.

1935–1936. *"De l' évasion"*,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V: 373–392.

1948. "La réalité et son ombre". *Les Temps Modernes* 4 (38); English trans. "Reality and Its Shadow". In: Lévinas 1987a.

1960. "Judaism and their Present". L' Arche 44: 32–36; English trans. in: *The Levinas Reader*. Seán Hand (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1961. *Totalité et infini*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8, 1971); English trans. *Totality and Infinity*, by A. Lingis, J. Wild (intro.)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1972. *Humanisme de l' autre homme* (Montpellier: Fata Morgana); English trans. *Humanism of the Other Man*, by A. Lingis in Lévinas 1987a.

1974. *Autrement qu' être ou au-dela de l' essence* (The Hague: Nijhoff); English tran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by A.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87a. *Collected Philosophical Paper*, trans. A. Lingi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7b. *Hors Sujet* (Montpellier: Fata Morgana); English trans. *Outside the Subject*, by M. B. Smith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3).

1990. "Preface" of 1990 to Levinas, "Reflection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tlerism", trans. S. Hand, *Critical Inquiry* 17: 63—71.

1991. *Entre nous. Essais sur le penser—à—l' autre* (Paris: Grasset); English trans. *Entre nous. On Thinking—of—the—Other*, by M. B. Smith and B. Harshav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8).

1994. *Beyond the Verse*, trans. G. D. Mol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Ethics and Infinity*, R. A. Cohen trans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97. *Emmanuel Levinas: Basic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 Robert Bernasconi, Simon Critchley and Adriaan Peperzak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Of God who Comes to Mind*, trans. W. Hamacher and D. E. Walbe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OTMAN, Jurij.

1975. *La semiosfera* (Venice: Marsilio).

MORRIS, Charles W.

1938.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 I*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Italian trans. F. Rossi—Landi. *Lineamenti di una teoria dei segni*. Turin: Paravia, 1954; new ed. S. Petrilli (Lecce: Manni, 1999).

1942. *Paths of Life* (New York: Harper).

1946. *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48. *The Open Self* (New York: Prentice—Hall). Italian trans. S. Petrilli, *L' io aperto. Semiotica del soggetto e delle sue metamorfosi* (Bari: Graphis).

1956. *Varieties of Huamn Valu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Signif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of Signs and Valu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Italian trans. in C. Morris 1988 and 2000.

1970. *The Pragmaitc Movement in American Philosophy*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1. *Writing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 ed. T. A. Sebeok (The

Hague-Paris: Mouton).

1988. *Segni e valori. Significazione e significatività e altri scritti di semiotica, etica ed estetica*, Italian trans and Intro. S. Petrilli (Bari: Adriatica).

2000. Significazione e significativitá, Italian trans., ed. and Intro. S. Petrilli (Bari: Graphis).

OGDEN, Charles K., and Ivor A. RICHARDS.

1923.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 with suppl. essays by B. Malinowski and F. G. Crookshank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9).

PEIRCE, Charles Sanders.

i. 1866-1913.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Vols. I-VI ed.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35), Vols. VII-VIII ed. Arthur W. Burks (same publisher, 1958); all eight vols. in electronic form ed. by John Deely with an Introduction "Membra Ficte Disjecta—A Disordered Array of Severed Limbs" (Charlottesville, VA: Intelex Corporation, 1994).

PETRILLI, Susan.

1985. "Introduction" to Welby 1985b.

1986. "On the Materiality of Signs", *Semiotica* 62, 3/4, pp. 223-245.

1988. *Significs, semiotica, significazione*, Pref. T. A. Sebeok (Bari: Adriatica).

1990. "Dialogue and Chronotopic Otherness: Bakhtin and Welby," *Discours social / Social Discourse* 3, 1&2, pp. 339-350.

1995a. *Materia segnica e interpretazione* (Lecce: Milella).

1995b. *Che cosa significa significare?* (Bari: Edizioni dal Sud).

1996. "Bachtin Read in Italy (1980-1994)." *Le Bulletin Bachtin. The Bakhtin Newsletter*, 5 (1996), pp. 55-66.

1998a. *Teoria dei segni e del linguaggio* (Bari: Graphis, new ed. 2001).

1998b. *Su Victoria Welby. Significs e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Naples: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1999a. "Charles Morris's Biosemiotics", *Semiotica* 127−1/4, 1999, pp. 67−102.

1999b.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Victoria Welby's Significs," *Semiotica* 127−1/4, pp. 23−66.

2000. "Charles Morris," in Jef Verschueren, Jan−Ola Östaman, Jan Blommaert & Chris Bulcaen, eds., *Handbook of Pragmatics* 2002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p. 1−26.

2001a. "Comments on Some Books by Sebeok," in Marcel Danesi, ed., *The Invention of Global Semiotic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Life and Work of Thomas A. Sebeok* (New York, Ottawa, Toronto: Legas), pp. 103−113.

2001b. "Light between Sacred and Profane: Victoria Welby from Biblical Exegesis to Significs", in *Signs and Light. Illuminating Paths in the Semiotic Web*, a Special Edition of *Semiotica* 136−1/4 (2001) Guest−Edited by Susan Petrilli, pp. 173−200.

2001c. "Women in Semiotics" (with Thomas A. Sebeok), in Thomas A. Sebeok, *Glob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145−153.

2001d. "Differenze di segno e segni di differenza," in P. Calefato, G. Caprettini, G. Colaizzi, eds., *Incontri di culture. La semiotica tra frontiere e traduzioni*, pp. 83−90 (Turin, UTET).

2001e. "In the Sign of Charles Morris," *Charles W. Morris. RSSI Semiotic Inquiry / Recherches Sémiotiques*, 21, 2001, 1−2−3, pp. 163−187.

2003. "The Objective Character of Misunderstanding. When the Mystifications of Language are the Cause," in E. Tarasti, ed., *Understanding / Misunderstanding*, *Acta Semiotica Fennica* XVI, pp. 127−145 (Hakapaino, Helsinki: International Semiotics Institute, 2003).

2004. "Welby, Victoria Alexandrina, Lady Welby (1837−1912)," in *Oxford New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ed. by Matthew Col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a. "From Pragmatic Philosophy to Behavioral Semiotics: Charles W. Morris after Charles S. Peirce," in Petrilli ed. 2004: 277−316.

2005a. *Percorsi della semiotica* (Bari: Graphis).

2005b. "The Semiotic Universe of Abduction." *On Abduction: Between Su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Semiot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 153−1/4, pp. 23−51, Special Issue, Guest −Edited by João Queiroz and Floyd, Merrell.

2005c. "Signs and Difference: National Identity and War in a Semiotic Key," in *Semiotics* 2003: *Semiotics and National Identitiy*,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Semiotic Society of America in Ottawa, Canada, October 2003, ed. Rodney Williamson, Leonard G. Sbrocchi, John Deely (New York, Ottawa, Toronto: Legas, 2005), pp. 57−76.

2005d. "La questione dell' io in Victoria Lady Welby and Ch. Morris," in Rosa M. Calcaterra. ed., *Semiotica e fenomenologia del sé*, pp. 147−172 (Turin: Aragno).

2005e. "Crossing Out Boundaries with Global Communication: The Problem of the Subject," *Subject Matters. A Journal of Communucation and the Self*, 2, 2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2005), pp. 33−48.

2005f. "Translation as the Doctrine of Inter−genre and Trans−genre Communication: A Semioethic Perspective." *TTR.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édaction. Etudes sur le texte et ses transformations*, ed. C. Foz and F. Lafarga, vol. XVIII, n. 1, ler semestre 2005, pp. 221−250.

2006a. "Meaning, metaphor, and interpretation: modeling new worlds," *Perspectives on Metaphor. Semiot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 161−1/4, 2006, pp. 75−119, Special Issue, Guest Ed. Frank Nuessel.

2006b. Communicazione, interpretazione, traduzione, ed. and intro. "Communicare, interpretare, tradurre", pp. 11−20, S. Petrilli (Milan: Mimesis).

2006/7. *White Matters. Il bianco in questione. Athanor. Semiotica, Filosofia, Arte, Letteratura* XVII, 10, (2006−2007), ed, and intro., "Sulla questione bianca e i discorsi secondo cui se ne parla. Introduzione", pp. 9−38, by S. Petrilli.

2007a.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come arte dell' ascolto. Sulla ricerca scientifica di Augusto Ponzio /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the art of listening. On Augusto Ponzio's scientific research*, ed. and presentation by

S. Petrilli (Bari: Edizioni dal Sud, 2007).

2007b. "Abduction, medical semeiotics and semioethics: individual and social symptomatology from a semiotic perspective", in Lorenzo Magnani and Ping Li,, eds., *Model-Based Reasoning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Berlin: Springer, 2007).

2007c. "Bachtin e Welby. Dialogo e alterità cronotopica," in Victoria Welby, *Senso, significato, significatività*, Italian trans. intro. and ed. by Susan Petrilli (Bari: Graphis, 2007), pp. 166—179.

2007d. "Significs and Semioethics. Places of the Gift in Communication Today," in Genevieve Vaughan, ed., *Women and the Gift Economy: A Radically Different Worldview is Possible* (Toronto, Canada: Inanna Publications and Education Inc.), pp. 108—120.

2007e. "Interpretive Trajectories in Translation Semiotics," *Semiotica. Les emotions: figures et configurations dynamiques*, Guest ed., Jacques Fontanille; *Vital signs of semio-translation*, Guest-Edited by Dinda L. Gorlée 163—1/4 (2007), pp. 311—345.

2007f. "Reading Augusto Ponzio, Master of signs and languages," in S. Petrilli, ed.,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come arte dell' ascolto. Sulla ricerca scientifica di Augusto Ponzio /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the art of listening. On Augusto Ponzio's scientific research*, Presentazione e cura di S. Petrilli (Bari: Edizioni dal Sud, 2007), pp. 281—326.

2007g. "Linguistic production, ideology and otherness," in S. Petrilli, ed.,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come arte dell' ascolto. Sulla ricerca scientifica di Augusto Ponzio /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the art of listening. On Augusto Ponzio's scientific research*, Presentazione e cura di S. Petrilli (Bari: Edizioni dal Sud, 2007), pp. 333—362.

2007h. "Traducción como doctrina de comunicación inter—géneros y trans—géneros: una perspectiva semio—ética," *Signa. Revista de la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semiótica*, 16, 2007, pp. 463—492.

2007i. "Il senso e il valore del significare", Introduction to Welby 2007: vii—lx.

PETRILLI, Susan, Editor.

2003.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msterdam: Rodopi.

2004. *Ideology, Logic, and Dialogue in Semioethic Perspective*. Guest—Edited Special Issue, *Semiotica* 148—1/4.

PETRILLI, Susan, Augusto PONZIO.

1996. "Peirce and Medieval Semiotics". In V. M. Colapietro and T. M. Olshewsky, eds., 1996, pp. 351—364.

1998. *Signs of Research on Signs. Semiotische Berichte*. Österreichschen Gesellschaft für Semiotik, Special Issue Jg. 22, 3/4.

1999. *Fuori campo. Il segni del corpo tra rappresentazione ed eccedenza* (Milan: Mimesis).

2000a. *Il sentire della comunicazione globale* (Roma: Meltemi).

2000b.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rt and Answerability in Mikhai Bachtin* (New York / Ottawa / Toronto: Legas).

2001. *Thomas A. Sebeok and the Signs of Life* (London: Icon Books).

2002a. *I segni e la vita. La semiotica globale di Thomas* A. Sebeok (Milan: Spirali).

2002b. "Sign Vehicles for Semiotic Travels: Two New Handbooks", *Semiot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 141—1/4, pp. 203—350.

2003a. *Semioetica* (Rome: Meltemi).

2003b. *View in Literary Semiotics* (Toronto: Legas).

2005. *La raffigurazione letteraria* (Milano: Mimesis).

2005b. *Semiotics Unbounded. Inte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7. *Semiotics Today. From Global Semiotics to Semioethics, a Dialogic Response* (Ottawa, Canada: Legas).

PONZIO, Augusto.

1981. "Das Problem der Bezeichnung bei Morris und in der zeitgenossischen Semiotik", in A. Eschbach ed., *Zeichen uber Zeichen uber Zeichen* (Tübingen: Gunter 1981), pp. 162—172.

1990. *Man as a Sign. Essay 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 and ed. S. Petrilli. Appendix I & II by S. Petrilli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0a. "Signs to talk about signs ", in A. Ponzio. *Man as a Sign*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pp. 16—74.

1992. *Production linguistique et idéologie sociale*. (Québec, Canada: Les Editions Balzac).

1993. *Signs, Dialogue, and Ideology*, English trans. and ed. S. Petrill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a. *Responsabilità e alterità in Emmanuel Levinas* (Milan: Jaca Book).

1995b. *El juego el comunicar. Entre literatura y filosofia, ed. M. Arriaga*. (Valençia: Episteme).

1995c. *Segni per parlare dei segni. Signs to Talk About Signs* (bilingual text), English trans. S. Petrilli (Bari: Adriatica. 1st ed. 1985).

1996. *Sujet et altérité. Sur Emmanuel Levinas*, suivi de Deux dialogues avec Emmanuel Levinas (Paris: l' Harmattan).

1997. "Treating and mistreating semiotics: Eco's treatise on semiotics", *S—European Journal for Semiotic Studies* 9. 3—4, pp. 641—60.

1997a. Metodologia della formazione linguistica. (Rome and Bari: Laterza).

1997b. *Elogio dell' infunzionale. Critica dell' ideologia della produttività* (Rome: Castelvecchi).

1998. *La revolución bajtiniana* (Madrid: Catedra).

1999. *La comunicazione* (Bari: Graphis).

2001. *Enunciazione e testo letterario nell' insegnamento dell' italiano come LS* (Perugia: Guerra).

2002a. *Individuo umano, Linguaggio e globalizzazione nella filosofia di Adam Schaff* (Roma: Mimesis).

2002b. *Il linguaggio e le lingue. Introduzione alla linguistica generale* (Bari: Graphis).

2003a. *I segni tra globalità e infinità. Per la critica della comunicazione globale* (Bari: Cacucci).

2003b. "Modeling, dialogue, and globalization: Biosemiotics and semiotics of self", *Semiotiké Sign Sistems Studies*, University of Tartu, 31. 1, pp. 25—63.

2004a. *Semiotica e dialettica* (Bari: Edizioni dal Sud).

2004b. *Linguistica generale, scritura letteraria e traduzione* (Perugia:

Guerra).

2004c. *Testo come ipertesto e traduzione letteraria* (Rimini: Guaraldi).

2006a. *The Dialogic Nature of Sign* (Ottawa: Legas).

2006b. *Linguaggio e relazioni sociali* (1st ed. 1970; Bari: Graphis).

2006c. *Produzione linguistica e ideologia sociale* (1st ed. Bari: Graphis, 1970).

2006d. *La cifrematica e l' ascolto* (Bari: Graphis).

2006e. *The I Questioned: Emmanuel Levinas and the Critique of Occidental Reason. Special issue of Subject Matter. 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and the Self*, 3, 3.

2007. *Fuori luogo. L' esorbitante nella riproduzione dell' identico* (Roma: Meltemi).

PONZIO, Augusto, Patrizia CALEFATO, and Susan PETRILLI.

1999.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Bari—Rome: Laterza, 1994; new ed. 1999).

PONZIO, Augusto, Susan PETRILLI, Patrizia CALEFATO, Editors.

2006. *Con Roland Barthes alle sorgenti del senso* (Rome: Mimesis).

PONZIO, Augusto, Susan PETRILLI, Julia PONZIO.

2005. *Reasoning with Emmanuel Lévinas* (New York/ Ottawa/ Toronto: Legas).

ROSSI—LANDI, Ferruccio.

1953. *Charles Morris* (Milan: Bocca; new ed. F. Rossi—Landi 1975).

1961; new ed. 1998. *Significato, comunicazione e parlare comune* (Padua: Marsilio, 1980; 1998 ed. by A. Ponzio).

1968. *Il lingaggio come lavoro e come mercato*, ed. A. Ponzio (Milan: Bompiani; new ed. by A. Ponzio 1992, and 2003). English trans. M. Adams et al., *Language as Work and Trade* (South Hadley, MA: Bergin and Garvey, 1983).

1972. *Semiotica e ideologia* (Milan: Bompiani, new ed. by A. Ponzio 1994).

1973. *Ideologies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 (The Hague: Mouton).

1975a. *Linguistics and Economics* (The Hague: Mouton. New ed., 1977).

1975b. *Charles Morris. Una semiotica novecentesca* (Milan: Feltrinelli).

1985. *Metodica filosofica e scienza dei segni* (Milan: Bompiani, new ed. by A. Ponzio 2006).

1992a. *Between Signs and Non－signs*, ed. and Intro. S. Petrill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16.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 Ch. Bally and A. Séchehaye. Paris: Payot, 1964. Critical ed. Engler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4 Vols., 1968－1974.

SCHMITZ, Walter H. (ed. and pref. i－ix.)

1990. *Esssay on Significs. Papers Present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Victoria Lady Welb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SEBEOK, Thomas A.

1971. " 'Semiotic' and Its Congeners", in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Studies in Honor of Archibald Hill, I: General amd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ed. Mohammed Ali Jazayery, Edgar C. Polomé, and Werner Winter (Lisse, Netherlands: Peter de Ridder Press), 283－295; reprinted in Sebeok 1985: 47－58, also in Deely, Williams and Kruse 1986: 255－263.

1976. *Contributions to the Doctrine of Signs* (Bloomington, IN, and Lisse, Netherlands: Pub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 of Indiana University, together with The Peter De Ridder Press). Reprinted with new material 1985: see entry below.

1978. *Sight, Sound and Sense*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The Sign & Its Masters* (Austin, TX: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nd ed.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 Italian trans. and Intro . S. Petrilli, *Il segno e i suoi maestri* (Bari: Adriatica, 1985).

1981a. *The Play of Musement*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b. "The Image of Charles Morris", in *Zeichen über Zeichen über Zeichen*, ed. A. Eschbach, pp. 267－284.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2. "Peirce in Italia", *Alfabeta* 35.

1985. *Contributions to the Doctrine of Signs* (=Sources in Semiotics IV; reprint of 1976 original with an extended Prefatory Essay, "Challenging Signs at the Crossroads", by Brooke Williams (1985), evaluating the book in light of major review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6. I *Think I Am a Verb. More contributions to the doctrine of signs* (New York and London: Plenum Press). Italian trans. and Intro. S. Petrilli. *Penso di essere un verbo* (Palermo: Sellerio, 1990).

1990. *Essay in Zoosemiotics*, ed. M. Danesi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a. *American Signatures. Semiotics Inquiry and Method*, ed. and Intro. I. Smith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b. *A Sign Is Just a Sig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talian trans. and Intro. S. Petrilli, *A Sign is just a sign. La semiotica globale* (Milan: Spirali, 1998).

1991c. *Semio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talian trans., Intro., and ed. S. Petrilli, *Sguardo sulla semiotica americana* (Milan: Bompiani, 1992).

1994. *Signs.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new ed. 2001). Italian trans. and Intro. S. Petrilli, Segni. *Introduzione alla semiotica* (Rome: Carrocci, 2003).

1998a. *Come comunicano gli animali che non parlano*, Italian trans. ed. and Intro. S. Petrilli (Bari: Edizioni dal Sud).

2001a. *Glob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b. *The Swiss Pioneer in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Heini Hediger* (Toronto, Canada: Legas).

2001c. "Biosemiotics: Its Roots, Proliferation, and Prospects", *Semiotica* 134-1/4 (2001), 61-78.

2001d. "Biosemiotics",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 ed. by Paul Cobley (London: Routledge), pp. 163-164.

SEBEOK, Thomas A., Editor.

1968. *Animal Communication: Techniques of Studies and Results of Research*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1. " 'Semiotics' and Its Congeners", original draft in English; first published in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Studies in Honor of Archibald A. Hill, I: General and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ed. Mohammad Ali Jazayery, Edgar C. Polomé, and Werner Winter (Lisse, Netherlands: The Peter de Ridder Press, 1976), 283—295, and reprinted in Sebeok 1976: 47—58.

1976. Contributions to the Doctrine of Signs (Bloomington, IN: Research Center for Language and Semiotic Studies of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and Lisse, Netherlands: The Peter de Ridder Press); reprinted as Vol. IV in the Sources in Semiotic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with a Prefactory Essay by Brooke Williams, "Challenging Signs at the Crossroads", pp. xv—xlii.

1978. *Sight, Sound and Sense*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SEBEOK, Thomas A., Susan PETRILLI, Augusto PONZIO.

2001. *Semiotica dell' io* (Rome: Meltemi).

UEXKÜLL, Jakob von.

1909. *Umwelt und Innenwelt der Tierre* (Berlin: Springer)

1934. "A Stroll through the Worlds of Animals and Man", reprinted as a Special issue of *Semiotica* (1992), 89—4.

1940. "The theory of meaning", reprinted in *Semiotica* 42 (1982), 1—87.

1973. *Theoretische Bi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reprinted 1973).

VOLOSHINOV, Valentin N. (see also "Bakhtin, Mikhail M.", above).

1927. *Frejdizm*. Moscow — Leningrad. English trans. I. R. Titunik, *Freudianism: A Critical Sketch.*, ed. I. R. Titunik with N. H. Brus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Italian trans. *Freudismo*, ed. A. Ponzio (Bari: Dedalo, 1977).

1928. "The Latest Trends in Linguistic Thought in the West", in Shukman 1983: pp. 31—49.

1929. *Marksizm i filosofija jazyca*. Leningrad. English trans. L. Matejka and I. R. Titunik,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Italian trans. *Marxismo e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ed. A. Ponzio (Lecce: Manni, 1999).

1980. *Il linguaggio come pratica sociale* (1926－30), ed. A. Ponzio (Bari: Dedalo).

WELBY, Victoria.

1881. *Links and Clues* (London: Macmillan & Co. 2nd ed. 1883).

1891. Witnesses to Ambiguity. A Collection (Grantham: W. Clarke).

1892. *The Use of 'Inner' and 'Outer' in Psychology: Does the Metaphor Help or Hinder? A Small Collection of Extracts Bearing upon This Question Respecfully Sub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ugust* 1892 (Grantham: W. Clarke).

1893a. *A Selection of Passages from 'Mind'* (January, 1876, to July, 1892), 'Nature' 1870, and 1888 to 1892), 'Natural Science' (1892), Bearing On Changes and Defects in the Significance of Terms and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ogic (Grantham: W Clarke).

1893b. Meaning and Metaphor. *The Monist* 3 (4), 510－525. Now in V. Welby 1985a. Italian trans. in V. Welby 1985b, 79－107. Revised edition in Welby 2007.

1896. "Sense, Meaning and Interpretation", *Mind*. 5 (17), 24－37; 5 (18), 186－202. Now in V. Welby 1985a. Italian trans. in V. Welby 1985b, 109－170. Revised edition in Welby 2007.

1897. *Grains of Sense* (London: J. M. Dent).

1902b. Translation. In J. M. Baldwin 1901－1905, Vol. 2, 712.

1911. "Significs", in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1th ed., Vol. XXV, 78－81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in C. Harwick 1977, 167－175. Italian trans. in V. Welby 1985b, pp. 171－187.

1929. *Echoes of Larger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Early Correspondence of Victoria Lady Welby*, ed. and Intro . Mrs. H. Cust.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1. *Other Dimensions: A Selection from the later Correspondence of Victoria Lady Welby*, ed. Mrs. H. Cust, Intro. L. P. Jacks (London: Jonathan Cape)

1983 [1903]. *What is Meanings?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ance)*, ed. and Pref. A. Eschbach, ix－xxxii, Intro. G. Mannoury, xxxiv － xlii. In *Foundations of Semiotics*, Vol. 2.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5a [1911]. *Significs and Language*, ed. and Intro. H. W. Schmitz, pp. ix – ccxxxvii. In *Foundations of Semiotics* Vol. 5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5b. *Significato, metafora, interpretazione*, Italian tran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pp. 7–50) by Susan Petrilli (Bari: Adriatica).

2007. *Senso, significato, significatività*, essays in Italian translation introduced by Susan Petrilli, ed. (Bari: Graphis).

WELBY, Victoria, ed. by Susan Petrilli.

2009. *Significs. Writings (with Commentary) of Victoria Welby and the Significs Movement o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ed. and intro. S. Petrilli (forthcoming).

WELBY, Victoria, James Mark BALDWIN, and George Frederick STOUT.

1902. *Significs*, in J. M. Baldwin 1901–1905, Vol. 2. 529.

WELBY, Victoria, and George Frederick STOUT

1902. Sensal, In J. M. Baldwin1901–1905, Vol. 2, 515.

WITTGENSTEIN, Ludwig.

1921. *Prototractatus: An Early Version of 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 Ludwig Wittgenstein*, ed. B. F. McGuinness, T. Nyberg, and G. H. von Wright, with an English trans, by D. F. Pears and B. F. McGuiness, and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y G. H. von Wrigh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22. *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 trans. C. K. Ogden of Wittgenstein 1921, in bi–lingual edition with facing pages of German and English text, and an introduction by Bertrand Russel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Retranslated by David F. Pears and Brian F. McGuinness (same publisher, 1961; reprinted with corrections 1972).

c. 1931–1950.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published posthumouly in the edition of G. E. M. Anscombe and R. Rhees (London: Blackwell, 1953).